BERTIL LINTNER

# 中國的印度戰爭

## 世界屋脊上的衝突
## 亞洲兩大區域強權的角力

# CHINA'S INDIA WAR

## COLLISION COURSE ON THE ROOF OF THE WORLD

柏提爾・林納——著 林玉菁——譯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BERTIL LINTNER

# 中國的印度戰爭

## 世界屋脊上的衝突
## 亞洲兩大區域強權的角力

# CHINA'S INDIA WAR

## COLLISION COURSE ON THE ROOF OF THE WORLD

柏提爾・林納——著　林玉菁——譯

# 前言与志谢

我对喜马拉雅边界争议的兴趣始于一九六七年。当时我是个十四岁的瑞典少年，手写一封信寄到斯德哥尔摩的印度大使馆，询问争议的相关讯息；年纪轻轻就已经对国际事务深感兴趣。我十分好奇，究竟边界争议是如何导致一九六二年那场短促却伤亡惨重的战争呢？

我收到一箱回覆，箱内有整叠的白皮书，其中包含了新德里与北京信件和正式声明的复本，以及详细的折叠式地图，描绘出印度与中国各自主张的领土区域。我开始对区域地理有些了解，并从印度观点建立了对冲突的基本认识：中国对喜马拉雅地区发动了大型攻击，印度是中国侵略的受害者。

战争结果以印度大败收场。然而出乎许多人意料的是，中国并未持续占有东部的占领区。中国将印度军队逐出多数争议区域后，便沿着喜马拉雅山嵴，撤退到旧的实质控制线（Line of Actual Control）之后。尽管今日的中国官方地图仍标示此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印度的行政管理与军事人员却可以重回这些区域，仅有在西边的拉达克（Ladakh），实质控制线的微调倾向中国的利益。

数年后，我在一九七○年代中期读到一本书《印度对华之战》（India’s China War），作者是澳洲英文记者奈维尔．马克斯韦尔（Neville Maxwell），他针对这冲突呈现完全不同的观点。马克斯韦尔认为，虽然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日是由中国发动攻击，战争却是因印度挑衅所起。印度独立后的首任总理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提出「前进政策」（Forward Policy）后，印度便沿着实质控制线建立一连串军事据点，甚至越过控制线。

马克斯韦尔的论点基于一份外洩的印度机密报告，这份《亨德森．布鲁克斯——巴格特报告》（Henderson Brooks-Bhagat Report），是由两位资深印度军官亨德森．布鲁克斯中将（T.B. Henderson Brooks）和普里敏德拉．辛格．巴格特准将（Premindra Singh Bhagat）撰写。报告内容当然支持马克斯韦尔的论点，亦即这场战争是由印度所挑起，中国仅是反击并重申中印边界的领土主权。中国主要是尼赫鲁敌意政策下的无辜受害者。

同时，根据马克斯韦尔的说法，印度对实质争议区域并无主张之权利。这些区域只印在一九三○年代英属印度政府单方面发行的部分（但非全部）地图中，并于一九四七年后，全面印在独立印度政府发行的地图里。在此之前的正式地图中，英属印度的北方边界与中国地图上所展现的边界并无二致，两者同样位于阿萨姆平原的喜马拉雅山脚丘陵。

英国、西藏与中国代表于一九一三与一九一四年，曾在可俯瞰北印平原的高地上，时为英属印度政府夏都的西姆拉（Shimla）召开会议，欲解决西藏地位及边界问题。然而马克斯韦尔、阿拉斯泰尔．兰姆（Alastair Lamb）及其他西方学者皆主张，这几次会议并没有共识，因为中国拒绝接受英国与西藏的提案。

我当时认为马克斯韦尔的书十分具有说服力；不仅文笔流畅、充满细节，同时提供了详尽的注释。当我对此议题涉猎得愈深入，也发现这本书对许多的西方及亚洲学者、决策者影响深远。

毫不意外地，中国领导人对马克斯韦尔的着作赞誉有加。在一九七一年北京的正式宴会中，中国总理周恩来与巴基斯坦总理阿里．布托（Zulfikar Ali Bhutto）由主桌一同起立，前往外国记者座位区。当时马克斯韦尔也在那儿，周恩来上前向他致意，周恩来透过翻译说：「马克斯韦尔先生，你的书讲出了真相，令中国受益。」[1]

就连前美国国务卿季辛吉（Henry Kissinger）也印象深刻，在他的着作《论中国》（On China）一书中，表明对印度的前进政策不予认同。[2]马克斯韦尔[3]在二○一四年的访问中表示，一九七一年《印度对华之战》在美国上市时，季辛吉曾读过此书。

它改变了他（季辛吉）对中国的想法，并将书推荐给尼克森（总统），这些现在都记载在尼克森——季辛吉——毛泽东谈话纪录中（一九七一至一九七二年）。季辛吉访问北京时，周恩来传给我私人讯息，说季辛吉告诉他：「这本书让我知道可以跟你们打交道。」

但进而广泛阅读中印冲突的相关资料后，我开始了解到，马克斯韦尔对一九六二年战争一连串的因果事件描述，完全禁不起严格审视。首先，尼赫鲁的前进政策是为稳定整条中印边界，西起拉达克，东至东北边境特区（North-East Frontier Agency，过去为阿萨姆邦政府下的行政机构，现在属于印度的阿鲁纳恰尔邦［Arunachal Pradesh］）。此政策是在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二日新德里的会议中决定，此时离战争爆发不到一年。这会议由尼赫鲁主持，与会者包含国防部长梅农（Vengalil Krishnan Krishna Menon）、情报局长穆立克（Bhola Nath Mullik）、外交部长迪赛（M.J. Desai）以及新任陆军总司令塔帕（Pran Nath Thapar）。

这显然是场最高层级的重要会议。然而，会后下达军队的指令并非侵略性，而是「（在拉达克阿克赛钦［Aksai Chin］区域）尽可能由现有据点向前巡逻。此举意图建立防止中国持续前进的据点，同时掌握对方可能已于我国领土建立的任何据点」。[4]而西段阿萨姆平原上已建立的新据点，仅驻有相对小型且装备不足的军力，并且多数来自准军事组织

「阿萨姆步枪队」（Assam Rifles）。

因此与其说是印度挑衅中国，更可主张为新中国的共产党领袖在一九四九年取得政权后的侵略行为。一九五○年，中国派出数万军队入侵当时仍为事实独立的国家：西藏。此后，印度与中国两大文明之间不再有西藏扮演缓冲角色，双方领土在歷史上首度直接接壤。

一九五○年代，中国在阿克赛钦区域修筑了一条公路。虽然中、印两国皆宣称拥有这块领土，但此区明显由中国管控，因为印度是在将近一年后，才发现了这条穿越阿克赛钦最高点、连接中国新疆到西藏的新藏公路。由于阿克赛钦除了氂牛游牧民外，并无任何定居人口，因此中国得以在不受注意的情况下建造公路。

但西藏却不同，其平民遭屠杀，佛寺僧院被毁坏。中国在西藏的镇压引发了一九五九年三月的拉萨起义，最后中国人民解放军镇压了抗争行为，杀害数百名僧侣与平民，并导致上万难民穿越喜马拉雅山脉，前往印度寻求庇护。其中包含西藏的精神领袖：神王达赖喇嘛。

中国在西藏起义前（特别是起义后）于西藏各地建立军事据点，其中包含邻近印度领土的区域。中国建造通往印度东方的新路，直达东北边境特区的中印边界上，这很难不令人认为，中国版「前进政策」（虽然并非如此称呼）比印度版更加积极且具侵略性。

马克斯韦尔认为，中国决定攻击的可能日期是「一九六二年十月中，因为印度在多拉（Dhola）建立哨所，激化边界东段的紧张局势。在此之前一切仍旧『平静』」。[5]根据某些地图，多拉位于印度与西藏边界的麦克马洪线（McMahon Line）以北，此边界是一九一四年英属印度与西藏政府代表在西姆拉会议中同意的。当时中国代表只签下开头字母，但未正式签署协定，因为中国并不承认西藏是独立国家。此议题后续未获解决，也影响边界情势发展的正常化。

一九五九年拉萨起义后，中国开始在麦克马洪线对侧与沿线进行各种动作，我不清楚马克斯韦尔对此是否蓄意无视或一无所知。没有任何严肃的军事分析师会认为，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日中国对印度的大规模战争（或开战前数日发生的战斗），会是在人民解放军跨越边界（东段的麦克马洪线及三千公里外西段拉达克实质控制线），前一周或数周所做的决策。

中国对这场战争的准备明显远早于一九六二年十月，甚至比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尼赫鲁提出前进政策的会议更早。即使当地已有新建道路与军事基地，仍需要运输数万名人民解放军及许多吨补给，包含军事重装备，进入世界上最崎岖难行的地理区域。毛泽东总共派出八万名人民解放军进入拉达克及喜马拉雅山东侧，发动对印度的攻击[6]，因此必须建立

且稳固通往西藏后方基地的补给线。

而跨过边界后，中国军队明显熟稔印度军队驻扎地的地形与地势，并清楚如何发动攻势。由于当时中国还无法获取卫星影像或以侦察机得到空中影像，完全得倚靠在地潜伏的特务蒐集情报，在这种地势崎岖且缺乏道路的东北边境特区，必定需要花费大量时间。不过中国特务潜伏对象主要是藏语社群，几乎无法进入以非藏语部落为主的东北边境特区大部分地方。

因此，中国发动攻击的区域有经过仔细选择，而且实际上相当侷限，这与包含印度在内的多数研究认定不同。一般常误解，人民解放军穿越了东北边境特区多数区域，并直抵巴鲁克旁（Bhalukpong）低地，此地为现今阿鲁纳恰尔邦与阿萨姆邦的交界。巴鲁克旁遭到弃守，人民解放军与印度军的最后交火，是在鲁巴（Rupa）以南、靠近邦迪拉（Bomdila）的查库（Chakhu）。在东部的人民解放军并未超过瓦弄（Walong）太多；从中央区域入侵苏班西里（Subansiri）与桑朗（Siang）的武力相对较弱。

这些区域都有一个共同点，在地人口主要是藏语族群或使用藏语相关方言，是战前得以进行人际情报收集的地区。当解放军进入东北边境特区，透过藏人翻译，可与这些留在当地的居民沟通。虽然印度军队由东北山区的所有据点撤出，但解放军并未进入由密什米人（Mishmis）、阿帕塔尼人（Apatanis）、尼伊希人（Nyishis）及其他非藏语部落为主的区域。由于战争开始前的谨慎计画并未得到此地情资，这些部落可能被认定为具潜在敌意的敌方。

中国在一九六二年十月发动攻击前，还採取了其他准备措施。印度军队的约翰．达尔维准将（John Dalvi）与部分军队在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二日遭俘虏成为战犯，直到一九六三年五月才获释。他的着作《喜马拉雅失策：印度最毁灭性军事灾难背后的愤怒事实》（Himalayan Blunder: The Angry Truth about India’s Most Crushing Military Disaster）记载了整段经歷。达尔维被俘送往另一侧之后，得以观察中国如何谨慎准备对印度的闪电攻击。他发现中国已经建立可容纳三千人的战犯营，同时印度所有主要语言的翻译员也于一九六二年三至五月间送往拉萨。远在攻击发生前，不仅有上万名军队事先遣入区域熟悉边界山脉高度，还招募数千名藏人挑夫，并沿着边界建立临时军火供应站。更明显的是，达尔维发现中国兴建了一条可承重七吨货车的道路，直上麦克马洪线附近的马曼（Marmang）。综合种种观察，达尔维最后写下：「并非意外，更绝非在一九六二年九月八日之后才决定。这是中国冷酷算计的谋划之举。」[7]

虽然做成最终决定的时间点，确实可能是在解放军行动的前一周（从军事策略角度思考的确说得通），但重要的是，印度军队在次大陆最偏远角落建立哨站，实在与一九六二年战争毫无关联。此事或许可视为托词，即使如此也相当薄弱。毛泽东更在战争前后告诉尼泊尔与苏联代表团，重点从来不是麦克马洪线或边界争议。中国认为印度对西藏有所图谋，而后者在一九五○年代，正逐步纳入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版图之中。8

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五日，拉萨起义爆发后三周，达赖喇嘛正翻山越岭前往印度，当时的中国政军领袖邓小平，明白在会议中表达了中国立场：「等时候到了，我们会跟他们（印度）清算总帐。」9美国安全与南亚议题专家布鲁斯．里德尔（Bruce Riedel）认为：「也许早在一九五九年，毛泽东就决定将对尼赫鲁採取强硬行动。」10

中国国家安全部的南亚分析师赵蔚文，曾在一九六二年战后写道：「印度热切希望持续英国在西藏的事业。」而尼赫鲁本人「则怀抱黑暗心理」。赵蔚文认为，这些因素导致尼赫鲁在一九五九年表现出「游移不决的态度」。美中关系学者高龙江（John Garver）则引述他的话：「黑暗心理导致尼赫鲁放任『反中势力』不管，试图在西藏煽动骚乱，以此『推翻中国中央政府的统治』。」11

根据高龙江的研究，毛泽东本人也现身一九五九年三月的会议，并表示印度「在西藏做坏事」，因此需要有所处置。毛更进一步告诉在场的中国核心领导，中国此刻不应公开谴责印度。相反地，要给印度足以吊死自己的绳子，「多行不义必自毙」。12中国等待处理印度的时机到来，但首先需要边界另一侧的精确情报。

中国情报行动专家尼可拉斯．艾夫第米亚迪斯（Nicholas Eftimiades）揭露，中国早在军事侵略前两年，已开始派遣特务进入东北边境特区与其他区域。「透过潜伏在边境公路盗匪、挑夫与马队中的特务，解放军收集关于印度军事作战序列、地形地势特徵，以及军事战略等情报。」艾夫第米亚迪斯指出，这些特务「随后在攻击行动中，引导人民解放军穿越边境区域……佯装为藏人的低阶军官早已事先侦查行动区域」。13

「军事侵略前两年」，表示至少是在尼赫鲁提出「前进策略」的前一年，因此「印度的区域行动挑衅中国出兵」此一说法就更难站得住脚。此外，经过数年准备后的最终行动日期：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日，更是精挑细选。此日期与古巴飞弹危机同时发生，而中国透过与苏联领导人的关系早已事先知情。随着苏联在古巴布置飞弹，可以肯定美国必然无力旁顾远在喜马拉雅山脉中发生的战事。14

由于当时中苏关系逐渐恶化，苏联领袖赫鲁雪夫（Nikita Khrushchev）并未亲自告知毛泽东，苏联正遣送飞弹前往古巴。如里德尔书中所写：「直到开战前两天，毛才告知莫斯科，中国将与印度开战。」[15]然而，根据英国分析师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记载，当时中国驻莫斯科大使刘晓「提前告知北京赫鲁雪夫的计画，中国可能早已知晓，因为他们在古巴拥有极好的情报来源」。[16]

中国在东北边境特区的情报蒐集工作，可能早在一九五九年邓小平指示将与印度「清算总帐」前就已展开。根据一九五二年的一份情资报告，当时一个反对达赖喇嘛的西藏异议教派，被送入印度担任「间谍与煽动者」。报告指出这教派「在（一九五○年）占领西藏的行动中，担任（中国的）第五纵队」。[17]

中国显然正准备与印度进行一场长期冲突。然而，一九六二年之后却转成代理人战争，由印度境内的反抗势力进行斗争。看似不可能的伙伴包含在印度极东山丘地带的基督徒部落那迦人（Nagas）。那迦人在费佐（Angami Zapu Phizo）的领导下，高举武器反抗新德里政府，并立即获得印度头号敌手，巴基斯坦的军事援助。此外，那迦反抗军也获许在东巴基斯坦（今孟加拉）设立营地，由此向印度发动攻击。费佐本人则由东巴基斯坦借道瑞士前往英国，在肯特郡的流亡寓所持续与那迦丘陵的指挥官保持联系。

一九六二年六月，那迦反抗军指挥官之一的莫乌．格韦增（Mowu Gwizan）在前往伦敦与费佐会面的途中，停留喀拉蚩（Karachi），并在巴基斯坦接待的介绍下认识了「中国友人」，后者承诺给予那迦人援助与支持。[18]会议之后，那迦人集结一百三十二名兵力，在一九六六年十月从那迦山区出发。他们在数个月的时间里徒步跋涉，穿越缅甸北部丛林，于一九六七年一月抵达云南，接着在当地接受政治与军事训练。一九六七年底，第一批受训的那迦人带着中国制突击步枪、机关枪与火箭发射器返回印度。一九六七至一九七六年间，有超过七百名那迦反抗军前往中国受训，带着大批武力回去对抗印度军队。继那迦人之后，同样来自东北边境山区的米佐人（Mizo）反抗军也跋涉前往中国；他们同样接受军事训练，并带着中国武器返回山区家园。一九七○年代，另一群来自曼尼普尔（Manipur）的反抗军，则在西藏接受中国政治与军事训练。

一九六二年战争前，人民解放军已获取部分发动越境决定性攻击的经验。一九六○年十一月至一九六一年二月，数千名中国军队跨过中缅边界，追击中国国民党余军。这批军队在一九四九年的中国内战败北后，便撤退到缅甸偏远的东北山区，运用跨越中缅边界的庇护，向中国境内发动袭击。由于缅甸也希望驱逐这群入侵者，因此两国军队合作发

起攻击行动，在缅甸代号为「湄公河战役」（Mekong River Operation），中国则称之为「中缅联合勘界警卫作战」（Burma Border Surveying and Security Operation）。

然而作战结果仅有部分胜利，多数国民党余军逃过一劫并退往泰国边界，这也暴露出解放军的弱点：难以在陌生地形环境中开展作战。虽然参与联合作战的部队与一九六二年攻击印度的部队不同，但可以合理推测，中国的战略制定者从此役中获取教训，因此一年后得以在喜马拉雅山区发动更为成功的作战。[19]

若是如此，《亨德森．布鲁克斯——巴格特报告》又是怎么回事呢？这份报告始终列为机密文件，不过我在二○一三年时从一名资深印度记者那里取得了复本。一年后，马克斯韦尔决定将之公诸大众。他将报告的电子文件档公布在网路上，香港报纸《南华早报》则以标题「奈维尔．马克斯韦尔公布文件，显示一九六二年边界战中，印度挑衅中国开战」报导此事。报导甚至令人惊讶地宣称：「（该）记者像史诺登（Edward Snowden）一样，揭露了一九六二年战争的来龙去脉，强化了中国和平崛起的宣示。」[20]

我认为一个人必须拥有强大的想像力，才能从《亨德森．布鲁克斯——巴格特报告》导出，印度是一九六二年战争的侵略者，而中国是受害者的结论。「谁攻击谁」或「谁该为战争负责」等问题，甚至不在这份报告讨论的范畴里。这份报告主要探究了战争的四个领域，以此了解印度为何挫败，分别是：训练军备的可能缺失、指挥体系、军队体能、各阶层指挥官影响下属的能力。[21]

基本上，除了「印度并未准备好面对战争，自然无法抵御中国攻击」外，《亨德森．布鲁克斯——巴格特报告》内容并未延伸太多。它指出印度指挥架构的弱点，政府与军队间缺乏有效合作，但绝对没说印度应该为战争负责，也未质疑整体前进政策。[22]

马克斯韦尔将报告公诸于世后，看起来显然缺乏有趣内容，许多印度记者与研究者开始猜想，是否可能有第二份报告或第一份报告的附录，以提供更多讯息。然而令许多人失望的是，这份报告内容确实不如马克斯韦尔或其他人所宣称。或者如《印度时代杂志》（Times of India）前助理编辑维格斯（B.G. Verghese）在二○一二年所写：「这份报告展现出政治与军事上普遍的天真糊涂、矛盾对立，以及缺乏计画与控制。《亨德森报告》中没什么需要保护的军事机密，只有待隐藏的政军自负及愚蠢。」[23]当我开始审视《印度对华之战》书中的注释后，发现马克斯韦尔所写，与引用资料实际所说确实有出入。

读过马克斯韦尔后，我转向阅读英国学者阿拉斯泰尔．兰姆的着

作，他曾大量书写中印与中巴边界争议。虽然兰姆的书籍文章比马克斯韦尔对边界议题与一九六二年战争的书写来得学术，仍有严重缺失及合理批评。一九六八年，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政治学教授李奥．罗斯（Leo E. Rose）对兰姆的两册巨着《麦克马洪线：中印涉藏关系史，一九○四至一九一四年》（The McMahon Line: A Study in the Relations Between India, China and Tibet, 1904 to 1914）曾如此评论：「当议题涉及当今政治争议时，学术客观性与特别请愿间的界线必然更为狭小，一如这篇研究所充分体现。」无疑地，罗斯对兰姆的作品如此写道：

在当今中印喜马拉雅东段边界争议中，形成中国观点的论述，这并非不受欢迎。中国确实有其道理，而比起北京政府，兰姆先生以更清晰而有说服力的方式呈现此观点。但不熟悉这片鲜为人知边界的非专家读者，必须明确意识到，作者在评估分析事件与结论时有其特别偏向。[24]

对我来说，兰姆对地图细节及划界等相关次要议题几近痴迷，同时模糊了更大的地缘政治图像。当我进一步研究相关议题时，更明晰了解到这其实远超越边界争议；而中国从未意图持有战争期间占领的区域，这块他们宣称是属于中国的领土。

中国军队一九六二年从占领区域中撤军，实际上令军事史家及众人感到不解，一般猜测可能是因为严冬即将到来，或是后方漫长的补给线中断了军事行动。即使有这些困难，中国事实上可以进一步往下推进，来到阿萨姆核心区及布拉马普特拉河（Brahmaputra River）平原。在这个区域里，气候将不成问题，同时能拥有大量粮食。他们可以轻易掌握山脉以南的德兹普（Tezpur）小城，此地机场状况良好，而印度军队及行政机关已弃城离去。

在一九五○年代韩战之后，中国开始积极发展空军，因此在对印战争时已拥有数千架飞机（包含运输机）。这些飞机部分由苏联输入，其他则是经过授权在中国制造。[25]虽然并无迹象显示一九六二年时中国曾派机进入西藏（当时西藏仅有五个可运作的机场），或许是人民解放军缺乏空军驾驶，但美国情报单位相信：「若中国空军可从缅甸进行任务，或是掌握布拉马普特拉河谷的机场，能力将大幅提升。」[26]美国报告也指出，对印作战时，亦可运用中国西南省分云南与四川的机场。

然而中国意图并非征服占有土地，这不是中国领导人决定攻击印度时的本意，而是在地缘政治上发出重要一击，这已足够。尼赫鲁这位一九五○年代不结盟运动的主要推动者遭到羞辱，再也不是亚非新兴独立国家的领头羊；他从一九五五年印尼万隆的歷史性会议后，一直扮演这个角色。经过一九六二年战争，中国取代印度成为第三世界的领袖。

「第三世界」一词也是由中国无所不能的毛泽东主席提出，以此取代旧有的不结盟概念。而第三世界的领袖，自然是毛泽东所带领的中国。

中国领袖决定与印度「算帐」（引述邓小平的话），并动用战争准备的时机点，必须放入当时中国内政问题的脉络来理解。一九五八年，毛发动灾难性的「大跃进」，意图带动中国现代化。一九六一年，约有一千七百万至四千五百万人死于毛的政策之下；大跃进带来了饥荒，而非预期的任何快速工业化进程。

毛不但失去声望，甚至面临可能下台的处境，他深觉需要重掌权力，而最好的方式莫过于团结国家（特别是军队），共同对抗外侮。印度是个「软」目标，它在一九五九年才刚提供因反中侵藏起义失败而出逃的达赖喇嘛政治庇护，并允许西藏神王在北印度的麦克罗甘己（McLeodganj）建立流亡政府；此外还有中国不承认的边界争议。

马若德在中国文化大革命起源的详实歷史着作中写道，中国的内政与外交政策间常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在毛泽东的世界观中，中国革命是一连串全球事件的一部分，并且有着双向影响。然而马若德也指出，中国军事行动与内政的连结经常隐而不显。根据其说法：「中国参与一九五○年爆发的韩战，让中国共产党领袖得以发起爱国行动，团结身后的人民。」[27]

韩战爆发于一九五○年，正好是共产党取得中国政权后一年，并持续至一九五三年。当时中国新统治者首要之务在于巩固权力，并为尚未获全民爱戴的政权赢得支持。因此数万人上街头举行反美示威，同时估计在韩战方兴未艾的半年中，有七十一万人被标籤为旧政权相关的反革命者，遭到处决或被迫自杀。[28]

灾难性大跃进后的情势有些雷同。一场胜仗对毛及其支持者来说有如天赐大礼。虽然战争与毛重新掌权之间的直接关联，仍有待中国内部文件证实，但毛确实在一九六二年战后重新掌握了党与国家的大权，部分敌人遭到清算，部分仍存活。因此毛泽东在一九六六年发起伟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一步将所有政治对手消灭，并在中国上升到接近神的地位。

考虑到中国的区域野心与当时的内政情势，任何严肃的观察家与分析师都很清楚，边界争议不过是发动一九六二年战争的藉口。然而同时我们也须谨记，中国的态度一向认定自己是对的，任何挑战中国说法的企图，都会被视为「挑衅」。不论出于任何原因，只要不为中国所喜的条约都视为「不平等」，因此也不会遵守。

身为专长亚洲区域安全议题的记者，不难察觉中印边界争议与南中国海主权争议之间的相似性。今日的中国也许比一九六二年时更为开

放，意识型态也比较不僵硬，不过它对待邻居的方式仍然不变。

中国从未控制或统治印度东北任何区域，但今日却如此宣称，并在地图这样标记；这与南中国海的斯普拉特利群岛[29]的情势发展惊人相似。中国在地图上以大U字型，宣称将斯普拉特利群岛几乎全数纳入领土；今日台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与汶莱均宣称拥有全部或部分岛屿。而根据北京说法，「挑衅」的是这些国家，而非中国。

中国发言人坚称，根据十五至十六世纪的明代文件证实，中国统治整个南中国海地区。然而此说绝非事实。明朝皇帝对海洋事务并不上心，在十五世纪中国短暂的海权时期，探险家郑和带领舰队航向南亚、东南亚、印度次大陆、阿拉伯半岛，甚至远及东非海岸。郑和的助手马欢留下详细纪录与地图，罗列东南亚与印度洋超过七百个地名，包含安达曼（Andamans）、尼可巴（Nicobars）、马尔地夫与拉克沙兑普（Lakshadweep）等岛群中的偏远小岛屿。[30]

中国制图家十分清楚斯普拉特利群岛的存在与位置，马欢也提到它们，但并不如纪录中的其他地方详细。原因十分简单：斯普拉特利群岛并非岛屿，而是捉摸不定的沙洲浅滩与暗礁，古代水军必须绕行以避免沉船。然而，此一事实并无法阻止中国做出惊人宣言，最近同时更透过在浅滩暗礁建立人工岛屿，实质巩固其主张。任何反对意见都将被视为干涉中国内政。

二○一六年七月，海牙的国际仲裁法院回应菲律宾提出的指控时，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发现中国对南中国海并无可信的「歷史权利」。法庭指出并无证据证明，中国曾行使此种专属主权性质的权利。北京政府对此则愤怒回应，宣称判决是场「闹剧」，并宣布中国在海洋中的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不受判决影响。[31]中国官媒《人民日报》刊出措辞严厉的社论，坚称仲裁庭「忽略基本事实」，「践踏」国际法，因此「中国政府与人民坚定（反对）判决，不承认也不接受」。[32]

喜马拉雅山区也许不会爆发另一场战争，但中国在南海的不妥协态度与行径，极可能导向另一场区域冲突，而且比今日所见更加严重。此外，中国更是世界上最主要的水坝建造者。许多河流由西藏、云南流往下游国家，中国常未先谘询这些国家便建坝拦水，甚至有计画将西藏的水大规模导向中国核心地带。

西藏就如同西方非政府组织Maptia所指出：

是世界独特的大量淡水提供者，透过河流进入中国与十几个下游国家。西藏是亚洲河流的主要源头，此外更透过支流注入其他河川（例如恒河），地球上找不到任何类似情况。我们只有一个西藏，没有备援，

也没有第二次机会。33

还有事实独立的台湾，是否真如北京宣称，是中国的一部分呢？再一次，在这些议题上，中国认为抱持其立场以外的意见，都是干涉内政。

由于今日地缘政治现实牵涉甚广，我们更需要回头研究喜马拉雅山区冲突的缘起与发展。如今中印仍旧是强大的区域对手，而两者之间的敌意，开始于半个世纪前的喜马拉雅山区。

有关边界争议的研究使我前往阿鲁纳恰尔邦、锡金及印度西孟加拉邦的北部地区；也曾进入缅甸的克钦族领域、中国云南省、尼泊尔与不丹。伦敦大英图书馆馆藏的印度办公室档案（India Office Records）是资讯的宝库。记者身分无法进入西藏，但我详细研究中国文献与地图，试图找出北京主张的背景与歷史纪录。研究途中曾有许多人提供协助，由于人数众多无法一一志谢，而且因为议题敏感，多数要求保持匿名。

即使如此，我想感谢鲁巴的多吉．堪卓．腾多（Dorjee Khandu Thongdok）。中国攻击鲁巴时，他逃出故乡，后来也写下这段故事。我在达旺（Tawang）遇到两名还记得一九六二年中国占领他们家乡的藏人。一位瓦弄村民与我分享战争期间发生的事。大吉岭有名年长藏人，比我认识的任何人都还清楚边界情况。还有锡金甘托克（Gangtok）的地方官员。在西孟加拉邦北部的西里古里（Siliguri），我遇见阿比吉．马遵达（Abhijeet Mazumdar），他是已故拿撒尔人（Naxalite）运动领袖查鲁．马遵达（Charu Mazumdar）的儿子。过去我也无数次访问印度东北地区的那迦、米佐与曼尼普尔反抗军，他们曾经在一九六○与一九七○年代前往中国受训。同时，我也有机会访问了阿萨姆联合解放阵线（United Liberation Front of Assam）反抗军，包含最高领袖阿拉宾达．拉吉科瓦（Arabinda Rajkhowa）与派瑞许．巴鲁亚（Paresh Barua）。在尼泊尔，我拜访退休记者作家卡纳克．马尼．迪克西（Kanak Mani Dixit），以及其他当地媒体与研究区域暴力冲突的国际组织；同时也造访了尼泊尔南部的难民营，此地从一九九○年代初期，就收容许多来自不丹的尼泊尔裔难民。在不丹，我有机会与数位政府官员讨论中国相关议题，然而对方希望维持匿名。西藏专家朱利安．吉林（Julian Gearing）协助我探索错综复杂的西藏派系这困难任务；喜马拉雅山区的佛教世界常令外来观察者感到扑朔迷离。同时，我也想感谢阿拉斯泰尔．兰姆。二○一六年一月我在大英图书馆进行研究时遇到兰姆教授。虽然我不同意兰姆的论点与结论，但他慷慨分享资讯，甚至送了我一些相关书籍。我从未试图联系奈维尔．马克斯韦尔，除了《印度对华之战》，我还读了他另一本较不为人所知的着作《中国边界的解决与冲突》（China’s Borders: Settlements and Conflicts），以及过去数

年发表在《经济政治周刊》（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的文章。34

当然，面对中印争议如此炙手可热的冲突性议题，充斥许多相互矛盾的歷史与当代纪录，我们很难达到完全精确无误。但我尽一己之力，在此呈现冲突的完整细緻样貌：冲突为何及如何开始；冲突转变后的样貌；冲突在当今亚洲现实中所代表的意义。倘若有任何事实出入，那么都是我的责任，与任何口述或书面资料来源无涉。

1 Debasish Roy Chowdhury, ‘Neville Maxwell discloses document revealing that India provoked China into 1962 border war’,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31 March 2014, available at http://www.scmp.com/news/asia/article/1461099/neville-maxwells-revelation-reveals-india-was-hidingnothing-over-its-1962 (accessed on 3 April 2016).

2 Henry Kissinger, On China (London: Penguin, 2012), pp. 187–9.

3 Debasish Roy Chowdhury, ‘Neville Maxwell: The full transcript’,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31 March 2014, available at http://www.scmp.com/news/china/article/1461102/neville-maxwell-interview-full-transcript (accessed on 3 April 2016).

4 Bruce Riedel, JFK’s Forgotten Crisis: Tibet, the CIA, and the Sino-IndianWar (New Delhi: HarperCollins India, 2016), p. 88.

5 Neville Maxwell, India’s China War (Harmondsworth, Middlesex: Penguin, 1972), p. 380.

6 Eric S. Margolis, War at the Top of the World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p. 229.

7 John P. Dalvi, Himalayan Blunder: the Angry Truth About India’s Most Crushing Military Disaster (Dehra Dun: Natraj Publishers, 2010) pp. 152–4.

8 Riedel, JFK’s Forgotten Crisis, p. 98.

9 Quoted in ‘The Politico-Diplomatic Prelude Part-2’, P.J.S. Sandhu, Bhavna Tripathi, Ranjit Singh Kalha, Bharat Kumar, G.G. Dwivedi, Vinay Shankar (eds.), 1962: A View from the Other Side of the Hill (New Delhi: Vij Books India, 2015) p. 24.

10 Riedel, JFK’s Forgotten Crisis, p. 101.

11 John Garver, ‘China’s Decision for War with India in 1962’, Alastair Iain Johnston and Robert S. Ross (eds.),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China’s Foreign Polic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90–1.

12 For Garver’s excellent study of the 1962 War, see his essay ‘China’s Decision for War with India in 1962’, p. 93.

13 Nicholas Eftimiades, Chinese Intelligence Operations (Ilford, Essex: Frank Cass, 1994), pp. 90–91.

14 Riedel, JFK’s Forgotten Crisis, pp. 105–7, 114, 119.

15 Riedel, JFK’s Forgotten Crisis, p. 107.

16 Roderick MacFarquhar,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3: The Coming of the Cataclysm 1961–1966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nd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317.

17 ‘A Tibetan Communist Plot’, Kenneth de Courcy (ed.) Intelligence Digest: A Review of World Affairs, New York, October 1952, p. 4.

18 Author’s interview with Mowu Gwizan, Kohima, 18 October 1985.

19 For an account of the Mekong River Operation, and a list of the PLA units that

participated in the campaign, see this unusually detailed account in Wikipedia: 'Campaign at the China–Burma border (1960–61)', available at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ampaign_at_the_China%E2%80%93Burma_border (accessed on 15 April 2016).

20 Chowdhury, 'Neville Maxwell discloses document revealing that India provoked China into 1962 border war', 2014.

21 V.K. Singh, Leadership in the Indian Army: Biographies of Twelve Soldiers (New Delhi: Sage Publications, 2011), p. 280.

22 See the Henderson Brooks–Bhagat Report, available at http://www.indiandefencereview.com/wp-content/uploads/2014/03/TopSecretdocuments2.pdf (accessed on 15 April 2016). For a reference to the Forward Policy, see p. 8 and p. 10, where it is stated that 'it is obvious that politically the "Forward Policy" was desirable and presumably the eviction of the Chinese from Ladakh must always be the eventual aim'.

23 B.G. Verghese, '50 Years after 1962: A Political Memoir', South Asia Monitor, 23 September 2012, available at http://pragati.nationalinterest.in/2012/10/50years-after-1962/ (accessed on 15 March 2017).

24 Leo E. Rose, 'The McMahon Line: A Study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India, China and Tibet, 1904 to 19145', Pacific Affairs, Vol. 41, No 1 (Spring), 1968, pp. 132–3.

25 Li Xiaobing, A History of the Modern Chinese Army (Lexington: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2007), pp. 109–10, 125.

26 'The Chinese Air Threat', P.J.S. Sandhu, Bhavna Tripathi, Ranjit Singh Kalha, Bharat Kumar, G.G. Dwivedi, Vinay Shankar (eds.), 1962: A View from the Other Side of the Hill (New Delhi: Vij Books India, 2015), p. 119.

27 MacFarquhar,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3, p. 297.

28 Philip Short, Mao: A Life (London: Hodder & Stoughton, 1999), pp. 435–6.

29 译者注：西方称为斯普拉特利群岛（Spratly Islands），华人称之为南沙群岛，越南称为长沙群岛。

30 Ma Huan, Ying-hai Sheng-lan: The Overall Survey of the Ocean's Shores (Bangkok: White Lotus, 1997). This is a reprint of a work compiled in 1935 by the Chinese scholar Feng Ch'eng-chun.

31 The ruling can be found at https://www.documentcloud.org/documents/2165479-phl-prc-press-release.html (accessed on 18 September 2016). See also Tom Phillips, Oliver Holmes, and Owen Bowcott, 'Beijing rejects tribunal's ruling in South China Sea case', The Guardian, 12 July 2016, available at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6/jul/12/philippines-wins-south-china-sea-case-against-china (accessed on 20 July 2016).

32 Phillips et al., 'Beijing rejects tribunal's ruling in South China Sea case'. The response from the Chines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is available at http://www.fmprc.gov.cn/mfa_eng/zxxx_662805/t1379492.shtml (accessed on 20 July 2016).

33 See https://maptia.com/michaelbuckley/stories/stealing-tibet-s-rivers (accessed on 30 May 2016).

34 These books and articles are listed in the Select Bibliography.

# 第一章　未必是边界争议

棒山口（Bumla　　Pass）位于海平面五千公尺之上的喜马拉雅山东翼，盘踞在分隔印度次大陆与西藏高原的崎岖山巅。更加高耸锐利的山峰在一段距离外，沿着形成今日中印间实质控制线的分水岭拔地而起。此高地空气稀薄，邻近并无人居，唯一冒险来这里的当地人是半游牧犛牛牧民。夏季的高山坡地由青草取代白雪，放牧季节他们会带上牲口，在中印掌控的领土间自由来去。

其他访客若无印度政府核发的特别通行证，就不得进入棒山口。这里是高度军事警戒区，通往山口的狭窄道路上，行驶的几乎都是军用卡车与吉普车。山口南方边缘设有一群厚实建物：会议厅、瞭望台及警哨。一块告示板标志出印度控制结束的地点，牌上显示印、中两国国旗及一句话：「两大古老文明邻国。印度与中国，进步的伙伴。」[35]位在中印边界上的棒山口，是少数能让两国军官会面讨论共同议题或欢庆彼此国庆的地点。中国在会面时会搭设帐棚，活动结束后随即拆卸；面向山口的对侧则没有任何实体建物，因为对中国来说，那将代表承认山峰就是两国之间的正式边界。

这是麦克马洪线，以一九一三至一九一四年西姆拉会议的英国主要谈判官，亨利．麦克马洪（Henry McMahon）命名。英国与西藏承认这条边界，但后续的中国政府并不承认。一九六二年战争最决定性的一场战役就发生在棒山口。

那场战役在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三日清晨爆发，山口北侧的中国军队向印度军队发动强大砲火，爆炸照亮夜空，响声在山棱间迴音缭绕。天亮之后，中国已取下最近的印度据点，当时那里是由准军事组织「阿萨姆步枪队」的三十名成员负责防守；十七人当场死亡，十三位存活者则遭俘虏。另一支较强的锡克军团则驻扎在离山口实际地点一段距离以外的地方，他们发动强力反击直至弹尽援绝，最后不得不撤退。[36]

中国人民解放军带着六个步兵团与一个独立营的总军力，以压倒性的武力开始往前推进，过程并未遇到太多阻碍。印度在此区域驻有数百名军士，但配备落后，而且从南方阿萨姆平原到此处的补给线漫长险阻，仅有吉普车与驮兽队能上到达旺，当时东北边境特区西北段的主要城镇（如今东北边境特区已成为印度的阿鲁纳恰尔邦）。解放军在达旺并未遭到抵抗，因为印军在棒山口之役后已连夜撤退。达旺在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四日落入解放军之手。

实际上，中国对边界印度据点的攻击始于十月十九日，当时达旺西北方的印度据点已遭砲击。次日中国接着对棒山口以西、靠近不丹边界

的塔格拉山嵴（Thagla Ridge）发动勐烈砲火与步兵攻击；当天早晨同一时间，其他中国军团则攻击印度次大陆的另一侧，印度在喀什米尔西北角拉达克地区的据点。因此战争并非限于东北边境特区（虽然东部前线的损失最为惨重）。在塔格拉山嵴，解放军几乎歼灭整个印度军队第七旅，并俘虏指挥官约翰．达尔维准将。印度无力抵抗解放军较强的火力攻击，其东北边境特区西段防线一片混乱。

对解放军来说，想提供军队补给并不像印度军队那么艰困，因为中国在攻击前数年已经铺设道路通往此区。在东翼有好几条路直通实质控制线，直接面向对侧的印度东北边境特区；在西翼也早已建好一条穿越阿克赛钦的公路，连接新疆与西藏。

随着塔格拉山嵴与棒山口的印军防卫溃散，人民解放军可以直下达旺。海拔高三○四八公尺的达旺属于高山区域，由于在更高山峰与边界隘口的笼罩下，是一处相对肥沃的谷地。解放军取得达旺附近区域后，数千名挑夫、建筑工、推土机和重工具，开始源源不绝跨过棒山口。中国採用每日三班轮调不休的方式，仅花十三天就穿越极端崎岖的山区地形，建出一条将近四十公里的道路，连接了棒山口与达旺。人民解放军的卡车此时可开抵达旺，此处成了中国的主要补给基地。接着解放军往南推进，目标是达旺南方七十八公里处、位于战略位置的色拉山口（Sela Pass）。经过一场激斗后，色拉山口也落入中国手中。十一月十九日，势如破竹的中国军队来到达旺以南一百七十公里的邦迪拉，当时人民解放军距离阿萨姆与肥沃的布拉马普特拉河平原，仅有数天路程。

随着中国入侵东北边境特区的极东角落，战争开始扩大。十月二十二日，中国对基比图（Kibihtoo）的印度据点发动攻势，此地位于瓦弄小城以北，靠近缅甸边境。经过一段休战时期，人民解放军于十一月十三日再度往前推进，三天后攻下瓦弄，并夺下当时印度称为苏班西里与桑朗边境分区（Subansiri and Siang Frontier Division）的数个村庄。此区域位于东北边境特区的中段，北方紧邻实质控制线。

印度侧陷入一片惊慌。由于不敌人民解放军的优势军力与火力，东北边境特区的防卫完全崩溃，印军从整个区域撤退。许多人相信解放军会直下阿萨姆，夺取油田、茶园、苎麻庄园及其他资源。即使布拉马普特拉谷地的驻军城市德兹普早已疏散，印度只能等着看似无法避免的喜马拉雅崩溃发生。

中国的攻势不仅在印度东方边界东北边境特区与西藏间的据点。查穆与喀什米尔邦（Jammu and Kashmir）东北角的拉达克阿克赛钦区域，一处偏远的印度据点也遭到攻击。十分钟后，中国地面部队展开战斗，此据点随即被攻下。根据印度消息来源，该据点的防卫武力并没有

任何砲火或迫击砲，仅用小型军火从开放壕沟反击。[37]防卫连中没有任何印度士兵活着或成功逃离战场。六十八人中有三十六人死亡，其他人则受伤或被俘。

随着一开始在拉达克的成功，中国也往前推进，从北、南、东三方向区域中其他印度据点发动多面攻击。战前中国就在此区进行绵密的情报蒐集，加上在占据西藏的数年间，中国军队预备对印度的战争，已然习惯此地高度。同时，他们显然也受过训练，学习如何破坏尚未全面建构完成的印度防卫网络。[38]

十月底时，中国军队已占领上印度河谷地东翼冈底斯山脉（Kailash Range）的多数战略地点，包含了空喀山口（Kongka Pass）及通往班公措（Pangong Lake，超过四千公尺的高山内陆咸水湖）的区域。四个营的印度军力遭到歼灭，其他则由高原据点撤出。休兵一段时间后，中国重整军力强化防线，并输入更多补给。十一月十八日，中国再次出击，同样运用多面向攻击，包围击溃区域里仅存的印度据点。

然而就在隔日，当人民解放军抵达邦迪拉时，中国总理周恩来在官邸召见驻北京的印度代办班纳吉（Purnendyu Kumar Banerjee）。周恩来告诉班纳吉，中国将于十一月二十一日宣布熄火停战，并将所有军队撤到实质控制线以北二十公里的据点。之后中国履行承诺，战争就此结束。人民解放军在数周内撤回山脉另一侧的中国控制区。

此举不仅震惊印度，更令全球许多政治军事观察家讶异。究竟是什么原因驱使中国发动攻击，造成了如此短暂却残酷血腥的战争？根据中国的纪录，印度死伤人数为四千八百九十七人，被俘者为三千九百六十八人；新德里国防部公布的伤亡数字则是一千三百八十三名军人阵亡，一千零四十七名伤者，一千六百九十六人在战斗中失踪，被俘者数字则与中国公布相同，为三千九百六十八人。人民解放军的伤亡数字远低于印度军队，根据中国资料，死者七百二十二人，伤者一千六百九十七人，没有军士遭俘。正如美国军事史学者伍尔泽（Larry Wortzel）与中国学者程锋（Cheng Feng，音译）所指出，此为「战争史上少见之事」。[39]

然而，中国的攻击不应视为全然意外之举。中国入侵印度宣称所有的领土，可追溯到一九五○年代中期。除了知道一九五七年中国已在西部建造一条一百七十九公里、穿越阿克赛钦的公路；中印边界首次冲突发生在一九五九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国巡逻武力攻击东北边境特区的朗久（Longju）哨所。同年十月二十一日，拉达克的空喀山口发生驳火事件。朗久冲突导致印度两人阵亡，空喀山口冲突则有十七名印度士兵死亡。中国宣称此举为「自卫行动」；另一方面，印度表示遭到中国「勐

烈的突然攻击」。[40]

想了解一九六二年战争起源及中印冲突与敌对关系，关键在仔细观察棒山口告示板上所写的字句。即使板上写着应该扮演「进步伙伴」的两个「古老文明邻国」，但从两国歷史、社会结构与政治文化来看，我们很难想像比中国与印度更加迥异的文化。

许多世纪以来，印度兴衰荣败的王国与帝国，总是拥有诸多语言与不同宗教的高度多元国家。多数语言都有自己的拼音文字，各不相同。即使到了今日，「多元中团结」仍是印度立国的理念。没有任何单一宗教、语言或政治团体能够独占权力，而这正是印度得以长久维持民主制度的原因。

另一方面，中国长久以来则由单一族群（汉人）主宰的帝国统治。数世纪来，汉人征服（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吸纳）了其他少数民族。中国最后一个王朝清朝的确是由满人建立，与前代统治者相比，清朝时（一六四四至一九一二年）国家呈现部分多元文化性格。其他非汉人王朝（辽、金、元）可能也是例外。虽保有部分族群认同，满人菁英同时也习得所有传统中国统治者的表象。他们使用标准中文，到了十九世纪，满语几乎在中国消失。即使如此，反清运动领导人之一的孙逸仙医师，仍在一九○四年写下运动目标之一：「驱逐鞑虏」（即满人）。[41]一九一二年清朝遭推翻，孙逸仙医师成为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统。此后数十年，许多满人后代试图掩饰自己的族裔出身，顺应汉人习惯与文化。[42]

中国各地方言互有相异，其中部分如广东话、客家话与福建话可能无法相通，而且与「标准」中文相当不同，但以语素（logogram）而非拼音文字为主的书写系统，仍旧适用于全国各地。在政治文化上，中国长期由权威性思想体系主导，包含过去的儒家或共产主义，或今日的后共产极权资本主义。

这并不表示中国社会必然与民主价值不相容。台湾正是一个明显案例，展现出中国文化国家也能摆脱极权专制，成为亚洲最蓬勃发展的民主国家之一。然而，一九六二年中印冲突期间的中国却是残暴独裁政权，背后更有漫长的极权统治歷史。即使一九八○年代「走资派」邓小平启动开放市场改革，为中国带来了惊人的经济自由化，这点仍旧没有改变。

印度在一九四七年独立后，仍维持英国统治时代引进的许多制度，例如民选国会与专业司法体系。英国离开后，这些制度发展完全走向民主，而非由外国势力掌控，逐渐成为拥有许多政党的议会民主政体。印度军队现今虽全数由印度人指挥，仍深受英国殖民时代的军团传统影响。指挥体系维持不变，以族群为基础的军队编制也获保留，并加入新

的编制。最重要的是，印度从独立之初便建立了军队由文人政府控制的原则。

英属印度军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与亚欧的英国军队并肩作战。印度独立之后，其军队也参与联合国维和任务，包含一九五○年代中期前往中东，一九六○年代初期前往刚果，一九五○年印度曾将一组医疗队派往韩国。冲突结束后，科丹德拉．苏巴亚．提马亚中将（Kodendera Subayya Thimayya）出任联合国成立的中立国遣返委员会主委。提马亚中将被朋友及一般大众暱称为「提米」，他受训于英国桑德赫斯特军事学院，二战期间是英属印度军队中唯一的步兵旅指挥官。提马亚获得英国皇室颁发杰出服务勋章，并在报导中表彰其对抗日本的精采表现。

一九五四年，印度派遣一个步兵营与支援人力前往印度支那（包含越南、寮国与柬埔寨），协助监督停火及战犯遣返。这次行动并未涉及战斗，主要任务是在印度支那监督执行一九五四年日内瓦协议（1954 Geneva Accord）。印度持续与加拿大、波兰人员共同推动工作，直到一九七三年。[43]

印度在一九四七年甫独立之际，其军队在边境与巴基斯坦因喀什米尔问题展开一场艰苦战争，而维安武力也用来统一部分拒绝加入独立印度的前大公国。一九五○年代中期，印度派军队前往邻近缅甸的东北边境，镇压那迦山地的分离主义反抗军，后来演变成与当地部落游击队的长期拉锯战。一九六一年，印度军队接收印度西海岸上的三个葡萄牙飞地：果亚（Goa）、达曼（Daman）与迪乌（Diu），紧接而来的是一九六二年与中国的冲突，以及自一九四七年后再次与巴基斯坦展开战争。

整体而言，印度军队是远离政治的专业军队，其主要目标在于保卫国家疆界，以及捍卫民选政府认定的国家安全利益。即使是退休军官，也倾向成为智库的安全分析师，而非从政。

另一方面，战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理想典型，则展现在虚拟士兵雷锋的个人形象上。[44]这名脸颊红润的谦逊人物会一手拿扳手修理军用卡车，另一手拿着毛主席的着作。他的目标，以他的话来说，就是「为党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45]雷锋的故事与神话在今日看来也许滑稽，但中国歷经了政治变迁却也未曾改变。即使到现在，中国依然将三月五日定为「学雷锋纪念日」。

不论有无雷锋其人，人民解放军正如其名所暗示，是在一九二○年代第一次国共合作末期设立，以意识型态驱动的「人民军队」。在周恩来、贺龙与朱德的领导下，部分国民党军队在南昌起义中反叛国民政府，虽然遭到镇压，但在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被称为「中国工农革命

军」的共产党武力正式成立。这支军队后续简称为「红军」，曾多次与国民党军队作战。一九三四至一九三五年，红军从中国南方江西旧部展开漫长的军事撤退，前往北方陕西省的延安，获得进一步强化。这段广为人知的「长征」，在三百七十日中穿越了九千公里。最终抵达延安的八千人中，有七千人来自一九三四年十月从南方出发、原本有八万六千名军士的队伍。疾病、饥饿、政府军战斗及当地军阀势力等，都让红军损失惨重。

在延安防御良好的新基地里，红军被改造为一支难以对付的武力。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五年的抗日战争中，红军曾与蒋介石的国民党军队合作。在一九四五年日本战败后，国共内战再次爆发，此刻这支革命军以「人民解放军」闻名。就在二战刚结束、内战方兴之际，共产党军队已拥有超过九十万正规军与两百万民兵。46

之后国民党战败，蒋介石逃亡至台湾岛，他的中华民国政权也带着「有朝一日光复大陆」的无望渴念，在岛上持续下去；然而这期望未曾实现。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在数十万欢呶群众之前，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并说：「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47

中国官方歷史盛赞毛泽东为军事天才，实际上不过是个迷思，更是一九六○年代围绕着毛而发展出来的个人崇拜之一。毛泽东是政治而非军事领袖，红军与人民解放军的实际创建者与指挥官是朱德（出身中国南方云南四川省的军阀，在南昌起义中加入中国共产党）。朱德的革命事业起于中国最有力的秘密结社之一，他曾是哥老会的袍哥，还沉溺于鸦片，直到一九二○年代初期才前往上海接受治疗。形塑了游击战操作原则的并非毛泽东，而是朱德（尽管他的人品可疑），使下面这段简要箴言传扬于世：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48

直到一九五四年，朱德才卸下人民解放军元帅的职务，此后担任数项党政职，之后于一九六○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到斗争清算。毛泽东虽非军事领袖，但他对共产党军事原则的贡献，则来自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于中共中央委员会提出的知名口号：「枪桿子里面出政权」。49这句话从此成为全世界革命运动的指导原则。（而自从马克思本人提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后，支持其他国家革命就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信条。）

一九六二年在喜马拉雅山区发生冲突的两支军队与其指挥官，迥异之处正如南辕北辙，这是战争中极重要却遭忽视的面向。这是两个文明间的冲突，而非只是「争夺喜马拉雅偏远山巅控制权」或「中印界线究竟该怎么划」的战争。

以色列学者亚可夫．维兹伯格（Yaacov Y.I. Vertzberger）认为尼赫鲁未能认清中印之间的文化与歷史差异，因此粗糙地误判中国的意图。尼赫鲁的观点存在着客观、普世接受的国际法律体系，认为若印度以地图与条约支持自己的主张，中国终将承认印度在法理上站得住脚。相反地，中国从未在意过国际法，不论是当时（如维兹伯格的一九八○年代研究指出），或者更晚如近期的南中国海争议所见。根据维兹伯格的研究，尼赫鲁同时也未能完全了解「印度争取独立及中国击败日本与国内反动势力（国民党）这两个过程的根本差异」。[50]

印度透过公民不服从运动争得独立，血腥暴力不多，也因此让殖民政权与独立运动形成类似相互友好尊重的关系；另一方面，毛泽东与共产党的经验则截然不同。根据维兹伯格所述：「因此，印度可以在思想上拒绝英国殖民主义，却仍採用英国人留下的部分表象，如政治文化、边界与地缘策略思考。」[51]尼赫鲁「接纳英国的地缘策略思考，因为对他来说，过去与现在是延续的」。[52]然而对中国来说，延续这概念并不存在。在一九四九年共产党赢得胜利前，与外国势力签订的任何条约，确实可被视为「不平等条约」，因此新政权并不须履行。毛泽东本人早在一九二五年，就于九项基本原则中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53]

一九五○年代末期，当印度外交官与学术研究者忙着起草各式白皮书，欲证明印度对于边界争议的诠释禁得起歷史检视时，中国正在备战。[54]对中国来说，边界问题诉诸法律途径，不过是场「虚伪骗局」。[55]维兹伯格认为，履行「不平等殖民条约」对中国毫无意义，因此也从未承认麦克马洪线。中国仍主张今日阿鲁纳恰尔邦多数区域属于中国，并持续在所有正式地图中，划定中印边界在山脚边。

支持中国说法的人（包含马克斯韦尔与兰姆）指出，这也约莫是英属印度时代及部分印度独立后的地图所划的边界之处。讽刺的是，援引旧地图与条约的马克斯韦尔与兰姆其实与尼赫鲁同样误判，只是导出不同的解读。即使是中国说法的狂热支持者，也难以宣称在旧地图上确实存在中印国际边界，并由中印（或英属印度）的移民关税官员把守关口。认定英属印度时代西藏就是中国一部分的人，也难以论证这区域是在拉萨治下。

英国国家广播公司孟加拉语服务前总监马赫穆德．阿里（S. Mahmud Ali），在其讨论中印冲突颇具权威性的着作中指出，直到一九五一年，东北边境特区是由「西藏喇嘛治理」。[56]这是对当时现实状况的重大误解。没有任何西藏喇嘛曾统治过中国宣称所有的区域。西藏收税官驻扎在达旺及最西侧的少数地方，喜马拉雅山巅附近的少数村落也曾缴纳土地税，这是中央集权西藏政府能抵达的最远极限。今日中国政府称阿鲁纳恰尔邦为「藏南」，这是过去从未存在的概念。

除了间谍外，中国人在一九六二年战前曾出现此地的唯一纪录，是在一九一○至一九一二年间。清帝国末年，中国曾派遣军队入藏，这次侵藏是由赵尔丰领军，因其残暴镇压藏人的行径，被称为「赵屠夫」。一九一○年，赵尔丰的军队抵达拉萨，根据歷史学家约翰．罗兰（John Rowland）的纪录，「当神王（达赖喇嘛）与随从骑马出逃锡金时，一小群藏兵为其断后。」[57]达赖出逃印度，受到加尔各答英属印度政府的庇护。

赵屠夫于一九一一年离藏，前往四川镇压叛变，结果反遭革命军逮捕处决。然而部分中国官员直到一九一二年才离开西藏，并穿过喜马拉雅山脉，抵达后来成为东北边境特区的极东区域。他们在瓦弄的东南方竖立边界柱之后撤退。

一九一四年一月，这些边界柱由英国行政官欧卡拉罕（T. O'Callaghan）移除。除此之外，他还穿过分水岭，进入藏边的力马（Rima）与当地西藏官员面议，但并未见到任何中国势力。[58]

欧卡拉罕移除边界标记的前一年，弗雷德里克．马士曼．贝利上尉[59]与亨利．特雷斯．摩谢德（Henry Treise Morshead）带领英国探险队，前往测绘瓦弄以西及西北区域。他们发现西藏官员对于英国入侵此区（甚至西藏本土）有所警觉。

贝利留下与西藏官员的交涉纪录[60]中写道：

他问我们是否将在米培（Mipi）或洛希特河谷（Lohit Valley）驻军。我说密什米人区域的瓦弄已派驻一名军官。他问我们是否也会在西藏驻军，我向他保证无此意图。我不清楚他是否相信。他只是回说西藏唯一的外国人经验是中国人，而他们很残酷。

赵屠夫的屠戮记忆仍深植藏人心中。显然当时此区并无中国行政官员，他们在一九一二年占藏结束时已随军队撤出。除了明显反中之外，藏人认为山巅是行政管理的界线。

但马克斯韦尔对边界标志重要性及边界位置有不同诠释，「中国……在一九一○年竖立标志，藏人坚持边界在此，而非上游二十公里处的麦克马洪线。」[61]我不清楚马克斯韦尔是在什么基础上，宣称西藏与中国针对边界争议有某种共识。这可能性并不高，而且实际上这些标志也不过只存在了两年出头。

一九五○年中国入侵西藏，大幅改变整个区域的地缘政治。直到那时之前，西藏与印度的关系向来比中国来得亲近，却再也不是事实存在的独立国家。印度的内政部长瓦拉拜．巴特尔（Vallabhbhai Patel），是当时政府中少数理解这项改变背后重大意涵的人。巴特尔于一九五○年十二月去世，他在死前一个月曾致信尼赫鲁：

我们必须思考此刻面临的新情势，西藏消失带来的后果，如我们所知，是中国的扩张已到我们门口。歷史上，我们很少忧虑东北边界。喜马拉雅山一向视为北方入侵者无法穿越的障碍。友善的西藏也很少制造麻烦。中国因为内部分裂的缘故，从未骚扰我们的边界。62

然而尼赫鲁身为理想主义者，并无法理解北京共产党新统治者的思想，仍持续相信要与中国建立友谊关系。在他的想法中，印度与中国同样是从压迫中崛起的国家，应该与亚非其他独立解放的国家携手合作。因此在一九五○年代，中印关系在印地语（Hindi）口号「中印兄弟之邦」（Hindi Chini Bhai Bhai）中蓬勃发展。

一九五四年印度共和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签订《关于中国西藏地方与印度的通商和交通协定》，首度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63不过印度在一九五二年九月就实质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正式同意中国（而非西藏）政府将印度驻拉萨代表团的地位改为总领事馆。64印度也是首批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非共产国家之一，大使层级的外交关系始于一九五○年四月一日。

中印兄弟之邦的关系本应在一九五四年协定的前言中稳固底定，其中包含五项和平共处原则，在印度称为《五德条约》（Panchsheel Treaty），panch代表五，sheel则是梵文中的美德之义。这五项原则是：

（一）互相尊重领土主权

（二）互不侵犯

（三）互不干涉内政

（四）平等互惠

（五）和平共处

中国当时仍然弱小，因此印度及其深受敬重的政治家尼赫鲁，在旧殖民帝国如英、法等西方强权崩毁后，成为了亚非新兴国家的领袖。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九个亚非新近独立国家在印尼万隆会面时，尼赫鲁的《五德条约》也成为不结盟运动的基础。

在果园环绕、荷兰人兴建的运河与殖民风格别墅中，印尼总统苏卡诺（Sukarno）接待一群亚非国家领袖，包含阴晴不定的柬埔寨王子西哈努克（Norodom Sihanouk）、引领时代的埃及总理纳瑟（Gamal Abdul Nasser）、锡兰（今日的斯里兰卡）的约翰．科特拉瓦拉爵士（John Kotelawala）、巴基斯坦总理柏格拉（Muhammad Ali Bogra）及缅甸总理吴努（U Nu）。当黑色礼车载着各国贵宾抵达万隆的会议厅时，许多人对「殖民主义」的忧虑远大于共产主义。

在尼赫鲁坚持邀请下，中国的周恩来也出席会议，不过他差点无法成行。尼赫鲁派到香港载运周恩来前往雅加达的印度国营航空「喀什米尔公主号」，于一九五五年四月十一日坠落南中国海。国民党特务在机上放置炸弹，目标明显就是周恩来；然而周因为行程延误并未登机。空难三天后，周恩来先飞往缅甸仰光，会见尼赫鲁与吴努，才又继续到万隆出席会议。

一九五四年六月至一九五七年一月间，周恩来访问印度四次。尼赫鲁在一九五四年十月前往北京，不只会见周恩来，还有伟大领袖毛主席。正如《纽约时报》所说，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非共产国家元首第一次访华。根据《纽约时报》的报导所述，「市中心与机场间的六英里间，挤满了密不可破的人墙，鼓掌欢呶，并持续高喊着中文标语：『和平万岁！』」65

然而，随着中国侵藏暴力血腥逐步升高，西藏的情势更加危急。根据西藏反抗军恩珠仓．贡布札西（Gompo Andrugtsan）的记载：「中国人收取大量金钱税收，当地人遭到随意拘捕，公开处决，以儆效尤。僧院遭到毁坏，僧侣们无故遭到关押处决。」66

这段期间的冲突，导致西藏东部一向强悍独立的游牧民族康巴人起义反击，他们运用手边任何武器伏击中国军车队伍。康巴反抗军吸引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注意，并空投资源进入西藏；部分的康巴人逃出西藏，并在美国控制的太平洋岛屿塞班岛接受训练。印度西孟加拉邦北方的噶伦堡（Kalimpong）成为秘密行动与情报蒐集的基地。

美中关系学者高龙江在其中印冲突着作中引述：

史蒂芬．霍夫曼（Steven Hoffman）对于此时期印度决策过程的细腻研究中（总结）：「一九五八或一九五九年的印度政府，对于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主要动作究竟了解多少仍不得而知……（印度国安首长波拉．纳特）穆立克在回忆录中坚称，尼赫鲁认为武装西藏反抗势力乃自杀之举，且毫无益处；他坚持和平、非暴力反抗才是最好的方式。（西藏史学家）茨仁夏加（Tsering Shakya）也认为尼赫鲁与其他印度领袖直到一九六二年战争后，才得知美国支持西藏武力反抗的活动。」67

另一方面，其他作者如肯尼斯．康伯伊（Kenneth Conboy）与詹姆士．莫里森（James Morrison）则认为，尼赫鲁与穆立克至少知道基本样貌，并且默许中情局的行动。68

中国无法理解西藏人对于被占领的愤恨，因此认定印度支持西藏反抗运动。一九五九年拉萨起义失败后，达赖喇嘛出逃印度，中印关系进一步恶化。三月十七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之中，强调西藏起义与印度政府之间的关联，并且进一步怀疑英、美与印度同谋支持

叛乱分子，而「叛乱指挥中心就设在噶伦堡」。[69]

至此，中印兄弟之邦已荡然无存，邓小平认为该给印度一个教训。中国在一九五九年八月入侵朗久与十月攻击空喀山口，可能都是为了测试印度的防卫。美国学者唐诺．札哥利亚（Donald Zagoria）在中俄冲突的详尽着作中，提供了一九五九年中国突击的另一种解释，再次展现中印冲突主要并不在于边界划定或遵守合约。他引述一九五九年十月，波兰代表团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而访问北京的纪录：

波兰人……认为中国共产党对被摒除在高阶谈判外的愤怒，是北京当局决定要掀起中印边界争议的背后动机。十月在喀什米尔的事件中，好几名印度士兵死于伏击，这被认为是给印度、苏联与西方的警告，世界重要议题的解决，必须透过与北京直接谈判。[70]

同时有件事也渐趋清晰，那就是毛泽东与中国的世界观，和尼赫鲁的不结盟主义、不涉入他国内政的理想截然不同。西方在冷战期间形塑的三个世界模型，意指美国与盟友所属的第一世界；苏联与卫星国所属的第二世界；最后是中立、不结盟的第三世界国家。毛的三个世界模型则并非如此，对他来说，美、苏属于第一世界；日本、欧洲、加拿大则形成第二世界；亚、非、拉丁美洲则是第三世界。

中国自然渴望成为第三世界领袖，将印度从一九五○年代就霸占的宝座夺过来，成为亚洲新近独立国家的主要声音。中国国家社科院研究员王宏伟在研究之中曾指出：「印度在併吞超过五百六十个县之后，派军进入喀什米尔，遂行扩张主义……自从印度中产阶级菁英踏上当代亚洲歷史的舞台争夺霸权后，中国必须展现优于印度的军力，而一九六二年即达此目的。印度从未由此溃败中恢复，尼赫鲁本人在一九六四年死于失望与沮丧之中。而中国在毛泽东领导下，成为多数第三世界革命者的标竿。如毛泽东曾说：『枪桿子里面出政权』。」[71]

一九六二年战争也强迫印度放弃不结盟路线，首先寻求美国的支持，接着与中国的新敌人苏联结盟。当一九七一年印度军队干涉东巴基斯坦，协助反抗军成立孟加拉时，不干涉内政从此走入歷史。圣雄甘地的非暴力理想已让路给军事化的印度；不但扩张军队规模，甚至在一九七四年五月试爆核弹。中国确实胜利，印度不再是第三世界追寻的典范，新典范已经变成中国。

即使快速扫视中国在一九四九年后发动的战争歷史，也显示出边界争议从来不是北京外交政策的主要指导原则。除了一九五○年代入侵西藏及轰炸台湾海峡上由国民党掌控的金门与马祖群岛（这两者皆是为了奠定新共产党政府对于合法领土的主权），中国发动的战争全都有其意识型态动机，为了展现面对敌国的军事优势，以及展现对社会主义同志

的团结支持。至于对国际疆界的尊重与否，从来不在其考虑之列。

一九五○年代初期，数十万中国「志愿军」进入朝鲜半岛支持北韩共产主义政权，对抗美国支持的南韩。韩战于一九五三年签订停战条约，产生目前仍旧分裂的两个国家，北方是中国的盟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以及南部亲西方的大韩民国。韩战里由于中国诉诸「人海战略」，亦即招募派遣一波又一波无经验的士兵，直接面对南方的子弹砲轰，因此伤亡极为惨重。估计约有十五万两千名中国人死于韩战，三十八万三千人受伤。不过这也是中国军事力量第一次受到认可；当政治状况需要时，它将毫不迟疑以重大伤亡达成目的。

在一九六○至一九六一年穿越边界进入缅甸作战的「湄公河战役」后，中国在同一区域展开策略上更具冒险性的行动。一九六八年一月，数千名中国军队再次穿越边境进入缅甸；这次则是与缅甸共产党（Communist Party of Burma）叛乱武力共同作战的「志愿军」。缅甸共产党自一九四八年缅甸独立开始，即对政府军发动武装斗争。一九五○年代以来，超过一百四十名缅共流亡党员住在边界对面的中国。直到一九六二年三月，奈温将军（Ne Win）出人意料地夺取首都仰光政权后，他们开始获得中国大量协助。西方学者一般认定，由于一九六七年六月仰光的排华暴动，催化中国决定援助缅共。但就如同中印边境争议一般，这也不过是让中国採取行动的藉口。

缅共干部一九六三年就已开始侦测边界区域，寻找合适的渗透路线。同时他们也经介绍，认识一群一九五○年代初期撤退到中国的克钦族反抗军。由于多数缅共成员是都市知识分子，这群好战的克钦部落战士将成为缅共军的核心。直到一九七○年代初，中国「志愿军」仍然是缅共军力的主力，多数都是来自中国的年轻红卫兵，深受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教育启发，其中也不乏较具经验的解放军军官及政委。

中国对缅甸共产党的支持一直持续到邓小平上台。政治上铁桿、经济上改革开放的邓小平，在一九八○年代改变北京的涉外政策，从支援革命运动转向与邻国建立双向商贸关系。然而中国从未完全放弃缅共，因为后者仍是有用工具，能让中国在缅甸内部发挥影响力。

一九六九年三月，中国与苏联爆发边界战争，表面上看来是为了争夺乌苏里江上的某些沙滩地。然而，就如同一九六二年的中印冲突，其政治动机远比边界来得更重要。北京欲向第三世界展现革命中国的强大，甚至足以对抗「苏联修正主义叛徒集团」（中国在一九六○年与莫斯科关系破裂后，即以此称呼苏联领袖）。中国才是世界所有受压迫人民的真正领袖，而非苏联。

直到越南战争于一九七五年五月结束前，中国对北越与南越的共党

游击队提供大量援助。然而，中越之间几世纪的不信任导致关系恶化，河内政府逐渐向苏联靠拢。一九七八年十二月至一九七九年一月，越南入侵中国在中南半岛的主要盟国柬埔寨，正好成为北京给区域邻国另一场「教训」的机会。一九七九年二月，中国军队跨境进入北越；他们与一九六一年进入缅甸追击国民党的军队来自同个军团。然而这次的解放军跨境战役，并不如一九六二年中印战争来得成功。越南的反击造成中国军队重大伤亡。双方皆未赢得胜利，而这也是人民解放军最后一次进行此类战役。此后，人民解放军将重心放在建立更现代化的专业军队，而非过往的「人民军队」。

然而回到一九六二年，那时人民解放军仍是由中共政委领导，是以意识型态驱动的组织。同时印度（特别是尼赫鲁本人）显然并未了解这点。尼赫鲁对周恩来的信心也明显受到误导。深谙多种当地方言的英国西藏事务专家乔治．派特森（George Patterson）在一九六三年出版的着作《北京与德里》（Peking Versus Delhi）72中提到：

周恩来有较不为人知的一面，他迷人、聪明、甚至「温和」的外表是用来赢得友谊、影响他人的工具。一九三一年，中共中央委员与特务组织负责人顾顺章背叛共产党，向汉口警方投降。当时周恩来亲自带领一组人去勒毙顾顺章一家，包含仆人与婴儿。

虽然顾顺章本人逃过一劫，但在他逃亡时，党也做出惩处顾家的决定。到了一九三五年，顾顺章对国民党当局不再有用时，他也遭到处决。同时间，周恩来对共产党里真实或猜测认定的叛徒，曾执行过许多类似的清算谋杀行动。周恩来与令人惧怕的特务头子康生同样强硬，而后者在一九六○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时期以残暴闻名。

更重要的是根据中国文献显示，周恩来对于来自尼赫鲁展现的喜爱之意，并没有投桃报李之心。中共一向认为尼赫鲁是中产阶级民族主义领袖，与社会主义沾不上边，甚至早在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建国前，就有对印度总理的抨击。根据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九日由中共文化委员会出版的杂志《世界知识》的一篇文章称，尼赫鲁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一九四九年九月十六日出刊的杂志宣称：「尼赫鲁是尾随帝国主义者之后的丑角，认定自己是亚洲人民的领袖……国家独立运动的叛徒，下流恶棍……以及帝国主义的忠实奴才，帝国主义者将尼赫鲁当作蒋介石的替身。」73

周恩来及其同志于中文出版品上的发表，在「中印兄弟之邦」年代背后所做的批评，虽然尼赫鲁毫无所悉，美国中央情报局对中国想法却相当清楚。最近才解密的一九六三年三月二日中情局最高机密报告74中写道：

中国的外交努力是场五年的伟大诈骗计画，主要由周恩来策划与执行。周恩来展现出温和倾向，以及对中印友好关系的真诚期望，玩弄了尼赫鲁的亚洲反帝国主义心态。周的策略是在与尼赫鲁的对话与沟通中，避免明白表达中国对边界的宣示，同时也避免撤回任何会改变中国地图的宣示。一九五四年十月在北京的会面，周和尼赫鲁站在同一阵线，主张共产中国「尚未有时间重新审视」国民党地图，以此留下暗示，却没明白表示这些地图会被重新审视。一九五六年十一至十二月访问新德里时，周试图让尼赫鲁留下一种印象：北京可能接受麦克马洪线。然而他的言语依旧模稜两可，犹如左手让出，右手收回。

同一份中情局报告也提到，缅甸前总理巴瑞（Ba Swe）曾于一九五八年致信尼赫鲁，警告他在中印边界议题上要「谨慎」应对周恩来。同时，缅甸也与中国进行共同边界协商，最后在一九六○年签订协议划界，结果对缅甸不利。

根据报告，「尼赫鲁在回覆中宣称周恩来是『诚信之人』，足以信赖。」[75]当人民解放军在一九六二年十月大举跨越喜马拉雅山时，尼赫鲁与印度为这份信任付出了相当重大的代价。

部分分析师与史学家认为，中国愿意透过双方各自让步达成和解。中国愿意放弃对东北边境特区的主张，以此交换印度承认中国对阿克赛钦的实质控制；毕竟中国就是以这种方式去解决与缅甸、尼泊尔及巴基斯坦的争议。然而这类主张并未区别北京与小型邻国（如缅甸、尼泊尔）的关系、中国和重要策略同盟巴基斯坦的关系，以及中印争议实际上远超越地图划线、边境标界之举。同时就如我在前面所述，一九五○年代的中国已然崛起，意欲和印度一争亚太新近独立国家领袖的地位。

今日又呈现出全新情势：中印双边贸易额（经由海路，而不是关闭边界）蓬勃成长，二○一五至二○一六年，达到七百零七点三亿美元。值得一提的是，印度对中贸易赤字为五百二十六点八亿美元。中国从印度进口矿产、铁矿与棉花，印度则买进电子设备、电脑硬体及化工产品。[76]

然而中印的敌对关系并未结束，彼此之间依旧有深刻的不信任。对中国而言，阿鲁纳恰尔邦仍旧是「藏南」，来自此区的旅行者，他们的中国签证是浮钉在护照上。对中国来说这些人并非外国人，而是来自被印度占领的中国领土；然而此举除了羞辱印度与印度人外，并无实际意义。

更令人担忧的是，中国并未停止支持印度东北动乱地区的反抗军。那迦人、阿萨姆人与曼尼普尔人都能在中国美其名为「黑市」的交易中买到武器。主要组织阿萨姆联合解放阵线的领导人派瑞许．巴鲁亚住在

中国城镇中，行动自如。中国可能自认只是效法印度庇护达赖喇嘛之举，允许别国的敌人住在自己国中。然而达赖喇嘛与巴鲁亚并不同，他并非一群武装反抗军的领袖。[77]

如今棒山口与喜马拉雅其他隘口可能已归于平静，但中国即将于西藏的布拉马普特拉河上兴建一连串水坝的计画，再度引发了疑虑。布拉马普特拉河在西藏及中国地图上称为雅鲁藏布江。二○一五年十月，西藏东南方的藏木水坝正式启用；在布拉马普特拉河进入印度之前，中国还预计在干流与支流上兴建其他二十七座水坝。此计画自然引起争议，因为中国并未事先徵询下游受影响国家（印度与孟加拉）的意见。[78]这种对待邻国的态度同样也展现在湄公河流域：中国预计在境内的湄公河上游兴建一系列水坝，而且未事先徵询下游流经的缅甸、寮国、泰国、柬埔寨与越南。

中、印两国虽然边界紧张，但今日的摩擦中心却不在喜马拉雅山区，而是在印度洋上。中国正建立通道，指向过去印度认定为无冲突可能的「自家湖泊」。中国希望能密切掌控中东油运必须经过的海道，但这表示要挑战印度在印度洋的霸权。近日印度与美国在印度洋的联合军事演习，以及日本对此表现的兴趣，正显示出新冷战的态势。只是这次的主要敌手是中国而非苏联。

而缅甸正处在纷乱核心。过去缅甸长期试图扮演区域对手间的中立缓冲国，却也常成为内部与国外势力角逐影响力的冲突场域。一九六八至一九七八年间，中国提供缅共大量援助，远超过对中南半岛外任何共产运动的援助。缅甸东北沿着中国边界区域，建立起一处广达两万平方公里的基地。中国人在缅共基地中建了两座小型水力发电站，以及一座地下电台「缅甸人民之音」（The People's Voice of Burma），从一九七一年起自中缅边界的云南侧放送节目。这座电台后来移到缅共位于缅甸的邦桑[79]总部，所有领导阶级都住在中国建造的房舍中。

泰国境内少数民族克伦族（Karen）、掸族（Shan）与孟族（Mon）的反抗军获得允许设立基地，从泰国购买武器补给。泰国希望能在自身与歷史仇敌缅甸之间划开一个缓冲区。歷史上缅甸曾多次入侵泰国，并于一七六七年劫掠泰国的旧都大城（Ayutthaya）。这些顾虑在现今看来也许不合时宜，但在当时却是非常实际的考量。

在西方，靠近东巴基斯坦（后来的孟加拉）边界处，来自缅甸若开邦（Rakhine）罗兴亚（Rohingya）社群的穆斯林游击队，自一九四八年缅甸从英国独立之后，就一直积极活动。印度从未支持任何缅甸境内的反抗运动，只在一九六二年奈温将军驱逐吴努出境时提供政治庇护。一九八八年八至九月的缅甸民主运动期间，印度当局也对民主运动人士

表达道德支持。

一九八九年三至四月，一度强大的缅甸共产党在佤族为主的低阶军官叛变中崩溃，缅甸边界区域局势产生了剧烈变化。佤族是缅甸东北横跨中国边界的猎头族，虽然被招揽进入缅共军队，却对自己以生命捍卫的共党思想毫无所悉。缅共军后续分裂成四支族群军，其中佤邦联合军（United Wa State Army）是最强的一支。

一九八九年的缅共叛变，实际上正符合中国的利益，有中国特务积极鼓励佤族等人反抗缅共领导。在邓小平强调贸易与商业扩张的新政策中，坚持毛路线的缅共旧领导班子，反而成为中国一大负担。

缅共叛变之后的数年中，中缅经贸关系持续成长。缅甸市场充斥来自中国的廉价消费品，从缅甸输入中国的主要是原物料，例如柚木与矿产；年度货物交换金额来到十亿美元。中缅双边贸易之所以大幅成长，也是因为当时缅甸政府严重侵害人权，受到西方贸易制裁与杯葛的缘故。因此中国不需面对任何竞争，轻易成为缅甸最主要的外贸伙伴。

然而中国并未放弃从一九六○年代末期就在缅甸内部取得的掌控权。一九八九年五月，佤邦联合军与缅甸政府签订停火协议；这一方面符合中国新的商贸利益，另一方面也协助强化佤邦联合军。毕竟从缅共时期开始，中国与佤邦联合军多数领袖都有长期关系，因此佤邦联合军得以从中国购买大量军火，包含重砲、地对空火箭与装甲战车。

今日佤邦联合军的火力远比缅共时期更为强大，拥有至少两万名装备精良的部队、数千名村庄民兵与其他支援军力。更重要的是，佤邦联合军的最高领袖身旁总是伴随着中国情报官，并提供建议指导。

近几年缅甸开始修复与西方的关系，有部分原因是中国影响力虽然举足轻重，但也愈加难以掌控，同时间西方取消了制裁。就在缅甸改善与华府关系之际，中国向佤邦联合军输送更多武器，以此向缅甸政府施压。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并无法将缅甸「输」给美国与西方；而强大的佤邦联合军提供了中国策略利基，也是与缅甸政府谈判时的筹码。

二○一二年十一月，缅甸总统府部长昂敏（Aung Min）前往曼德勒（Mandalay）西北方的小城蒙育瓦（Monywa），会见一群抗议由中国支持铜矿开採计画的当地民众，当时他公开承认：「我们害怕中国……我们不敢得罪（他们）。若他们对关闭计画不满，重新支持共产党，边界经济将会衰退，所以你们要严肃思考。」80所谓「共产党」明显是指佤邦联合军及其盟友，包含果敢（Kokang）地区的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军（Myanmar National Democratic Alliance Army），这是另一支在东北区域的前缅共军，确实也在二○一五年二月发动过武装攻击。

可想而知，中国自然会反驳任何自己涉及冲突的说法，但事实仍旧

存在：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军的多数武器与大量军火，都是来自佤邦联合军。根据一名高层人士的消息来源，中国採用间接方式，「在果敢给缅甸政府一个教训，向西方靠太近就是这下场。」[81]同一时间，中国也打出另一张「温情」牌，积极参与缅甸政府与诸多民族反抗军之间的「和平谈判」。

无论中国试图输出革命或扩张保护商贸利益，都明显感觉需要在缅甸境内有个稳定的立足点，而佤邦联合军及前缅共相关团体正是最好、最忠实的盟友。缅甸做为中国通往印度洋的「走廊」，是云南及其他西南内陆省分对外贸易的出口，与北京的区域战略利益有段距离。虽然中国从未在此设置任何军事基地，但正如部分印度的观察者所指出，中国协助缅甸提升海军设施，这就足以令印度忧虑。

二○一五年四月，由于缅甸政府对躲在国内的印度反抗军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态度终于磨光了印度的耐性。印度军队穿过印缅边界，摧毁许多阿萨姆、曼尼普尔与那迦反抗军躲藏的营地。这些叛军的武装来自缅北克钦邦（Kachin State）里前缅共区域内的秘密军工厂。这些工厂虽位于缅甸境内，机器与技工却都来自中国。或许中国政府对阿萨姆人、曼尼普尔人与那迦人独立运动没有兴趣，但显然希望让印度疲于奔命，至少在印度仍庇护达赖喇嘛与西藏流亡政府的期间是如此。

在棒山口标语放肆宣称「两大古老文明邻国」的背后，中印双方文化与世界观有着巨大差异，而西藏问题始终是中印冲突的核心。支持中国对边界争议与一九六二年战争说法的人，若是更仔细检视中国援引的资料来源，不难发现划界议题从来都不是重点。一九五九年五月六日，拉萨起义反抗中国占藏的数周之后，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发布一篇文章〈西藏革命与尼赫鲁哲学〉，指控印度总理採行「英帝国主义的策略野心」。[82]

根据美国安全专家与前中情局分析师布鲁斯．里德尔所说：「攻击尼赫鲁文章发表当日，周恩来在一场公开会议中指尼赫鲁『继承英国旧政策，认为西藏是个独立国家』，而此心态是『中印冲突的核心』。」[83]维兹伯格的结论相当正确地指出，尼赫鲁与中国领导人的世界观截然不同，而在更现代的脉络中，可以说中国与印度在文化与策略思考上，处于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

中国认定所有印度领导人（特别是尼赫鲁）想要夺取西藏，这一点也许是大错特错。不过中国畏惧「丧失」自己认定不可或缺的领土，这因素决定了一个多世纪以来的中印关系，直到此刻仍旧如此。这串事件首先开始于一九一四年的西姆拉，当时中国歷经千年帝国统治后的衰颓，正由混乱的共和新秩序所取代。

35 I visited Bumla Pass on 28 October 2015.

36 Interviews with Indian army personnel at Bumla, 28 October 2015. For a detailed account of the battle, see 'Operations on the Kameng Frontier Division (Tawang)', P.J.S. Sandhu, Bhavna Tripathi, Ranjit Singh Kalha, Bharat Kumar, G.G. Dwivedi, Vinay Shankar (eds.), 1962: A View from the Other Side of the Hill (New Delhi: Vij Books India, 2015), pp. 82–3.

37 'Operations in the Western Sector (Ladakh)', Sandhu et al., 1962, p. 55.

38 Satyanarayan Sinha, China Strikes (London: Blandford Press, 1964), p. 77.

39 Cheng Feng and Larry Wortzel 'PLA Operational Principles and Limited War: The Sino-Indian War of 1962', Mark A. Ryan, David M. Finkelstein, and Michael A. McDevitt (eds.), Chinese Warfighting: The PLA Experience Since 1949 (New Delhi: KW Publishers 2010), p. 188. This is an Indian reprint of the one published by M.E. Sharpe in 2003.

40 Sandhu et al., 1962, p. 28.

41 For the life and philosophy of Dr Sun Yat-sen, see Bernard Martin, Strange Vigour: A Biography of Sun Yat-sen (London and Toronto: William Haeinemann, 1944).

42 Email communication with Pamela Kyle Crossley, an expert on the Manchu Dynasty, 14 April 2016.

43 For a complete list of the Indian Army's peace-keeping missions, see 'India and United Nations, Peacekeeping and Peacebuilding', available at https://www.pminewyork.org/pages.php?id=1985 (accessed on 8 April 82016).

44 For an account of the Lei Feng myth, see Evan Osnos, 'Fact-checking a Chinese Hero', The New Yorker, 29 March 2013, available at http://www.newyorker.com/news/evan-osnos/fact-checking-a-chinese-hero (accessed on 10 April 2016).

45 Fang Lizhi, The Most Wanted Man in China: My Journey from Scientist to Enemy of the State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2016), p. 228.

46 William Wei, '"Political Power Grows Out of the Barrel of a Gun": Mao and the Red Army', David A. Graff and Robin Higham, A Military History of China (Dehra Dun: Greenfields Publishers, 2012), pp. 244–5.

47 Quoted in, for instance, Roy Rowan, Chasing the Dragon: A Veteran Journalist's Firsthand Account of the 1946–49 Chinese Revolution (Guilford, Connecticut: Lyons Press, 2004) p. 217.

48 Wei, 'Political Power Grows Out of the Barrel of a Gun', p. 235.

49 Mao Zedong, Quotations from Chairman Mao Tse-tung (Peking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68), p. 61.

50 Yaacov Y.I. Vertzberger, Misperceptions in Foreign Policymaking: The Sino-Indian Conflict, 1959–1962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1984), p. 217.

51 Vertzberger, Misperceptions in Foreign Policymaking, p. 217.

52 Vertzberger, Misperceptions in Foreign Policymaking, p. 217.

53 Wang Dong, China's Unequal Treaties: Narrating National History (Asia World, Lanham, Marylan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05), p. 64.

54 From 1959 to 1962, the Indian government published more than a dozen White Papers with maps, documents, copies of treaties, and correspondence between the Indian and Chinese governments. Several of them are available at http://www.claudearpi.net/index.php?nav=documents&id=20&lang=1 (accessed on 16 June 2016).

55 Vertzberger, Misperceptions in Foreign Policy Making, p. 217.

56 S. Mahmud Ali, Cold War in the High Himalayas: The USA, China and South Asia in the

1950s (Richmond, Surrey: Curzon, 1999), p. xxviii.

57 John Rowland, A History of Sino-Indian Relations: Hostile Co-Existence (Princeton, NJ, Toronto, London: D. Van Nostrand Company, 1967), p. 42.

58 James Barnard Calvin, 1984, 'The India-China Border War (1962)', available at http://www.globalsecurity.org/military/library/report/1984/CJB.htm (accessed on 5 April 2016).

59 译者注：弗雷德里克．马士曼．贝利上尉（Frederick Marshman Bailey, 1882-1967）精通藏语，后分别于一九二一至一九二六年、一九二六至一九二八年，两度出任英国驻锡金政务官，负责英国及英属印度与锡金王国、不丹王国、西藏的关系，维护大英帝国与印度在喜马拉雅山地区的利益。一九一三年他在喜马拉雅山区为印度测绘局绘制地图，成为一九一四年西姆拉会议中麦克马洪线的基础。此次探险证实，印度布拉马普特拉河的上游是西藏的雅鲁藏布江。

60 F.M. Bailey, No Passport to Tibet (London: The Travel Book Club, 1957), p. 71.

61 Neville Maxwell, India's China War (Harmondsworth, Middlesex: Penguin, 1972), p. 50.

62 Madhav Godbole, The God Who Failed: An Assessment of Jawaharlal Nehru's Leadership (New Delhi: Rupa, 2014), p. 312.

63 For the full text of the agreement, see http://www.mea.gov.in/bilateraldocuments.htm?dtl/7807/Agreement+on+Trade+and+Intercourse+with+Tibet+Region (accessed on 5 April 2016).

64 CIA, 'The Sino-Indian Border Dispute Section 1: 1950-59', CIA document (2 March 1963, and declassified May 2007), available at https://e-asia.uoregon.edu/node/2570 (accessed on 29 March 2016).

65 See http://qz.com/404874/photos-when-indias-first-prime-minister-visitedchina-in-1954/ (accessed on 5 April 2016).

66 Quoted in Yuliya Babayeva, 'The Khampa Uprising: Tibetan Resistance against the Chinese Occupation', Honours College Theses, Paper 31 (New York: Pforzheimer Honours College, 8 January 2006), p. 15, available at http://digitalcommons.pace.edu/honorscollege_theses/31/ (accessed on 7 April 2016).

67 John W. Garver, 'China's Decision for War with India in 1962', Alastair Iain Johnston and Robert S. Ross (eds.),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China's Foreign Polic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100.

68 Kenneth Conboy and James Morrison, The CIA's Secret War in Tibet (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2002), pp. 95–6, 155–6.

69 'The Politico-Diplomatic Prelude Part 2', Sandhu et al. 1962, p. 23.

70 Donald S. Zagoria, The Sino-Soviet Conflict 1959–1961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2), p. 280.

71 Wang Hongwei, ximalayashan qingjie: zhongyin guanxi yanjiu ('The Himalayan Sentiment: A Study of Sino-Indian Relations') (Beijing: China Tibetology Publications, 1998), p. 55. Quoted in B.R. Deepak, 'The Republic of India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1947–1949', translated by B.R. Deepak, D.P. Tripathi and B.R. Deepak (eds.), India and Taiwan: From Benign Neglect to Pragmatism (Delhi: Vij Books, 2015), p. 52.

72 George N. Patterson, Peking versus Delhi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63), p. 51.

73 Quoted in Sandhu et al., 1962, p. 5. Shijie Zhishi was a Shanghai-based fortnightly founded in 1934. The de facto editor was Hu Yuzhi, a secret CCP member. The magazine moved to Hankou and then to Hong Kong in 1938, publishing there until it folded when the Japanese invaded the British colony in 1941. It resumed operations in Shanghai in December 1945, published by the CCP's underground Culture Committee, and was banned by the KMT

government in March 1949. It resumed publication after the communist takeover of Shanghai in May 1949, before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as proclaimed in Beijing on 1 October 1949.

74 CIA, 'The Sino-Indian Border Dispute Section 1', pp. 2–4.

75 CIA, 'The Sino-Indian Border Dispute Section 1', p. 4.

76 Press Trust of India, 'India's trade deficit with China jumps to $53 billion in 2015–2016', The Economic Times, 1 August 2016, available at http://economictimes.indiatimes.com/news/economy/foreign-trade/indias-tradedeficit-with-china-jumps-to-53-billion-in-2015-16/articleshow/53492853.cms (accessed on 6 June 2017).

77 Bertil Lintner, Great Game East: India, China and the Struggle for Asia's Most Volatile Frontie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5), p. 151.

78 Sana Hashmi, 'China Dams the Brahmaputra: Why India Should Worry', Rediff News (21 October 2015), available at http://www.rediff.com/news/column/china-dams-the-brahmaputra-why-india-should-worry/20151021.htm (accessed on 8 April 2016).

79 译者注：邦桑（Panghsan）是缅甸佤邦首府，位于中缅边境南卡江西岸，东接中国的猛阿口岸。清朝时称班散，后称邦桑，一九七○年代为缅甸共产党中央驻地。一九八九年缅共分裂，华裔领导的部队脱离缅共，改称佤邦联合军，由于华语中「桑」与「丧」谐音不吉利，因此一九九九年后改称邦康（Pangkham）。

80 Bertil Lintner, 'Same Game, Different Tactics: The Myanmar Corridor', Irrawaddy, July 2015, pp. 14–19. Also available at http://www.irrawaddy.com/magazine/same-game-different-tactics-chinas-myanmar-corridor.html (accessed on 7 April 2016).

81 Lintner, 'Same Game, Different Tactics'. p. 19.

82 Bruce Riedel, JFK's Forgotten Crisis: Tibet, the CIA, and the Sino-Indian War (Delhi: HarperCollins India, 2016), p. 98.

83 Riedel, JFK's Forgotten Crisis, p. 98.

# 第二章　界线

一九一二年对整个亚洲而言是动盪变化的一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尚未爆发，然而其他力量在这里蠢蠢欲动。开年第一天，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中华民国宣布成立。歷经多年暗潮汹涌的不满情绪，中国各地起事频传，湖北省武昌的军事叛变终于在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爆发。往后在共和民族主义者间称为「双十节」的这天，激发更大规模的起事，推翻渐趋无能的清朝统治者。

反清运动领袖孙逸仙医师当时并不在国内，他已流亡海外数年，组织夏威夷、东南亚与日本的海外华人反对势力。在美国冒险家荷马．李（Homer　Lea）的伴随下，孙逸仙医师在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返抵国门，视察当代中国歷史最戏剧化的事件之一。八天后，一群来自全国的反清团体代表，一同选出孙逸仙医师为共和国的「临时大总统」，并在新年就职。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二日，清朝最后一任皇帝，年仅六岁的溥仪被迫退位。

然而超过两千年的帝制走向终点，并未如革命者与改革家所想，将这广袤赤贫的国家迎进现代繁荣的新时代，权力斗争与阴谋导致动乱不稳。孙逸仙医师上任不到七周即辞去职位，并由袁世凯接任。袁世凯是名军官，甚至够不上民主改革的边。一九一五年十二月，袁世凯甚至自称皇帝，但在位仅仅八十三天。由于国内叛变层出不穷，袁世凯只能放弃帝位，并于一九一六年六月死于血液疾病，享年五十六岁。此前被迫流亡日本的孙逸仙医师，在一九一七年共和政府重新恢复时返回中国。这时整个国家已陷入更深的混乱里，中央政府孱弱，各地军阀不过是地方省分控制自己封地的土匪头子。孙逸仙医师试着统一分裂国家但回天乏术；一九二五年三月，五十八岁的他因肝癌过世。

原本孙逸仙医师希望能聘美国友人荷马．李担任中华民国首席军事顾问，但李于一九一二年二月心脏病发后便返回美国，并于同年十一月过世；而孙逸仙医师的革命伙伴认为李不过是个外人，强烈反对聘任外国人为军事顾问的想法。虽然中国从未被殖民，但是欧洲强权在海岸租界的影响力，也造成中国人民对外来者抱持强烈恨意。

香港属于英国，葡萄牙人占有澳门，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德国人据有青岛。西方与日本为商业利益无情地剥削中国，外国人在中国土地上视中国人为次等公民。因此当共产党于一九二一年成立后，迅即获得都市知识分子与乡间贫苦农民的支持，这一点也不令人意外。

改变同样发生在一九一二年的印度，虽然过程较为平和。该年六月，伦敦国会颁布《印度政府法案》（Government of India Act）。一

九○五年已分裂成两省的孟加拉（西孟加拉及新的东孟加拉与阿萨姆），再次重新划分成三省：孟加拉省（相当于今日的印度西孟加拉邦与孟加拉国）、比哈尔（Bihar）与奥里萨省、阿萨姆省。新划分的孟加拉不再受中央「管辖区」（presidency）统治，而是省督统管的行省。阿萨姆则独立为一省，后续成立自己的议会，表示有必要更清楚区划边界。

当时的阿萨姆省包含今日印度的那迦兰邦（Nagaland）、米佐拉姆邦（Mizoram）、梅加拉亚邦（Meghalaya）及阿鲁纳恰尔邦。今日印度东北还有另外两个邦：特里普拉邦（Tripura）与曼尼普尔邦，当时都是由王公统治的大公国，并不属于阿萨姆。由中央控制的那迦山脉特区（Naga Hills District）早在一八六六年成立，逐渐扩张至极东山脉的更大区域。一九一二年，那迦山脉特区正式併入新成立的阿萨姆省。卢谢山脉（Lushai Hills），即今日的米佐拉姆邦，也在十九世纪后半叶获得「平定」（殖民时期「占领」的同义词），并于一八九五年成为英属印度的一部分。今日的梅加拉亚邦包含卡西（Khasi）、詹塔（Jaintia）与加罗（Garo）山脉，是布拉马普特拉河谷以南的高地区。由于殖民官员喜爱凉爽高原，胜过布拉马普特拉河平原炎热潮湿的热带气候，今日梅加拉亚邦的首府西隆（Shillong），当年是整个阿萨姆省的总部。自一九四七年印度独立，到一九七二年梅加拉亚邦成立为止，西隆一直是阿萨姆省的首府。

布拉马普特拉河平原以北，置有更多山脉特区，官方的控制不像那迦、卢谢、卡西、詹塔与加罗山脉那么严密，但也是阿萨姆省与英属印度的一部分。随着十九世纪末期、二十世纪初期，在英国数次进入布拉马普特拉河以北山脉的军事征服行动后，领袖之一的汉密尔顿．包尔少将（Hamilton Bower）于一九一二年建议，应将这些边界区域分成三段部族掌控区域：西段、中段与东段。此举导致阿萨姆省政府在一九一四年成立「东北边境地域群」（North-East Frontier Tracts）。[84]五年后，中段与东段合成「萨蒂亚边境地域」（Sadiya Frontier Tract），西段的名称则更改为「巴利帕拉边境地域」（Balipara Frontier Tract）。

逐渐收编阿萨姆与外围山脉区域的同时，英属印度其他区域也正经歷行政变化。一九一一年，英王乔治五世（King George V）访问印度，并在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二日对国会演说，表达此行印象。由于印度是大英帝国王冠上的珠宝，伴随着一九一二年《印度政府法案》的通过，英属印度首都由东方的加尔各答，移往位置居中的德里。

新德里这座新城的基石，事实上是由英王乔治五世所奠定，都市设计的重责大任则交给两位杰出的英国建筑师：爱德华．路提彦（Edward Lutyen）与贺伯．贝克（Herbert Baker）。然而，由于一九一四年第一

次世界大战爆发，建设进度因此延后数年。这座英属印度的雄伟新都，直到一九三一年二月十五日才正式启用。

一九一二年对日本而言也是变动的一年。该年七月三十日，明治天皇去世。明治天皇从一八六七年即位，在统治期间带领日本从封建社会转变为工业化的世界强权。根据九月十七日的《日本广告》（Japan Advertiser）报纸的报导，天皇葬礼有如「光之童话」一般，前面有老派「穿着外套与丝帽的绅士」与牵引灵车的圣牛，尾随着「数百位穿戴高礼帽与金边制服」的海陆军士。「灵车前后形成的对比确实惊人。灵车之前是旧日本，之后则是新日本。」85

强大的明治天皇去世后，由其儿子嘉仁继位，年号为大正。大正天皇与其父截然不同，由于身体羸弱且受精神疾病所苦，让他无法视事，因此实际权力旁落到一群年长政治家的手中，得以不受天皇制衡地掌理国事。正因如此，一九一二至一九二六年天皇逝世为止的大正期间又号称「大正民主」。不过宫廷内虽有许多政治运作空间，但并不等同西方定义下的民主。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以协约国盟友身分向德国宣战，占领德国在亚太地区的前殖民地：中国海岸上的青岛，以及太平洋上的加罗林群岛（Caroline Islands）、马里亚纳群岛（Mariana Islands）与马绍尔群岛（Marshall Islands）。青岛必须在一九二二年归还中国，但日本趁中华民国孱弱之际，扩张势力遍及中国大陆其他部分与附近区域。日本已于一九一○年兼併朝鲜半岛，此刻又掌握了德国在满洲与内蒙古的商业集团。

大正天皇于一九二六年过世，享年四十七岁，接着由其长子裕仁即位，是为昭和天皇。在大正天皇的弱势统治下，日本军部成为国家中最强的势力，并导致一九三○至一九四○年代与中国的许多战争。此时日本正在崛起，成为亚洲的军事与政治强权。

中国的帝制崩溃与随之而来的国家瓦解，为中国外围区域的附庸国家提供了重申自治或事实独立的机会。事实上，即使是在皇帝统治下，许多附庸国早已是这种状态。在十三与十四世纪时，蒙古部族在成吉思汗与忽必烈汗的领导下，曾征服亚洲多数区域，之后逐渐臣服中国皇帝。清朝统治时，蒙古人的领域分成直接受清朝控制的「内」蒙古及戈壁沙漠以北草原高地的「外」蒙古。外蒙古为自治区域，相当于今日的蒙古国。

早在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也就是中国民主革命爆发后的短短两个半月，蒙古即宣布独立。蒙古人奉行与藏人相同的佛教信仰，最高宗教领袖被称为「博格达格根」（Bogd Gegeen）或「神圣光明

者」。此刻宗教领袖成为政教合一蒙古国的「博格达汗」（Bogd Khan）或「神圣统治者」。虽然受和平佛教的僧侣统治，但蒙古人仍觉得有需要建立一支军队，捍卫新赢得的独立地位，因此宣布独立后不久便发起军事行动，欲从中国手里解放内蒙古。

蒙古人向俄国为新生军队购买武器，但沙皇尼古拉二世（Nicholas II）并不支持对刚成立的中华民国开战。蒙古不知道的是，俄国就在同一年（一九一二年）与日本签订秘密协约，划分各自在中国北方的势力范围。南满洲与内蒙古属于日本，而日本承认俄国在北满洲与外蒙古的势力范畴。86

因此，俄国武器从未抵达蒙古，不过俄国也没因为日俄秘密协定而准备兼併外蒙古任何区域。一九一二年十一月三日（根据俄历为十月二十一日），俄国与蒙古签订条约，承认蒙古在新成立的中华民国内的自治权。然而在蒙古版的条约内容却写「独立」，蒙古因而诠释为俄国承认「大蒙古国」独立。相对地，蒙古给予俄国在其境内的通商特权。

随后签订的中俄条约，更进一步造成蒙古国际地位的困惑。条约中写着蒙古在中国的「宗主权之下」，享有内部自治。87一九一五年五月二十五日，俄、中、蒙在布里亚特（Buratiya）的恰克图（Kyakhta）签订协约；蒙古被迫承认宗主权，并同意不得与外国签订国际条约。88

《恰克图条约》签订前，蒙古极力试图取得独立宣示的承认，因此派遣代表团前往圣彼得堡，却遭到俄国阻挡，避免蒙古与其他欧洲国家接触；另一个前往东京的代表团，则遭日本驻满洲哈尔滨的领事拒绝提供任何协助。

蒙古唯一的外交胜利，来自宗教上的兄弟国西藏。一九一三年一月十一日（俄历一九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蒙藏在库伦（Urga），也就是今日的乌兰巴托（Ulaanbaatar），签订了《蒙藏友好同盟条约》。蒙古由外交部长大喇嘛然丁（Da Lama Rabdan）和军队总司令曼莱巴特尔．达木丁苏隆（Manlaibaatar Damdinsüren）代表。与代表西藏达赖喇嘛的阿旺．德尔智（Agvan Dorzhiev）签订条约。不过问题是德尔智来自布里亚特，这是使用蒙语的西伯利亚东部区域，因此实际上是俄国人。这条约的合法性始终存疑。89

西藏也在中华民国成立的动乱首年宣布独立，不过宣布的确实日期不明。一九一○年初，清朝曾派遣一支远征军入侵西藏，试图最后一搏，巩固帝国宣称既有领土的主权。一九一○年二月十二日，中国军队进入西藏首都拉萨，废除达赖十三世，后者在当时英属印度总督明托伯爵（Lord Minto）的邀请下逃亡加尔各答。

达赖出逃印度，这对修复西藏与英国的关系有所助益。一九○三年

十二月，英国曾派遣一支军队入侵西藏，领军者是在英属印度出生、于桑德赫斯特学院受训的荣赫鹏（Francis Younghusband）。荣赫鹏短暂但暴力的占领过程，导致拉萨在一九○四年九月签下一纸条约，给予英国在西藏庞大的利益。90一九○四至一九○九年间，达赖喇嘛逃亡中国与蒙古，躲避英国追击。此刻，英藏则联合对抗中国。

中国占领西藏的时间很短，一九一二年初清朝覆灭后，军队旋即撤退。但这次的占领行动中，中国军队歷史上首度跨过喜马拉雅山分水岭，进入现今为阿鲁纳恰尔邦最东北角的瓦弄，在瓦弄以南竖立几个边界标志后就此撤退，未曾试图设立任何行政机构。中国军队最终撤出西藏占领区的路线颇为讽刺，是透过到加尔各答乘船返回中国港口，因为所有由藏入中的道路已被藏兵控制。

随着中国军队撤出西藏，达赖喇嘛返回拉萨，藏人也想追随蒙古人的前例。一九一三年二月十三日，也就是阿旺．德尔智与大喇嘛然丁、曼莱巴特尔．达木丁苏隆在库伦签订条约的一个月后，达赖十三世发表了等同独立宣言的声明。

首先，达赖喇嘛解释：

数年前，四川与云南的中国政府试图殖民我们的土地。他们带着大批军队进入西藏中部，藉口监督贸易市集。因此我与我的官员们离开拉萨，前往印度与西藏边界，希望向满洲（清）皇帝以电报澄清，西藏与中国的既有关系，是施主与僧侣的关系，而非一方臣服于另一方。我别无选择必须跨越边界，因为中国军队所受命令是逮捕达赖，死活不论。91

接着是对西藏国际地位的说明：

西藏是具有丰富天然资源的国家；然而科技不如其他国家先进。我们是一独立宗教小国，为了与世界各地同步，必须保护自己的国家。在过去的外国入侵中，我们的人民也许必须面对某些困难，但都必须坚忍。为了保卫及维护国家的独立，所有人都必须自愿奉献。居住于边界周遭的子民必须警醒，透过特使知会政府任何可疑发展。我们的子民不应为了小事而造成两国主要冲突。92

然而，西藏的独立宣言与蒙古一样，也被外界势力忽略。英国与其他国家持续承认中国为西藏和蒙古的宗主国。然而宗主权并不等同于主权。宗主权一词最初是用来定义鄂图曼帝国与其周围区域的关系，仅指某个区域承认宗主国的权力，因此向其支付贡金（实际上却经常逃避支付）。因此，这实际上代表在宗主权中的内部自治，而宗主国仅掌有涉外（或许还有国防）的权力。而一九一○年代的中国陷于动乱脉络中，因此这是毫无意义的形式称号。蒙古和西藏两者就算不是法理（de

jure）独立，也是事实（de facto）独立的国家。

为了规范西藏地位并明确边界，英属印度政府外交部于一九一三年五月二十三日邀请中国政府会同西藏政府，举行联合会议。三方最终在十月十三日，于喜马拉雅山脚下的印度夏都西姆拉召开会议。

英属印度政府首席谈判官亨利．麦克马洪是生于西姆拉的殖民官员，担任这场会议主席。在西藏相关议题上，协同官员有前驻中国领事阿奇博尔德．罗斯（Archibald Rose）及当时英国驻锡金政务官查尔斯．贝尔（Charles Bell）。英国团中还有一位着名人物，全名是索南．汪达．莱登．拉（Sonam Wangdel Laden La），或简称莱登．拉，是来自锡金的不丹人，熟稔多种语言，包含藏文与英文。一九○三至一九○四年间，莱登．拉曾随荣赫鹏远征拉萨，此次则为负责安全事务的高级警官。甫由英国返回印度的莱登．拉被遣往西姆拉，在会议最后阶段担任西藏代表团的翻译。他于一九一四年六月二十一日抵达，并停留了一个月。[93]

西藏派出伦钦[94]夏札．班觉多吉（Shédra Penjor Dorjé）代表达赖喇嘛。西藏代表团中协助谈判者还有另外两位高阶政府官员：赤门．诺布旺杰（Trimon Norbu Wangyal）与堪琼丹巴达杰（Khenchung Tenpa Dhargyal）。根据西藏消息来源，这次会议是西藏政府不想错过的机会。他们希望独立宣言获得承认，伦钦夏札与团队事先蒐集各项佐证资料，在中英代表面前提出。[95]

中国的主要代表是陈贻范，是熟稔英文并四处游歷的外交官，曾在中国驻英国使馆九年。中国政府任命陈贻范为西藏宣抚使，由副宣抚使王海平辅佐。然而陈、王二人背后的真正掌权者是陆兴祺。一九一二年达赖喇嘛返回拉萨后，陆兴祺在分化达赖与西藏第二掌权者，班禅喇嘛的关系上，扮演了重要角色。[96]

一九一三年四月，中国政府任命陆兴祺为护理驻藏办事长官，并令其从海路经加尔各答前往西藏。由于陆兴祺无法入藏，只能停留在其非常熟悉的加尔各答。他曾在十九世纪晚期就读加尔各答的中国学院，后来在中国城的特丽塔市场街（Tiretta Bazar）成立「天益号」，经营西藏的毛皮生意。[97]

在成功商人的外表下，陆兴祺还是负责印藏事务的情报人员。[98]陈贻范成为中国政府处理西藏事务的新官方脸孔，虽然中国资料中并未载明此一职位何时由陆兴祺转到陈贻范手中（倘若有正式移转的话）。[99]西姆拉会议期间，陆兴祺、陈贻范及中国政府一直保持密切联系。

由于中国希望西藏被称为中国的一部分，因此会议一开始就面临难题。伦钦夏札虽然甚少离开家乡，但在呈现藏方论点、反驳中国对西藏

地位主张的政治掌握度，着实令中英代表团感到惊讶。伦钦夏札列出中国在一九一○至一九一二年占据西藏的过分行径，并且毫不意外地持续要求承认西藏的独立地位：

西藏与中国从未从属彼此，未来也不会如此。西藏认定自己是独立国家，神圣保护者达赖喇嘛是西藏统治者，统管所有世俗与精神事务。西藏否认一九○六年四月二十七日在北京签订的《中英续订藏印条约》……由于西藏并未遣使参加会议，亦未签章，因此该条约将无法对三方政府生效。[100]

一九○六年《中英续订藏印条约》内容包含「英国应允不强占藏境及不干涉西藏一切政治。中国应允不准其他外国干涉藏境及其一切内治」[101]。然而英国可以铺设西藏与印度之间的电报线，因此西藏与外界联系主要是透过英属印度，而不是中国。

一九○六年《中英续订藏印条约》可解释为英国承认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但主要目的是确认西藏做为英属印度与沙俄之间的中立缓冲区地位。因此英国并不同意伦钦夏札否认一九○六年《中英续订藏印条约》的要求：承认西藏是完全独立的国家。此外，承认西藏独立将违反一九○七年《英俄条约》，其内容主要是解决英、俄两国在波斯、阿富汗与西藏的势力划分争议。[102]在条约规范下，两国都承诺除非透过中国调停，否则不得与西藏单独订约。至于中国方面，自然是不愿意讨论西藏独立议题。

根据查尔斯．贝尔所述，英国不愿同意伦钦夏札的要求还有其他原因，独立的西藏可能寻求蒙古的协助，并且透过蒙古转向俄国。[103]就如同印度东北曼尼普尔邦报纸《因帕尔自由报》（Imphal Free Press）的编辑普拉迪普．潘竹邦（Pradip Phanjoubam）所说：「此时的英国对藏政策并非针对中国，而是对于俄国的恐惧，也就是所谓的『大博弈』（Great Game）。」[104]

中国确实并未被视为「大博弈」中的要角，西姆拉会议之所以邀请中国出席，不过是因为一九○七年《英俄条约》的约束。此条约根据潘竹邦所言，「基本上是英国强加于俄国之上，后者正因日本而饱尝败战的羞辱」[105]，这里的败战是指一九○五年的日俄战争。俄国必须保证不干涉西藏，然而条约内容同样束缚着英国。西藏、阿富汗与波斯，将持续做为沙俄与英属印度之间的中立缓冲区。[106]

荷兰学者凡．艾克隆（W.F. Van Eekelen）认为，当时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John Jordan）「主要关心西藏转向俄国的危险，然而英国斡旋的空间，同样受限于一九○七年《英俄条约》」。[107]朱尔典建议，英国不应成为西姆拉会议任何条约的签署国，因为这将牵涉与俄国签订

新条约，也建议麦克马洪：「採取友好协助的态度，扮演诚实中介的角色。」108

俄国必须小心处理。他们持续收到消息，英国在俄国清楚表明无反对之意后，依计画召开西姆拉会议，「若各方承认的边界获得批准后，才必须向俄国提出正式通知。」109

在九个月的谈判过程中，主要争议点在于中国与西藏的边界如何划定。由于许多藏人居住在远离拉萨政治控制的区域，这些区域技术上属于中国，而当时中国的中央政府甚至难以掌控国内较核心的区域。麦克马洪或许是受蒙古的新安排影响，建议藏人居住区也应分「内」与「外」。外藏为传统上由拉萨控制的区域，并持续做为自治体。内藏则是中国的一部分，将做为拉萨统治的西藏与俄国主导的外蒙古之间的缓冲区。110外藏包含西藏中部与西部，紧邻中国的内藏则包含安多（Amdo）与部分康区（Kham）。111

经过九个月漫长且时而激烈的论辩，英藏在一九一四年七月三日签订条约，其上明言「大不列颠和中国政府承认中国在西藏享有宗主权，并且承认『外藏』自治，允诺尊重该地区的领土完整，不干涉『外藏』的行政事务（其中包括达赖喇嘛的认定与坐床），『外藏』的行政事务将仍由拉萨的西藏政府掌管。」112同时条约内文还说：「中国政府允诺不把西藏变成一个行政省，大不列颠政府允诺不吞併西藏或占领其任何部分。」113

藏人并未获得希求的独立承认，但中国也必须允诺仅派遣「驻藏高级官员」，率领「适当卫队」且「不得超过三百人」，同时「外藏所有官员选任，皆由西藏政府为之」。114

陈贻范在条约草案上署名，但最后拒绝批准此约。根据歷史学者约翰．罗兰的观点，陈贻范与中国政府「拒绝《西姆拉条约》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不愿放弃任何被认定为『天朝上国』既有领土的传统态度」。115

虽然内、外藏建立与边界划分是西姆拉会议论辩的主题，会议中也讨论了印度与西藏边界。陈贻范曾署名的条约内文中，第九条即言明「为便于执行本条约，西藏疆域及内藏与外藏的分界，分别以红、蓝线绘明于所附的地图上」。116红线即是分隔西藏与英属印度的麦克马洪线，蓝线则是内、外藏的界线。因此罗兰认为「中国毫无理由指称西姆拉会议并未处理印度与西藏边界」117，或者是陈贻范并未同意地图上的红、蓝线。

同时这也不像中国后续宣称的「秘密协商在陈贻范与中国代表团背后进行」。但也许可以争论的是，中国并未被纳入印度与西藏边界划定

的讨论，因为英国与西藏认定此为双边议题，与中国无涉。

根据凡．艾克隆所述：

在条约内文草案定案前，英国与西藏代表已经完成印度东北边界的讨论，亦即「麦克马洪线」。中国并未受邀参与讨论，他们也未特别寻求中国同意。此线呈现在条约所附之西藏疆域及内外藏的分界地图时，中国才得知此事。118

若採信中国与其支持者的观点，麦克马洪线则是阴谋论的结果。当英国施压藏人接受新的边界时，陈贻范等人都被蒙在鼓里；在未徵询中国意见的情况下，边界从布拉马普特拉河以北的喜马拉雅山脚，移到喜马拉雅山顶。接着如马克斯韦尔及兰姆等人指称，英藏协议出于某些不知名原因（也许是为了不触怒中国）而被秘密收藏，之后甚至遭遗忘长达数十年。

一九一四年《西姆拉条约》及另外一份提到麦克马洪线的《英藏宣言》（Amglo-Tibetan Declaration），都未出现在收录「印度及其邻国的条约、协定和证书」的一九二九年版《艾奇逊条约集》（Aichison's Treaties）之中，这份辑录自一八六二年开始，以系列方式出版。然而，根据马克斯韦尔与兰姆的观点，当西姆拉会议与英藏边界协定纳入一九三八年再版的一九二九年版《艾奇逊条约集》，出版日期则订在一九二九年。原本的一九二九年版据称由流通市场收回。119换句话说，对马克斯韦尔与兰姆而言，这是明显的欺骗。

一九六二年，中国政府在一本名为《中印边界问题》的书中，提出中国的西姆拉会议内容及后续：

英国代表在会议之外，即中国中央政府代表背后，透过与西藏地方政府代表秘密交换信件，划出恶名昭彰的「麦克马洪线」，试图将中国九万平方公里土地纳入英属印度。中国政府拒绝承认这条不合法的『麦克马洪线』，自当时至今所有的中国政府皆然。正因如此，一九三六年（原文如此）以前，英国政府不敢公开将此线划在地图上。不合法的麦克马洪线完全是将英帝国主义加诸中国人民之上。120

马克斯韦尔宣称，麦克马洪在西姆拉会议之后即调离印度，暗示也许是因为他在一九一四年的「作为」。121事实上，麦克马洪不只能说印地语及波斯语，还通晓阿拉伯语，因此于一九一五年升任为英国驻埃及高级专员，这很难称得上是惩戒甚或降调。麦克马洪以埃及为基地，协助组织阿拉伯反抗军对抗鄂图曼帝国，于一九一六至一九一七年成功争取到独立。

马克斯韦尔同时写道：「直到一九三五年，一位名为欧拉夫．卡洛（Olaf Caroe）的德里官员，在旧文件中发现与藏人签订的条约，并开

始运作政府让此线成为印度实质的东北边界前，所谓的『麦克马洪线』根本无人闻问。」[122]

同时根据马克斯韦尔的说法，卡洛「歷经困难终于成功让此线（麦克马洪线）出现在某些正式地图上；他也安排假造一九一四年西姆拉会议出现在《艾奇逊条约集》上的纪录，好看起来与会各方对于新的『麦克马洪线』达成协议」。马克斯韦尔宣称，直到此刻「英属印度政府才开始缓慢将行政机构推往麦克马洪划下界线的山巅」。[123]

在边界议题上，相较于马克斯韦尔，兰姆采取较为仔细的学术态度，不过他也指责卡洛「假造」文件，并在自己的纪录中修改边界。兰姆指出，卡洛并不容易「说服政治人物，存在着领土安全的严重情势，这片领土虽然技术上属于英国，但大英帝国的统治者却遗忘超过二十年。这片领土倘若真的如此重要，为何会不在正式记忆之中？」[124]

然而其他学者并不同意兰姆，或至少认为他对这事件的诠释微弱且具争议。无庸置疑地，英藏之间确实在西姆拉签订边界条约，如同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教授李奥．罗斯及许多其他学者所记录。罗斯除了批评兰姆过度拥抱支持中国立场外，同时指出英国学者在麦克马洪线的书写上更精确的弱点。罗斯在两大主要议题上挑战兰姆。其一，兰姆宣称西藏政府并非独立，因此无法在未经中国同意的前提下签订条约，罗斯认为兰姆：

忽略西藏政府已在一九一三年正式宣布自中国独立的事实，并于西姆拉会议中在全藏建立有效政权……（兰姆）在简短段落中忽视英国与西藏政府是否有权就印度与西藏边界签订条约的问题。但我们可以合理争论，英藏政府是在权限中采取行动；就麦克马洪线一事而言，中国未能批准条约，并不具有「法律上的」重要性。[125]

此外，陈贻范确实有在划界条约所附的地图上签名。

其二，兰姆在书中一处注释中，提出西藏于《西姆拉条约》里承认中国的「宗主权」，罗斯如此认为：

究其分析主线来说，这点相当耐人寻味。他明显承认西藏政府至少能代表西藏人民做出此类承诺。但他没有注意到，这条文（根据条约内容）「必须」在中国批准条约后才会生效。由于中国并未批准条约，因此整个讨论并不实际。[126]

罗斯的另一个论点是，兰姆的论点奠基在英中与英俄签署的条约，将限制英国在西藏行动的能力。而罗斯认为「也许有人争论英国与西藏达成协议时，已违反了这两项条约（英中、英俄），并震惊地认定在极端不同情况中签署的条约，在国际法之下是为无效。然而反对此诠释的前例比比皆是」。[127]

西姆拉会议之中与之后实际发生的事，也远比中国版本的诠释更直接且缺乏戏剧性。当陈贻范与中国代表忙着处理西藏地位及中国内地与西藏边界的划分时，西姆拉会议的纪录中明显可见，他们对印度与西藏边界何在其实缺乏概念。陈贻范懊悔缺乏西藏各边界的精确地图。128根据潘竹邦报导，陈贻范「在麦克马洪询问时并不清楚印度边界何在，隔天才提出回覆，并使用法国地图为证据」。129

此外，关于《西姆拉条约》与麦克马洪线的细节并未立刻公诸于世这件事，应该视为英国的谨慎与忽略，而非如中国宣称的「恐惧」，或是马克斯韦尔与兰姆所说的秘密欺瞒。西姆拉会议后，第一次世界大战旋即爆发，比起印度遥远边境的边界划分，英国显然有更重要的优先议题。

印度确实就西藏问题与俄国签订条约，这件事也不应忽视；这是伦敦外交部的重要考量。130然而，一九一七年俄国发生布尔什维克革命，苏联成立后情势有所改变。此刻，一九○七年《英俄条约》已然失效。

同时，事实也非马克斯韦尔、兰姆与中国所称，在一九三○年代前，喜马拉雅山巅边界线从未出现在英国或其他地图上。远在明确边界的地图细节成为现实前，分水岭、山川河流就已成为国与国之间的分界；而喜马拉雅山巅（而非南方的山脚）长久以来就是西藏高原与印度次大陆的分界线。

后来成为英国驻拉萨特使的英国驻锡金政务官查尔斯．贝尔，在一九二四年的经典作品《西藏的过去与现在》（Tibet: Past and Present）中，随附的折叠地图显示出，印度与西藏边界位于喜马拉雅山巅，或者说大致沿着麦克马洪线。131中国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的《中国地图》（Atlas of the Chinese Empire），出版于一九○八年，西姆拉会议的五年前，其中的西藏地图显示的边界是沿着喜马拉雅分水岭。一九一二年三月，伦敦皇家地理学会出版的《地学杂志》（Geographical Journal）地图也是如此。甚至部分在中国刊印的地图，也将边界划在喜马拉雅山巅，其中包含一九一七年中国政府使用的官方邮务地图，以及同年在上海出版的《最新中国商业政治地理大全》（The New Atlas and Commercial Gazetteer of China）。132

西段边界的划分甚至比东段更模糊不清，主要是因为当地人烟稀少，缺乏跨越山区的贸易往来。然而拉达克是由奉行藏传佛教的西藏部族组成的独立王国，与西藏及不丹维持往来关系。一八三四年，拉达克被来自旁遮普平原的锡克帝国（Sikh Empire）武力兼併，六年后完全失去独立地位。一八四六年，拉达克被纳入查穆与喀什米尔大公国，后者于阿姆利泽（Amritsar）签订条约，承认英国在印度帝国中的至高权

力。[133]高耸山脉及所谓的「自然环境」成了拉达克、中国及西藏控制的北方区域间的分界。但对「自然环境」如何定义，各方意见不一。

根据一八四六年《阿姆利泽条约》（Treaty of Amritsar），邻近西藏的北界，应由英属东印度公司聘任专员，会同查穆与喀什米尔大公古拉伯．辛格．多格拉（Gulab Singh Dogra）共同订定。一名英属印度测量局官员威廉．詹森（William H. Johnson）成为大公之下的拉达克总督。一八六五年，他提出一条穿越阿克赛钦的边界，接通此区最高的崑崙山脉。一八九七年，这条边界由英国伦敦的军事情报处长约翰．阿尔达少将（John Ardagh）向英国政府提出。后续，这条线就称为「阿尔达——詹森线」（Ardagh-Johnson Line）。[134]

中国从未承认阿尔达——詹森线。一八九二年，一名中国巡逻官曾经在喀喇崑崙山口竖立了几座边境标志，这座山口是自古以来新疆与拉达克之间的商队路线。从此之后，中国持续宣称拉达克的阿克赛钦大部分区域应属于中国。英国对中国进入这块偏远无人居住区域一事并不关心，但为了在扩张的沙俄帝国与西藏间建立另一块缓冲区，一八九三年又划了一条新边界「马继业——窦讷乐线」（MacCartney-MacDonald Line），将多数阿克赛钦区域都划入中国境内。这个新边界是以英国驻新疆主要城市喀什（Kashgar）的领事马继业（George MacCartney）与当时英国驻清公使窦讷乐爵士（Claude MacDonald）为名。窦讷乐更为知名的作为是，在一八九八年为香港殖民地向中国谈判，取得新界九十九年租约。此租约于一九九七年到期，整个香港回归中国统治。

根据印度资料，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英国政府接受以阿尔达——詹森线（而非马继业——窦讷乐线）做为正式边界。[135]此线也是今日所有地图上的印度边界，中国主张则大致沿着马继业——窦讷乐线。英国殖民时期地图上的西段边界，远比东段更为模稜两可，然而在一九四七年印巴分治前夕所出版的地图，印度领土确实包含了阿克赛钦及今日的阿鲁纳恰尔邦。[136]矛盾的是，部分较早的殖民时期地图中，拉达克边界标示着「未定界」。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七年间，英属印度政府曾数度遣使西藏，要求划定拉达克与西藏的边界，然而未果。[137]因此至少到一九四三年前，这段边界在地图上多以虚线方式标注。

另一方面，中国地图的对外疆界也不精准，其中想像力最为丰富的莫过于中华民国地图，至今仍在台湾使用。虽然中华民国只存在于台湾与数个附近小岛，但使用的地图仍展现一九一二年建国时所宣称的中华民国疆界。这张地图上唯一修正的部分，是在一九四五年纳入台湾，因为台湾从一八九五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都受日本统治。

在正式地图上，西藏自然也是属于中华民国，此外还有蒙古国、俄

罗斯的图瓦共和国（Republic of Tuva）、阿克赛钦、阿鲁纳恰尔邦、缅甸最北侧克钦邦孙布拉蚌（Sumprabum）以北区域、南中国海岛群及钓鱼台列屿。钓鱼台列屿位于东海，日本也宣称拥有主权，并称为尖阁诸岛。

中华民国从未承认蒙古独立，这也是之前蒙古多年无法加入联合国的原因。直到一九六一年，苏联威胁中华民国若再次动用否决权，也将否决所有甫解放殖民的新兴非洲国家加入联合国，因此才让蒙古加入联合国。当时中华民国在联合国中代表中国席次，并担任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直到一九七一年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取而代之。

蒙古在一九一一年宣布独立后，也经历了一些重大变化。一九二一年俄国红军进占蒙古之后，政教合一的旧国家不复存在。这波入侵是由前沙俄军队中将在俄罗斯远东区域的恐怖统治所引起，他的名字是罗曼．费欧多洛维奇．冯．恩琴——史登伯格（Roman Fyodorovich von Ungern-Sternberg），这人若生在今日，应该会被认定心理变态而入狱。冯．恩琴——史登伯格以「疯狂男爵」闻名，也信奉麾下蒙古骑兵的喇嘛佛教，并从佛教导师那里习得轮迴转世概念。他坚定相信杀害无力反抗者是为了他们好，可以让被杀者在下一世更加强壮。

一九二○年秋天，冯．恩琴——史登伯格带领一支六千人的杂牌军，包含前沙俄骑兵团、当地哥萨克人与蒙古骑兵进入蒙古。一九二一年一月当他入侵库伦时，「各年龄层、种族与信仰难以计数的孩子们都被砍成碎片、刺刀刺穿、枪杀、勒毙、绞杀、钉死或活埋。」[138]

冯．恩琴——史登伯格在蒙古自称「全俄皇帝」，誓言铺出一条从库伦通往莫斯科的「恐惧大道」，并将吊死「共产党人与犹太人」。[139] 他也宣称将带领军队一路直入西藏，并相信自己的「帝国」将与达赖喇嘛签订条约。

莫斯科新的共党政府显然视冯．恩琴——史登伯格为威胁，不单是因为他所带来的灾难。日本是冯．恩琴——史登伯格的主要后台，并视之为扩张北亚、中亚势力的有用工具，特别是在一九○四至一九○五年击败帝俄之后。日本公开支持冯．恩琴——史登伯格的「大蒙古」计画，并将其纳入保护国。虽然不清楚征服西藏是否在计画之中，但在日本的支持下，冯．恩琴——史登伯格的猖狂行径已引起新德里与伦敦的关注，并重视强化英属印度北方边防的需求。

最后终结了冯．恩琴——史登伯格恐怖统治的，并非英国或任何外国势力，而是俄国共产党。一九二一年七月，一万名红军进入库伦，逮捕并处决冯．恩琴——史登伯格，蒙古成为了莫斯科的附庸国。蒙古不同于其他共产党统治的中亚区域，当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三十日，苏维埃

联邦共和国宣布成立时，蒙古并未成为联邦的一部分。由于当时苏联与中华民国关系友好，兼併蒙古将会破坏中苏关系，因此苏联採行自认妥协的解决方式，让蒙古成为一个「人民共和国」，是苏联之外的第二个共产国家，而中华民国所有地图，仍持续将蒙古包含在疆界之中。

今日的图瓦共和国是俄罗斯联邦的一部分，也是另一个由俄国共产党统治，但中国却宣称为其所有的区域。它与蒙古一样成为正式独立国家，当时名为「坦努图瓦人民共和国」（People’s Republic of Tannu Tuva）。于一九二一年八月建国，至一九四四年消失在地图上。由于图瓦面积较小，战略位置也不如蒙古重要，遂被苏联所併。但图瓦也如同蒙古，今日仍出现在中华民国的地图上。

中华民国官方地图或许可视为与现实脱节，但台北当局仍旧维持这份地图，倘若承认蒙古为独立国家，那么又该如何处理台湾？台湾岛上有强烈㗊声要脱去中华民国旧名，改採台湾共和国。若台湾独立，中国则威胁入侵。虽然一八九五年以来，台湾受大陆政权统治时间仅仅四年，从一九四五年脱离日本统治回归中国，到一九四九年中国共产党取得胜利，国民党政府逃往台湾为止；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仍认为台湾是其领土的一部分。国民党也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指的是中华民国，不过此观点并未获得台湾民族主义的民进党人士认同，后者自二○一六年五月成为执政党，并希望台湾脱离大陆成为独立国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印制的地图，不合现实的出入自然比中华民国地图少，但仍旧包含一些从不属于中国，或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建国后占领的区域。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未宣称拥有蒙古与图瓦，但新的中国共产政府自一九五○年代初期就占领西藏与阿克赛钦，其地图也包含台湾、今日的阿鲁纳恰尔邦、南中国海斯普拉特利群岛及钓鱼台列屿。

中共政府刚上台时宣称，将「重新审阅过往政权与外国势力签订的条约，予以承认、废止、修订或重新谈判」。[140]一九六○至一九六三年期间，中国与缅甸、尼泊尔、蒙古、巴基斯坦及阿富汗签订新的边界条约，但未包括印度与苏联。直到一九九一年、二○○三年及最终的二○○八年条约签订后，中苏之间才解决领土争议。

一九六○年十月一日签订的条约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弃过去对缅甸最北角克钦邦的领土宣示，虽然此地从未在中国统治之下。一九六○年条约进一步要求，为交换中国的「让步」，以及缅甸对克钦邦边界两百二十平方公里的南碗指定区[141]主权，中国将取得中缅边界上的三个克钦族村落：片马（Hpimaw）、古浪（Gawlum）及岗房（Kangfang），以及缅甸东北佤族山区的班洪——班老区域（Panghung-Panglao）。克钦邦村落区域约为一百五十二平方公里，而

割让中国的佤族区域为一百八十九平方公里。142

以国际标准来看，这笔交易并非不公平。不过传闻迅速在缅甸少数民族区域的克钦邦中扩散：克钦领域的广大区域已割让给中国。因此克钦人在一九六一年发动叛变，直到今日仍未休止。除了与中国的边界条约外，缅甸政府于一九六○年决定将佛教定为国教一事，也让以基督徒为主的克钦族人大为不满。克钦人开始争取独立，或者至少是真正自治的政府。

从区域观点来看，中缅在一九六○年签订的边界条约与印度冲突有关，因为两国区划的边界延续了麦克马洪概念，亦即分水岭的概念。缅甸的北方边界事实上是麦克马洪线的延续，而中国显然并未视其为某种古老、殖民时期「不平等条约」或「帝国主义政策」的延续，这是中国政府在讨论中印边界与其他领土争议时一贯诉诸的说法。

缅甸边界可能对印度有另一种影响，因而让英国在一九三○年代採取行动稳固麦克马洪线。当时称为Burma的缅甸（Myanmar），在十九世纪三次英缅战争后，成为英属印度的一省。然而在一九三五年《印度政府法案》的规划下，缅甸将成为另一个殖民地。此事于一九三七年发生，根据潘竹邦的说法，这可能是「欧拉夫．卡洛急忙在《艾奇逊条约集》中发布麦克马洪线的原因之一。一九三八年他最终在争议状态下所做之事，（正因为）缅甸即将脱离印度」。143

英国在缅甸极北之处的统治，虽然比殖民地其他部分来得微弱，但确实延伸到北方分水岭，因此稳固麦克马洪线确实说得过去。一份解密的一九五九年美国中情局文件显示：「虽于一九一四年划定麦克马洪线，此后在延伸山区行政控制方面，几乎没有任何作为。」144英国虽然忽视布拉马普特拉河以北的山区，但并非毫无作为。同一份中情局文件也指出，虽然多数地区未设治，「一九○○年前，英国人曾与不同山区部族签订条约，避免他们劫掠平地居民。」145

这些接触并非没有意义。远征军进入布拉马普特拉河以北山区，部落居民不只劫掠低地，也会来此购买高地无法取得的日用品。除了今日阿鲁纳恰尔邦西北角的达旺区域与极东的瓦弄主要是与西藏进行交易外，山区部落居民与外界的任何接触，都是透过南下平原，而非北上穿过世界最高的山岳。同时也如前述，倘若这些部落民有熟悉任何外界的语言，通常是零碎的阿萨姆语而非藏语，当然更非中文。

然而，不只马克斯韦尔与兰姆的着作中出现困惑与明显的矛盾，许多其他西方学者宣称存在于麦克马洪线旁近与下方，所谓的内部与外部界线也是如此。部分内容是真的，但许多都是虚构，不只是误解，更是对印度北方边界实际情况的扭曲。马克斯韦尔宣称存在着「事实边

界」：「布拉马普特拉河广大平原由此开始向喜马拉雅山脚丘陵上升……英属印度称此统治极限为『外部界线』，并禁止任何未经许可的穿越行为。」[146]

这完全是谬论。一八七三年的《孟加拉东部边界规范》（Bengal Eastern Frontier Regulation）之下同时立法，在阿萨姆平原与附近山区之间建立所谓的「内部界线」（Inner Line）；但行政当局明白表示：「此线并不代表领土边界，仅是行政区域界线……同时也未决定外侧区域的主权。」[147]

如同潘竹邦指出的，一八七三年是茶叶种植在阿萨姆各地快速扩张的年代，「茶叶投机分子渴望争夺更多土地」[148]，因此争相进入山区。投机客与寻求利益的大众间缺乏控制的沟通，代表「政府将损失大笔税收」[149]。另一方面，对殖民当局来说，内部界线是避免所谓「野蛮部族」劫掠低地的必要之举。内部界线外的领土在一九一九年《印度政府法案》中列为「除外地区」（excluded areas）、「部分除外地区」（partially excluded areas）及「落后区域」（backward tracts）。但这些仍是英属印度的一部分，而非外国土地。

《内部界线规范》（The Inner Line Regulation）仍旧在印度东北部分地区施行，此法同时也避免低地人民永久定居在界线以北的区域。不是来自东北山区数邦的印度公民，需要申请特别许可才能进入那迦兰、米佐拉姆、阿鲁纳恰尔邦与锡金。非印度公民在进入那迦兰、米佐拉姆与曼尼普尔前，必须向印度当局登记；欲进入阿鲁纳恰尔邦与锡金，则需要申请特别许可。

内部界线很明确，但从未有任何正式的外部界线。那只是几位西方学者想像中的虚构。兰姆在其着作《中印边界：边界争议起源》（The China-India Border: The Origins of the Disputed Boundaries）中，甚至在一幅地图上标出「一九一四年前外部界线」。[150]虽然部分古老书籍与纪录提及外部界线，但正如潘竹邦指出：「英属印度政府否认有任何正式外部界线，任何外部界线指涉，应该大致为一九一三至一九一四年所划的麦克马洪线。」[151]若真有任何外部界线，就该是喜马拉雅山巅；没有任何理由在内部界线与麦克马洪线之间再划第三条线。

在兰姆的地图上，外部界线沿着山脚，或者说在内部界线以北数公里处。两条如此相近的平行界线，实在毫无道理。马克斯韦尔甚至更进一步在《印度对华之战》中宣称，一九一○年「即将退休的总督明托伯爵比（孟加拉副总督）更大胆，提议外部界线应延伸包含所有部落区域……（新总督）哈汀（Hardinge）采纳明托的提案，认为外部界线应向北推展」。[152]

此处再次暗示了存在一条正式的外部界线。问题在于马克斯韦尔在此条注释写着：「哈汀给克鲁（Crewe）」，这让人有一种印象，认为此言是摘自一九一一年印度总督查尔斯．哈汀对英国的印度事务大臣罗伯特．克鲁——密尔恩爵士（Robert Crewe-Milne）的直接通讯。然而他援引摘文的来源并不是这么说。

根据《印度对华之战》的注释，摘文引自《阿萨姆邻近边界区域歷史：一八八三至一九四一年》（History of the Frontier Areas Bordering Assam From 1883-1941），作者罗伯特．瑞德爵士（Robert Reid）曾于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一年担任阿萨姆总督，其中提到：

我们不提议在既有内部界线与新的外部边界之间建立第三条中界线，但在考虑部落领域行动的过程中，可能有必要在合适地点，例如往西藏的通商路线，设立石碑以标明我方控制终点，并向部落民说明这类标志的目的。153

哈汀在电报中提到了「外部界线」，但认为并无需要，因为当时正在讨论更为精确的新边界。然而在兰姆与马克斯韦尔版本的歷史中，这个不精确的「外部界线」反成正式的外部界线。根据潘竹邦所述，内部界线与喜马拉雅山巅之间的区域确实存在，「但在任何现实意义上，是被视为荒野『无人』之地，等待正式宣示所有权。在此案例中，是透过麦克马洪线。」154

马克斯韦尔同时给人一种印象，阿萨姆以外的土地是属于中国，并指出印度感到威胁，因为「中国在印度边界地区积极活动」，而这正是英国想向北扩张的原因。155然而中国除了一九一○至一九一二年短暂占领西藏时期，曾在瓦弄边缘的偏远区域设立几个边界标志外，并没有任何官员或军队靠近印度北部边界的纪录。马克斯韦尔同时认为达旺「无庸置疑属于西藏／中国」，看起来像是藏人与中国人一起快乐地统治这里。156部分中国商人确实可能在二十世纪初进入或穿越达旺，但中国官员从未前往此地。同样令人误解的还有马克斯韦尔说的「一九一一至一九一二年，中国势力在西藏突然垮台」157。事实上，他所指的是中国在这两年里短暂而失败的占据西藏行动。

殖民进入今日阿鲁纳恰尔邦的行动，是来自其他更直接的考量，例如部落民族时常劫掠阿萨姆低地，以及茶商希望向布拉马普特拉河以北山区扩张茶叶种植范围。英属印度政府支付内部界线以北数位部落酋长高额费用，避免他们劫掠平原地区，造成部落与殖民权力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酋长依靠英国抵御外来者，而英国则透过每年补助款来换取部落忠诚。

喜马拉雅山脉另一侧的西藏，自一九一三年达赖十三世宣布独立

后，维持事实独立长达数十年。甚至正如西藏专家华伦．史密斯（Warren W. Smith）所指出：「清（帝国）与西藏的关系本质上是两国关系，或是帝国与半自治国家之间的关系，而非中央政府与外围省分的关系。」[158]

随着中国在西藏有限影响力的结束，藏人此时终于可以建设一个真正较为独立的国家。西藏与英属印度的边界已然明确，如同西姆拉会议中西藏代表伦钦夏札致麦克马洪的信件所述：

为免将来纷扰，印度与西藏的边界需要清楚划定，我已将您二月提送的地图送往拉萨等候命令。此刻我收到来自拉萨的命令，因此同意两份地图上以红色标记的边界。这两份地图由您署名，并依贝尔先生转交您在三月二十四日信件中所列条件为限。我已签名并封缄两份地图，自存一份，另一份于此回覆。[159]

当然，「以红色标记的边界」所指的就是麦克马洪线，而贝尔先生是指查尔斯．贝尔。

因此，就连藏人也认为宣称麦克马洪线为「秘密划定」十分荒谬。至于宣称相关文件在一九三○年代才由卡洛「发现」，同样会令人误解。阿萨姆平原与麦克马洪线之间，并没有建立太多实质行政管理机构；然而一九二八年，内部界线以北巴利帕拉边境地域的政治官奈维尔上尉（Captain Neville）才通知印度政府，若中国试图掌控西藏，达旺将是个「轻易进入印度的秘密门户」。[160]

达旺是难以区分属于麦克马洪线以北或以南的部分区域之一。地图上红色麦克马洪线将边界大致放在色拉山口，位于达旺以南七十八公里。然而根据麦克马洪线建立的原则，沿着喜马拉雅山最高山峰划定，并由分水岭连接，边界应该在达旺以北的棒山口。在西姆拉会议的最后备忘录中，麦克马洪发现此事，并快速讨论将达旺纳入印度领土，「这将给我们天然分水岭边界，通往西藏最短的贸易路线，并控制过去曾以不当收取金钱与压迫行为阻断贸易的达旺寺庙。」[161]

「发现」麦克马洪线部分区域的模糊状态，其功劳不应归于卡洛，而是英国植物学者暨探险家法兰克．金顿——沃德（Frank Kingdon-Ward）。他在一九三四至一九三五年间抵达门隅（Monyul）或达旺区域，并注意到印度政府长期以来：

支付年度补助款给门隅（达旺）的事实统治者，并以为他们是独立酋长。一开始也许如此，但最近才发现多数补助款进到错那（Tsona-Dzong）那些（位于西藏）掌权者的口袋，然后转到拉萨……此一做法稀释了印度对门隅的控制……一九一四年完成的安排，门隅将成为巴利帕拉边境地域的一部分。[162]

金顿——沃德认为印度政府应为其忽视负责，「倘若印度于一九一四年掌握这片土地，就不会有今日之事。」163并且提出解决方法，「在一九三九年，最迟一九四○年进行有效占领。」164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横亘其中，直到一九五○年代初期，达旺才进入印度中央政府的控制之下。

金顿——沃德的达旺之行，在英属印度与西藏关系中造成一些问题。当地政府逮捕他，接着藏人向当时访问拉萨的英国官员德瑞克．威廉森（Derrick Williamson）抗议。与藏人交涉后，金顿——沃德被遣返低地。经过此一事件，欧拉夫．卡洛才决定将《西姆拉条约》公诸于世。此前，只有少数边境官员知道《西姆拉条约》。165

虽有金顿——沃德事件，一九二○及一九三○年代间，西藏与英属印度之间的关系一贯友好；一九○三至一九○四年荣赫鹏远征西藏、达赖出逃及藏军羞辱溃败之事已然被遗忘。一九二二年，英国人派遣莱登．拉（不丹籍锡金官员，曾参与荣赫鹏远征军，后来在西姆拉会议担任口译）前往拉萨建立西藏警卫队。他的工作非常成功，英国情报官弗雷德里克．贝利（Frederick Bailey）上校在一九二四年到访拉萨时回报：「莱登．拉为拉萨市建立一支口碑甚佳的警卫队。队员相当精干，冬天穿着厚斜纹呢卡其制服，夏天则是黄滚边蓝色制服。」166在莱登．拉的领导下，西藏警察乐队以风笛鼓乐迎接贝利。

这些在西藏看来充满异国风情的乐器，连同许多外国商品，都是由印度进口。往南的贸易路线，从拉萨通往锡金边界的则里拉山口（Jelep La Pass），接着通往噶伦堡与莱登．拉的家乡大吉岭。由此开始，连接加尔各答的交通顺畅，甚至有一条由北孟加拉平原蜿蜒爬升山区的铁路。西藏与印度之间由电报线连接，西藏印制邮票、纸钞，并发行自己的货币。西藏货币包含两（srang），一两有十钱（sho），以及更小的单位色瓦（skar）。此外还有章噶币（tangka），为十五色瓦。货币政策由西藏噶厦（kashag）政府主持。与此同时也引入电力，不过规模很小；第一具电话与汽车开始出现在拉萨街头。西藏也拥有自己的国旗。

一九二○与一九三○年代间，中国基本上对西藏不存有影响力，但并未就此放弃西藏。事实上，蒋介石的主要目标之一是「统一中国」，对他来说，蒙古与西藏都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并于一九二八年成立了蒙藏委员会。由于当时中国分崩离析，因此任何以武力夺取西藏的企图都将带来灾难，这个委员会转成类似现代用语中的「智库」。西姆拉会议后很少有陈贻范的消息，也许因为他在文件上签名，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同意了英国要求。然而，狡诈的陆兴祺直到一九三○年代，仍持续在背后运作蒙藏事务。167

不过达赖十三世疏远他的噶伦暨亲英军事将领擦绒．达桑占堆（Tsarong Dzasa），这事并未逃过中国的注意，一场阴谋于是展开。一九二九年底，国民政府透过北京雍和宫的掌教喇嘛与藏人建立联系。蒙藏委员会派遣一位年轻女性刘曼卿前往拉萨会见达赖喇嘛。她传递蒋介石的话：「对于西藏当前情势深刻忧心，并且急切希望看到藏族兄弟重回民国大家庭。」168

达赖的回应基本上与藏人在西姆拉的立场一致，不过也带有与中国和解的意味。西藏是独立国家，但只要藏人得以自行主理藏事，西藏愿意接受名义上臣服中国。虽然并未达成任何协议，但这是自一九一三年以来，西藏首次与中国重建某种正式关系。

若说藏中之间有任何友善关系，也都不长久。就在两年后（一九三二年）藏中再次爆发战争，西藏军队试图夺取青海与西康土地（亦即内藏的康区）。藏军遭击败，中国警告藏人勿再跨越金沙江（即内藏与外藏的界线）。

次年，达赖十三世圆寂。藏学家梅尔文．戈尔斯坦（Melvyn Goldstein）认为「意志强悍、独裁且极为独立的达赖十三世圆寂，为中国创造新情势，在重新建立中国对西藏的传统控制权上看似有利」。169中国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黄慕松将军带领代表团，前往拉萨向已故的达赖十三世弔祭，而更精确的说法是重申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在各种策略中，黄将军特别强调中藏之间有别于英国的共通性。

这一次仍未达成任何实质协议，然而中国获准在拉萨驻扎一名官员及一具无线电设备，做为进一步对话之用。根据戈尔斯坦所述：「此决定反应出西藏对中政策的矛盾：拒绝放弃事实独立，但同时也不愿与中国全面决裂。中国则是抱着可能达成满意解决的希望，又拒绝在任何重要议题上让步。」170

一九三三年达赖十三世圆寂后，寻找新任达赖的工作旋即展开，此时中国不断企图诱使藏人达成某种决议。某些迹象显示，西藏第二重要的喇嘛（当时驻南京的流亡班禅喇嘛）成为中华民国政府的工具。虽然班禅返回西藏的可能性会对英国产生影响，但后者仍清楚表达欢迎班禅返藏，并表示若有需要，他们很乐意扮演班禅与拉萨当局之间的中介。但中国学者林孝庭指出：「英国政府绝不会同意中国军队进入西藏……认为将破坏一九一四年《西姆拉条约》。他们透过外交管道将想法明白传达给中国。」86此时谈及《西姆拉条约》时显然无任何「恐惧」，因为数年前卡洛「发现」了这批文件。

新任达赖喇嘛最终于一九三七年寻获，这位两岁男孩出生时被命名为丹增嘉措（Tenzin Gyatso），并于一九三九年四岁时，在喇嘛的簇拥

下进入拉萨，此后在布达拉宫及罗布林卡（Norbulingka）夏宫度过童年。由于达赖年龄幼小，因此由热振活佛（Reting Rimpoche）代为摄政，会同噶厦政府总理政务。但这政教合一国家的高阶喇嘛与官员们十分忧心国家未来，特别是达赖十三世的预言。据说达赖十三世在圆寂前，曾留下关于西藏未来的不祥预言：

这块（宗教与政治和谐共存的）土地上，诈骗之举将内外丛生。到那时，若我们不敢起而捍卫国土，我们的精神人物包含世系圣职（达赖与班禅喇嘛）将遭消灭无踪；我们的拉章（转世喇嘛居所）与僧侣的财产权威将遭剥夺。此外，由伟大三法王（松贊干布、赤松德贊与赤热巴巾）所创建的政治体系，也将不复存在。所有人民无论高低，财产将遭夺取，也将被迫为奴。一切生命将被迫忍受无止境的痛苦，受恐惧所苦。此一时代即将到来。[171]

达赖十三世很清楚，西藏笼罩在中国阴影之下。后世中国对达赖十四世坐床仪式的纪录中，国民党政府由蒙藏委员会代理委员长吴忠信将军代表，于一九四○年二月二十二日主持坐床大典，并批准提名。然而此纪录就像其他中国对西藏地位及边界的宣称一般，纯属无稽之谈。英国代表巴西尔．顾尔德爵士（Basil Gould）也在坐床仪式现场，指出吴忠信不过是诸位宾客之一：

他不过是呈递一条哈达，与英国代表在内的其他人所做之事完全相同。但是全世界都会听到中国所言，之后还可以根据媒体纪录，制造全然不实的歷史事件。由于西藏没有报纸，不论英文或藏文报纸，因此也无从揭发这种造假之事。[172]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达赖十四世还是婴儿，无法察觉大战将对国家带来的影响。西藏事实独立、做为印度与中国之间缓冲区的微妙地位正受到挑战。中国与英属印度史上第一次形成同盟，要对抗共同敌人：日本。日本皇军已占领中国东部广大区域，并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占领了英国殖民地香港。

数万中国部队从中国内地经由缅甸北部，撤往印度东北。许多人驻扎在比哈尔邦的兰迦（Ramgarh），即是位于今日的贾坎邦（Jharkhand）。英、美坚定地支持蒋介石部队，并准备提供装备，将部队送回中国战场。此外，由于日本已切断传统透过缅甸及邻国运送物资的路线，如何将补给送入中国，则是另一个主要任务。

蒋介石与盟友认为有必要从印度发展替代路线，因此与英国大使在战时首都重庆协商后，一九四一年二月便下令兴建一条新公路，从重庆所在的四川，经过西藏东南的力马，连结印度侧的瓦弄。从瓦弄，这条公路通往阿萨姆，并将因应战时需求建设高原机场。英国大使薛穆爵士

（Horace James Seymour）支持中国的计画，并建议「在此事上，我们不可让过时的政治思维阻碍进步」。[173]意指英国支持西藏内部自治的承诺，不应干扰这项重要的策略性公路建设计画。

但是英属印度政府反对这项计画，因其无法大幅助益战况，此外，与英属印度关系密切的西藏，其事实独立的缓冲国家地位将受影响。在十二月日本占领香港后，英国转而支持中国建造补给路线的计画，但必须经由缅甸北部而非西藏。这条穿越缅甸抵达中国的公路，最后成为史迪威公路（Stilwell Road），也叫雷多公路[174]，因为是以负责建造的美国将军约瑟夫．史迪威（Joseph Stilwell）命名，也以这条新军事补给线在阿萨姆东北起点处的小城雷多（Ledo）为名。

虽然四川到瓦弄之间并未兴建道路，中国的盟友仍施压让军事补给得以透过西藏送往中国。英国派出驻锡金副政务官诺布顿珠（Norbhu Döndup）前往拉萨，试图说服西藏政府协助英、中对抗日本。

西藏陷入两难局面。一方面希望维持与英国、印度的友好关系；另一方面在战争中支持中国，将会开启危险先例。最后拉萨的国民议会表明，西藏国土不得用以运送补给进入中国。噶厦同时也知会英国，西藏希望保持战时中立。[175]

然而战争与美国的到来，使西藏国际地位与遗世独立的状态受到挑战。史迪威是蒋介石的首席军事顾问，而蒋决心将西藏置于中国统治下。一九四二年，狡诈的蒋介石下令将领马步芳准备入侵西藏，并宣称若「西藏与日本合作」，则威胁会轰炸西藏。[176]

没有任何证据支持蒋对西藏与日本关系的想像。一九四三年，日本间谍木村肥佐生乔装成蒙古僧侣，化名「达瓦桑波」（Dawa Sangpo）潜入西藏；但他直到一九四五年九月才抵达拉萨，当时战争已经结束。[177]

一九四二年七月，西藏终于同意非军事物资可经由西藏转运中国。然而此事过于敏感，因此噶厦在未经国民会议同意前，要求噶伦之一签署协议。运输路线经过拉萨；补给物资将透过西藏贸易公司运输，採取穿越西藏中部的传统驮兽贸易路线。中国则宣称计画在西藏沿路驻扎「技术人员」以「协助运输」。[178]

藏人拒绝这项提议后，中国政府又尝试进行另一项诡计，其交通部官员将与孟加拉北部噶伦堡的西藏贸易公司直接协商谈判。英国人同意了，但藏人再次看穿中国提议背后的企图，并宣布任何西藏贸易公司，都不得在未经拉萨当局同意前与中国协议。

同时，美国战略情报局（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提议派遣情报员进入西藏测量地形。对于「建一条从印度穿越西藏通往中国的公

路」这想法，美国从未全然放弃。克服一开始的困难之后，两位美国人伊利亚．托尔斯泰（Ilia Tolstoy）与布鲁克．多兰（Brooke Dolan）获允进入西藏。美国的立场是支持中华民国及其领土主张，但托尔斯泰给予藏人的保证可能超过官方政策范围。他表示会向自己政府建议，西藏应派代表出席战后举行的和平会议。噶厦十分兴奋，视之为西姆拉会议后，首次推动国际承认西藏独立的机会。

另一方面，英国对中国的动作疑虑渐增。一九四三年四月二十九日，伦敦外交部向印度事务部递交提案，认为英国应撤回过去向中国对西藏宗主权的承认。外交部在信中表示，此撤回符合英国与印度利益，因为这将一次性解决印度与西藏边界的所有问题。179

最终英国决议，改变西藏地位政策将引发中国攻击甚至占领西藏。无论如何，一旦二战结束，中华民国很可能会试图入侵西藏。但后来国民党忙于另一段更重要的前线，也就是与共产党的内战。共产党的胜利与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建国改变了一切。那时在天安门广大群众面前，毛泽东发表知名承诺：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在毛泽东的铁腕共产统治下，中国从未是真正自由的国家，然而毛却完成蒋介石做不到的事：一统国家。中国新统治者承认共产统治蒙古的独立地位，但政教合一的西藏却必须回归中国中央政府的掌控。

美国虽从未正式承认西藏为中华民国的一部分，但中国政府如此主张，华盛顿也就这样应对，以免引起蒋介石不满。然而在共产政权即将取得中国时，美国的态度有了重大转变。一九四九年一月，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显然时日无多，美国驻印大使向华盛顿国务院建议，应重新考虑西藏政策。特别是如果毛泽东与共产党成功控制中国，美国应准备视西藏为独立国家，「若共产党控制了中国核心，西藏将是亚洲大陆上少数非共产主义的滩头堡。外蒙古已然脱离，共产党在缅甸的影响力相当强盛，也正渗透新疆与内蒙古。因此西藏将具有意识型态与战略上的重要性。」180

一九五○年十一月十七日，年仅十五岁的达赖十四世正式亲政，成为西藏的统治者，然而他的统治却不和平。在达赖十四世亲政之前，共军于十月七日跨过金沙江，与配备不良的弱小藏军进行第一场也最决定性的战役。据信大约有五千名藏军死于这场战役，根本可以说是大屠杀。

朵麦总管181阿沛．阿旺晋美（Ngapoi Ngawang Jigme）为中国所俘，之后被遣往拉萨与达赖喇嘛进行谈判。经过数个月的讨论，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三日，晋美在北京签下十七点「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这是远在一九九七年香港回归中国前，中国首度承诺「一国两制」。这

项协议申明中国对西藏的主权，不过根据第四点所述：「对于西藏现行的政治制度，中央不予变更。达赖喇嘛固有的地位及职权，中央亦不予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182

然而极不祥地，人民解放军一九五一年底在拉萨设立基地，中国占领西藏的动作已经展开。在这样的安排下将不会有一国两制，官方歷史也需修正。一九五○年代后期出版的中国宣传册子中，完全不提维持「西藏现行政治制度」，却刊印人民日报一篇社论：

为保护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下令解散组织动乱的西藏地方政府……人民解放军获得神职与世俗西藏人民的积极支持，迅速压制拉萨地区动乱，此刻正扫荡其他区域的叛匪。183

中国入侵之后，西藏人民几乎立刻集结，高举武器对抗新统治者。反抗军中包含康巴部族，以及中国击溃的藏军余部。中国的报复既快又狠，反抗军疑犯遭到逮捕并枪决，寺庙遭劫掠，中国在西藏各处展开恐怖高压统治。

如今西藏处于中国直接统治下，从一九五○年代初期开始，中国就成为印度的永久近邻，此事过去从未发生。法国学者贝海妮丝．居约——荷沙尔（Bérénice Guyot-Réchard）在《影子国家：印度、中国与喜马拉雅，一九一○至一九六二年》（Shadow States: India, China and the Himalayas, 1910-1962）书中写道：「一九五一年的最后一个月，人民解放军出现在麦克马洪线以北。自一九一○年代后未曾见过中国军队的察隅（Dzayül），很快出现整群军事营地、总部与碉堡，其中两个靠近印度边境。大约与此同时，军队也开始来到达旺以北。」184

从一开始，美国身为甫建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头号敌人，必须小心应对此情况，因为蒋介石在最终溃败后撤退到台湾，旧的中华民国也在台湾延续下去。蒋的政权持续在联合国（包含安理会）代表中国，更是美国亲近的盟友，此刻共同对抗中国共产党。而台湾的国民党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样，也认为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国入侵西藏后的种种阴谋，涉入其中的各色人物，几乎让过去大博弈时代相形失色。中国进入东部康区巩固对西藏的控制后，美国也开始展现对西藏议题的兴趣。一九五一年春天，美国驻加尔各答总领事馆年轻的中情局情报员赖瑞．达利（Larry Dalley），曾与城内外交圈两名年轻女士联系，希望寻求中国对西藏企图的资讯。其中之一是白玛次珍公主（Pema Tseudeun），是锡金王储巴登顿珠（Palden Thondup）的长姐。白玛次珍公主是令人惊艳的喜马拉雅美女，嫁给西藏贵族，被社交圈称为库库拉公主（Coocoola）。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少女时代的公主已结交两位美国战略情报局驻拉萨专员：托尔斯泰与多兰。她与

丈夫在拉萨拥有大片庄园，然而中国的入侵迫使他们返回锡金，接着搬到加尔各答。185

达利的另一位联络人是库库拉的妹妹，同样迷人的白玛曲西（Pema Choki）公主，朋友都叫她库拉（Kula）。库拉公主同样嫁给西藏贵族，公公是噶伦堡西藏贸易代表处的高官。达利询问两位公主，西藏是否需要美国提供协助，通往喜马拉雅山另一侧反抗势力的管道就此开启。

根据美国学者肯尼斯．康伯伊与詹姆士．莫里森的研究：

一九五二年六月，库库拉带着达赖喇嘛的口讯联系领事馆。她刚从拉萨访视完婆家返回，虽然并未亲自面见达赖喇嘛，她由库拉的公公尧西宇妥扎萨（Yurok　Dazza）处获得讯息。他当时也在拉萨，游走于政府高层之间。库库拉引述达赖的话，当解放的吉时到来，他希望美国能提供物资援助与支持。186

随着西藏各地对中国占领的不满持续发酵，一九五四年九月，年轻的达赖喇嘛受邀前往北京，表面上是带领西藏代表团前去庆贺中华人民共和国制定第一部宪法。年仅十九岁的达赖会见中国当时所有重要领袖：毛泽东、周恩来与邓小平。所有官媒上都刊登微笑的达赖与看似和善的中国主人合照，然而毛泽东却以宗教是毒药等话语侮辱这位精神领袖。毛同时也告诉达赖，一个全新的组织「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在一九五一年的《十七点协议》保证下已经成立。西藏人无须再管理西藏事务。

当达赖喇嘛返回拉萨，他发现中国已开闢通往西藏的新路，包含通往印度边界村庄的公路，而境内的人民解放军比他去北京之前还多。达赖喇嘛十分忧虑，意识到中国首次入藏以来，他所深爱国家享有的任何自主，很快都将要消失。中国是新的统治者，比起过去未曾真正统治整个西藏的清帝国及国民党，共产党对于宗教的宽容更少。

一九五六年，达赖喇嘛前往印度朝圣时曾经有个机会。当时尼赫鲁邀请他前往菩提迦耶（Bodh　Gaya）参加佛诞日庆典，当地的大菩提寺（Mahabodhi）为此重新整修。达赖喇嘛率领五十五人的西藏代表团从锡金进入印度，却惊讶地发现周恩来也在印度进行正式访问。

西藏议题受到讨论，尼赫鲁在新德里会见达赖喇嘛，表示若达赖喇嘛决定逃离中国控制的西藏，印度将不提供庇护。印度总理认为印度与中国新建立的友好关系，对整个区域的政治稳定更为重要。最后达赖喇嘛返回西藏，如他两位官方预言家所建议。187

我们并不清楚，达赖喇嘛对于此刻正在形成的反抗势力是否知情；又或者尼赫鲁对加尔各答中情局干员与两位锡金女士的筹谋是否知情。

一九五二年九月，驻加尔各答美国总领事加里．索兰（Gary Soulen）与库库拉公主前往锡金健行并测量地形。返回印度之后，他联系了当时的印度情报局长穆立克；比起尼赫鲁，穆立克更深受古老殖民传统影响，是一位积极的政治人物。他与达赖喇嘛流亡印度的两位兄长建立起联系。两位之中较年长者是土登晋美诺布（Thubten Norbu），当时已透过隐密组织「自由亚洲委员会」（Committee for a Free Asia）与中情局建立关系。较年轻者是住在大吉岭的嘉乐顿珠（Gyalo Thondup）。噶伦堡就在大吉岭附近，位于西藏与印度间的主要沟通路线上，因此成为秘密活动的中心，干员由此穿越边境收集「敌方军队活动」，以及反抗中国的地方游击队情报。[188]

一九五六年，康区的反抗席卷西藏东部，一群亟欲参战的康巴人集结在噶伦堡，问题是该如何在尼赫鲁与印度政府背后将这些人送出印度。结论只有一条通道：经过不丹与东巴基斯坦之间的狭窄印度领土。在一九五○年代中期，巴基斯坦已成为美国的亲近盟友，比中立的印度更愿意接纳华府的台面下提案。一九五四年，巴基斯坦加入了反共防卫组织「东南亚公约组织」（Southeast Asia Treaty Organization），成员国包含澳洲、纽西兰、法国、泰国、菲律宾及美国。西亚在一九五五年也成立了类似组织「中部公约组织」（Central Treaty Organization），由英国、伊朗、伊拉克、土耳其及巴基斯坦组成。

接着，一九五九年三月爆发拉萨起义，反抗中国占据西藏。当时达赖喇嘛受中国邀请，前往拉萨近郊的人民解放军基地观赏戏剧演出。他得到指示：不带传统武装侍卫，这点令达赖周围的人起疑，怀疑中国企图绑架达赖喇嘛，传言散布至整个拉萨。数千人包围达赖喇嘛宫殿，防止他离开住所或被人民解放军带走。

人群在三月十二日涌现街头，重申西藏独立，人民解放军与西藏反抗军之间开始发生冲突。人民解放军在达赖夏宫罗布林卡范围内发射砲火。十七日，两阵砲火轰炸罗布林卡，促使达赖喇嘛周围的人准备从拉萨出逃。

这场起义遭到人民解放军的无情镇压，然而达赖喇嘛在反抗军的护持下，于夜色浓重的清晨三点成功逃出城外，目的地是印度边界。在达赖出逃的过程里，中情局究竟出了多少力至今仍有争议，但确实在达赖离开西藏首都数日后，他们就清楚达赖喇嘛正变装前往印度。达赖喇嘛一行人在山区行进时，遇到西藏内部携带着无线电设备的中情局西藏反抗军。他们将讯息传到位于冲绳的美军基地，此地自二战最后阶段占领行动后都未交还日本。中情局同时也得知，达赖喇嘛在前往印度边境途中已否认「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点协议》。[189]

中情局训练的西藏无线电操作员传来的讯息，促使他们要求印度，在达赖抵达印度边境前便给予庇护。中情局驻新德里办事处主任直接面见尼赫鲁并提出这要求。由于拒绝请求可能对美印关系带来负面影响，经过漫长的辩论后，总理最终同意了要求，并为此突破层层限制。梅琳达．刘（Melinda Liu）在一九九九年四月号《新闻周刊》（Newsweek）中报导：「中情局训练的藏人甚至以十六釐米摄影机拍下这段冒险过程，精神领袖骑在一匹棕马上，其上有刺绣精美鞍袋，带着随从穿越西藏荒凉山岳地带，而后方的人民解放军紧追不捨。」190

一九五九年三月三十日，达赖喇嘛一行人穿越边界，进入到兼则马尼（Khenzemane）与吉美塘（Zeimithang）之间的最后隘口，就位在达旺的西北方。身患痢疾的达赖喇嘛由此进入优美的达旺山间绿色谷地，印度政府官员与军方人员在此迎接，他终于安全了。达赖喇嘛一行人持续下行，前往阿萨姆平原的德兹普，媒体大阵仗地在此等待。二十四岁的西藏神王终于逃离共产中国，立刻成为世界新闻。

达赖喇嘛从德兹普搭火车前往德拉敦（Dehra Dun），再改搭汽车到喜马拉雅西部山区避暑地摩苏里（Mussoorie），会见尼赫鲁与其他印度领袖。他们为西藏领袖选择了新的落脚地：麦克罗甘己，这处更小的山区避暑地位于今日的喜马偕邦（Himachal Pradesh），自一九六○年代以来就是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

随着达赖喇嘛一行人在印度落脚，中情局也可以开始对西藏反抗军进行援助。达卡（Dhaka）北部库米朵拉（Kurmitola）有一处废弃机场，是英国人在二战期间所建，现在成为空投西藏的前线基地，也是西藏反抗军转送冲绳、菲律宾克拉克空军基地及太平洋塞班岛的据点，这些都是中情局在亚太地区秘密任务的总部。中华民国、韩国、寮国与越南的突击队也都在此受训。

西藏秘密行动的代号是ST CIRCUS，空中行动代号则是ST BARNUM。根据康伯伊与莫里森所述，由于飞机必须在未经印度许可的状况下飞越领空，因此必须考虑到加尔各答的雷达侦测。不过中情局确实有事先进行研究：

……并且知道印度系统没有补偿功能，因此若B—17以喜马拉雅山块做为雷达屏障，即可逃过侦测。往北飞越锡金，第一批空投飞行员最远可以飞到（西藏境内的）布拉马普特拉河，往东穿越西藏高原到康区执行第二批空投，接着往西南穿越印度领土，返抵东巴基斯坦。191

为了掩饰美国的参与，所有飞行员都是在美国获得庇护的反共波兰人，以防飞机遭到侦测或击落时露馅。

新疆的穆斯林游击队及缅北秘密营地中的民族主义共产党士兵，也

都得到了中情局的援助。这是一场针对中国的秘密战争，但如同康伯伊与莫里森所指出：「在西藏行动中，中情局极力排除中华民国参与。」192同时美国是否真的支持西藏独立，这点也启人疑窦；这些行动的有限范畴，主要目的似乎在于骚扰中国，令其军队分心。

不论原因为何，当科罗拉多州莱德维尔（Leadville）附近的赫尔营（Camp Hale）特别训练机构设立后，一群关系紧密的中情局干员负责西藏计画，也对这群独特的藏人产生情感。后来他们在回忆中谈到，这群严肃的西藏佛教徒会一边小心拯救掉进茶杯中的苍蝇，一边表达杀害中国人的强烈渴望。在赫尔营中，这群藏人接受游击战争及秘密行动的训练，包含间谍摄影、摩斯密码与埋设地雷等。

一切的细节直到一九九○年代训练完全结束后才揭露。根据一九九九年梅琳达．刘的《新闻周刊》封面报导：

训练在极机密的情况下进行。美国官员假造赫尔营进行最高机密核能研究计画的故事，并且对入侵者下达格杀勿论的命令。一九六一年，有四十八名美国公民在不经意间看到十五名穿着迷彩服的亚洲人，在护卫下登上窗户完全遮蔽的C—124环球霸王运输机，因而遭到暂时拘留。国防部长罗伯特．麦纳玛拉（Robert McNamara）私人介入，阻止《纽约时报》刊出报导。193

美国派来训练藏人的干员都非常年轻，却要担负颠覆地球上人口最多国家的重责大任，其中有些人是蒙大拿州的空中救火员，寻求冒险的无畏青年。西藏任务之后，许多人加入中情局在寮国对抗共产反抗军的秘密战争。二十多岁的前美国陆军上士汤玛士．佛斯迈尔（Thomas Fosmire）正是其中一员，并曾担任泰国边境巡警顾问。寮国任务后他便待在越南，直到一九七五年四月越共军队进入西贡。另一位中情局干员约翰．劳斯（John ‘Ken’ Knaus）是中国语言学者，曾在史丹佛大学主修哲学，后来写了一本书，记录他与这些藏族游击队在科罗拉多训练营的生活。他对于最后让藏人失望一事感到懊悔与愧疚，「我们的参与导致他人失去生命，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主要冒险行动」。194

此外还有多采多姿、以小名「东尼．波」知名的安东尼．波修尼（Anthony Poshepny）。他是前美国海军，二战期间在对日最后战役的硫磺岛一战中受伤，因此于一九五一年加入中情局，成为民兵专员。韩战期间他在敌后作战，一九五○年代末期曾试图在苏门答腊煽动反印尼总统苏卡诺的起事，但没有成功，并因武力不足被困在岛上；后来他与一名同伴搭着拖网渔船逃出苏门答腊，登上前来等待的美国潜艇。在赫尔营中，东尼．波负责训练藏族游击队，甚至陪伴他们前往东巴基斯坦机场，由此搭机空降西藏。195

西藏任务之后，东尼．波直接前往寮国训练反共游击队，这是一支由他与其他中情局干员招募部落民所组成的秘密军队。他在寮北山区建立自己的属地，很快因为残暴而恶名昭彰。他悬赏奖励取得敌人耳朵，若能连同红星共产党帽，则可获得更高酬赏。据说他将敌人斩首，会把首级插在刺刀上，以此鼓舞部属士气。精神失常的东尼．波成为一九七九年好莱坞电影《现代启示录》（Apocalypse Now）中的叛逃绿扁帽上校寇兹的原型。这可能是达赖喇嘛心灵启示的最极端版本。

同时，由前英国殖民地分切成世俗但以印度教徒为主的印度联邦与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后，印度人正忙着巩固领土。前英属印度治下的大公国可以决定想加入哪个国家。以穆斯林为主却有着印度教大公的查穆——喀什米尔选择加入印度，掀起了巴基斯坦与印度间的冲突，至今仍未停歇。海德拉巴的穆斯林尼贊[196]则决定加入巴基斯坦，这是很不可思议的决定，因为海德拉巴位于南印度，离任何一块巴基斯坦土地都十分遥远。当时负责整合这些大公国的印度内政部长瓦拉拜．巴特尔，派出警力以确保海德拉巴不会有任何脱离印度的尝试。「警察行动」持续了五天，最终海德拉巴并未成为巴基斯坦的一部分。然而，另一位穆斯林统治者，古贾拉特邦朱纳贾德（Junagadh）的纳瓦伯[197]也选择加入巴基斯坦。等到印度军队介入后，纳瓦伯逃往巴基斯坦，朱纳贾德则在一九四八年二月的公投中，以绝大多数的同意票加入印度。

印度还有其他非属英国的殖民地问题。法国拥有加尔各答北方、哬格里河岸上的昌德纳加（Chandanagar，当时拼法为Chandernagore）；南方马拉巴海岸上的玛黑（Mahe），即现在的玛耶兹（Mayyazhi）；普督切利（Puducherry），即现在的旁迪切里（Pondicherry）；卡莱伊卡（Karaikal），即现在的卡利卡（Karikal）；以及印度东海岸上的亚南（Yanam）。法国并不打算在印度独立后继续拥有这些飞地，特别是印度支那已分裂成数个独立国家：一九五三年的寮国与柬埔寨、一九五四年的越南。昌德纳加于一九五一年加入印度，其他四个法国属地则于一九五四年转由印度统治，最终在一九六二年成为印度联邦的一部分。

葡萄牙统治印度西海岸上的果亚、达曼与迪乌、达德拉与纳加尔哈维利（Dadra and Nagar Haveli）则较为顽固。内陆的达德拉与纳加尔哈维利飞地，在当地人请求下于一九五四年加入印度。但葡萄牙拒绝放手果亚和达曼与迪乌。印度决定派出军队，在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发动「胜利行动」（Operation Vijay，Vijay为胜利之意）。印度总共动员四万五千名部队，毫无困难地击败葡萄牙属地中的四千名陆海军。这三块前葡萄牙殖民地也成为印度联邦的领土。一九八七年五月三十日，果亚成为印度第二十五邦，而达曼与迪乌仍旧是联邦属地。

那迦山地的部族反抗行动却没有消停的迹象。他们从边界对侧的缅甸藏身地与东巴基斯坦吉大港山地群（Chittagong Hill Tracts of East Pakistan）的基地，持续向印度发动唐吉诃德式抗争，欲争取那迦国的独立。即使抗争看起来毫无成功的可能，却也将印度的警备力量牵制在这片充满敌意的偏远区域。

新德里欲将族群与地形多元歧异的广袤领土融为一体，并努力维护边界，包括今天的阿鲁纳恰尔邦。英国最终于一九四三年决定合併内部界线与喜马拉雅山之间的山地区域，创造出「东北边境地域群」。印度独立后通过一套法律，管理阿博（Abor）与密什米山地特区行政事务。道路与行政管理开始进入过去与外在世界（即阿萨姆平原）极少接触的村庄社区。

达旺是个问题。多年任职喜马拉雅山区印度行政官的纳里．罗斯通吉（Nari Rustomji）在着作《着迷的边境：锡金、不丹与印度的东北边境》（Enchanted Frontiers: Sikkim, Bhutan and India’s North-Eastern Borderlands）中写道：

令我们特别焦虑的是卡门边境分区（Kameng Frontier Division）最西北角的达旺，位于一万四千英尺色拉山口的对侧。虽然达旺无疑位于麦克马洪线以南，因此属于印度领土，但数代藏人对此区域都有很强的情感连结，部分原因在于此地为达赖六世的出生地。达旺大佛寺掌教有时候是从拉萨附近知名的哲蚌寺（Drepung Monastery）喇嘛中选出。此地文化与西藏和印度的联系同样深远。198

罗斯通吉与手下边境官员决定该是表明达旺归属的时刻，而这件事在一九五○年中国入侵西藏后，便显得特别重要。英国在一九三八年派遣戈登．莱福特（Gordon Lightfoot）上尉领军在达旺插旗，虽然此后并未有重大事件，但印度仍记得奈维尔上尉早在一九二八年就提出的警告。若中国试图掌控西藏，而此刻显然他们已经採取行动，达旺将是个「轻易进入印度的秘密门户」。199

达旺当地人口主要是门巴人（Monpa），虽使用与藏语相关的语言，但并不认为自己是藏人。莱福特远征之后，阿萨姆政府秘书处汇整的一份机密报告中提及，门巴人「处于一种接近奴役的状态……（同时）非常态性西藏法庭对英裔门巴人施以严刑……西藏政府官员不定时下令……杀害英国区域的居民，甚合领主心意」。200除了对当地人施以严刑外，当地藏人官员主要收税上缴位于西藏的错那寺。因此莱福特进入达旺时，门巴人毫不犹豫地支持他对抗西藏领主。

阿萨姆省秘书处报告认为，西藏政府应从达旺撤出藏人官员，英国应在该区建立长期治理，但因一九三九年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而未有动

作。直到印度独立三年半后的一九五一年二月，准军事组织「阿萨姆步枪队」的支队跨越色拉山口，进入平静的达旺。这个支队是由拉连瑙．「鲍伯」．卡亭少尉（Ralengnao ‘Bob’ Khathing）领军，他是来自曼尼普尔的党库（Thangkhul）部落那迦人。根据罗斯通吉所述：「鲍伯进入达旺，对他们（门巴人）来说是真正的解放，让他们不再受到奴役，或是在压力之下被迫出售自己的农畜产。」201

然而矛盾的是，当达旺新的印度行政机关不再收税时，反而让当地人感到困惑。因此最终卡亭必须对每个门巴家户课徵每年五卢比的房屋税，以证明他们确实是印度公民，不再受到西藏统治。202

边界对面的西藏，虽然首批人民解放军在一九五○年十一月进入拉萨，但直到一九五一年九月才完全控制首都。因此当卡亭接收达旺时，噶厦仍旧是西藏首都掌权者，藏人向拉萨的印度代表抗议，却无功而返。相对地，新德里开始紧缩所有麦克马洪线附近的区域。在过去未设治的区域引进行政建置；重组阿萨姆步枪队；进行边境巡防侦测工作；沿着边界开始派驻情报侦防单位；招募非军事警力；在主要道路山径上设置警哨。

一九五四年一月，东北边境地域群转成东北边境特区，在划定界线的歷史性西姆拉会议四十年后，印度的掌控终于直上麦克马洪线。

84 Pradip Phanjoubam, The Northeast Question: Conflicts and Frontiers (New Delhi,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6), p. 34.

85 Excerpts from the article were reproduced in the New York Times on 13 October 1912, available at http://query.nytimes.com/mem/archive-free/pdf?res=9D05E3DB1F3CE633A25750C1A9669D946396D6CF (accessed on 14 April 2016).

86 For a comprehensive history of Mongolia, see C.R. Bawden, The Modern History of Mongolia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68).

87 For the text of the Russo-Chinese Agreement 1912, see www.claudearpi.net/maintenance/.../1913Russo-ChineseAgreeement.pdf (accessed on 16 April 2016). Reproduced from Pradyumna P. Karan, The Changing Face of Tibet (Kentucky: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1976), pp. 87–8.

88 ‘Treaty of Kyakhta 1915’, available at https://www.revolvy.com/main/index.php?s=Treaty%20of%20Kyakhta%20(1915) (accessed on 12 June 2017).

89 For the text of the treaty, see https://www.mtholyoke.edu/acad/intrel/mongtib.htm (accessed on 16 April 2016) and Michael C. van Walt van Praag, The Status of Tibet: History, Rights, and Prospects in International Law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1987), pp. 320–1. See also Matteo Miele, ‘A Geopolitical reading of the 1913 Treaty Between Tibet and Mongolia’, Tibetan Review, Jan–Feb 2015, available at http://www.tibetanreview.net/a-geopolitical-reading-of-the-1913-treaty-between-tibet-and-mongolia/ (accessed on 15 September 2016).

90 The British were allowed to trade in Yadong, Gyantse, and Gartok; the border between Tibet and Sikkim was delineated; Tibet was not to have relations with any foreign power other than Britain; and the Tibetans were forced to pay an indemnity of 7.5 million Indian

Rupees to the British. For the text of the treaty, see http://www.tibetjustice.org/materials/treaties/treaties10.html (accessed on 15 April 2016).

91 For Tibetan and English versions of the declaration, see http://www.tibetjustice.org/materials/tibet/tibet1.html (accessed on 12 June 2017). See also, Tsepon W.D. Shakabpa, Tibet: A Political History (New Delhi: Paljor Publication, 2010 [a reprint of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7]), p. 338.

92 Shakabpa, Tibet, pp. 339–40.

93 For a book about the life of Laden La, see Nicholas and Deki Rhodes, A Man of the Frontier: S.W. Laden La (1876–1936: His Life and Times in Darjeeling and Tibet) (Kolkata: Mira Bose, 2006). Laden La's role at the Shimla conference is mentioned on pp. 30–31.

94 译者注：伦钦（Lönchen）为西藏政府中，地位在达赖之下，噶伦之上的最高行政官。

95 Norbu Tsering, 'The Simla Convention of 1914—an appraisal', 9 November 2013, available at http://www.phayul.com/news/article.aspx?id=34200 (accessed on 15 April 2016).

96 For Lu Xingqi and his role, see Parshotam Mehra, Essays in Frontier History: India, China, and the Disputed Border (New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58. See also Ravinder Makhaik, 'The 1913–14 Shimla Convention, McMahon Line and the Disputed India-China border', The Hill Post, 5 December 2011, available at http://hillpost.in/2011/12/1913-14-shimlaconvention-mcmohan-line-and-the-disputed-india-china-border/36974/ (accessed on 16 April 2016).

97 Tan Chee-beng, Routledge Handbook of the Chinese Diaspora (Abingdon: Routledge, 2012), p. 222.

98 Mehra, Essays in Frontier History, p. 59.

99 Ya Hanzhang, The Biographies of the Dalai Lamas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91), pp. 307–9. On page 307 it says that 'in April 1913 the Beijing government appointed Lu Xingqi commissioner for Tibet', and on page 309 Ivan Chen is referred to as 'Commissioner for Tibetan Affairs' when the Shimla Conference opened on 13 October 1913. Whatever the case, Lu was a chief intelligence officer charged with Indian and Tibetan affairs. Chen had to report to, and seek advice from, Lu before and during the Shimla Conference.

100 van Walt van Praag, The Status of Tibet, p. 54.

101 van Walt van Praag, The Status of Tibet, p. 305.

102 For the text of the 1907 Anglo-Russian Convention, see van Walt van Praag, The Status of Tibet, pp. 307–8, and http://avalon.law.yale.edu/20th_century/angrusen.asp (accessed on 10 May 2016).

103 Charles Bell, Tibet: Past and Present, (New Delhi: Asian Educational Services, 1992), pp. 148–9.

104 Pradip Phanjoubam, 'How McMahon Drew His Line, and Why China Wants It Changed', The Wire, 20 May 2015, available at https://thewire.in/2108/how-mcmahon-drew-his-line-and-why-china-wants-it-changed/ (accessed on 15 April 2016). For a comprehensive study of the border issue, see Pradip Phanjoubam, 'Neville Maxwell's "Facts" and Silences',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vol. 51, no. 46, 12 November 2016, available at http://www.epw.in/journal/2016/46/discussion/neville-maxwells-factsand-silences.html (accessed on 18 November 2016).

105 Pradip Phanjoubam, 'How McMahon Drew His Line and Why China Wants It Changed'.

106 'Anglo-Russian Entente: United Kingdom-Russia [1907]', available at https://global.britannica.com/event/anglo-russian-entente (accessed on 14 April 2016).

For the text of the clauses regarding Tibet in the Anglo-Russian Convention of 1907, see Melvyn C. Goldstein,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1913–1951: The Demise of the Lamaist State (New Delhi: Munshiram Manoharlal Publishers, 2007), pp. 829–31.

107 W.F. Van Eekelen, Indian Foreign Policy and the Border Dispute with China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64), p. 14.

108 Van Eekelen, Indian Foreign Policy and the Border Dispute with China, p. 14.

109 Van Eekelen, Indian Foreign Policy and the Border Dispute with China, p. 14.

110 John Rowland, A History of Sino-Indian Relations: Hostile Co-Existence (Princeton, NJ, Toronto, London: D. Van Nostrand Company, 1967), p. 47.

111 van Walt van Praag, The Status of Tibet, p. 55.

112 Melvyn C. Goldstein,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1913–1951 (New Delhi: Munshiram Manoharlal Publishers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p. 833.

113 Goldstein,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1913–1951. pp. 833.

114 Rowland, A History of Sino-Indian Relations, pp. 33–6.

115 Rowland, A History of Sino-Indian Relations, p. 49.

116 Goldstein,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1913–1951, p. 835.

117 Rowland, A History of Sino-Indian Relations, p. 49.

118 Van Eekelen, Indian Foreign Policy and the Border Dispute with China, pp. 16–17.

119 Neville Maxwell, India's China War (Harmondsworth, Middlesex: Penguin Books, 1972), p. 44, and Alastair Lamb, Tibet, China & India 1914–1950: A History of Imperial Diplomacy (Hertingfordbury, Hertfordshire: Roxford Books, 1989), p. 280.

120 The Sino-Indian Boundary Question (Enlarged Edition)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 1962), pp. 10–11.

121 Neville Maxwell, 'The Deadlocked Deadlock: Sino-Indian Boundary Disput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Vol. 16, No. 38, 19 September 1981, pp. 1548.

122 Maxwell, 'The Deadlocked Deadlock: Sino-Indian Boundary Dispute', p. 1548.

123 Maxwell, 'The Deadlocked Deadlock: Sino-Indian Boundary Dispute', p. 1548.

124 Lamb, Tibet, China & India 1914–1950, p. 429.

125 Lamb, Tibet, China & India 1914–1950, p. 133

126 Lamb, Tibet, China & India 1914–1950, p. 133.

127 Lamb, Tibet, China & India 1914–1950, p. 133.

128 Mehra, Essays in Frontier History: India, China, and the Disputed Border, p. 72.

129 Phanjoubam, 'How McMahon Drew His Line, and Why China Wants It Changed'.

130 W.F. Van Eekelen, 'Simla Convention and McMahon Line', Journal of The Royal Central Asian Society, Vol. 54, No. 2, 1967, p. 180: 'The Foreign Office … maintained its opposition to separate signing with Tibet on the ground that it would amount to tearing up the Anglo-Russian Convention of 1907.'

131 Bell, Tibet: Past and Present.

132 For reproductions of old and more recent maps of the Indo-Tibetan border, see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Government of India, Atlas of the Northern Frontier of India (New Delhi: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1960).

133 John Bray, 'Introduction: Locating Ladakhi History', John Bray (ed.), Ladakhi Histories: Local and Regional Perspectives (New Delhi and Dharamsala: Library of Tibetan Works and

Archives and Indraprashtra Press, 2011), p. 1.

134 Steven A. Hoffman, India and the China Crisis (Berkeley, Los Angeles,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pp. 11–12.

135 K.L. Rao, History of the Indian Army (New Delhi: Manas Publications, 2016), p. 183.

136 See, for instance, Bina D'Costa, 'Partition: the price of freedom and the price paid by women', South Asia Masala, 6 August 2009, available at http://asiapacific.anu.edu.au/blogs/southasiamasala/2009/08/06/partition-the-price-offreedom-and-the-price-paid-by-women/ (accessed on 20 May 2016).

137 George N. Patterson, Peking Versus Delhi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63), p. 192.

138 Jasper Becker, The Lost Country: Mongolia Revealed (London: Hodder & Stoughton, 1992), p. 75.

139 Becker, The Lost Country, p 134.

140 Francis Watson, The Frontiers of China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66), p. 9.

141 译者注：南碗指定区（Namwan Assigned Tract），中国称为勐卯三角地。

142 For a map of the border and the areas which were ceded to China, see Josef Silverstein, Burma: Military Rule and the Politics of Stagnation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7), p. 174.

143 Pradip Phanjoubam, 'Why Removing the Historical Baggage of McMahon May Be More Important for China than the Line itself, The Wire, 26 May 2015, available at http://thewire.in/2015/05/26/for-china-removing-thehistorical-baggage-of-the-mcmahon-line-may-be-more-important-than-theline-itself-2509/ (accessed on 10 May 2016).

144 'The Sino-Indian Border', Current Intelligence Weekly Summary, 17 December 1959, p. 17.

145 'The Sino-Indian Border', p. 17.

146 Neville Maxwell, 'Olaf Caroe's Fabrication of the "McMahon Lin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Vol. 51, Issue No. 32, 6 August 2016, p. 100.

147 Edward Gait, A History of Assam (Guwahati, Delhi: Spectrum Publications, 2011), p. 335.

148 Phanjoubam,The Northeast Question, p. 79.

149 Phanjoubam, The Northeast Question, p. 80.

150 Alastair Lamb, The China-India Border: The Origins of the Disputed Boundaries (London, New York, Toronto: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p. 124. Maps showing 'the Outer Line' can also be found online on Wikipedia at https://en.wikipedia.org/wiki/McMahon_Line (accessed on 12 June 2017).

151 Phanjoubam, The Northeast Question, p. 110.

152 Maxwell, India's China War, pp. 30, 32.

153 Robert Reid, History of the Frontier Areas Bordering Assam from 1883 to 1941 (Guwahati, Delhi: Spectrum Publications, 1997), pp. 227–8.

154 Phanjoubam, The Northeast Question, p. 112.

155 Maxwell, India's China War, p. 34.

156 Maxwell, India's China War, p. 30.

157 Maxwell, India's China War, p. 34.

158 Warren W. Smith, China's Tibet? Autonomy or Assimilation (Lanham, Boulder, New

York, Toronto, Plymouth UK: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8), p. 8.

159 Goldstein,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1913–1951, p. 841.

160 H.K. Barpujari, Problem of the Hill Tribes North-East Frontier Vol. III: Inner Line to McMahon Line (Guwahati: Spectrum Publications, 1981), p. 236.

161 Van Eekelen, Indian Foreign Policy and the Border Dispute with China, p. 182.

162 Barpujari, Problem of the Hill Tribes North-East Frontier Vol. III, p. 236.

163 Quoted in Barpujari, Problem of the Hill Tribes North-East Frontier Vol. III, p. 236.

164 Barpujari, Problem of the Hill Tribes North-East Frontier Vol. III, pp. 236–7.

165 Barpujari, Problem of the Hill Tribes North-East Frontier Vol. III, p. 238.

166 Rhodes and Rhodes, A Man of the Frontier, p. 39.

167 Mehra, Essays in Frontier History, p. 59.

168 Goldstein,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1913–1951, pp. 214–215.

169 Goldstein,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1913–1951, p. 223. 85. Goldstein,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1913–1951, p. 245.

170 Lin Hsiao-ting, Tibet and Nationalist China's Frontier: Intrigues and Ethnopolitics (Vancouver, Toronto: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2006), p. 91.

171 Arjia Rinpoche, Surviving the Dragon: A Tibetan Lama's Account of 40 Years under Chinese Rule (Emmaus, Pennsylvania: Rodale Books, 2010), p. vii.

172 Charles Bell, Portrait of a Dalai Lama (London: Wisdom Publications, 1987, reprint, first published in 1946 by Wm. Collins, London), p. 454.

173 Goldstein,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1913–1951, p. 379.

174 译者注：雷多公路（Ledo Road），中国称中印公路。

175 Goldstein,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1913–1951, p. 382.

176 Yangdon Dhondup and Hildegard Diemberger, 'Tashi Tsering: The Last Mongol Queen of "Sogpo"' (Henan)', Inner Asia, vol. 4, issues 1–2,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Mongolia and Inner Asia Studies, 2002, p. 204.

177 For a fascinating account of Hisao Kimura's exploits see Hisao Kimura, Japanese Agent in Tibet, as told to Scott Berry (London: Serindia Publications, 1990).

178 Goldstein,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1913–1951, p. 387.

179 Goldstein,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1913–1951, p. 399.

180 Quoted in Goldstein,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1913–1951, p. 607.

181 译者注：朵麦又称朵麦基巧，管辖中国昌都地区的军政事务。昌都地处康区，一九○四年清朝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对康区的藏族土司进行「改土归流」，藏人土司的领地不断被蚕食。之后中华民国成立，在昌都设川边特别区，让噶厦政府非常不满。一九一八年，西藏以武力夺取昌都，设置朵麦基巧。当时西藏与川康关系紧张，担任朵麦基巧的官员官阶很高，与噶伦属于同一级别。

182 The full text of the 17-point agreement is available at http://www.friends-oftibet.org.nz/17-point-agreement.html (accessed on 12 June 2017). Ngapoi Ngawang Jigme, who passed away in Beijing in 2009 at the age of 99, became the first President of the newly established Tibet Autonomous Region in 1964. In an interview with Asiaweek magazine (20 October 2000), he predicted that 'nothing will change' when the present Dalai Lama dies, 'Without a Dalai Lama for 40 years, we've done quite well', available at http://www.tibet.ca/cms/en/library/wtn/archive/old?y=2000&m=10&p=16_2 (accessed on 13 June 2017). Many Tibetan exiles condemned Jigme as a traitor and collaborator. See Jasper Becker,

'Interview with Ngapoi Ngawang Jigm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4 April 1998, available at http://www.tibet.ca/en/library/wtn/archive/old?y=1998&m=4&p=8_4 (accessed on 12 June 2017).

183 Concerning the Question of Tibet pp. 17–18.

184 Bérénice Guyot-Réchard, Shadow States: India, China and the Himalayas, 1910–196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p. 203.

185 For a detailed account of the two Sikkimese princesses and their CIA contacts, see Ken Conboy and James Morrison, The CIA's Secret War in Tibet (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Press, 2002), pp. 21–23.

186 Conboy and Morrison, The CIA's Secret War in Tibet, p. 23.

187 Conboy and Morrison, The CIA's Secret War in Tibet, p. 35.

188 For Gyalo Thondup's own account of his activities in Kalimpong, see Gyalo Thondup and Anne F. Thurston, The Noodle Maker of Kalimpong: The Untold Story of My Struggle for Tibet (London, Sydney, Auckland, Johannesburg: Rider, 2015).

189 Conboy and Morrison, The CIA's Secret War in Tibet, pp. 91–2.

190 Melinda Liu. 'When Heaven Shed Blood', Newsweek,19 April 1999, available at http://www.newsweek.com/when-heaven-shed-blood-164864 (accessed on 13 June 2017).

191 Conboy and Morrison, The CIA's Secret War in Tibet, p. 61.

192 Conboy and Morrison, The CIA's Secret War in Tibet, p. 103.

193 Liu, 'When Heaven Shed Blood'.

194 John Kenneth Knaus, Orphans of the Cold War: America and the Tibetan Struggle for Survival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1999), p. 325.

195 Richard Ehrlich, 'Death of a dirty fighter', Asia Times Online, 8 July 2003, available at http://www.atimes.com/atimes/Southeast_Asia/EG08Ae02.html (accessed on 13 June 2017).

196 译者注：尼贊（Nizam）是海德拉巴（Hyderabad）阿沙夫．贾王朝（Asaf Jah）穆斯林统治者的头衔，创立人喀玛尔乌丁汗（Mir Qamar-ud-Din Siddiqi）原为蒙兀儿帝国统治德干地区的总督，在蒙兀儿中央式微后，于一七二四年自立为王，统治延续至一九五○年。

197 译者注：纳瓦伯（Nawab）是蒙兀儿皇帝册封南亚穆斯林大公国统治者的头衔，其职责是维护帝国主权，并掌理大公国内事务。

198 Nari Rustomji, Enchanted Frontiers: Sikkim, Bhutan and India's North-Eastern Borderlands (Calcutta, Delhi, Bombay, Madra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p. 125.

199 Barpujari, Problem of the Hill Tribes North-East Frontier Vol. III, p. 236.

200 'Letter from the Secretary of the Governor of Assam, No. 3851-G.S., dated the 7th September 1938: Report on the Tawang Expedition, 1938', The British Library's archives, London.

201 Rustomji, Enchanted Frontiers, p. 127.

202 Shiv Kunal Verma, 1962: The War That Wasn't: The Definitive Account of the Clash Between India and China (New Delhi: Aleph Book Company, 2016), p. 11.

# 第三章　入侵

中国的攻击并非完全出乎意料。印度早已观察到边界对面进行大规模建设；在主要攻击前夕，印度军队与人民解放军曾有过数次冲突，包含一九六二年十月十九日对多拉与兼则马尼的砲轰。然而十月二十日及其后数日间，中国攻势的完整统筹与勐烈程度令印度国安机制与国际观察家震惊。当日破晓，火砲与迫击砲向塔格拉山嵴对侧勐烈轰炸。

根据约翰．达尔维准将的纪录所述：

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日上午五点整，第三桥对面的中国军队发射两枚闪光信号弹，随之而来的是超过一百五十支枪与重迫击砲的轰炸，出现在塔格拉山嵴的顺向坡上……那是关键的一刻。那刻塔格拉山嵴不再是一片土地，而是测试、衡量并净化印度对外防卫政策的冶金炉。[203]

达尔维称之为「审判日：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日」。[204]中国对达旺北方印度据点的全面攻击持续进行着。

西方的阿克赛钦前线上，战斗在一片由北往南的广袤土地上展开，范围大约长达六百公里。然而中国军队往南突进的势力集中在一片相对窄小的区域，由西至东约为二十公里。[205]人民解放军的多数攻击，似乎都集中于驱逐印度政府「前进政策」下建立的哨所驻军，而非夺取领土。根据印度军事分析师的观点：「中国在西段的目标有限。他们已经占领多数阿克赛钦高原，并在此兴建连接西藏与新疆的西部新藏公路。此战目的在于移除印度哨所，他们认定已经跨越了一九六○年宣布的界线。」[206]就如东北边境特区的情势，中国并不想深入印度领土。

阿克赛钦高原过去与现在同样几乎无人居住，因此中国得以在一九五○年代中期兴建新藏公路，而印度直到完工后一年才发现此事。阿克赛钦一词意指「白石沙漠」，高度约在海拔四千三百至六千九百公尺之间。过去，部分的拉达克牧民以此地为夏季牧地，因此成为喀什米尔羊毛贸易路线的一部分；除此之外，此区几乎没有任何值得一提的商业活动。过去存在的古老贸易路线都是次要因素，唯一的谷地（若可以称之为谷地）是由新疆流向查穆与喀什米尔邦的奇普查普河（River Chip Chap）。在一九六二年战争中，中国军队攻下河谷中数个印度据点，从此掌握了此区。

一九六二年战争大戏，在西段战斗的数周中，可以发现中国清楚掌握了印度的位置，以及每个据点的人数和拥有何种武器。如同东段的东北边境特区一般，中国在阿克赛钦地区也透过行动自由的调查小队，在荒原上不受察觉地进行战前的情资蒐集。

东段的争议焦点，是印度在南卡曲河峡谷（Namka Chu gorge）的多拉哨所，此地位于达旺西北方，是印度、不丹与西藏交界处。此哨所是在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四日建立，根据《亨德森．布鲁克斯——巴格特报告》的内容，哨所位置「根据一九六二年十月／十一月版之前的地图，是标在麦克马洪线以北。据信此旧版由我国外交部交予中国，以标明麦克马洪线。同时据悉我国试图于我方地图上更正错误，然中国不予接受」。207无论如何，中国对印度地图并不在意；其目的根本不在此，而是为了给印度一个教训。

《亨德森．布鲁克斯——巴格特报告》中的这段话，与马克斯韦尔和他人认定「印度为挑衅者，对多拉哨所挑起一九六二年战争」这主张相去甚远。中国军队在九月八日跨过南卡曲，包围峡谷中的印度前哨，并摧毁河上两座桥。附近的多拉哨所获得增援，整个九月中两侧的砲火持续不歇。中国向哨所投掷手榴弹，导致三名印度军人挂彩，除此以外并无伤亡。208

最终攻击于十月二十日登场，印度军队发现前一夜中国已切断所有电话线。准备攻击时，中国军队也占领了印度防线后的高地，因此能在早晨向下发动攻击。从俯视南卡曲河的塔格拉山嵴发动砲火勐攻后，中国摧毁了所有印度砲击据点及附近武装。数小时内，中国攻占印度边境哨所，以及多拉与兼则马尼，印度守军不是战死就是遭俘虏。中国的攻击战力估计有两千名，而这些据点的印度守军仅有六百名。209

中国同时对其他据点发动攻击，附近的第二拉吉普联队（2nd Rajput Regiment）受到重创。五百一十三名战斗成员中，有两百八十二人当日战死，八十一人受伤被俘，另外遭俘的九十人则未受伤；仅有属于后援的六十人逃出战场。另一支也在附近的廓尔喀步兵连则损失八十人，四十四人受伤，一百零二人遭俘虏。第七旅在十月二十日那命运的早晨，总共损失了四百九十三人。210人民解放军对多拉与塔格拉前线作战总共派出至少一万人，并且配备了重砲与远比印军先进的武器设备。211

印度防线崩溃后，第七旅旅长约翰．达尔维准将遭中国俘虏将近七个月。他以极为苦涩的笔触记载了大量细节，描述指挥体系如何崩溃，以及印度军队配备低落的情况。他引述一名军队同袍的话：他们的「任务是政治而非军事行动的防卫。南卡曲河畔遭屠杀的军队防线过长，人数不足，难以补给也无法守卫」。212

除了观察中国为印度战俘兴建的营地外，达尔维也发现「中国从一九六二年五月就开始认真备战」，这时间远早于多拉哨所事件。213这里的重点在于「认真」，所有可得证据都指向一个事实：情资蒐集与建设工程都始于一九五○年代中期，中国开始想挑战印度做为亚非新独立国

家的领袖地位之时。一九五九年达赖喇嘛出走印度，这更刺激了中国，并从思考与印度一战的可能性，转向付诸实际行动。

达尔维同时也引述并调侃中国的说法：

中国告诉全世界：「十月二十日清晨七点（北京时间），印度的攻击武力在强烈砲火掩护下，向克节朗河（Kachileng River）与兼则马尼的中国边防军队发动大规模攻击。」可怜的中国军队竟被两支在射程以外、只有四百发子弹的帕拉手枪，逼迫到得自我防卫的地步！214

马克斯韦尔的说法比起中国虽然比较不极端，不过他对一九六二年事件过程的倾中描述，同样启人疑窦；然而他的说法在后续诸多战争边界争议讨论中，仍受到广泛引用，其中甚至包含前美国国务卿季辛吉。

东北边境特区的东段战争与拉达克的战役十分不同。中国军队在拉达克前线并未遭遇太多平民，但在东北边境特区却占领数个城镇村庄，因此与平民互动成了重要议题。从棒山口往下的道路建设完成后，中国军队以达旺为补给基地。显然人民解放军不仅在事前派出特务蒐集重要情资，其军官士兵也受过心理战训练。

当中国开始攻击边境时，达旺多数门巴人与藏人皆逃离当地。他们从亲友与商贩处听说了人民解放军为西藏带来的灾难，因此当然会感到害怕。然而解放军一直具有双重性格，做为意识型态驱动的共产党武力，它无法容忍异议或对统治权的挑战；然而做为「人民军队」，它理应对「受压迫大众」温和相待。根据毛泽东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共产党士兵理应「不拿群众一针一线」。215

英国传教士作家乔治．派特森描述对部分参与西藏占领中国士兵的观察：「行为上一丝不苟、洁身自重，并未压迫西藏人民。士兵即使是在藏召妓，也可能遭受重罚。曾有一名中国士兵被藏族妇女指控性侵，因而遭到长官射杀。」216西藏部分地区也建有医院与提供中藏双语课程的学校。

然而，这类友善行为背后有着对藏人的隐藏企图。根据派特森所言：

随着引进这些造福民众的必要改革，一项不祥的要素逐渐浮现，这些新建设并非在全国广泛施行，而仅限于由西藏通往印度沿线城市村镇地区的主要道路。事实上，它们不过是通往印度边界的辅助措施；政府并未试图发展主要道路以外的区域。217

这些发展在一九五○年中国入侵西藏后一两年开始，表示早在一九五九年邓小平与毛泽东誓言将与印度「算帐」前，218中国就已开始准备沿着边界的行动。

更重要的是，根据派特森所述，「在东藏地区，他们的行为经常延续共产党模式」[219]，而不是新秩序。东藏是康巴人的家园，也是一九五○年代中期首波爆发武力反抗中国占领之处。一九五八年，中国政权开始强迫中央省分的藏人往「人民公社」集中，占领者与被占领者的关系持续恶化。[220]

中国军事史学者李小兵访问人民解放军无线电兵李维恒（Li Weiheng，音译），描述中国士兵入藏时遭遇的敌意，特别在一九五九年的拉萨起义之后，「李维恒中士回忆入藏时，他与同袍感觉彷佛进入外国。宗教及语言隔阂，分离主义宣传，以及落后经济，在军队与当地藏人间造成了看似难以跨越的隔阂。」中士告诉李小兵，入藏解放军有个规范是未经允许不得与藏人说话。「村落与连队小组间的沟通都必须由……连长透过村落长老进行，其中有个长老会说中文。」[221]

李中士在西藏服役的前六个月仅造访村落两次。首次造访是与同袍到村中看医生，因为对方拒绝进入中国军营，坚持军人必须来此就医。李中士可以「感受到环境中的敌意。孩子逃进家中……也看不见女人。几个坐在屋前的西藏男人手中持刀，一言不发地盯着李中士。李觉得幸好在一九五九年叛变后所有藏族的武器都遭没收。没有人可以合法拥有枪枝」。[222]

李维恒中士第二次造访村落的经验则有所差异。这次是在一九六二年战争期间，村落下方山脚设了一座暂时关押印度战俘的营地。「大批印度战俘来到，超过营地警戒单位可处理的数量……（李）惊讶发现许多西藏村民探望印度战俘，带来水、食物与牛奶……甚至看到那名老医者照顾生病、受伤的印度士兵。」[223]李所属的排向营地指挥官抱怨，因为后者曾经下令，不许藏人接触印度士兵，「然而他无法提供食物给如此大量的战俘。基于妥协心态，他允许藏族妇女、儿童探望印度战俘。」[224]

即使在明显充满敌意的群众包围下，人民解放军为对印之战招募、教育足量的藏族间谍与翻译，似乎也没有遭遇困难。我们常会遗忘一件事，就是某些藏人（尤其是反对西藏中古封建体系者）确实与中国站在同一边，至少在占领行动初期的确如此。一群由汪杰平措（Bapa Phuntso Wangye）领导的年轻人，在一九三九年成立了小小的西藏共产党；然而他跟其他革新的藏人一样，在一九五○年代的发展中醒悟过来，因而招致了中国的疑虑。汪杰平措于一九五八年遭羁押，一九六○年入监。[225]然而其他深谙中文的藏人仍为中国服务，人民解放军在十月二十日攻击前几个月，动员了属于社会另一阶层的数千名挑夫，这些是从南藏各处村庄里，在枪下招募来的农民。

在达旺，几乎所有人民都撤离，印度军队也撤出该区，人民解放军自然选择採取「亲善」路线，避免对抗仍留在城里的少数人。根据少数留在达旺的藏人辛杰（Singye）说，那时中国军队在与当地人互动中，极尽亲善之能事。[226]达旺虽不属于西藏核心区，但达赖六世是一六八三年生于此地的门巴人，于一六九七年成为达赖喇嘛，统治西藏直到一七○六年失踪为止，传说他是被中国康熙皇帝的盟友所杀。因此，达旺对藏传佛教徒有其特殊意义，中国人必须谨言慎行。

根据辛杰的说法，达旺知名的佛寺并未如部分谣言所说，遭到中国军队毁坏或劫掠。人民解放军保护这座寺庙，并将步枪交给一名资深僧侣，让他可以对抗劫掠者。印度军队与多数当地人离城后，劫掠者开始在此横行，甚至从西藏的纳塘寺（Rethang Monastery）派来一名喇嘛，带领并参与达旺的宗教仪式。中国军队将屋主逃难后留下的闲置民宅上锁，避免劫掠。印度落入中国手中的飞机空投食物，则再次分配给当地人，「这是我们给您们的礼物。」中国军官如此说。[227]

中国当然也有使用比较粗鲁的方式，向当地人表示比起印度军人与来自南方平原的行政官，自己才是值得信任且认同的人。边境区域住民回忆，中国军官给他们看蓄鬍、戴着头巾的锡克教徒照片，说：「我和这个人，谁是你兄弟？」[228]比起旁遮普人，中国人当然看来更像达旺当地人。

然而留在当地的居民仍是相对少数。数万人往南方平原逃难或跨越东方边境前往不丹。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十八日，中国击破达旺南方色拉山口的印度防线，令各地一片惊慌。一天之后，当解放军的某个单位以侧翼迂迴直抵邦迪拉镇时，许多印度人都相信，中国将直驱南下占领阿萨姆。

其中之一是来自邦迪拉附近鲁巴小镇的多吉．堪卓．腾多。他与家族在数天中跋涉穿越高山，身上仅有藏族传统的糌粑（一种青稞粉混合奶茶的粥状食物）果腹。抵达平原后，他们被卡车载往布拉马普特拉河谷的临时难民营。巴兰普（Barampur）、迪普（Diphu）与丹西利（Dansiri）成立了三座临时难民营，供难民们住在小屋与军营中。[229]

邦迪拉当地多数为舍朱奔人（Sherdukpens），与门巴人相近，也是使用藏语相关方言，但仍有些许不同。人民解放军明显停留在此地，因为再继续往南推进，他们将无法透过藏语翻译与当地人沟通；更重要的是，在一九六二年战争前几年的准备中，人民解放军的间谍无法蒐集到此地以南的情报。一九六二年十月与十一月的东西两段战争中，他们对到此为止所入侵地域的资讯详尽程度十分惊人。古迪尔．辛格上校（Gurdial Singh）在鲁巴被俘并持续被盘问山麓的所在位置。[230]巴鲁克

旁低地位于东北边境特区的山麓低处，虽遭弃守，却从未被占领。

印度军队由所有先前战斗区域的据点中撤出，而布拉马普特拉河畔的驻军城镇德兹普，有三分之二以上的人口在十一月二十日前尽都逃出城外。火车与卡车满载大包小包往西逃难的民众，以躲避即将到来的中国入侵。监狱与医院都门户大开，病患与犯人只能自力求生，而这造成一大问题，由于德兹普设有一间大型精神病院，突然间有一些重度精神疾病患者在街头流窜。至于银行，则是将纸钞烧尽后关闭。[231]

不过这些惊慌却是误导所致，因为人民解放军并无意用东段与西段的攻击模式占领阿萨姆。十月二十二日中国对边境上的基比图小镇发动攻击，可能是为了将所有印度军队推回其南方二十公里处的主要基地：瓦弄。中国对瓦弄的最终攻击发生在十一月十六日，并因拥有此地与附近地形地势的重要情报而占上风。瓦弄之役由四面发动攻击，其中也包含后方。这片区域的当地民族是梅约人（Meyor），他们使用藏语方言并信仰藏传佛教。

中国占领瓦弄后，东北边境特区极东角落的印度防线全面崩溃。根据一名印度作家所说：「瓦弄沦陷，代表着哈尤良（Haiyuliang）陷落，之后就是德兹普。从德兹普开始，就是布拉马普特拉河谷地，因此德兹普之后，就是丁苏吉亚（Tinsukia）。」[232]然而这一切并未发生。中国军队并未跨越瓦弄南方的亚普克河（River Yapuk），这里是中国在地情报蒐集的界线。亚普克河以南属于密什米人的领域，所使用的语言截然不同。

中国军队对东北边境特区中段苏班西里与桑朗的攻击，是在十月二十一日展开，而主要攻势则是在十一月十六日发动。此处的印度守军与东北边境特区各地守军一样，在人力与设备均不足的情况下艰困防守，最终不敌火力更为强大的中国军队。这里是传统白马岗[233]的一部分，白马岗跨越两国边境，但大部分落在印度境内。直到一九五○年代前，西藏税收官员曾活跃于此，因此蒐集此地情报对人民解放军来说并非难事。[234]然而中国并未占领任何超过此区的领土；白马岗以南属于阿帕塔尼人（Apatanis）与尼伊希人（Nyishis），他们的语言虽与藏语有关，但还没近到能相互理解的程度。

藏语与部分当地方言的相近，让中国特务得以收集在地情资，并以此选择暂时占领区。由中国行动的速度与精确来看，这是在一九六二年十月，即人民解放军展开攻势前就已完成的工作。解放军一进入此区，当地人大都逃到南方平原，从单纯战事的角度来说，中国军官能仰赖藏语翻译与少数留在当地者沟通。

十一月二十一日，中国单方面宣布停火后，其军队便开始撤退，人

们也逐渐返家。辛杰记得中国军队打包列队，沿着他们所铺设的棒山口至达旺公路离去，军用卡车上载着设备器具。此时已是十二月，四十九天的占领行动终于划下句点，中国军队返回麦克马洪线以北的营地与基地。

多吉．堪卓．腾多与家人此刻终于能返回鲁巴家乡。从阿萨姆平原返回丘陵上的家园时，他们看到烧毁的坦克车与汽车、弹药带、迫击砲、步枪与阵亡或撤退士兵遗留的头盔。抵达村庄时有一阵奇异的静默，眼前等待他们的是空荡荡的房子，直到数周之后，他们的生活才返回常态。235腾多挖苦地说，战争前两国总理（尼赫鲁与周恩来）的肖像还挂在当地学校的墙上。236

然而中国对东北边境特区所精选区域的占领结束后，并不表示在地有任何实质改变，麦克马洪线成为中国惯称的「实质控制线」，印度则持续称之为「传统边界」。然而印度却大受打击，从此尊严扫地，没人想再提起「前进政策」；尼赫鲁本人则从未从这羞辱与被中国背叛的感觉中复原。

尼赫鲁认为自己受到严重的误解，其他人则认为尼赫鲁太过相信周恩来的甜言蜜语，以致落入圈套，认定中国是印度的朋友。但中国早在一九四九年就宣称尼赫鲁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与蒋介石一样是革命敌人的「忠实奴才」。237

平心而论，对于一九四○至一九五○年代中国在其背后的批评，尼赫鲁似乎一无所悉。他的前进政策并非为了挑衅中国，而是为重申印度认定的传统疆界。印度建立新哨所，并针对拉达克与东北边境特区偏远地区进行巡逻，填补边界防卫的漏洞，以制衡中国往前推进。印度只有在认定的麦克马洪线以南发现新中国的军营时，才会採取行动。

曾经参与一九六二年色拉山口之役的印度军官古迪普．辛格．克雷尔中校（Gurdip Singh Kler），在战后曾写下一段话：「我们许多人都将前进政策比为警察行动，是将中国推出我们的领土，并且认为这项行动不会导致战争。」238同时他也认为，当时虽提出徵募新的军事单位，其中部分确实也成立，「但军队武器、设备与弹药的资金都不足」，在此情况下，「我们必须对付世界最强国家之一」是项「奇异」之举。239

一九五○年代末期到一九六○年代初期，随着中国持续强化边界山区的军事据点，印度决定在一九六二年十月八日发动代号为「来克亨」（Leghorn）的军事行动，保护其宣示领域。印度军队在南卡曲河北方的僧崇（Tsengjong）建立桥头堡，却于十月十日遭人民解放军攻击。印度军队撤退，补给却严重不足，而空投补给又落在错误地点，致使部队仅剩数日存粮，许多士兵仅余五十发子弹。当十天后中国军队跨越塔

格拉山嵴发动攻击时，印度的迫击砲与弹药仍在转运途中。240那时虽然无法确定此区域内的解放军数量，但确实比沿着麦克马洪线扩散的印度军队多出许多。

从事后来看，许多书写都谈论到印度的情报失误，印度政府对中国从一九五九年开始沿着边界进行的大规模建设一无所悉。然而尼赫鲁的情报局长穆立克确实不断警告政府，中国有许多沿着边界及跨越边界的动作。「一九六○年九月，我们提交另一份报告，指出中国沿西藏边界的广泛活动，以及多起新的入侵行为。同时提到中国沿着拉达克东南方边界区域出现新的活动，而这里是过去一向平静的区域。」241

然而穆立克也并非毫无责任，《亨德森．布鲁克斯——巴格特报告》引述情报局长（明显是指穆立克）的话：「对我们新成立的哨所，中国应该不会有反应；即使有能力，也不会採取武力对抗。」242这是非常明显的重大误判。

在东段，中国已推进并穿越印度希望串联修补的「边防漏洞」，这动作甚至发生在尼赫鲁的「前进政策」之前，问题在于尼赫鲁拒绝相信中国确实正准备向印度开战；出于对中印友谊的坚实信任，他忽略一九五○年代末期西藏动乱的报告。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七日，亲藏的派特森受到尼赫鲁本人在印度国会下议院的演说警告，「他将街头流言信以为真」。243派特森因为传布关于西藏情况的「夸张误导报告」244而被问罪，更遭威胁将会被逐出印度。

当尼赫鲁指控派特森散布不实讯息时，动乱已在拉萨爆发。这位心碎的总理必须在三月十九日另一场下议院演讲中承认动乱为真，而且中国子弹确实击中拉萨的印度总领事馆。中国明显认定印度有参与起义，因此要求外交官在进一步通知前必须留在总领事馆中。派特森写下：「不论印度如何认定中国的友谊与亲善，中国对印度的亲善显然不屑一顾。」245即使如此，尼赫鲁仍在演讲之中加上一句：「印度无意介入中国内政，我们与中国关系友好。」246

一九五九年三月，随着达赖喇嘛在起义失败后出逃印度，尼赫鲁被迫重新评估这段友谊。中国官方公开指责印度为动乱背后的黑手，其国营官媒刊登一段报导：「印度扩张主义者与英帝国主义者，尚未放弃入侵西藏与奴役西藏人民的野心。」指出这场伟大阴谋论的「指挥中心」位于西孟加拉邦北部的噶伦堡，并宣称英帝国主义者与印度扩张主义者联合此地的西藏「叛国派系」，制造「一连串叛国颠覆活动」。247

藏人与美国合作，从噶伦堡收集情资，同时某些西藏反抗军接受美国中情局援助与训练，这并非秘密；但从当时尼赫鲁的声明来看，令人相当质疑他是否知情。更惊人的是，虽然尼赫鲁决定给予达赖喇嘛政治

庇护，却仍相信中国实际上是友善邻国，两国间的任何问题都能和平解决。直到最后一刻，他才认真看待中国军队在边界对侧进行大规模建设的报告，并决定推动规划粗劣的「前进政策」以对抗中国。许多人都认为尼赫鲁并非全心拥戴这决策，因为不论什么目标，执行政策的工具与必要资源都付之阙如。

马克斯韦尔大胆用来「证明」印度是一九六二年侵略者的《亨德森．布鲁克斯——巴格特报告》中指出：「『前进政策』显然是政治风向，并假设把中国逐出拉达克将是最终目标。此事虽无疑义，然而重要的是，当时我们是否有军力推动此一政策。」[248]这份目前仍被列为机密的报告继续谈到：

一九六○年底，中国在西藏的建设大幅增加，这已在一九五九至一九六○年度军事情报评论中提出，因此有必要重新评估我方的战力与任务……（同时）冲突发生时，若有面对中国攻击的统合计画，我方军队对应可能较为平衡，不会产生最后一刻才填补缺口的状况。[249]

令人惊讶的是，除了马克斯韦尔与兰姆外，许多西方作家也接受中国的粗糙宣传，相信他们对边界冲突与相关议题的华丽诠释，甚至一九六二年战争的起因。这很可能是因为兰姆与其他接受中国观点者，在呈现这看法时就如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罗斯教授所说：「比北京政府更清晰、更有说服力。」。[250]换句话说，他们所展现的中国观点，其实减去了「印度扩张主义者」、「英帝国主义者」与「西藏的叛国颠覆派系」等疯狂言语。

这套一九六二年战争成因的扭曲诠释中，认为开战时刻是由印度军队在多拉哨所附近的行动，以及中印在十月中的部分冲突所决定。然而有一桩远离印度次大陆的事件反而更能合理解释，为何中国认定十月二十日是适合发动攻击的日子。该事件即是发生在十月二十二至十月二十八日的古巴飞弹危机。

从中国的观点来看，在美国总统甘迺迪忙着面对即刻的国安危机之际，此时对印度发动战争的确是神来一笔，因为美国将无法直接支援战争中的印度，即便支持，也将有损印度不结盟的承诺。十月二十六日，当战争在喜马拉雅山区爆发时，尼赫鲁史无前例地诉求国际的同情与支持。[251]

三天后，当古巴飞弹危机大致结束时，美国驻印大使加尔布雷斯（John K. Galbraith）与尼赫鲁闭门会议后，美国确实决定提供军事援助。美苏签订秘密协定，美国将撤除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盟国土耳其东部的飞弹基地，苏联则同意撤回部署古巴的弹道飞弹。

在加尔布雷斯传递的讯息中，甘迺迪同意「无后续条件」提供印度

武器。[252]根据报导，尼赫鲁也向美国要求战机；十一月十九日，印度向美国寻求全面防卫干预。[253]后来此事虽未发生，但一艘美国航空母舰已驶向孟加拉湾，一队运输机也抵达印度。[254]一般相信甘迺迪已同意提供印度一百万发机关枪弹药、四万枚地雷与十万发迫击砲弹药；而《时代杂志》的报导甚至认为美国提供更加庞大的武器弹药，并配有美军人员与维修团队。[255]然而这些都太少也太晚。当西方军事协助抵达时，中国早已达成其目的。

不过中国并没有放过谴责尼赫鲁的机会，说他是「美国帝国主义走狗」及「国际反中运动的卒子」。[256]根据英国分析师马若德所述，十月二十七日刊登在官方报纸人民日报上一万五千字语带刻薄的文章内容，「与一九六○年北京的反苏维埃论辩一致，也预示一九六三至一九六四年的反苏维埃论调，因此显示这是对莫斯科意识型态斗争的武器，而非对印度的军事斗争。」[257]

中国除了谴责尼赫鲁向美国寻求军事援助外，也希望藉此打击苏联；在冲突前，苏联比任何西方强权都更接近印度，更是中国在「第三世界」掌控上的主要竞争对手。这竞争始于一九五○年代，而首度浮上台面的，是一九六○年在罗马尼亚共党统治的国会中，苏联领袖赫鲁雪夫与彭真（中国中央政治局领导之一）发生争执。赫鲁雪夫指毛泽东为「民族主义者、冒险主义者及分裂者」，中国则谴责赫鲁雪夫「封建思想、独断独裁」，甚至是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正主义叛徒」。[258]赫鲁雪夫的回应是从中国撤回一千四百名苏联专家与技师，并对这世上人口最多的共产国家取消超过两百项计画。

苏联在中印冲突之初的态度十分审慎。虽然赫鲁雪夫同情印度，却也无法对中国过度强硬。另一方面，以倾苏立场闻名的印度国防部长梅农，被迫为一九六二年战争印度缺乏防备担责，在十月三十一日辞职。尼赫鲁本人在危机中短暂代理国防职责。战前即长久提供印度防卫设备的苏联，发现自己的立场实在两难。根据身兼印度记者与中印关系专家的摩罕．罗摩（Mohan Ram）所述，苏联曾恳请中国停止军事行动，并提供调停，同时间印度也预备接受调停。「他们极力试图避免印度向美、英寻求协助。若是如此，维持印度中立的多年努力将功亏一篑。感谢中国侵略，资本主义者将提供军火给印度。」[259]

根据罗摩的另一则消息，苏联也忧心梅农将从印度政府退出。罗摩引述苏联的回覆表示：「中国侵略的结果是，我们失去印度领导圈中最忠实的一位朋友，因为他向来仰赖我们的协助。」[260]

在一九五九年的中印边界冲突中，赫鲁雪夫决定保持中立，而这触怒了中国。随着中印紧张局势在一九六二年升温，中国向苏联领导者吻

吁「谴责印度中产阶级为帝国主义走狗」却被拒绝。261相反地，十二月十二日战争终结时，赫鲁雪夫站出来支持印度，并说：「我们绝无法接受印度会向中国开战的想法。」262最终，中国迫使印度向美国求援，并将苏联打入同样的反中阵营，这确实是中国成为第三世界领袖的神来之笔。

根据马若德所述：「尼赫鲁在紧急时刻向西方求援的做法，就算没有破坏印度做为不结盟国家的形象，也降低其在共产世界与第三世界的地位……北京同时也向充耳不闻的莫斯科表明，选择印度而不选中国做为伙伴，这是何等的不智。」但马若德认为更重要的是，一九六二年中印不断攀升的紧张局势，最终导致了十月爆发的冲突，是「向其他共产世界盟友展现，武装马列主义的旗帜再次飘扬于北京上空」。263一九六二年的中国，毛泽东重返高峰，成功挑战印度与苏联，最终成为第三世界进步革命力量的领袖。

学者与分析师们不断臆测，中国为何在十一月二十一日宣布片面停火，并撤退至麦克马洪线后的先前据点。部分人士猜想美国的介入是原因之一，其他人则认为若中国不停止入侵印度领土，苏联威胁将采取行动。印度军事分析师则指出，事实上喜马拉雅山区寒冬将至，因此很难从西藏内部的运输基地，维持漫长而脆弱的补给线。

然而，这些解释都跟中国的一九六二年战争期间的整体政策与策略野心视野不一致。这场战争是惩戒印度的有限度行动，目的是将之从不结盟运动的领袖宝座上揪下来，并迫使苏联在一九六○年开始扩大的国际共产运动内部冲突中选边站。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中国曾意图保留一九六二年十至十一月占领的区域。中国希望展现军事力量与优势，而透过撤军更突显对邻居与世界的「善意」，表明自己并非意图夺取他国领土的侵略强权。在这些背景上，中国成为冲突的赢家，而成为第三世界领袖的大道已然开启。

古巴飞弹危机也许解释了中国为何决定在十月二十日攻击印度，将一九五九年以来擘划已久的计画付诸行动。不过其实还有其他内政因素，促使他们加快对印度发动闪电攻击；当时毛泽东歴经一九五○年代末期大跃进政策的重大挫败后，正筹谋重新取回中国共产党最高领袖的位置。

他必须想办法边缘化、中立或赢取党内对手的支持。其中批判毛政策者包含国家主席刘少奇、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以及最重要且具影响力的国防部长彭德怀。彭德怀是中国革命与一九五○年代初期的韩战英雄，他从韩战经验学得教训，致力于改革人民解放军，成为一支参照苏联军队制度、更为专业的武力。然而这与毛泽东信念中的「人民军队」

相违背，毛认为人民军队应该由意识型态驱动，学习伟大主席着作。毛心目中的理想士兵，体现在稍晚创造出来的虚构人物雷锋身上，这位忠诚战士期许「为党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264

一九六二年战争的意识型态面向，以及做为当时中共内部权力斗争的工具，在马若德对一九五○至一九六○年代中国的研究中多有着墨。「至今仍未能回答的问题是，若毛泽东持续处于退休状态，刘少奇与周恩来是否会选择用如此血腥的方式教训尼赫鲁？从他们对『三和一少』概念的支持来看，也许不会。」265

「三和一少」是由毛的前同志暨中国驻苏联大使王稼祥提出的概念，意指「三项和平行动与一项减少」，也就是与帝国主义（美国）、修正主义（苏联）、反动派（印度）维持和平，并减少对世界革命力量的援助。266

根据中苏关系专家拉钦科（Sergey Radchenko）的分析，可以了解到毛泽东极力反对此一观点：

毛泽东提到国家安全与国家尊严。他要让全世界知道中国不会被吓退，北京对印度的严厉警告并非虚张声势。他知道人民解放军已有能力给予印度军队震撼一击，伸张中国的区域霸权。光是国家安全思考与对荣耀的想像，就足以与印度一战。267

早在一九五九年，印度就被中共高层领袖一致认定为主要区域敌手，因此适合做为联合内部、清除党内「修正派」及其他「不良分子」的藉口。当印度在喜马拉雅山区面对具高度纪律且优异精良的战争机器时，并不清楚中国才勉强熬过史上最严重的饥荒之一，而这结果源自于毛泽东的灾难性政策。

一九四九年共产党接收中国后，大小地主的土地都遭没收，分发给较贫困的农民，为避免引起全面的反对声浪，此时尚未实施土地公有。政策在一九五○年代中期开始转变，农民被迫纳入农业合作化；到了一九五八年，政府全面废除土地私有，最终诞生了中国标志性的人民公社，有千万农民在此共同劳动，以达成通常不切实际的产值。早在大规模运动之前，中国共产党即决定以共产主义取代旧的宗教信仰，这表示古老庙宇遭毁弃，传统节庆受禁止，人民家里的旧偶像则以毛泽东、朱德及其他共党领袖的肖像取代。

这些施政引来反对声浪；在共党统治初期，新经济政策的批评甚至来自党内。在非常基本的层面上，政府甚至无法掌握农收，确保人民有足够的粮食果腹。毛泽东的反应是发起「百花齐放」运动268，不仅开放批评，甚至鼓励批评。事后回顾，毛泽东似乎是希望等到繁花盛开以便摘下。当批评声音浮现出来，随后就在一九五七年六月发起的「反右运

动」中被逮捕。结果至少有五十万人受害，幸运者仅失去工作或房舍，不幸者则因此入狱，甚至被处决。

对于改变中国农村社会生活，以及清算基进政策批评者，毛泽东有个更远大的计画，他希望中国成为现代工业化国家。政策的起源可追溯至一九五○年代中期，当时毛泽东开始倡议高速工业成长，类似苏联在一九三○年代史达林治下的成功。但是这与当时的主要经济学者陈云倡议稳健逐步工业化及全面平衡政策背道而驰。陈云试图缓和主席提出后来被称为「大跃进」的疯狂计画，但最终未果。这项政策被认为是现代歷史上最严重的人为灾难之一。269

毛泽东不愿接受其他意见。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他访问苏联时，因为受到史普尼克号（Sputnik）近期发射进入太空所激励，宣称：「东风压倒西风」。270同时苏联的大规模钢铁生产，以及赫鲁雪夫承诺将于十五年内超英赶美，也让他印象十分深刻。毛希望中国能够效法，同年十一月十三日的《人民日报》社论上，「大跃进」一词正式出现。毛泽东的期望比苏联更为大胆，他在一九五八年五月的中共第八次全国党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宣布，中国将採行「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271目标是在七年内超越英国，十五年里赶上美国。

全国千百万的人民动员起来，欲将中国转变为世上最现代化、工业化的国家。首要之务是制造钢铁，然而在缺乏粗钢的情况下，各种铁工具、铁片到铁钉门把都遭熔冶，期望达成目标；同时还发起耗费资源的灌溉水利建设以增加农业产量。国营媒体则发布国内四处大规模进展的亮丽报导。

河南省因为达成了看似惊人的成就，因而成为大跃进政策的标竿。光是在商丘县一地，百万人在「户户是工厂，家家叮噹响」272的口号下进入家庭作坊工作。河南省三万八千四百七十三个公社併成一千三百五十五个大社，平均每社拥有七千两百户居民。根据官媒报导，谷物生产、畜养猪只与农田水利计画蓬勃发展。一九五八年十月，省政府宣布河南省同时有五百七十七万人，超过二十二万个冶炼炉炼钢。273

其他省分也报导了类似但不如河南惊人的跃进成果。在「三面红旗」口号总结下，中国正走在毛泽东所预想成为工业化国家的道路上，亦即「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274然而这一切不过是假象。人民公社建筑在先前由个别农民拥有的土地上，因此为国家及党辛苦耕种以交换政府配给，对他们来说毫无吸引力。由于动员炼钢的千百万农民不再耕种农田，结果并不意外，河南的谷物产量在大跃进期间实质下降。275在毛泽东大量动员人力投入工业化的要求下，旧的粮食配输网络也遭到破坏，而中国仍旧是落后的农业社会。即使在一

九四九年共党胜利后成立的合作社中，绝大多数民众仍依赖田地生存。

一九五九年初，北京中央政府收到河南模范省的报告，许多人民「罹患肿病或死于饥饿」。[276]其中一封日期一九五九年一月二十日署名「刘堤圈车站南北的群众」的信，特别栩栩如生，令人动容：

春节那天，在夏邑、虞城，田野里挖野菜的遍地是人，所能吃的野菜都吃光了。在两县交界处各村都有人死亡，有人是排队买东西时一头栽在地上就死了，有人是在田野里挖野菜就倒下死了。[277]

中国各地都是同样或更糟的情况。各地人民死于饥饿，人吃人的报告频繁出现。光是在河南省信阳一地，就有至少二十起以上吃人肉的事件。一名十八岁女孩将五岁表弟淹死并吃掉；另一位十四岁姐姐也在饥饿之下，吃了弟弟的肉。[278]一九五九至一九六○年间，安徽省有六十三起吃人肉事件。一对夫妻掐死八岁的儿子，然后将他煮熟吃掉；同一省中有个男人挖出尸体，吃了一部分，并将剩下的当猪肉卖掉。[279]这些并非单一事件，中国多数省分都有类似事件的纪录，不过整体灾难的全面影响，直到最近几年才暴露出来。部分区域也有零星反抗事件，但都迅速遭到镇压，有数百名甚至数千名的反抗者与领导人遭到军警处决。[280]

而中国转型为工业化国家的运动也惨痛失败。冶炼炉出产的钢铁完全无法使用；为了农业现代化而在农村兴建的灌溉沟渠、堤防与水库皆品质低落。长期研究大跃进的香港大学教授冯客（Frank Dikötter）曾说：「愈来愈多调查团队报告确认，原料、工具与机械都被弃置甚至蓄意破坏。例如石家庄钢铁厂的半数引擎经常当机。」[281]冯克认为「发展出浪费的文化，光是洛阳三间工厂，就积聚超过两千五百吨废金属却文风不动。在湳阳，铜镍熔液在废金属堆间肆意散流」。[282]

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五日，在一片混乱之中，中国共产党于上海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议程要务自然是大跃进。然而西藏动乱甫遭镇压，达赖喇嘛已出走印度，因此该议题也被提起。会议之前，周恩来已指责英、美支持拉萨起义。根据周的说法，做为边界国家的印度自然也参与其中。

邓小平在上海会议中复述周的发言，但认为北京公开谴责印度的时机尚未成熟。[283]虽不清楚中国何时将与印度「算帐」，但这是所有人都认同的议题。相对于毛泽东推行的经济政策，邓小平与刘少奇皆倾向较为实际的做法。不过面对处理西藏及共党领袖认定的国家安全议题上，邓与毛都是强硬派，问题只在于何时给印度「一个教训」。

即使在西藏与印度议题上达成共识，毛泽东仍深陷危机。大跃进的失败动摇了他的领导地位，上海会议更贊成毛由共和国国家主席（亦即国家实质元首）之位退下，转由较温和的刘少奇担任。但毛泽东仍是中

共主席，同时也尽其所能在幕后持续掌控局势。

所有领导高位者都会面临的问题就是「无法信任地方属下」。各地为了掩盖大跃进带来的灾难，或是为了逃避失败惩处，送往北京报告中的农作收成数字都经过造假。由于这些假造数字过于浮夸，就连毛也不相信。一九五九年四月的上海会议后，毛以党内通信的方式谴责「纯粹浮夸」，并要求据实回报产量。[284]

周恩来受过良好教育，不难理解情势发展，事实上他早在一九五六年就率先发起运动，反对毛的「冒进」想法。但就在毛透过中共中央委员会镇压政策的同时，周或许是认为自己的高层领导地位不再稳固，很快就转向了；甚至还在一九五八年三月针对自己反对毛的快速工业化主张，发起了「自我批评」，「反冒进的错误，我要负主要责任，事实上伤害了群众的积极性……当时我没有认识，但后来了解到这是对社会主义建设带方向性的动摇和错误。」[285]

这里我们看到那位一九五○年代造访印度时，留给大众稳重成熟印象的政治家，在党的审判者面前所做的自我羞辱。周恩来无疑仍对毛泽东快速推进中国工业化的计画存疑，但在大跃进渐形苦涩的权力斗争中，他同时也是求取生存的机会主义者。一九五九年七月，中共在江西山城庐山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与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时，此一趋势愈来愈明显。

中国学者杨继绳写道：「既要维护『三面红旗』，又要解决『三面红旗』造成的恶果，周恩来的内心是矛盾的。这种矛盾心态，造成他在庐山会议期间的双重人格。他一方面努力解决现实问题，另一方面又千方百计地迎合毛泽东。」[286]从事后来看，当周恩来与尼赫鲁讨论边界及其他中印未决议题之时，印度政策制定者根本不可能从周的身上获得任何可靠回应。

周恩来的机会主义态度，使他从毛泽东在庐山会议掀起的清算中全身而退。会议中遭斗争出局的最重要领袖是彭德怀，他在七月十三至七月十四日曾写下一封批评大跃进的私人信函。用字遣词虽极度谨慎，并提到「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成就是无庸置疑的」[287]，毛仍认定这是对他个人与政策的攻击。不过毛泽东犯了个错误，就是将彭的信函在党中流传，这表示其他批评声音也将随之而起。身为党内老兵暨中央政治局成员的张闻天就发出了批评意见，以中共内部允许发声的标准来说是个批评。

毛泽东的回应快速而勐烈，彭德怀、张闻天与其他相关人士皆被打为「右派」与「反革命分子」，并在庐山会议期间与之后遭到清算。张闻天遭控「与外国勾结」，意指苏联；在被要求坦承「罪状」时，有好

几桶脏水从他头上泼下。[288]九月，毛泽东的心腹林彪取代彭德怀成为国防部长（不过后续他也将遭到斗争清算）。毛似乎在这场权力斗争中赢得了胜利，但他的地位仍未稳固。

毛泽东的统治激起广大的不满。大跃进造成的饥荒规模在中国史上前所未见，正确的死亡人数难以统计。冯客相信一九五八至一九六二年间，有四千五百万人「非必要」死亡。[289]杨继绳则引用中国学者蒋正华的研究，将数字大幅下修至一千七百万人。[290]无论大跃进期间实际饿死人数是多少，这都是一场空前浩劫。相比之下，二十世纪印度最严重的灾害是一九四三年的孟加拉饥荒，死亡人数大约为三百万人。

即使已清除主要政敌，周恩来也舔舐着伤口并谨守党的路线，毛泽东仍被在庐山会议前后不得不面对的反对势力困扰着。究竟党内还有多少「右派」与「修正主义者」？谁是可信任的？会议刚结束，毛又发起另一波凶勐的「反右」运动，让剩下的批评者全都闭嘴。人民解放军真正的建立者老将朱德，在庐山会议中透过小批彭德怀，希望以此来保全彭。朱德谴责彭德怀一事已满足毛泽东对他的期待。朱德失去中央军委会副主席职位，却得以保留部分比较不重要的国家职务与党职。

此刻，毛泽东很可能决定透过西藏议题与印度边界争议，强化自己在党与国家中被动摇的地位。庐山会议于八月十六日结束，同月二十五日就有一队人民解放军向东北边境特区边界上的朗久发动意外攻击，接着就是十月二十一日在拉达克的空喀山口驳火。由毛泽东任命掌管军队的林彪显然奉令行事，人民解放军若是由较专业的彭德怀掌理，这些攻击会否发生还是个疑问。另一方面，一九五九年中国在战场上的成就与一九六一年进入缅甸，特别是一九六二年战争的胜利，确实受益于彭德怀采取的军官专业化政策，军队指挥体系因此更有效率。而这些成果将因林彪的掌理反转；在林彪之下，雷锋概念得到发扬，并于政治与意识型态上成为一种全国信仰，今日仍然可见。[291]

毛泽东攀回绝对权力高位的行动才刚刚开始。一九六一年，大跃进随着三年内死去的所有人命一同埋葬。除了千百万死于饥饿的人外，还有许多人遭到党狂热分子殴打至死，或是被罗织颠覆或其他不实罪名而被处决。一切结束之后，大跃进的政治遗产是让毛泽东决定，将要以其个人统治取代过去党集体领导的原则，他的统治将不受评论或挑战。从此刻起，他不会再容忍任何对统治或个人的批评。

然而他的政治重返之路尚未结束。此刻的他是否能倖免于党内的阴谋诡计？毛的私人医生兼密友李志绥多年后在所写的主席传记中曾提到，大跃进之后，毛泽东在党内的支持度正在消退，他「对农业危机感到沮丧，也对党内菁英感到愤怒，此刻他逐渐难以控制后者」。[292]

接着一九六二年到来。根据李医师的记载，「一九六二年是毛泽东政治上的转捩点。一月，毛召开另一次中共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他在党内的支持度来到最低点。」293在会议上，国家主席刘少奇公开指责饥荒是「人祸」294，并希望能平反那些因反对大跃进而清算的领袖，此举导致毛泽东不满。

阿谀奉承的林彪持续拥毛，毛主席本人则开始更激烈地反击对手，主张「社会主义之下也有阶级」295，因此「阶级斗争」必须继续，于是任命恶名昭彰的强硬派特务头子康生，负责清算更多「修正主义者」，例如中共内部的反毛派。康生与江青密不可分，这位女演员在一九三八年成为毛泽东的第四任妻子。他们与林彪携手，成为毛泽东重掌权力的工具，宣传毛派独特的共产主义，以及在一九六○年代中期开始推动的个人崇拜。

印度边界争议正是转移权力斗争注意力的有效工具，更是能堵上对手与批评者嘴巴（甚至将其收编）的议题。这也能解释为何与印度一战的最终准备阶段始于一九六二年初。林彪就位指挥作战，毛泽东与这位忠心耿耿的解放军指挥官结成同盟，对印战争才能付诸实现。296随着中国在战争的最终胜利，毛的极左路线也在中国内部获得上风。党内任何尚存的反对声浪在这波清算后，最终归于寂静。

此刻，毛的视野与野心无疑超越了中国边境。他不只想做中国领导人，也希望成为世界所有革命运动的领袖，而此事在一九六二年击败印度后成真。两年后尼赫鲁在受中国羞辱的痛苦中忧愤离世。达尔维准将在一九六二年战争与战后的纪录中写道：「少了尼赫鲁，印度不再是不结盟世界的道德领袖。一九六二年之前，印度即使贫困且缺乏军事能力，还是能发挥强大的影响力。在被中国攻击后，借用对尼赫鲁最不友善的批评来说，就是印度被『砍成片片』。」297

中国受到对印战争胜利的激励，再次统一于毛泽东之下。喜马拉山区战场的余烬中，诞生出一个更为好战的中国。轰炸式的革命语汇对北京电台广播与《人民日报》文章而言并非新鲜事，但中国媒体的修辞比以往更具战斗性。而讯息主要传递的对象，是在对抗「帝国主义」、「修正派」与「反动派」斗争中，毛泽东希望跟自己站在同一边的世界各地革命者。298

摩罕．罗摩在杰出的一九六二年战争前后研究中指出，到了一九六七年中，中国「认为在激化的国际阶级斗争中，革命情势『大好』」，同时革命之火已在「第三世界」烽烟四起。299罗摩引述一篇《人民日报》的文章，针对当时苏联总理柯西金（Alexei　Kosygin）及其「终结战争」的主张发动勐烈攻击，并谴责为「美苏反对革命斗争之伟大共

谋」。最后《人民日报》总结：「世界充斥火药味……管他妈的战争『已死』论！」300

203 John P. Dalvi, Himalayan Blunder: The Angry Truth About India’s Most Crushing Military Disaster (Dehra Dun: Natraj Publishers, 2010), p. 364.

204 Dalvi, Himalayan Blunder, p. 364.

205 P.J.S. Sandhu, Bhavna Tripathi, Ranjit Singh Kalha, Bharat Kumar, G.G. Dwivedi, Vinay Shankar (eds), ‘Operations in the Western Sector (Ladakh)’, 1962: A View from the Other Side of the Hill, (Delhi: Vij Books, 2015), p. 67.

206 Sandhu et al., ‘Operations in the Western Sector (Ladakh)’ in 1962: A View from the Other Side of the Hill, p. 67.

207 The Henderson Brooks–Bhagat Report, available at http://www.indiandefencereview.com/wp-content/uploads/2014/03/TopSecretdocuments2.pdf (accessed on 15 April 2016), p. 54.

208 Sanjay Sethi, ‘Confrontation at Thag La: Indo China War 1962’, Scholar Warrior, Autumn 2013, p. 118.

209 G.S. Bhargava, The Battle of NEFA: The Undeclared War (Bombay, New Delhi, Calcutta, Madras, London, New York: Allied Publishers, 1964), p. 96.

210 Sandeep Unnithan, ‘1962 Indo-China war veteran Brigadier Lakshman Singh shares his experience’, India Today, 18 October 2012, available at http://indiatoday.intoday.in/story/i-led-40-men-to-safety-brigadierlakshman-singh-82/1/225265.html (accessed on June 1, 2016) and ‘Battle of Namka Chu, 10 Oct–16 Nov 1962’, available at https://www.facebook.com/notes/service-selection-board/battle-of-namka-chu-10-oct-16nov-1962/347589408614911/ (accessed on 1 June 2016).

211 Cheng Feng and Larry M. Wortzel, ‘PLA Operational Principles and Limited War: The Sino-Indian War of 1962,’ Mark A. Ryan, David M. Finkelstein, and Michael A. McDevitt (eds.), Chinese Warfighting: The PLA Experience Since 1949 (Armonk, NY: Sharpe, 2003), pp. 182–6.

212 Dalvi, Himalayan Blunder, p. 377.

213 Feng and Wortzel, ‘PLA Operational Principles and Limited War’, p. 152.

214 Dalvi, Himalayan Blunder, pp. 376–7.

215 Louise Chipley Slavicek, Great Military Leaders of the 20th Century: Mao Zedong (Philadelphia: Chelsea House Publishers, 2004), p. 37.

216 George N. Patterson, Tibet in Revolt,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60), p. 88.

217 Patterson, Tibet in Revolt, p. 88.

218 Patterson, Tibet in Revolt, p. 86–7 and 99–100.

219 Patterson, Tibet in Revolt, p. 88.

220 John Powers, History as Propaganda: Tibetan Exiles versus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120.

221 Li Xiaobing, A History of the Modern Chinese Army (Lexington: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2007), pp. 202-03.

222 Li, A History of the Modern Chinese Army, pp. 203–4.

223 Li, A History of the Modern Chinese Army, p. 204.

224 Li, A History of the Modern Chinese Army, p. 204.

225 See Melvyn C. Goldstein, Dawei Sherap, and William R. Siedenschuh, A Tibetan Revolutionary: The Political Life and Times of Bapa Phuntso Wangye (Berkeley, Los Angeles,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

226 Interview with Singye (name changed for privacy), Tawang, 28 October 2015.

227 Interview with Singye, Tawang, 28 October 2015.

228 Interviews, with local residents, Tawang, 27–29 October 2015.

229 Interview with Dorjee Khandu Thongdok, Rupa, 26 October 2015.

230 E-mail communication with Shiv Kumar Verma, the author of 1962: The War That Wasn't (New Delhi: Aleph, 2016), 18 March 2016.

231 Interview with Tilottoma Misra, Guwahati, 23 October 2015. Also see Brij Mohan Kaul, The Untold Story (Bombay, Calcutta, New Delhi, Madras: Allied Publishers, 1967), p. 427.

232 Mrinal Talukdar, Sino-Indian Conflict, translated by Deepika Phukan (Guwahati: Kaziranga Books, 2014), p. 216.

233 译者注：白马岗（Pemako）位于印度与西藏之间，是藏传佛教莲花生上师的隐密圣地。莲花生上师曾言，此为藏人面临困境之际的皈依所。中国于西藏境内置墨脱县。

234 Interview with Tsering (name changed for privacy), Darjeeling, 12 March 2016. Tsering is the son of a Pemako aristocrat from the Tibetan side of the border.

235 Dorjee Khandu Thongdok, War on Buddha: A Book on Chinese Aggression 1962 (Rupa, Arunachal Pradesh, 2012), pp. 18–19.

236 Thongdok, War on Buddha, p. 3.

237 Sandhu et al., 1962, 'The Politico-Diplomatic Prelude Part-1', p. 5.

238 Gurdip Singh Kler, Unsung Battles of 1962, (New Delhi, London, Hartford WI: Lancer Publishers, 1995), pp. 94–5.

239 Gurdip Singh, Unsung Battles of 1962, pp. 95.

240 Sethi, 'Confrontation at Thag La: Indo China War 1962, p. 120.

241 B.N. Mullik, My Years with Nehru: The Chinese Betrayal (Bombay, Calcutta, New Delhi, Madras, Bangalore, London, New York: Allied Publishers, 1971), p. 307.

242 The Henderson-Brooks Bhagat Report, p. 8.

243 Quoted in Patterson, Tibet in Revolt, p. 167.

244 Patterson, Tibet in Revolt, p. 166.

245 Patterson, Tibet in Revolt, p. 161.

246 Patterson, Tibet in Revolt, p. 176.

247 Quoted in Patterson, Tibet in Revolt, p. 182.

248 The Henderson Brooks–Bhagat Report, p. 10.

249 The Henderson Brooks–Bhagat Report, p. 32.

250 Leo E. Rose, 'Review: The McMahon Line: A Study in the Relations between India, China and Tibet, 1904 to 1914, by Alastair Lamb', Pacific Affairs, Vol. 41, Issue no, 1, Spring 1968, p. 132. See also Introduction and Acknowledgements.

251 Paul M. McGarr, The Cold War in South Asia: Brita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Indian Subcontinent, 1945–196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157.

252 Mohan Ram, Politics of Sino-Indian Confrontation (Delhi, Bombay, Bangalore, Kanpur, London: Vikas Publishing House, 1973), p. 122.

253 Ram, Politics of Sino-Indian Confrontation, p. 123.

254 Roderick MacFarquhar,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Volume 3: The Coming of the Cataclysm (New York 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nd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311.

255 Ramachandra Guha, India After Gandhi: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s Largest Democracy (New Delhi: Picador India, 2012), p. 340. Time claimed that Washington sent 60 planes loaded with US$5 million worth of automatic weapons, mortars, and land mines, and that 12 C-130 Hercules transport planes flew Indian troops to the battle zones; see 'India. Never Again the Same', Time, 30 November 1962, available at http://content.time.com/time/magazine/article/0,9171,829540,00.html (accessed on 27 September 2016). This is most likely an exaggeration of the extent of US military assistance to India in 1962. However, according to Bruce Riedel,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United Kingdom responded very quickly to Nehru's request for armaments. U.S. Air Force (USAF) Boeing 707 aircraft, flying from bases in Europe and Thailand, began airlifting weapons and ammunition to India; by November 2, eight flights a day were each bringing in twenty tons of supplies to Calcutta. USAF C-130s then transported the arms from Calcutta to airfields near the front lines … the Royal Air Force (RAF) also soon began airlifting supplies to India, and London was consulting with Australia, New Zealand and Canada on providing aid from the British Commonwealth.' See Bruce Riedel, JFK's Forgotten Crisis: Tibet, the CIA, and the Sino-Indian War (New Delhi: Harper Collins, 2016), p. 121.

256 MacFarquhar,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Volume 3, p. 310.

257 MacFarquhar,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Volume 3, p. 310.

258 Quoted in Alan Axelrod. The Real History of the Cold War: A New Look at the Past (New York: Sterling Publishing Co., 2009), p. 213. For the ideological conflict between the Soviet Union and China, see also Ram, Politics of SinoIndian Confrontation, pp. 101–6.

259 Ram, Politics of Sino-Indian Confrontation, pp. 130–31.

260 Ram, Politics of Sino-Indian Confrontation, p. 131.

261 Ram, Politics of Sino-Indian Confrontation, p. 127.

262 Ram, Politics of Sino-Indian Confrontation, p. 133.

263 MacFarquhar,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pp. 311–12.

264 For an account of the Lei Feng myth, see Evan Osnos, 'Fact-checking a Chinese Hero', The New Yorker, 29 March 2013, available at http://www.newyorker.com/news/evan-osnos/fact-checking-a-chinese-hero (accessed on 10 April 2016).

265 MacFarquhar,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Volume 3, p. 312.

266 Sergey Radchenko, The Suns in Heavens: The Sino-Soviet Struggle for Supremacy, 1962 to 1967 (Washington and Stanford: The Woodrow Wilson Center an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28.

267 Radchenko, The Suns in Heavens, p. 28.

268 This was a campaign that was launched after Mao Zedong had said in a speech made to a session of the Supreme State on 2 May 1956 that the party should 'let a hundred flowers blossom, let a hundred schools contend'. Referred to as 'the hundred flowers speech', it is mentioned and analysed in detail in Roderick MacFarquhar,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 Contradictions Among the People 1956–1957.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4), pp. 51–6.

269 For an excellent account of 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see Frederick C. Teiwes and Warren Sun, China's Road to Disaster: Mao, Central Politicians, and Provincial Leaders in the Unfolding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1955–1959 (Armonk, New

York and London: M.E. Sharpe, 1999). Chen Yun's criticism of Mao's policies is outlined on pp. 63–65.

270 Teiwes and Sun, China's Road to Disaster, p. xviii.

271 As quoted in Teiwes and Sun, China's Road to Disaster, p. xx.

272 Yang Jisheng, Tombstone: The Chinese Famine 1958–1962, translated by Stacy Mosher and Guo Jian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2), p. 77.

273 Yang, Tombstone, p. 77.

274 Yang, Tombstone, p. 87.

275 Yang, Tombstone, pp. 80–81.

276 Yang, Tombstone, p. 81.

277 Yang, Tombstone, p. 81.

278 Yang, Tombstone, pp. 41–2.

279 Yang, Tombstone, p. 278.

280 For rebellions during the Great Leap Forward, see Yang, Tombstone, pp. 465–82, and Frank Dikötter, Mao's Great Famine: The History of China's Most Devastating Catastrophe (London, Berlin, New York, Sydney: Bloomsbury, 2010), pp. 226–8.

281 Dikötter, Mao's Great Famine, p. 146.

282 Dikötter, Mao's Great Famine, p. 146.

283 Sandhu et al. 1962, 'The Politico-Diplomatic Prelude Part 2', p. 23.

284 Teiwes with Sun, China's Road to Disaster, p. xxiii.

285 Yang, Tombstone, p. 100.

286 Yang, Tombstone, pp. 370–1.

287 Yang, Tombstone, p. 358.

288 Yang, Tombstone, p. 383.

289 Dikötter, Mao's Great Famine, p. x.

290 Yang, Tombstone, pp. 419–20.

291 In 1963, Lin Biao presented to the public a diary supposedly written by Lei Feng. Although this was done after the 1962 War, the basic concept of the loyal and ideologically motivated PLA soldier dates back to the Chinese civil war in the 1930s and 1940s. 'Lei Feng' gave a name and a persona to that concept.

292 Li Zhisui, The Private Life of Chairman Mao: The Inside Story of the Man who Made Modern China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94), p. 356.

293 Zhisui, The Private Life of Chairman Mao, p. 385.

294 Zhisui, The Private Life of Chairman Mao, p. 652.

295 Zhisui, The Private Life of Chairman Mao, p. 652. See also Claude Arpi, 'Why Mao attacked India in 1962', Indian Defence Review, Vol. 26, Issue No. 3, July–September 2011, available at http://www.indiandefencereview.com/spotlights/maos-return-to-power-passed-through-india/ (accessed on 15 June 2017): 'At the beginning of 1962, as tension was increasing on the Indian border, did Nehru realize that China was a starving nation? Very few knew that, by the end of 1961 Mao was practically out of power.'

296 Claude Arpi, India and Her Neighbours: A French Observer's View, (New Delhi: Har Anand Publications, 2007), p. 194.

297 Dalvi, Himalayan Blunder, pp. 481–2.

298 Those ‘enemies’, and others, are identified in Mao Zedong, Quotations from Chairman Mao Tse-tung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68), pp. 8–23.

299 Ram, Politics of Sino-Indian Confrontation, p. 184.

300 The quote about ‘the smell of gun powder’ and ‘to hell with the theory of dying out of wars’ comes from a broadcast over Radio Beijing on 1 July 1967 and quoted in Mohan Ram, Maoism in India (New York: Barnes & Noble, 1971), p. 7.

# 第四章　战争结束时

战争才刚结束，指责游戏接着登场，令人摇头叹息不止。梅农在喜马拉雅山巅激战时就遭撤换，这一点也不让人惊讶。他的问题不在于本身的左倾立场，其实当时许多印度政治家都偏向左派；但身为国防部长却低估中国威胁这件事，让他受到许多批评。根据一九六二年战时印度参谋总长布利吉．摩罕．高尔准将（Brij Mohan Kaul）所言，印度的情报体系「比起中国相对不利。他们系统性地派遣特务进入印度全国，特别是东北边境特区，我们相对落后。他们的特务建立了回馈网络」。301

即使如此，在一九六二年十月攻击的前几年，关于中国军队在东北边境对侧大幅建设的情资报告，早已大量涌入军队总部及梅农办公室。梅农至少在三年前就得知中国可能会发动攻击。302或如印度记者暨政治评论家曼科卡（D.R. Mankekar）在其着作《一九六二年的罪人》（The Guilty Men of 1962）中写道：「从一九五九年开始，中国的敌意不断攀升，直到一九六二年在白热中爆发。」303

同样根据曼科卡所述：

当时国内两派流行思潮中，梅农引领的这派强调巴基斯坦威胁，低估中国对印度的威胁。除了意识型态上偏向中国与其他共产国家外，梅农长期以来也视巴基斯坦为自己豢养的敌手，多年以来在情绪汹涌的喀什米尔问题上，他一直扮演英勇斗士角色，独占前排光芒。304

一九六二年一月十日，梅农在阿萨姆的德兹普（即九个月后战争爆发的前线据点）发布声明：「印中边界争议的规模，不会导致战争。」305这在某个角度上是对的，因为中国并非为了实际边界争议而发动战争，但梅农未能掌握中国决定「跟印度算帐」306的更广大地缘政治及意识型态脉络。

某些人认为梅农是尼赫鲁内阁中最具争议性及分裂性的角色。他是尼赫鲁的老友兼亲信，但行动利益却与军队并不一致。一九五九年，知名将军科丹德拉．苏巴亚．提马亚甚至因为与梅农不合，决定辞去陆军总司令一职。但尼赫鲁拒绝接受提马亚的辞呈，并说服他留任，直到一九六一年退休。

一位英国观察家甚至进一步说梅农「感觉上像尼赫鲁家族一份子（没有其他部长能及得上）……事实上尼赫鲁与梅农之间有如父子，可以感觉到他视梅农为自己极希望拥有的儿子」。7其他西方观点将梅农刻划为「印度的拉斯普丁」307、「印度的维辛斯基」308与「印度的拥抱共产党无任所大使」。309

在喜马拉雅山区战争的高峰期，梅农的反西方立场成为议题，但当时印度别无选择，只能转向寻求美国支持。十月二十三日，尼赫鲁正式向美国寻求支持的三天前，美国驻新德里大使加尔布雷斯通知印度外交部长迪赛，若梅农继续担任国防部长，将对美国军援印度造成「较为严重的问题」310，因此他必须离开。尼赫鲁接管国防部一小段时间后，由印度独立期间的重要角色查万（Yashwantrao Balwantrao Chavan）接任部长一职。

即使尼赫鲁与梅农关系亲近，但两人之间仍有严重歧见。尼赫鲁对中国人的疑虑也许比表现出来的更多一些。早在一九五八年，据传他在与当时即将上任印度驻北京大使的帕塔萨拉蒂（G. Parthasarathi）私下会面时，曾说：

我一点也不相信中国人。他们欺瞒成性、意见多端、骄傲又自大。持续警戒是我们的格言。你所有电报只能送给我，而非外交部。此外，今日的指示别跟克里希那（梅农）提起。你、我与他虽然有相同的世界观与意识型态取向，但他却误以为世上没有任何共产国家会跟我们不结盟国家交恶。311

这是梅农最严重的误判。然而就如同高尔在关于一九六二年战争与后续的书中写道：「当梅农声望下滑，他过去对印度的诸多贡献也为人所遗忘，只留下错误。」312在印度政府部会首长中，梅农其实是最杰出且精力充沛的人才之一。身为素食者，他禁酒禁菸；身为部长，他住在一间朴素木屋，小房间中充满书籍。

一九二○至一九三○年代期间，年轻的梅农在伦敦大学学院及政经学院攻读学位，他的政治学老师哈洛德．拉斯基（Harold Laski）后来形容他是「我最好的学生」。313印度独立之后，梅农出任第一任驻英国高级专员314，之后更担任印度驻联合国大使。他也是一九五五年万隆会议及不结盟运动创立背后的智囊之一。事实上，「不结盟」一词正是一九五三年梅农在纽约联合国的演讲中提出，用来描述不与西方或苏联结盟的国家。然而比起华府或伦敦，梅农较亲近莫斯科亦不是秘密。

一九五七年他接手国防部时，「有如一股清新空气，吹走部长职位多年来累积的蜘蛛网与灰尘。」315梅农生性高傲，不太受上下同僚喜爱；然而根据高尔所述，「他广泛阅读，几乎是一部通晓太阳底下所有事物的百科全书，包含科学、哲学、医学、工程、歷史、政治、经济、农业与动物。他对飞机引擎、装甲车、潜水艇与无线设备等精密仪器有深刻认识。专家在他左右也都战战兢兢。」316

然而最重要的是，梅农奠定了印度自有国防工业的基础，确保国家减少对进口的依赖，并同时重新架构印度的军队指挥体系。在他监管之

下，位阶升迁改以功绩而非年资为基础。梅农也是一九六一年对前葡萄牙殖民地果亚兼併行动的擘划者。一九五七年，梅农写下纽约联合国安理会史上最长的演讲纪录；在八个小时中讲述对抗巴基斯坦的主张，捍卫印度对喀什米尔的主权。五年之后他被迫离开政府，也离开执政的国大党，以独立候选人身分参与数次选举，直到一九七四年离世，享寿七十四岁。当时印度总理甘地夫人感叹：「一座火山止息了。」317

下一个令人摇头的对象则是陆军总司令塔帕。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十八日，他从德兹普飞回德里，直接前往尼赫鲁官邸并向总理表明愿意辞职。塔帕说印度军队在喜马拉雅山区遭到击溃并非他的责任，但身为一名专业军人，他必须为此挫败负责。尼赫鲁回覆会考虑，接着于次日接受了塔帕辞呈。之后塔帕申请提早退休，也获得了许可。

塔帕生于旁遮普西部（属于今日巴基斯坦的一部分），并前往拉合尔（Lahore）接受教育。就跟那世代许多的军官一样，他也就读桑德赫斯特的英国皇家军事学院。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参与了缅甸、中东与义大利战事，后来成为军事行动与情报局长。塔帕的军队经歷优异，在一九六一年成为陆军总司令。从军中退下后，也曾出任印度驻阿富汗大使，时间长达五年之久。

继塔帕之后担任陆军总司令的是孟加拉出身的乔都利将军（Jayanto Nath Chaudhury）。他也是桑德赫斯特毕业生，并参与过「缅甸行动」（英国欲从日军手中夺回殖民地，而在缅甸发起的反制行动）。当中国宣布片面停火时，乔都利刚上任陆军总司令二天，而重整军队并重建破碎边防的责任就落到了他头上。

再来就轮到高尔将军。他同样也有杰出的军队资歷，战争期间担任参谋总长暨东北区域总司令。他跟其他人一样，也是桑德赫斯特出身，在英国军队传统中成长。之后参与了二战期间的缅甸战事，以及一九四八年的喀什米尔战争。一九五○年代初期，他与提马亚将军都效力于联合国的中立国遣返委员会。不过他与尼赫鲁更亲近，并被公认是极少数可能拥有政治野心的印度军官；然而东北那场战争却导致他前途中断。

十月中旬，当第一波冲突沿着边界发生之时，高尔就在边境，但因为高山症感觉不适而撤回德里接受治疗，直到十月二十九日才重返东北。高尔在战场上的缺席，对敌手来说正是怯懦的迹象，便说他因「临阵胆寒」而「装病」。318这其实是非常不公的指控，但在印度战败受羞辱后的政治环境中，他只能别无选择地吞下苦果，申请提前退休。政府于十二月十一日接受他的退休。319

当时高尔不过才五十岁。他最终苦涩地离开军队，在一九六三年五月十四日前往欧美、日本，展开为期一年的个人旅行。若非因为承担一

九六二年的战败指责，他非常可能不只在军中有大好前程，甚至还有政治上的未来发展。当时知名的美国广播主持人威尔斯．汉根（Welles Hangen）甚至视其为「尼赫鲁之后可能的印度总理接班人选」。320

此外，这场战争中还有一些不为人知且多数不知名的受害者，即印度华裔。印度当局怀疑这些人可能是在一九六二年战前，提供情资给中国军队的「第五纵队」，因此视其为叛国者。在一九六二年之前，中国共产党政府确实多年派遣情报特务进入印度，这点无庸置疑，然而很少是出于印度本身的华裔族群。印度华裔是在英国殖民时期来到印度，多数住在加尔各答，担任制皮、制鞋与木匠等工作，或是开设餐厅、美容院、商店及其他小公司。若他们有任何政治认同，也是倾向台湾的国民党政府，而非北京的共产党政府。一九六二年战争期间，加尔各答的海外华人协会公开表达支持印度政府，甚至呼吁切勿接受北京在十一月提出的停火「骯脏提议」。321

然而，十月二十五日发布的《外国人（中国国籍者限制）令》（Foreigners “Restriction of Chinese Nationals” Order），限制任何华裔人士在未获得当地官员书面许可下，擅自离开村落超过二十四小时。五天后又发布了另一纸命令，政府得羁押「任何非印度裔，并且生于任何正与印度战斗或侵略印度之国家的公民或被统治者」。322

接着发布的是十一月三日的《外国人（收容）令》（Foreigners “Internment” Order），在此法令之下，阿萨姆与西孟加拉邦北部部分特区政府，有权力逮捕所有华裔居民，并将他们送到位于一千五百公里外的拉贾斯坦迪欧利（Deoli）收容营。一九六三年二月，根据政府纪录，迪欧利总共收容两千一百六十五名华裔人士，另有一百四十三名关押在当地监狱。323几乎所有人都来自东北边境区域。

其中一名收容人名为殷玛絮（Yin Marsh，音译），她生于加尔各答，长于大吉岭，其家族在此地经营颇受欢迎的中式餐厅。她与父亲、祖母、八岁的弟弟都被送往迪欧利。她在自己的书《与尼赫鲁一同入监：印度华裔家庭的故事》（Doing Time with Nehru: The Story of an Indian-Chinese Family）中描述这段惨痛经歷。书名暗示着讽刺的巧合，下令大规模收容的尼赫鲁本人，在争取印度独立过程中，也曾被英国人关押在迪欧利过。324

最终，没有任何迪欧利收容人与印度华裔因间谍或其他罪名被审判。325然而在一九六三年，有两千三百九十五名华裔（包含一千六百六十五名收容人与七百三十名亲属）被遣返中国。留在印度的人情况更加艰难，一九六二年至一九六七年间，另有七千五百名华裔离开印度，前往香港、台湾、加拿大或其他地区，甚至包含了巴基斯坦。326直到一九

九八年，华裔才被允许取得印度公民身分。

这种对待华裔的方式，伤害了印度做为强盛民主国家的国际形象。一度繁盛的加尔各答华裔社群仅剩不到两千人；在噶伦堡、大吉岭及阿萨姆部分区域的人数更少。十九世纪，华人先民曾被英国茶园主以契约工的方式移入此地。二○一○年，迪欧利收容营倖存者公开要求在此地建立一座纪念碑，做为一九六二年「华裔遭受迫害的见证」，并提醒「我们失去的自由」。327

然而一九六二年战争的主要政治受害者，也许正是尼赫鲁本人与他的不结盟主义。战后尼赫鲁的健康急速下滑，一九六三年，他花了好几个月时间在喀什米尔高地休养生息，这里是其先祖发迹之地。一九六四年一月七日，尼赫鲁在出席印度东部奥里萨邦首府布班内许瓦（Bhubaneshwar）举行的一场国大党会议时，因心脏病发作倒在舞台上，迅速被送回新德里接受治疗。国大党与印度政府开始安排缩减他的负担。他当时七十五岁，并不算老，但活力显然正在快速消逝。

尼赫鲁在生命终结前有两件挂心的事，一是他与旧友谢赫．阿布杜拉（Sheikh Abdulla）就查穆与喀什米尔地位问题的痛苦冲突，二是东北那迦山区持续不断的部落反抗行动，之后该区域逐渐以「印度的小越南」闻名。然而对中战争的惨败伤他最深，部分歷史学者认为尼赫鲁视此为中国的完全背叛，他的健康也因此恶化，并加速了死亡的到来。328 如同印度学者罗摩强德拉．古哈（Ramachandra Guha）指出：「中印战争不只伤害了尼赫鲁在印度与世界的地位，同时也影响他在国大党内部的地位。」329

一九六四年五月二十七日，尼赫鲁经歷另一次心脏病发作，死于新德里三武馆（Teen Murti House）家中，在心脏科专家抢救无效的过程中，他的女儿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随侍在侧。当天下午两点，内阁部长苏布拉玛尼亚姆（C. Subramaniam）向国会下议院报告：「总理已辞世，光已熄灭。」苏布拉玛尼亚姆借用尼赫鲁在一九四八年一月三十日甘地遭暗杀后的发言：「生命之光熄灭了，到处都是一片黑暗。」330

虽然印度在战争中获得部分的西方援助，但英、美提供的军援是有代价的。印度歷史学者贾内许．库代西亚（Gyanesh Kudaisya）记述了尼赫鲁最后的岁月：

尼赫鲁感到沮丧……此刻印度被迫接受外部调停，就高度争议的喀什米尔议题与巴基斯坦展开对话。英、美政府利用喜马拉雅危机，施压印度向巴基斯坦让步，以解决喀什米尔议题。尼赫鲁小心经营的不结盟政策遭遇重挫，戮力经营印度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也消失无踪。331

国大党政治家暨经济学者古札利拉尔．南达（Gulzarila Nanda）暂代总理，直到六月九日夏斯特里（Lal Bahadur Shastri）宣示就职。夏斯特里是有些名望的前独立运动斗士，并非印度政治中的无名人物，不过他的性格温和、言语温文，缺乏尼赫鲁的领袖魅力与世界舞台高度。

无论如何，夏斯特里带领印度面对一九六五年的巴基斯坦战争，这次是由印度军队获胜，因此成功重建了部分在一九六二年战争所失去的尊严。一九六六年一月十日，和平条约在乌兹别克的塔什干（Tashkent）签订，当时此地为苏联的一部分，由苏联总理柯西金居中斡旋夏斯特里与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Muhammed Ayub Khan）的会议。一天后，夏斯特里因心脏病发死亡，这导致各种阴谋论四起。他是否被毒杀？若然，又是谁下的手？但并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这些揣测，夏斯特里遗体被送回印度火化。

古札利拉尔．南达再次出马暂代国家元首，直到一月二十四日，印度又有一位新总理，即尼赫鲁当时四十八岁的女儿英迪拉．甘地，她将再次提升国家在区域与世界的地位。印度与华府的关系再次紧张，因为她批评美国轰炸越南。同时英迪拉也带领印度与苏联建立亲密关系；从印度的观点来看，苏联比西方国家更值得信任。

一九六二年战争中，阿尤布汗曾激烈抗议英、美对印度的军援，宣称此举将「扩大并延长冲突」，同时这些武器将会在喀什米尔争议中用以对抗巴基斯坦。[332]西方不愿得罪巴基斯坦这倾西方的东南亚公约组织暨中部公约组织的成员国。[333]

巴基斯坦既是两个西方防卫条约成员国，又与中国维持亲近的盟友关系，地位十分微妙；而印度与苏联结盟，无疑将加速原已严重的中印冲突。印度政策制定者显然认为国家需要强大有决断力的总理，而英迪拉能带领大家穿越混乱年代中煎熬难解的南亚情势。她是尼赫鲁的女儿，此外还与圣雄拥有相同姓氏（虽然并非亲属）。

同一时间，中国的毛泽东正快速巩固其权力。一九五九年他在庐山会议清算了部分主要政敌，紧接着各种阴谋角力持续到一九六二年。若毛泽东在一九六二年初曾感到抑郁，那么同年八月于海滨度假城市北戴河的会议中，马若德称为「武装马列主义的旗帜」再次「飘扬北京上空」时，这份抑郁早已消散一空。[334]毛将大跃进的灾难结果归罪于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及其他「温和派」头上，「我们（指毛本人）持续讨论以农业为基础，但在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二的四年中……他（毛）的同志并未真正实行。」[335]

马若德指出，最后一次经济政策被转为政治斗争，正是在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上，「毛提醒他们，接着就是四名资深元老遭到清算斗

争。」[336]同样模式在一九六二年的北戴河会议中重现。加拿大教授罗伦兹．路堤（Lorenz M. Luthi）认为当时毛泽东「在日常政策制定中，展现了一场精采的重掌权力大戏。他运用这股动力，在中国外交关系上留下印记」。[337]他恶毒地谴责新敌人「苏修分子」，并准备对印度兴战。但军事行动的筹谋仅在毛泽东信任的追随者间闭门讨论，而没有提上正式会议。换句话说，计画之一就是为了边缘化党及国家机器中剩余的反毛派。[338]边界区域大量储存战争物资及中国军队人数明显增加，都是在八月二十七日北戴河会议之后几天的事。[339]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喜马拉雅山区战事正酣，《中国青年报》（中国共青团机关报）刊载一篇文章：「过去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证明了毛泽东无庸置疑的正确性。」[340]更惊人的是一九六三年一月八日的另一篇文章，毛「任何时刻都比任何人更高瞻远瞩……毛主席看待问题，必然就像站在高楼顶端，俯视着底下街道。每条路、街角与拐弯都逃不过他的眼睛。他怎么可能迷失方向呢？」[341]

同时间，中国的反苏联宣传也进入白热化阶段。根据解密的中情局文件显示：

（一九六二年）九月底十月初，中共发言人宣称苏俄共产党已「放弃」世界革命的领导权……（同时）此领导权自然由莫斯科与赫鲁雪夫转交给北平（北京）与毛泽东，因此看似孤立的共产中国，在此刻获得了社会主义阵营多数民众的支持，因此将坚持与苏联的「不妥协」斗争。[342]

中情局文件继续引述十一月十五日《人民日报》社论，北京自称是「国际共产运动中的最高指导权威」[343]，而在社论最后吆吁「所有马列主义者坚定斗争现代修正主义」。[344]一九六二年对印战争的胜利，展现中国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大败另一个亚洲强权。同时也正如预期，中国夺走印度做为亚非新近独立国家主要代表声音的角色。

此时正是毛泽东与他信赖的副手，包括妻子江青、国防部长林彪与情报头子康生，开始清算党内，并定义中国角色，不只是国际共产运动，更是整个第三世界的领袖。但首先中国需要核弹。

中国对核弹的兴趣始于韩战，当时他们发现美国考虑用原子弹吓阻如人海浪潮般涌入朝鲜半岛的中国志愿军。一九五○年代初期，中国在来自苏联的科技及技师协助下，已发展出小型武器、火箭与火砲生产。一九五五年一月，毛泽东召开中共中央委员会会议，讨论展开核子武器计画。同年，人民解放军元帅聂荣臻与中国科学院合作，在秘密地点成立核能研究所，开始发展计画内容与方针。[345]在一九五五至一九五八年间，苏联与中国针对核能科学、工业与武器发展，签订了六项条约。[346]

一九五七年，聂荣臻前往莫斯科签订条约，苏联同意提供核能研究、飞弹发展与航太科技援助，这项承诺包含了核弹原型与相关的飞弹科技。[347]此时中苏之间的分歧已在酝酿，但直到一九六一年才公开。不论如何，聂荣臻相信即使缺乏苏联协助，中国核能专案也能往前推进。

一九五八至一九六○年，千百万中国人处于饿死边缘之际，另一位人民解放军高阶军官陈士榘，将四万名特别工兵调到新疆沙漠的干涸盐湖罗布泊，开始兴建核弹测试地点。接着在一九六○年七月十六日，苏联政府撕毁六百份中苏合约，并告知北京将于七月二十八至九月一日间，撤回所有驻中国的一千三百九十名专家。[348]然而此举并未吓阻北京持续发展核能计画，当时全面改由中国技术人员接手，并以国家军事经费支应。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中国进行第一次核弹试爆。第二次试爆则在隔年五月十四日举行，紧接着是一九六六年五月九日的第三次试爆。此时中国已跻身核弹强国之列。

关于毛泽东本人对核子武器的态度，长期以来一直有人质疑，一九五七年十一月莫斯科的全球共党大会上，毛泽东在那场举世知名的「美帝是纸老虎」演说中是否真的说出：「核战争有什么了不起。全世界二十七亿人，死一半还剩一半。中国六亿人，死一半还剩三亿，我怕谁去。」[349]不过二○一三年三月，中国政府纪录片频道央视第九台，播出中苏外交关系解密档案的十八集纪录片，追溯至毛泽东当权时期，在其中一集，毛泽东确实说出这些话。[350]

直到此时，许多人（特别是中国人）拒绝相信国家领袖如此无情。然而当知名着作《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的美籍作者爱德加．史诺（Edgar Snow）在一九六五年专访时问及此事，毛主席本人并不打算否认。「毛并未否认他说过的话，也不希望我为他反驳所谓的谣言（关于千百万中国人在核战中存活的能力）。」[351]

一九六六年五月，也就是第三次核弹试爆的同月，毛泽东决定正是发起伟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时刻，以此肃清党内与国家中所有的「反革命者、修正派与走资派」。[352]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人民解放军老将暨总参谋长罗瑞卿遭撤去一切职务，因为他拒绝毛泽东在军中强化意识型态训练的主张，而这是毛与国防部长林彪热烈追求的路线。罗瑞卿与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及中央政治局委员杨尚昆都被打成「反党派」。

整个国家陷入动乱，天天上演批斗、群体会议甚至杀害毛的假想与实际敌人等事件。年轻好斗的红卫兵在乡间流窜，他们恐吓群众，并毁坏寺庙及任何会令人想到革命前岁月的事物。被公开羞辱清算的高层领袖之一，是过去仅次于毛的共和国二把手刘少奇。邓小平也被锁定清

算，下放到江西的拖拉机修配厂做工；他的儿子邓朴方遭虐待，被丢出四楼窗户而导致半身瘫痪，必须终生依赖轮椅。

这些清算斗争背后的主谋之一是康生，这名心理变态的鸦片上瘾者从一九三○年代开始，就在中共的情报网络中扮演重要角色。熟悉毛泽东与整个中共领导阶层的美国学者李敦白（Sidney Rittenberg）曾形容康生「黑暗、邪恶且阴狠」。353将印度的梅农称为拉斯普丁确实太过夸大，但康生绝对配得上如此评语。根据李敦白所述：「除了自夸发现外国特务的能力外，康生总是态度疏离……（他）似乎总是戴着隐形的单片眼镜，以优越及质疑的眼光审视他人。」354

曾一度受尼赫鲁信赖、应属「温和」的周恩来，也是在中国发动恐怖统治的领导班子之一。在动盪年代中，他确保国家机器仍旧相对稳定地运作；然而在毛泽东的邪恶妻子江青持续挑战下，周必须保持防卫，时时防范政治突袭。而为了确保自己处于文化大革命的赢家阵营，周恩来在一九六八年十月签署了文件，将刘少奇驱逐出党。比起当个精明政治家，周恩来似乎更像是个顶级的操弄者与机会主义者。355

印度虽然歷经尼赫鲁去世后好几年的不稳定状态，但与中国比起来，印度政治确实平静许多，不过一九六二年战争也导致印度开始扩编、现代化且重新武装所有军队，并为了北方边防成立新的山区军区。根据记者马哥利斯（Eric S. Margolis）所言：「过往未曾探查的喜马拉雅山区与拉达克边境地区，开始了精确的测绘调查。争议的喀什米尔突然再次成为高度重要战略区，因为德里忧心中国对此山区省分有所图谋，或是将巴基斯坦纳入对北印度的联合攻击中。」356

一九六二年中印战争或一九六五年印巴战争，都迫使印度强化情报蒐集的能力。最终结论是在一九六八年九月，甘地夫人的政府成立新一代对外情报部门，印度内阁秘书处研究分析室（Research and Analysis Wing），在特务之间简称为RAW。第一任首长是曾任职穆立克军情局的拉梅许瓦．纳特．卡欧（Rameshwar Nath Kao），正式头衔是印度内阁秘书处研究秘书（Secretary [Research]），这部门是秘书处的一个「处室」357。拉梅许瓦成为印度第一位真正的情报头子，这组织在他之后数年的领导下，成为世界最大、最活跃的情报机构之一。

同时印度正规军也正在强化。一九六二年战后，印度向苏联购买四百辆T—54中型坦克车，虽然这在山区无用武之地，却可以用来对付巴基斯坦。印度向美国购买F—104拦截机的企图则未成功，因为华府不愿得罪盟国巴基斯坦。然而印度早已开始兴建工厂，生产苏联的米格二一式战机。一九六三年，第一批米格战机已加入印度空军服役。358虽然巴基斯坦仍被视为立即威胁，但「印度领袖逐渐认定中国将成为长期对

手。一九六三年，印度开始秘密展开核武研发计画」。[359]

印度本土的国防工业是一九五○年代由梅农担任国防部长时建立，此时主要透过苏联技术专家的协助提升能力。古老的南方驻军城市邦加罗尔（Bangalore，今日改称Bangaluru），远离印度边境的纷扰，在一九五○年代被选为本土电子业发展地点。大型研究实验室如国家航太实验室与电子研发基地都设在此。一九五四年，巴拉特电子有限公司（Bharat Electronics Limited）在邦加罗尔成立，成为印度主要的国防电子企业，并于一九六○年代持续成长。印度斯坦航空公司（Hindustan Aeronautics Limited）于一九六四年十月一日成立，其前身是一九四○年成立的印度斯坦飞机公司（Hindustan Aircrafts）。这座在今日被称为「印度硅谷」的城市，开始成为先进国防工业的发展中心。

虽然在一九六○与一九七○年代，主流印度经济以近乎痛苦的缓慢速度成长，但印苏之间新的友谊关系，却使印度维持相当先进的国防工业。一九七一年八月，印苏签订《印苏和平、友谊与合作条约》（Treaty for Peace, Friendship and Cooperation），由印度外交部长史瓦朗．辛格（Swaran Singh）与苏联外长安德烈．葛罗米柯（Andrei Gromyko）签订。共产苏联达成了帝俄所不能及之事，将影响范围伸进印度次大陆。

然而这却有一个问题。印度依循其他社会主义及部分发展中国家的路线，也获得苏联的优惠支付条件待遇，并以印度制产品交换军事设备及零件；但同时国防分析师却认为：「过多的苏联设备，降低印度本土自行发展武器或寻求其他供应的动力，疏离了西方供应商。印度也无法将源于苏联、印度制造的武器，销售到国际市场上，因此少了珍贵的军事收入来源。」[360]

印度不难得出结论，苏联最终并非可靠盟友，并因此决心强化国家自行发展武器的决心，其中包含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印度的核能工业并非新创，最早在一九四四年，塔塔基础研究院（Tata Institute of Fundamental Research）就开始以和平为目标的核能研究，由知名科学家霍米．峇峇（Homi Jehangir Bhaba）与拉贾．拉曼拉（Raja Ramanna）领军。但在一九六二年战争之后，研究内容开始转向印度的军事武力发展。随着钸从加拿大提供的反应炉中产生后，印度开始生产核子装置，并于一九七四年五月十八日于拉贾斯坦波卡兰（Pokhran）试验场试爆。虽然号称为「和平核爆」，但这无庸置疑地表明，在中国首次试爆十年后，印度也有了核子武器的能力。

设立波卡兰试验场的主导者，是被视为印度核能计画之父的拉曼拉。据报导他曾于当年二月说：「我们已准备好摇摇龙尾。」[361]「龙」

指的是谁完全无庸置疑。试爆成功后，现场科学家以简短电话讯息报告总理甘地夫人：「夫人，佛陀终于微笑了。」362他们刻意将试爆日选在佛诞日这天，因此行动代号称为「微笑佛陀」。363

印度不需担心另一场来自中国的攻击；事实上，中国在一九六二年战后的策略是避免与印度发生直接冲突，反过来改採代理人战争。印度内部遭遇第一波由中国支持的反政府军，是邻近缅甸东北边境的那迦人反抗军，其指挥官莫乌．格韦增与其他那迦人一样是铁桿基督徒，一九六二年六月他在喀拉蚩的巴基斯坦接待介绍下，认识了共产中国的代表。当中国承诺愿意给予那迦援助支持时，莫乌应该相当震惊。巴基斯坦为了避免激起印度的报复，因此能提供那迦反抗军的援助有限；至于中国则没有这类顾虑。虽然那迦人都是基督徒，但在扰乱印度上确实是相当有用的力量。

在那迦山地中，莫乌与那迦反抗军其他领袖讨论后，决定接受中国的提议。他们选出带领第一批那迦武力前往中国的两名领袖。提诺色里（Thinoselie Medom Keyho）是那迦反抗运动老兵，他在一九五○年代加入那迦民族议会（Naga National Council）及反抗军；较年轻的穆瓦哈（Thuingaleng Muivah）来自曼尼普尔，除了基督信仰外，也有受马克思主义启发。一九六七年一月，他们经过四个月的徒步跋涉穿越缅甸北部，并在中国边境受到热烈接待。在身分确认后他们被带往云南腾冲。而提诺色里与穆瓦哈飞往北京，入住北京饭店；跟随他们同来中国的一百三十人，则留在腾冲附近新盖的训练营里。一九六七年十一月，提诺色里与所有士兵带着全新的自动步枪、机枪与火箭发射器，再次跋涉返回印度；穆瓦哈则留在北京。364

第二批那迦反抗军在一九六八年三月抵达中国，由出身那迦民族议会政治领导群的伊萨克（Isak Chishi Swu）与军方的莫乌领军，此后还有四批前往中国云南受训的那迦反抗军，总数超过七百人。之后那迦山地区域爆发了印度军队与那迦反抗军的激烈冲突。比起只提供旧步枪及少数机枪的巴基斯坦，中国对那迦显然大方许多。

中国之所以超乎寻常地支持那迦民族议会，是因为考量到那迦人近乎狂热的基督信仰。他们是在十九世纪末与二十世纪初，受西方传教士影响而改信基督教。虽然那迦人抵达中国时正值文革高峰期，却获准在云南训练营中祈祷、唱诗歌。由于中国需要那迦人进行战斗来扰乱印度，这点比宗教信仰更为重要。

继那迦人之后，其他印度东北区域的民族反抗军也前往中国。同样来自以基督徒为主的部落，渴望成立独立国家的米佐反抗军，也在一九七○年代徒步穿越缅甸北部前往中国。第一批三十八人于一九七三年抵

达中国，并在云南及缅甸克钦邦边界上的板瓦山口（Panwa Pass）对侧的固东军事据点接受训练。第二批一百零九人则于一九七五年八月抵达中国，在云南南部的孟海受训。米佐反抗军领袖拉尔登加（Laldenga）、外事秘书拉尔明登加（Lalmingthanga）及其他人也造访中国，并且前去北京，不过他们并非徒步跋涉穿越缅甸丛林，而是从东巴基斯坦飞往中国。365这显示出中国与巴基斯坦共谋支持印度的部落革命军。拉尔登加首次在一九六八年六月前往中国，这是由中国驻达卡领事馆所安排，当时中国已承诺提供军事援助。一九七○年九月，拉尔登加再次来到中国会见总理周恩来，并又获得了支持承诺。366

一九七六年四月，另一群来自曼尼普尔的反抗军则经由尼泊尔前往西藏，接受中国军队指挥官的训练。如同那迦人与米佐人获得中国提供的武器，曼尼普尔人在拉萨附近的解放军基地接受意识型态与军事训练。367返回曼尼普尔后，这群武装势力开始在因帕尔谷地发动恐怖统治，杀害印度军警及所谓的「叛徒」。这支命名为「人民解放军」（显然受中国正规军启发）的新武装团体劫掠当地银行，并抢夺警局与其他据点的武器。这支武力在一九七九年组成政治组织，称为「革命人民阵线」（Revolutionary People’s Front），由一九七六年在拉萨受训的武装分子之一比舍希瓦尔．辛格（Nameirakpam Bisheswar Singh）所领导。

根据一九六七年七月七日一份中国机密文件《中国应成为世界革命的弹药库》纪录，毛泽东宣称：「当前情势大好。印度的那迦兰正在与国大党进行武装斗争。」368毛进而强调缅甸共产党的重要性：「缅甸的地理条件比越南更好，有更多斡旋空间……若缅甸政府选择反对我们就更好了；我希望他们能跟我们断绝正式关系。那样一来，我们就能更公开支持缅甸共产党。」369

毛在同场演讲中继续说：「中国不仅是世界革命的中心，也必须在军事与技术上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当我们提供武器时，将会是刻着中文的中国武器（除了提供特定区域以外）。我们将公开支持他们；中国应成为世界革命的弹药库。」370印度对此当然并不开心，于是发出抗议，并在纽约联合国前展示从那迦反抗军收缴刻有中国印记武器的照片。但中国并不在意，因其已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而印度则是敌人。

一九六○年，周恩来曾在中国立法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说：「我们热切期待中印友好关系……并深信中印人民间的传统友谊将持续闪耀。」371然而在一九七一年十二月的党内报告中，他明确（或许也更为诚实坦白）定义他对中印关系的看法：

苏修主义支持印度，我们支持巴基斯坦。说到支持巴基斯坦，指的

是协助对抗印度的侵略；然而巴基斯坦内政上有错误，例如东巴基斯坦的屠杀，也缺乏国家政策。印度是帝国主义、修正主义与反动派中的反动头。因此，我们仍希望在适当时刻，与印度修复正常外交关系，以便进一步推动印度内的人民革命。372

中国相信，当时席卷印度部分乡村区域的政治运动「拿撒尔人运动」，或正式称为印度共产党（马列派），将会引发所谓的「人民革命」；至少这是中国领导在那些「印度同志」情况失控、无法达成期望前的想法。

印度共产党是亚洲地区最大、组织最缜密的共产党之一，却在一九六二年战争后分裂。印共党内主流路线谴责中国的攻击；当时国际共产运动分裂为拥苏派与少数拥中派，其中多数印共领袖是拥苏派。一九六四年，印度共产党（马克思派）成立，此派的意识型态路线并非完全拥中，认为一九六二年战争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冲突。

然而印度共产党中有一派公开拥护中国，并深受毛泽东革命理念启发。这一派由查鲁．马遵达（Charu Mazumdar）与卡努．桑亚尔（Kanu Sanyal）领军，两者都活跃于西孟加拉邦大吉岭的北部平原。此处的农民起义在一九六七年五月爆发。马遵达与桑亚尔已在此地准备了一段时间，动员茶园农工与贫农进行武装革命。在当地一座名为拿撒尔巴利（Naxalbari）的村庄里，一名佃农遭地主无理驱逐时，火花就此点燃。抗议的佃农遭当地主流氓毒打，引发数千位村民手持弓箭与矛头，占领了土地建物与谷仓；基本上他们将所属与邻近村落当作「解放」社区来管理。

约有一万五千至两万名农工参与这场运动，五月底时已达到武装起义的规模。警察进入当地与农民发生冲突，后者则以从地主那夺来的武器弹药反击。中国很快就表达对叛乱的全力支持。一九六七年七月五日，中国官方报纸《人民日报》一则以「印度响起春雷」为标题的社论写道：

一声春雷响遍印度大地。大吉岭地区的革命农民起义反叛。随着革命团体印度共产党的领导，他们在印度建立一片革命武装斗争的红区……无论帝国主义者、印度反动派与现代修正主义者如何合作颠覆与镇压，印度共产党革命者高举的武装斗争火炬不会熄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大吉岭的火花，将让全印度陷入火海。373

同月，印度的准军事武力进入拿撒尔巴利。发起运动者遭到痛殴或逮捕，或两者兼具，某些人（如马遵达）逃走并转入地下。动乱仅持续数个月，但对许多印度乡村地区的政治环境带来了长远影响，如同苏曼塔．巴纳吉（Sumanta Banerjee）在经典着作《拿撒尔巴利之后》（In

the Wake of Naxalbari）中所写：「暴露出当权议会左派的政治失败，并启动了共党内部重新思考的过程。」374

当时印共（马克思派）是统治西孟加拉邦的联合阵线（United Front）政府的一部分，对于起义行动予以谴责。留在当地的桑亚尔带领基进派聚会，讨论未来的行动方向。九月，也许是因为受到《人民日报》社论的鼓舞，他们决定透过东巴基斯坦达卡的中国外馆与中国联系。桑亚尔跨越边境前往东巴基斯坦，却没有成功去到达卡。375

他们返回西孟加拉邦北部后再次集会，并组成由桑亚尔领军的四人团队，取道尼泊尔前往中国。尼泊尔边界离拿撒尔巴利仅数公里之遥，这小队可以搭乘公共巴士前往尼泊尔的首都加德满都。位于加德满都的中国大使馆一开始不愿承诺任何事，然而就在馆员呈报北京长官之后，当时的大使亲自欢迎他们前往中国。这群人甚至可以住在使馆内，直到旅行的安排底定。

桑亚尔与小队成员在大使馆员的运送下来到中国边境，但为了避开移民关卡，他们必须徒步穿越山脉，完成最后一段旅程。另一侧，人民解放军协助他们抵达拉萨附近的军营。九月三十日，他们搭乘民用客机前往北京，也跟先前的那迦人一样入住北京饭店，并接受安排会见人民解放军军官。根据桑亚尔所述：「大约有十六或十七名指挥官，参与了这场超过两小时的马拉松会议。他们巨细靡遗地询问有关拿撒尔巴利的状况；希望知道事情怎么开始，我们有多少武器，以及后续的计画。」376

接下来几周中，毛泽东接见这四位印度毛派，之后就开始了军事训练。他们学习如何使用自动步枪、机枪及手榴弹，以及如何设置地雷与制作爆炸物，而现场备有中文与印地文口译员；他们也学习「毛泽东思想」，并了解该如何运用在印度脉络中。之后他们被告知勿再联系加德满都的中国使馆，但另外建立一条穿越尼泊尔与不丹的路线，以供「未来合作」使用，其中包含武器供应。377中国保证会负担在这条建议路线上建立秘密营地的一切费用。

十二月中，桑亚尔与小队在中国停留三个月后，便搭乘中国军车返回加德满都，接着搭乘巴士回到印度。到了边界另一侧，他们就搭上往新贾尔派古利（New Jalpaiguri）的火车，前往靠近西孟加拉邦北部的西里古里。

一切看来像是印度人民革命的闪亮开始。整个一九六八年，类似拿撒尔巴利的小型冲突在印度不同地区爆发，特别是老革命重镇，安德拉邦的斯利卡路兰（Srikalulam）。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二日，就在列宁百年冥诞时，印共（马列派）成立。九天后，桑亚尔在加尔各答马坦公

园的五月节大众游行中宣布成立消息，由马遵达担任第一任总书记。印度此刻拥有本土的拥中共产党，与印共、印共（马克思派）截然不同，更为基进好战。[378]北京广播电台播放许多来自印度的革命文宣，以及马遵达所写的文章摘要。

一九六九至一九七○年的斗争高峰期，印共（马列派）吸引来自各方的支持者，从孟加拉知识分子、乡村工作者到加尔各答的无产阶级流氓。拿撒尔人「消灭」了数百名「阶级敌人」，即枪杀或以棍棒殴击致死。「红色恐怖」的受害者包含地主、高利贷、警察与贪污地方官员，或是任何反对印共（马列派）的人。当时藏身于加尔各答的马遵达，是这波「左倾盲动主义」路线的背后推动者，桑亚尔则持续以西孟加拉邦北部乡村地区追随者为主，并留在当地。

一九七○年四月九日，北京广播电台宣布：「此刻，农民武装斗争之火已经扩散至西孟加拉、比哈尔、北方、旁遮普、喜马偕、奥里萨、阿萨姆与特里普拉等邦，特别是安德拉邦。」[379]同年稍晚，印共（马列派）派遣资深党工苏林．波西（Sourin Bose）前往北京会见周恩来及康生，此时中国对印度革命者的热情已开始消退。据说康生告诉波西，中共无法理解「拿撒尔人」的「消灭」概念，并将之比为一九二七年中共败退后「左倾盲动主义者」在中国所用的方法。马遵达提出的口号「中国主席是我们的主席」，也受到周恩来批评。[380]

由一九六七年反抗行动发起村落得名的拿撒尔人，这名称广为印度毛派所知，因为过于基进，就连毛泽东的死忠支持者，疯狂的康生都觉得太过。周恩来告诉波西：「我们并未否认（毛）主席是国际人物……（然而）将一国领袖视为他国领袖违反民族情感；劳动阶级将难以接受。」[381]

波西经由伦敦飞回加尔各答，带回来自北京的沮丧消息。在一九七○年十二月八日加尔各答会议上，印共（马列派）领袖同意不向支持者透露中国对他们政策的批评，以及党内将不会得到中国在道德、物质或其他方面的任何支持。[382]

倘若桑亚尔能够控制运动，中国也许或许会持续提供援助，拿撒尔人相当可能因此发展成更强大的力量。但没多久后，派系斗争导致小团体分裂，中国明显知道拿撒尔人不会成为印度政治的可靠力量，便决定抛弃他们。

一九七二年七月十六日，马遵达遭到一位同志背叛，在加尔各答藏身处被捕，并在十二天后死于警方看守所中。印共（马列派）并未收到任何中国援助；相反地，中国持续支持印度东北地区的那迦与米佐反抗军。比起那群难以控制的印度毛派，这些人显然较为可靠。

就在中国决定寻找并支持在印度内部作战的代理人时，一九六二年战争后的印度，也改变对待西藏难民及西藏反抗军的态度。虽然一九六○年代印苏关系逐渐亲近融洽，但这并没有阻止印度国安部门与美国中情局合作，后者自一九五○年代起就提供西藏反抗军秘密协助。一九六二年战争后，原本在美国科罗拉多州赫尔营受训的西藏游击队转移到印度，根据西藏歷史学者茨仁夏加所说：「印度在靠近德拉敦的恰克拉塔（Chakrata）建立秘密藏军基地，藏人一般称为二十二区（Unit 22）。」[383]将近一万两千名藏人被送到德拉敦，其中多数人都接受军事训练。运动领袖则是位于达兰萨拉（Dharamsala）上方麦克罗甘己山丘的达赖喇嘛流亡政府。然而，这项运动与其说是对中国占领西藏的直接武力抗争，最终看来比较像是情报蒐集行动。

反抗行动真正的前线基地，并非在印度内部相对短命的恰克拉塔，而是位于西藏偏远角落、邻近边界的木斯塘（Mustang）。木斯塘由地方封建领主统治，有时被形容为尼泊尔内部的「半独立西藏王国」，其三面都被中国占领的西藏包围。由于陆路难以抵达，因此中情局容易隐藏秘密行动。尼泊尔皇家军队士兵镇守所有通往此处的山区道路及隘口。武器与其他补给品则由C—130运输机空投，这些飞机从冲绳出发，经过印度领空，在泰国塔克林空军基地（Takhli airbase）加油。一九六二年战争前，空投补给与运送游击队进出西藏的美国飞机，都是从东巴基斯坦的隐密机场出发，只能穿越尼泊尔与不丹间，由印度领土形成的狭长走廊。

从军事角度来看，木斯塘不是个好的反抗基地。由于位于边界对侧，寸草不生、荒凉的藏区几乎没村庄可提供反抗军食物及其他补给，也无法组织对抗中国的起义行动。接着一九七二年一月，尼泊尔新王毕兰德拉．比尔．比克拉姆．沙阿（Birendra Bir Bikram Shah）登基，并希望改善与中国的关系。隔年十二月毕兰德拉造访北京，中国对尼泊尔内部的西藏营地表达不满。由于面对强大南邻印度，为了维持相对独立的立场，毕兰德拉愿意倾听中国的声音。中国则回以相对慷慨的援助。

一九七四年五月，尼泊尔与中国政府在加德满都签订贸易协定；七月，尼泊尔军队开始针对木斯塘的西藏营地採取行动。未经太多抵抗，他们武装即遭到卸除；这些人听完达赖喇嘛的录音讯息后，士气几乎完全消灭，达赖也许是在美国人示意下，请求他们放下武器并离开。

在一九七一年七月国务卿季辛吉与一九七二年二月尼克森总统这两位美国重要人物歷史性造访中国后，美国对西藏反抗军的支持划下了句点。纵然华府与北京的意识型态迥异，但在对抗苏联上有共同利益，而国家安全政策显然比意识型态更重要，因此必须牺牲西藏反抗军。中国同意与美国关系正常化的诸多前提条件，其中一项就是停止所有对西藏

的援助。

直到一九七六年九月毛泽东去世，意识型态较不僵化的邓小平上台前，中国持续支持印度东北的民族反抗运动。邓小平在文革中被视为「走资派」，事实上也是正确的，他引入许多自由市场改革，中国经济因此开始快速成长。

在米佐拉姆，反抗军与印度政府于一九八六年六月签订和平协定，为这块联邦属地成为独立一邦铺路。那迦兰在一九六三年就已获得类似地位，然而该地与曼尼普尔持续动乱。一九七○年代末期，旧的那迦民族议会内部爆发对武装冲突合理性的严重歧见，导致那迦兰民族社会主义议会（National Socialist Council of Nagaland）于一九八○年一月成立。后者的主要理论领导者是穆瓦哈，他带着混合基督教福音派教义与毛主义革命的奇异思想，由北京返回那迦兰。不过由于穆瓦哈来自曼尼普尔而非那迦兰，因此正式主席是来自于那迦兰奇西里米村的塞马部落那迦人[384]伊萨克。

一九八○年一月三十一日发布的奇妙混杂「宣言」是由穆瓦哈起草，他先引述毛泽东强调革命组织应有「正确政策」，进而赞美「基督徒的上帝，宇宙永恒之神」。宣言中谈到：「对吾等而言，我国主权存续及我国人民的救赎是社会主义；而精神救赎则仰赖永恒且无与伦比的基督。」并借用毛的语言，反对多党体系的想法：「为达致社会主义，革命组织对人民的独裁统治绝对无可避免。」而革命组织当然是指那迦兰民族社会主义议会，并承诺将从「反动派叛徒、官僚、富人与印度毒瘤的阶级迫害中」[385]解放那迦人。这类言语可能并未感动中国，一九七六年后便停止了那迦反抗军的中国军事训练。然而两者的连结并未完全断裂。

印度东北唯一没有任何武装叛变行动，后来更成为单独一邦的区域，即是当时的东北边境特区。原因之一可能是这块极度崎岖山地的族群多样性，过去几个世纪来，数十个不同部落多半各自独立。另一个可能的解释是，西方传教士从未到达此地。传教士虽未鼓吹分离主义，但从书面文字、文学与超越泛灵的坚定信仰，进而创造出民族意识。那迦人与米佐人正是前例，他们发展出地方民族主义运动，最终转为武装反政府势力。

东北边境特区的兴起，与两位截然不同的人物有关：维里尔．艾尔温（Verrier Elwin）与纳里．罗斯通吉。艾尔温是一名英国传教士，娶了中印度部落女性为妻，在一九三五年改信印度教，并于印度独立后成为公民。罗斯通吉则是印度的帕西人[386]，担任印度公职多年，是对印度北方边防有强烈情感的细心官员。艾尔温是尼赫鲁的密友，尼曾为其一

九五七年的着作《东北边境特区哲学》（A Philosophy for NEFA）作序。[387]艾尔温在书中主张，即使部落民族居住区域在内部界线之外，治理重点应放在教育与经济发展，而非孤立。

艾尔温与罗斯通吉都造访过整个东北边境特区。中国掌控西藏后，他们认为刻不容缓的行动，就是在东北边境特区建立可见的官僚及法院、警局等权力机构。主要人口中心因而开始兴建地方政府办公室、学校、图书馆、诊所及医院，同时还有手工艺训练机构与营建业。阿萨姆新铺设通往联邦属地的道路，直到一九七二年前，东北边境特区都还是联邦属地。一九五五至一九五六年，东北边境特区总计有一百一十三所小学、十三所中学与三所高中。[388]有鉴于此地为敏感边境区域，为强化印度情报网络，一九五四年印度也从当地诸多族群中的十四个部落招募特务人员，而入选受训的主要条件是必须受过基础教育。[389]

在艾尔温与罗斯通吉的协助下，东北边境特区开始初具行政实体运作的雏形；然而阿鲁纳恰尔邦的基础，却是一九六二年战争所定下的。罗摩克里希那教团（Ramakrishna Mission）在推动印度意识上也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个志愿组织是由印度圣人罗摩克里希那的首席弟子辩喜上师（Swami Vivekananda）于一八九七年成立。教团遵循印度教古老的吠檀多（Vedanta）哲学，推动社会工作、教育、部落福祉与健康服务等，虽然是私人慈善组织，但在一九六○年代进入东北边境特区时，无疑受到印度政府（特别是国安部门）的鼓励甚至支持。罗摩克里希那教团在整个东北边境特区成立社区中心与学校，提供印地语及其他基本教育。教团的印度教信仰对中央政府来说，无疑比起进入布拉马普特拉河以北丘陵区域的基督信仰更受欢迎。内部界线的规定不单限制外国人，也限制其他印度人，必须有特殊许可才能进入此区。

印地语在丘陵区域的传布，并未受到东北所有人欢迎。罗摩克里希那教团活动的副产品，就是印地语取代了阿萨姆语：丘陵居民与来自布拉马普特拉河谷的官员、商人沟通使用的语言，或东北边境语（Nefamese），这种各部落民彼此沟通或与平原居民沟通使用的混杂阿萨姆语，逐渐成为部落间的共通语言。早在一九五七年，洛希特边境分区（Lohit Frontier Division）的部落领袖就曾向阿萨姆邦政府提出一份备忘录：「学生也许可以在校学习印地语……（但教学语言）必须为阿萨姆语。尊贵阁下应知，本分区七族部落，包含阿博、康堤（Khamti）、艾都（Edu）、米竹（Miju）、迪格鲁（Digaru）、米利（Miri）、辛波（Singpho）与藏人，阿萨姆语是彼此间交流思想的主要语言。」[390]不论一九五○年代末期新德里对他们的观点有多少同情之意，但一九六二年后，东北边境特区推广阿萨姆语的动力远远比不上印地语。

东北边境特区过去是阿萨姆邦的山岳区域，在一九七二年转为印度联邦属地的阿鲁纳恰尔邦，并于一九八七年宣布成为独立邦，也因此与数世纪来当地人习惯接触的平原人口渐行渐远。然而对印度的国安擘划者来说，东北边境特区的融合远比当地人观感更为重要。新的行政组织以梵文命名，意为「旭日之地」，新首都则定在喜马拉雅山脚下的伊塔那葛（Itanagar），接近十五世纪由平原区域印度教国王兴建的堡垒遗址。

传统动乱东北区域下的阿鲁纳恰尔与其他六邦，和印度其他部分透过一条由尼泊尔、不丹与孟加拉包围的战略敏感廊道连接，称为「西里古里走廊」（Siliguri Neck），或另一个广为人知的称呼「鸡脖子」。这段廊道最窄处仅有二十七公里。一九六二年战争后，稳定这条廊道与东北区域的需求变得更加热切。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四日，美国大使加尔布雷斯会见当时的不丹总理时，得知中国军队已在不丹王国周围聚集。根据前中情局干员布鲁斯．里德尔对一九六二年危机的分析：「不丹的弱小军队无法阻止中国攻击。若中国将战线扩大至不丹，甚至更小的邻国锡金，他们可以轻易南下，截断印度整个东北区域，包含东北边境特区及阿萨姆，并连结东巴基斯坦。」391

中国在一九六二年战争时并无此企图，然而中国直下西里古里走廊的可能性，始终在新德里国安擘划者的脑中挥之不去。同时也让他们更加深信，位于喜马拉雅山区的两个孤立小王国，不丹与锡金，对于印度的国防来说有着至高的战略重要性。

301 Brij Mohan Kaul, The Untold Story, (Bombay, Calcutta, New Delhi, Madras: Allied Publishers, 1967), p. 438.

302 See D.R. Mankekar, The Guilty Men of 1962 (Bombay: The Tulsi Shah Enterprises, 1968), p. 122.

303 Mankekar, The Guilty Men of 1962, p. 120. 4. Mankekar, The Guilty Men of 1962, p. 122.

304 Mankekar, The Guilty Men of 1962, p. 126.

305 Deng Xiaoping stated: ‘When the time comes, we certainly will settle accounts with them [the Indians].’ Quoted in ‘The Politico-Diplomatic Prelude Part-2’, P.J.S. Sandhu, Bhavna Tripathi, Ranjit Singh Kalha, Bharat Kumar, G.G. Dwivedi, Vinay Shankar (eds), 1962: A View from the Other Side of the Hill (New Delhi: Vij Books India, 2015) p. 24.

306 Paul M. McGarr, ‘“India’s Rasputin?” V.K. Krishna Menon and AngloAmerican Misperceptions of Indian Foreign Policy Making, 1947–1964’, Diplomacy and Statecraft, Vol. 22, Issue no. 2, 9 June 2011, p. 224, available at http://www.tandfonline.com/doi/abs/10.1080/09592296.2011.576536 (accessed on 15 May 2016).

307 译者注：拉斯普丁（Rasputin, 1869-1916），帝俄时代尼古拉二世时的神秘主义者，深受皇室宠爱而掌握巨大政治影响力，后遭贵族议员合谋暗杀。

308 译者注：维辛斯基（Vishinsky, 1883-1954），苏联政治家、法学家及外交家，曾担任苏联检察总长，莫斯科与纽伦堡审判公诉人。一九四九至一九五三年期间为苏联外交部长，代表

苏联签订德国投降文书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309 McGarr, '"India's Rasputin?" V.K. Krishna Menon and Anglo-American Misperceptions of Indian Foreign Policy Making, 1947–1964', p. 241.

310 McGarr, '"India's Rasputin?" V.K. Krishna Menon and Anglo-American Misperceptions of Indian Foreign Policy Making, 1947–1964', p. 254.

311 B.G. Verghese, '50 Years after 1962: A Political Memoir', South Asia Monitor, 23 September 2012, available at http://southasiamonitor.org/detail.php?type=yearsafter&nid=3844 (accessed on 12 August 2016).

312 Kaul, The Untold Story, p. 429.

313 Quoted in R.K. Bhatnagar. 'Was Krishna Menon a Sick Man…' Asian Tribune, 17 October 2009, https://archive.li/itP4 (accessed on 21 September 2016).

314 译者注：英国驻大英国协国家的最高驻外机构为高级专员公署（High Commission），馆长称为高级专员（High Commissioner）；印度在伦敦亦设有对应机构。

315 Mankekar, The Guilty Men of 1962, p. 117.

316 Kaul, The Untold Story, pp. 204–5.

317 Bhatnagar. 'Was Krishna Menon a Sick Man…'.

318 Mankekar, The Guilty Men of 1962, p. 104.

319 Kaul, The Untold Story, p. 451.

320 Welles Hangen, After Nehru, Who? (London: Hart-Davis, 1963), p. 242–72.

321 Jerome Alan Cohen and Shao-chuan Leng, 'The Sino-Indian Dispute over the Internment and Detention of Chinese in India', Jerome Alan Cohen (ed.), China's Practice of International Law: Some Case Studies (Harvar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p. 276.

322 Cohen and Leng, 'The Sino-Indian Dispute over the Internment and Detention of Chinese in India', p. 274.

323 Cohen and Leng, 'The Sino-Indian Dispute over the Internment and Detention of Chinese in India', p. 277.

324 Yin Marsh, Doing Time with Nehru: The Story of an Indian-Chinese Family (New Delhi: Zubaan Books, 2015).

325 Cohen and Leng, 'The Sino-Indian Dispute over the Internment and Detention of Chinese in India', p. 277.

326 Cohen and Leng, 'The Sino-Indian Dispute over the Internment and Detention of Chinese in India', pp. 279–80.

327 Rahul Karmakar, 'Chinese seek 1962 war memorial', The Hindustan Times, 25 October 2010, http://www.hindustantimes.com/india/chinese-seek62-war-memorial/story-ETOIvo6MY8sDcmqPMHpidI.html (accessed on 15 September 2016).

328 See, for instance, Ainslie T. Embree (ed.) Encyclopedia of Asian History: Prepared under the Auspices of the Asia Society, Vol. 3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and London: Collier Macmillan Publishers, 1988), p. 99: 'The Chinese invasion in 1962, which Nehru failed to anticipate, came as a great blow to him and probably hastened his death'.

329 Ramachandra Guha, India After Gandhi: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s Largest Democracy (New Delhi: Picador India, 2012), p. 345.

330 'Light Goes Out in India and Nehru Dies', BBC, 27 May 1964, available at http://news.bbc.co.uk/onthisday/hi/dates/stories/may/27/newsid_3690000/3690019.stm (accessed on 5 September 2016).

331 Gyanesh Kudaisya, 'Nehru: Death of a Democrat', History Today, Vol. 64, Issue No. 5, May 2014, available at http://www.historytoday.com/gyaneshkudaisya/nehru-death-democrat (accessed on 15 September 2016).

332 Kudaisya, 'Nehru: Death of a Democrat'.

333 SEATO was set up in 1954 (and dissolved in 1977), and comprised Great Britain, France, USA, Australia, New Zealand, Pakistan, the Philippines, and Thailand. CENTO, also called the Baghdad Pact, was formed in 1955 (and dissolved in 1979) with Britain, Iran, Iraq, Pakistan, and Turkey as its members.

334 Roderick MacFarquhar,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3: The Coming of the Cataclysm (New York 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nd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312.

335 MacFarquhar,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3, p. 276.

336 MacFarquhar,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3, p. 276.

337 Lorenz M. Lüthi, The Sino-Soviet Split: Cold War in the Communist World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219.

338 Lüthi, The Sino-Soviet Split, p. 219 and MacFarquhar,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3, p. 302–3.

339 MacFarquhar,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3, p. 303.

340 Quoted in a CIA report released in May 2007, 'Communist China's Domestic Crisis: The Road to 1964', OCI No. 1949/64, 31 July 1964, p. 130.

341 Quoted in 'Communist China's Domestic Crisis: The Road to 1964', p. 130.

342 'Communist China's Domestic Crisis: The Road to 1964', pp. 117–18.

343 Communist China's Domestic Crisis: The Road to 1964', p. 118.

344 'Communist China's Domestic Crisis: The Road to 1964', p. 118.

345 Li Xiaobing, A History of the Modern Chinese Army (Lexington: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2007), pp. 151–2.

346 Dennis J. Blasko, 'Always Faithful: The PLA from 1949 to 1989', David A. Graff and Robin Higham (eds), A Military History of China (Dehradun: Greenfield Publishers, 2012), p. 252.

347 Blasko, 'Always Faithful: The PLA from 1949 to 1989', p. 252. For the early years of China's nuclear programme, see also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The Chinese Communist Atomic Energy Program', 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 Number 13-2-60, 13 December 1960 (declassified in May 2004), pp. 5–6, available at https://www.cia.gov/library/readingroom/docs/DOC_0001095912.pdf and accessed on 19 June 2017).

348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A Chronology of Events (1949–1988)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89), p. 460.

349 Quoted in Peter Beinart, 'How America Shed the Taboo Against Preventive War', The Atlantic, 21 April 2017, available at https://www.theatlantic.com/international/archive/2017/04/north-korea-preventive-war/523833/ (accessed on 19 June 2017).

350 Ariel Tian, 'Mao's "Nuclear Mass Extinction Speech" Aired on Chinese TV', Epoch Times, 5 March 2013, available at http://www.theepochtimes.com/n3/4758-maos-nuclear-mass-extinction-speech-aired-on-chinese-tv/?utm_expid=21082672-12.InTAp1P_QWuf9wSnIRJAqg.0&utm_referrer=https%3A%2F%2Fwww.google.co.th (accessed on 20 September 2016).

351 Edgar Snow, 'Interview with Mao', The New Republic, 26 February 1965, available at

https://newrepublic.com/article/89494/interview-mao-tse-tung-communist-china (accessed on 20 September 2016).

352 See Allan Todd, History for the ID Diploma: Communism in Crisis 1976–1989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p. 148, and César Landín, 'Mao's Cult or Personality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o what extent did Mao Zedong's cult of personality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help him to regain authority over China?', available at http://share.nanjingschool.com/dphistory/files/2013/06/Extended-Essay_February_CesarLandin-2403vg5.pdf (accessed on 19 June 2017).

353 Quoted in John Byron and Robert Pack, The Claws of the Dragon: Keng Sheng, the Evil Genius Behind Mao and his Legacy of Terror in People's China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2), p. 328.

354 Byron and Pack, The Claws of the Dragon, p. 328.

355 Gao Wenqian, Zhou Enlai: The Last Perfect Revolutionary, translated by Peter Rand and Lawrence R. Sullivan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7), p. 180.

356 Eric S. Margolis, War at the Top of the World: The Struggle for Afghanistan, Kashmir, and Tibet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p. 131.

357 译者注：印度内阁秘书处研究分析室在行政上隶属内阁秘书长，因此不受国会监督。

358 Ravi Rikhye, The Militarization of Mother India (New Delhi: Prism India Paperbacks, 1990), p. 48.

359 Margolis, War at the Top of the World: The Struggle for Afghanistan, Kashmir, and Tibet, p. 131.

360 Emrys Chew, 'Globalization and Military-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in South Asia: A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Geoffrey Till, Emrys Chew, and Joshua Ho (eds), Globalization and Defence in the Asia-Pacific: Arms Across Asia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p. 58.

361 Quoted in Deepti (blogger), When the Buddha Smiled on India, 2 August 2010, available at http://d-extracts.blogspot.com/2010/08/when-buddha-smiledon-india.html (accessed on 19 June 2017) See also India's Nuclear Program, Smiling Buddha: 1974, available at http://nuclearweaponarchive.org/India/IndiaSmiling.html (accessed on 19 June 2017).

362 Deepti, When the Buddha Smiled on India. See also E.A.S. Sarma, Will the sparrow ever return? Undated self-published book, p. 90, available at http://eassarma.in/sites/default/files/Will_the_sparrow_ever_return_17-3-12.pdf (accessed on 19 June 2017).

363 For details about India's first nuclear test, see 'India's Nuclear Weapons Program - Smiling Buddha: 1974', available at http://nuclearweaponarchive.org/India/IndiaSmiling.html (accessed on 15 September 2016) and 'India's Nuclear Weapons Program-The Beginning: 1944–1960', available at http://nuclearweaponarchive.org/India/IndiaOrigin.html (accessed on 15 September 2016).

364 Interview with Thuingaleng Muivah at Kesan Chanlam (northwestern Myanmar), 21 November 1985, and interviews with Thinoselie Medom Keyho at Kohima, 18 October 1985 and 24 December 2009.

365 Bertil Lintner, Great Game East: The Struggle for Asia's Most Volatile Frontier (New Delhi: HarperCollins India, 2012), pp. 340. The figures and the names of places were the Mizos were trained were collected by the author through numerous interviews with Mizo, Naga, and Kachin rebel leaders in the 1980s, 1990s, and 2000s.

366 Vivek Chadha, Low Intensity Conflicts in India: An Analysis (New Delhi and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05), p. 344.

367 Interview with Soibam Temba Singh (one of the Manipuri rebels who went to Tibet in the 1970s) at Pa Jau, northern Myanmar, 22 April 1985.

368 'China Should Become the Arsenal for World Revolution', Tsai Wei-ping (ed.), Classified Chinese Communist Documents: A Selection (Taipei: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1978), p. 454.

369 Tsai (ed.), 'China Should Become the Arsenal for World Revolution', p. 454.

370 Tsai (ed.), 'China Should Become the Arsenal for World Revolution', p. 455.

371 See http://www.claudearpi.net/some-documents-on-the-1962-sino-indianconflict (accessed on 19 June 2017).

372 'Chou En-lai's Report on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December 1971', Tsai (ed.), Classified Chinese Communist Documents: A Selection (Taipei: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1978), pp. 477–8.

373 For the full text of the People's Daily editorial, see https://www.marxists.org/subject/china/documents/peoples-daily/1967/07/05.htm (accessed on 15 September 2016).

374 Sumanta Banerjee, In the Wake of Naxalbari (Kolkata: Subarnarekha, 1980), p. 118.

375 Bappaditya Paul, The First Naxal: An Authorised Biography of Kanu Sanyal (New Delhi: Sage Publications India, 2014), pp. 114–15. Paul's book is based on interviews with Sanyal and has an excellent account of the Naxalbari uprising and its aftermath.

376 Paul, The First Naxal, p. 124.

377 Paul, The First Naxal, p. 131.

378 编按：至此印度共有三个共产党组织，印共（一九二五年成立）、印共马克思派（一九六四年从印共分裂出去）、印共马列派（一九六九年成立，源自印共马克思派的亲中人士，作者在内文中有时会称他们为印度毛派）。

379 Deepak Gupta, 'The Naxalites and the Maoist Movement in India: Birth, Demise, and Reincarnation', Democracy and Security, Vol. 3, 2007, pp. 157–88.

380 Banerjee, In the Wake of Naxalbari, p. 264 and Suniti Kumar Ghosh, Naxalbari Before and After: Reminiscences and Appraisal (Kolkata: New Age Publishers, 2009), p. 271.

381 Ghosh, Naxalbari Before and After, p. 332.

382 Ghosh, Naxalbari Before and After, p. 272.

383 Tsering Shakya, The Dragon in the Land of Snows: A History of the Tibetan Struggle for Survival since 1947 (London: Pimlico, 1999), p. 359.

384 译者注：奇西里米村（Chishilimi）位于那迦兰邦中部的津内伯托县（Zunheboto），传统上是苏米／塞马那迦战士部落的根据地，该地那迦人直到基督教传来之前，长期有猎人头的习俗。

385 Manifesto of the National Socialist Council of Nagaland, Printed by the NSCN, 31 January 1980. The manifesto is also reproduced in Nandita Haksar and Luingam Luithui, Nagaland File: A Question of Human Rights (New Delhi: Lancer International, 1984), pp. 111–38.

386 译者注：八至十世纪间，一部分坚持信仰琐罗亚斯德教的波斯人，不愿改信伊斯兰教而移居印度西海岸古贾拉特邦至孟买一带。这些波斯移民在印度被称为「帕西人」（Parsi），至今有约十万人左右，仍信仰琐罗亚斯德教，主要从事工商业。所有侨居印度以外地区（主要是前英国殖民地的新加坡、马来西亚与香港）的帕西人都来自印度或巴基斯坦。

387 Verrier Elwin, A Philosophy For NEFA (Delhi: Isha Books, 2009).

388 Bérénice Guyot-Réchard, Shadow States: India, China and the Himalayas, 1910–196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p. 131.

389 H.K. Barpujari, Problems of the Hill Tribes North-East Frontier, 1873–1962, Vol. III: Inner Line to McMahon Line (Guwahati: Spectrum Publications, 1981), p. 287.

390 Parag Chaliha (ed.), 'Tribal leaders Memorandum to Governor of Assam: Re-introduction of Assamese Language in NEFA Demanded', The Outlook on NEFA (Delhi: Facsimile Publisher, 2015), p. 49.

391 Bruce Riedel, JFK's Forgotten Crisis: Tibet, the CIA, and the Sino-Indian War (New Delhi: HarperCollins India, 2016), p. 118.

# 第五章　着迷的，也是致命的边界

西方世界中，甚至是印度次大陆以外的亚洲世界，在一九六三年前很少注意到锡金这国家。这一年锡金大公世子，亦即王储巴登顿珠南嘉（Palden　Thondup　Namgyal）与二十三岁纽约大学生荷蒲．库克（Hope Cooke）的婚礼，从此改变一切。三月二十日，锡金首都甘托克举行婚礼。荷蒲在两位佛教喇嘛引领下，伴随「十英尺长喜马拉雅号角、低鸣海螺与低音鼓的嘹亮声响」，步入新郎所在的王室家庙大昭寺（Tsuklakhang）。392僧侣不参加婚礼，因为婚姻将导向生命与再生，这是佛教宇宙观避免之事。大厅中点满油灯，户外高大竹竿上挂满西藏祈祷旗。在场贵宾包含盛装出席的锡金贵族、美国大使加尔布雷斯，以及其他来自新德里的外交使节。

荷蒲在自传《时光变化》（Time　Change）中如此回忆这场婚礼：「在群众间满场飞奔的电视与杂志记者，为眼前的多彩与丰美折服。」此外还记载：

穿着红色上衣与短马靴的尼泊尔男性，演奏夸张卷曲的号角；穿着红外套与条纹及膝裙的锡金卫队……尼泊尔与锡金妇女则身着不同民族服饰四处穿梭，非常清楚自己对摄影师的影响。声光令人炫目，带着录音器材的电影拍摄团队，在锡金警察风笛乐队、印度军乐队及演奏鼓号角的村民之间奔波。印度军乐队是为此场合特别商借的。393

十二月二日，婚礼结束不到八个月，顿珠的父亲锡金统治者札西南嘉（Tashi　Namgyal）去世。顿珠成为新任大公，荷蒲则是他的夫人；但实际加冕仍需等待王家星象师决定吉祥的日期与时间。最后加冕典礼订在一九六五年四月四日上午九点二十二分，比婚礼吸引更多外界注意。安德鲁．杜夫（Andrew　Duff）在关于锡金的杰出着作中，引用当时在场的英国女士玛莎．汉米尔顿（Martha　Hamilton）所言：「报纸千方百计将锡金浪漫化，《华盛顿邮报》的社论写着：『美国人很清楚摩纳哥因葛丽丝而独特，现在锡金则因荷蒲而闪耀。』英国女王伊莉莎白二世与美国国务卿鲁斯克（Dean　Rusk）的贺词也在正式程序上骄傲呈现。」394

然而顿珠小心谨慎，因为他很清楚锡金对印度的依赖。在向时任印度资讯与广播部长的甘地夫人与其他宾客致词时，他说：「带着深刻敬意，我们怀念锡金真正可信的友人尼赫鲁，也相信印度政府将持续向我们伸出友谊之手。」接着又说：「我们是一个小国，但对自己的制度、生活方式与文化传统深感骄傲。」强调锡金自身独特的民族特质。395

顿珠与荷蒲在一九五九年相识于大吉岭温德米尔旅馆的酒吧。当时

荷蒲还是在学少女，而顿珠则鳏居将近三年，前来此地探望两名就读寄宿学校的儿子；他的年纪几乎是荷蒲的两倍大，但两人相互受到吸引。后来荷蒲返回纽约继续攻读莎拉劳伦斯学院，两人仍保持联系，两年后便决定订婚。一九六三年婚礼灿烂多彩的照片刊登在许多浮华杂志上（主要是在美国，当然其他国家也有），他们被称为「锡金的国王与王后」，看似童话成真。西方媒体热爱这则故事，特别是其中的浪漫场景：喜马拉雅山区风光明媚的小王国，人民奉行某种密宗藏传佛教，山中充满巨型蝴蝶与四百种野生兰花。396这俨然就是异国风情的极致，或者说是最糟糕的一面。

然而，锡金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地方？是一个独立王国，就如多数西方文献偏好的描述方式？或仅仅是尚未完全纳入印度联邦的最后大公国？在一九六○年代，以上两者皆不正确。锡金确实曾是独立王国，版图也远较今日来得更大一些。西藏牧民与从事轮耕的绒巴族（Lepchas）从十三世纪开始定居此地，但到了十七世纪才初具国家行政规模。据信首位统治者是彭措南嘉（Phuntsog Namgyal），在一六四二年登基为第一代锡金「法王」（chogyal），而他的先祖来自藏东康区。彭措会同喇嘛让当地绒巴族人改信佛教，他的政府设有十二位大臣，全部都来自与西藏相关的菩提亚族（Bhutia）；另外十二名绒巴族人则担任新成立的地方行政机构首长。彭措也是南嘉王朝的创立者，并持续统治锡金直到现代。

部分现代藏学家对这段官方歷史存疑，认为彭措与其继承者所统治的是一个结构更为松散的实体。十九世纪初，英国往喜马拉雅山区的扩张（亦即威胁到锡金主权），导致他们重新构思锡金歷史，「试图将锡金定义为一个国家」。397

读者可自行选择相信哪个版本的锡金歷史；不过当英国人抵达此区时，锡金确实是独立王国，并一度包含了今日西藏境内的春丕山谷（Chumbi Valley），向西延伸至尼泊尔的阿伦河（Arun River），向南到西孟加拉邦北部；然而锡金在此的影响力，随着法王与尼泊尔、不丹的战争结果而起起伏伏。大片土地落入尼泊尔廓尔喀国王手中，然而在一八一六与一八一七年签订的两则条约下，部分土地又返回锡金手里：首先是英属东印度公司与尼泊尔的条约，其次是英属东印度公司与锡金法王的条约。

英国人为锡金带来根本性变化。一八二八年，一群英属东印度公司职员解决尼泊尔与锡金的冲突之后，在锡金南方高地发现一处适合做为英国军官与伤员的疗养地。七年后，亦即一八三五年，英属东印度公司从锡金统治者手中取得一片土地，开始兴建避暑地，并照当地的时轮金刚寺（藏语Dorjeling，意为金刚之地）命名为大吉岭（Darjeeling）。

经歷与法王的冲突后，英国人取得更多土地，同时更重要的是，这片土地位于英国与邻近的不丹之间。一八六○年代初期，今日属于西孟加拉邦大吉岭市的区域，全都落入了英国人手里，其中包含重要的贸易城镇噶伦堡。

一八六一年，锡东南嘉法王与代表英国的阿什利．伊登爵士（Ashley Eden）在廷姆隆（Tumlong）签订了另一则条约，使锡金成为英国事实上的保护国。后续的政教冲突、西藏军队入侵，以及中国宣称对锡金的宗主权，迫使英国于一八八九年正式将整个王国纳为保护国。398大吉岭地区兴建道路甚至铁路，连接到英属印度帝国的首都加尔各答，而茶叶被引进高地及下方平原种植。

英国工程师兼摄影家，后来更成为作家的约翰．克劳德．怀特（John Claude White），成为首任英国驻锡金政务官，也是首位进驻甘托克的政务官。他在此建筑豪宅，重新整顿行政机构，并主持法王的政务参议会。这幢建筑于一九四七年后转成印度之家（India House），今日则做为锡金邦首长官邸。

在英国的统治之下，锡金地位与其他大公国类似，其统治者被称为「大公」而非「法王」。正式印度官职名册中，锡金连同其他十七个大公国，包含杰沙默（Jaisalmer）、阿尔瓦（Alwar）、吉申格尔（Kishangarh）、兰普尔（Rampur）及不丹，都是十五响礼砲规格的大公国，同时也是英属印度帝国的属国。然而锡金是边界国家，因此英国待之较其他公国略为不同。

一八八九年后立即面临的问题是，就英国对这区域的设想计画来说，锡金人口太少（当时仅有约三万居民），道路建筑与货物运送的人力都不足。399不过这问题有个简单的解方，即从尼泊尔进口劳力。可能算最娴熟北方边界区域的印度官员罗斯通吉指出：「若说英国蓄意而积极操纵尼泊尔移民进入锡金，也许言过其实了；但无庸置疑，在早期，特别是在首任驻锡金政务官克劳德．怀特的治理下，他们鼓励并纵容移民。」400

劳力需求极大，然而锡金人很少愿意被徵召，担任甘托克或其他发展中城镇的道路或房屋建筑工人。而罗斯通吉也注意到，尼泊尔人涌入锡金同时有另外一个原因：

是对抗西藏势力的明确保证。尼泊尔人多数是印度教徒，语言也以梵语为基础。他们的文化与生活方式，比起西藏更接近印度……英国人认为，大批基本以印度教徒为主的人口定居锡金，将能避免锡金往北向西藏寻求指引与支持的风险。401

克劳德．怀特之后的政务官，在鼓励尼泊尔移民上则较为审慎，然

而已经启动的过程无法停止。更多的尼泊尔人抵达锡金，虽然在二十世纪初人数已超越藏人与绒巴人，但涌入的人潮并未停止，许多尼泊尔人也做起各种生意。一九○四年荣赫鹏远征拉萨开启了西藏贸易，他的军队由则里拉山口穿越边界，后来成为西藏与英属印度之间贸易交流的主要关口。锡金与较为孤立的东邻不丹相比，其繁荣程度截然不同（英国驻锡金政务官同时也负责不丹与西藏事务，虽然西藏是大得多的独立国家）。

接着迎来的是印度独立。一九五○年十二月五日，「印度总统与锡金大公阁下」签署协定，「锡金将持续做为印度的保护国，在此条约规范之下享有内政自主。」[402]独立印度政府将负责防卫锡金并处理其外交关系，「锡金政府不得处理交涉任何外国势力……（以及）未取得印度政府事先同意，锡金政府不得进口任何武器、弹药、军备或为任何目的、任何描述之战争材料。」[403]

大公一衔获得保留。然而顿珠即位之时，印度同意他的提议，将头衔改回旧称「法王」，他的妻子荷蒲．库克则称为王后（gyalmo），正式尊称为「锡金王后荷蒲拉殿下」，这是动乱的开始。荷蒲的存在带给锡金更高的国际能见度，她带着锡金手工艺品到纽约展售，邀请卡名义为「锡金国王王后殿下」。[404]在频繁造访美国的行程中，她接受美国记者专访，畅谈自己的喜马拉雅童话王国。肯塔基大学甚至出版详细的「锡金王国」地图。

一九六三年后锡金获得的国际注意力，以及甘托克王宫传出的新讯号，对于国际政治情势也有影响。锡金王家卫队再启，行政体系重组为更正式的架构，传统佛教法治也整合进部分新设的司法体系。新编国歌在典礼中传唱，国旗在政府建筑屋顶上飘扬。[405]各方要求锡金发行自己的邮票与护照，以便海外交易使用，并接受印度以外国家的直接援助。而在政党之中，拥王派的国家党（National Party）甚至要求重新审阅与印度签署的一九五○年条约。「我们永远都是锡金人，」国家党领袖聂吐茨仁（Netuk Tsering）说：「我们不会与印度、西藏、不丹甚至尼泊尔合併。」[406]

印度开始对荷蒲的企图逐渐提高疑虑。一九六六年，即位后仅一年，荷蒲为当地学术期刊《藏学通报》（Bulletin of Tibetology）所写的一篇文章，让这股紧张气氛转为愤怒。她认为一八三五年的条约「提供大吉岭给英国人做为疗养地，但并非直接赐予英国人所有」。荷蒲写道，英国人「自行视为赐予，并开始管理此区……视为印度领地的一部分」。此说法暗示了大吉岭属于锡金，而非西孟加拉邦。她指出，对所有属于法王等人的土地「只有『使用权』，而非真正所有权」。[407]

荷蒲可能没准备好面对文章将激起的反应。根据她本人说法，文章「捅了马蜂窝。『莎拉劳伦斯女孩宣称大吉岭属于锡金』、『甘托克的美国特洛伊母马』、『伪装的中情局干员』、『美国太太筹划导弹基地』。印度的反应极尽诽谤，而我很后悔，完全吓坏了」。408她同时注意到，「之后，当印度报纸写到锡金希望修改条约时，我的文章就被抛出来做进一步的抹黑。新闻报纸的攻击似乎早已算计好，在锡金官员造访德里协商时刊登。」409

荷蒲是无知或只是天真，这点很难判断，不过她的文章与其他古怪举动，确实捅穿了马蜂窝，让印度完全无法考虑修改一九五○年条约。此事发生在中国威胁愈显强烈的时刻，在这种情况下发表关于大吉岭的文章，并鼓励那些视为向印度要求更多独立的尝试，实在很难找到更不恰当的时机。

然而，印度之家与新德里官员对这些举动感到不满，其实并不全是荷蒲的错。印度记者苏南达．达塔——雷（Sunanda K. Datta-Ray）虽是法王之友，在其着作《粉碎与抢夺：锡金的兼併》（Smash and Grab: The Annexation of Sikkim）一书中谈到：「在暗示国际主权地位一事上，法王或许应有责任；但荷蒲是个外人，就得背负指责。」410况且为这鲜为人知的世界角落带来国际注意力的，正是荷蒲。

虽然担忧中国在一九六二年战争中，可能会在喜马拉雅山区打开另一道前线，但实际上锡金边界并无战事。然而根据现在已解密的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十六日中情局报告，当战争在东北边境特区与拉达克如火如荼时，「印度军方逐渐对在锡金对侧春丕山谷里集结的中国军队感到忧心。」411印度派出军队，强化已驻扎于锡金的小型印度武力，此为一九五○年条约的授权之举。

一九五四至一九五九年间，担任锡金迪望（dewan，相当于首相）的罗斯通吉，在其着作《着迷的边境》中提出，位于锡金与不丹之间的狭长西藏领土：春丕山谷，在歷史上是属于锡金的一部分。「此地住民的语言、服装与社会习惯，与今日锡金边界中的人民有高度相关性。」412同时，由于气候较温和，这里长期都是锡金统治者的夏宫之地。然而，罗斯通吉写道，中国在一九五九年入侵西藏后，也「凭藉武力占领春丕山谷，以免锡金人怀有夺回旧地的梦想。中国也『透过委任当地领导人』及中国年轻一代『文化融合』的乐观情怀，加速『去藏化』的过程」。413

罗斯通吉一九五○年代在锡金所见的「着迷边境」，在他离去后不久后即转变成紧张而危险的边境。第一场与人民解放军的冲突，甚至发生在一九六二年战争之前。一九六○年九月二十日，一名人民解放军巡

逻兵闯进靠近则里拉山口的锡金领土。当印度试图将锡藏边界视为边界议题整体讨论时，中国则认为此议题「不在讨论的范畴中」。[414]

一九六二年战争后，由于中国在春丕山谷聚集更多军队，紧张情势升高。一九六三年一月，中国指控印度在「乃堆拉山口（Nathu La Pass）的东南、东北与北侧」兴建地堡、交通壕及岗哨，要求印度应拆除所有建在「中国领土」上的建设。印度则否认指控。[415]

事实上是，一九五八年甘托克往乃堆拉山口新建了一条道路，而乃堆拉山口位于则里拉山口以北。当时锡金与西藏的跨国贸易仍持续往来。然而一九五四年签订的《关于中国西藏地方与印度的通商和交通协定》在一九六二年六月六日到期。当时边界紧张持续升高，双方自然都没有延长协定的意愿。所有跨边交通都停止，边界也关闭。从此印度军队便驻扎山口防卫边界，同时也监视对侧春丕山谷中国军队的动向。

中国的挑衅持续到一九六四年。八月，一名中国巡逻兵闯入乃堆拉山口，十二月又有三次中国士兵在山口的锡金侧被发现。从八月的第一此闯入事件后，中国发布声明「否认苏联与印度同谋制造的中国『入侵』锡金谣言」。[416]这成为此后所有边界事件的中国标准说法，而一九六○年代期间，此类事件频传。

也许是为了激怒新德里，当一九六三年札西南嘉去世时，中国发送了致哀讯息，并在一九六五年四月顿珠即位时发送恭贺讯息；但都是直接送到甘托克，而非透过印度政府转送。当时锡金的外交事务是由印度负责处理。此举被视为承认锡金的独立地位，并展现中国对锡金做为印度保护国的不满。[417]

顿珠即位后几个月，印巴战争爆发；冲突是从年初在古贾拉特邦的卡吉盐漠（Rann of Kutch）的驳火开始，到六月在英国斡旋下停火而终结。也许巴基斯坦自视占据上风并受到鼓舞，八月初大约有三万名巴国士兵身着平民装束，跨越了喀什米尔的控制线，与印度防卫武力的战斗随即爆发，然而在多数区域都被驱回巴国。巴基斯坦对此的反应，是在一九六五年九月一日跨越喀什米尔的控制线发动大规模攻击，轰炸印度机场，行动代号「大满贯」（Grand Slam）。然而想这样让印度军队屈服的期望很快就破灭。九月六日，印度军队跨越旁遮普的边境，来到拉合尔的攻击距离之内。

这场战争见证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型的坦克战之一。印度军队已从一九六二年败给中国的打击里恢复，此刻拥有更多军力与武器。虽然巴国军队确实占领印度境内的一些据点，但大满贯行动并不如预期。为了驰援巴基斯坦，中国必须威胁要在锡金开启另一条战线。若中国能经由锡金、大吉岭与西里古里，占据介于西藏及东巴基斯坦之间的

廊道，整个印度东北边境特区将与国家的其他部分失去联结。

中国开始向北京的印度大使馆递交抗议信，接着是九月十六日的最后通牒。其中宣称印度军队跨越锡金与西藏边界，并建立了防卫设施。这并非新指控，然而这时间点却非偶然，若印度不在三天内回应请求，中国将採取行动。信中并未说明三天后将会发生何事，却是印度无法忽视的挑衅。中国明白表示将「强化边防，提高警戒意识」，同时「印度政府持续犯行」将会招致一连串后果。418

目标很明确，中国公开将锡金边界行动连结到印巴持续的战争上。中国外交部长陈毅在九月四日访问喀拉蚩时，宣布中国支持「喀什米尔人民的正义斗争」，对抗「印度残暴统治」。419部长暗示中国站在巴基斯坦这边，因巴国仅是对印度的侵略进行自我防卫。

此时联合国插手干涉，秘书长吴丹（U Thant）与巴国总统阿尤布汗及印度总理夏斯特里举行会议，中国被迫展延三天的最终通牒。由于巴国军队大败，阿尤布汗无法让战争持续下去，于是中国在九月十八日发出新消息，宣布「愿意」将期限延长到九月二十二日午夜。讯息里透露中国政府「对喀什米尔人民追求自决权的斗争……以及巴基斯坦对抗印度侵略的正义斗争，表达全力支持」。420

九月二十日，一支解放军队伍移入东崔拉山口（Dongchui La pass），并向该地印度士兵开枪。次日，另一支解放军队伍开始向乃堆拉山口的印度据点开火。然而中国向印度发动新一波战争的时机已过，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要求印度与巴基斯坦停火，并将所有士兵撤回八月五日前所拥有的据点；此决议为印、巴两国所接受，因此中国亦无计可施。北京发布一篇迟来的奇怪声明，宣称印度在中国政府指定的时间前已将入侵军队撤回，并「拆除了侵略的军事建设」。然而该声明接着宣称，「试图重返的印度军队持续跨越边界，甚至向中国边境守卫发动武装攻击。显然，印度利用锡金领土进行无止境入侵、挑衅中国的行为，制造了中国与锡金边界的紧张。」此声明继续提醒众人「事实」，亦即「众所周知，印度在一九六二年十月向中国发动大规模攻击」。421

一九六六年一月十日，印度总理夏斯特里签署苏联斡旋的和平条约时，本来或许能使巴基斯坦给出更多让步，当然此事颇有争议。但英迪拉．甘地担任印度新总理后，则开始明确标志出新的、更有魄力的印度，她将不再忍受中国挑衅。

中国虽未发动攻击，但一九六六年七月位于乃堆拉山口对侧的中国军队，架设了六具强力扩音器，向对面印度驻军不断放送宣传。八月也在则里拉山口架起扩音器，并将超大幅的毛泽东肖像矗立在两个边界山口上，面向印度。这些伎俩对印度的士气究竟能有什么影响，着实令人

怀疑；但骚扰价值应该更高一些，可能有干扰到部分士兵的睡眠。

中国的小规模入侵持续发生。九月十一日，公开冲突爆发，印度士兵透过扩音器宣布，他们并无意入侵西藏，即便只是一公釐。印度军队在宣告之后，开始沿着乃堆拉山口南侧边界架设铁丝网。接着中国军队以自动步枪及轻机枪开火，杀伤了数名印度士兵。印度一侧也回击，中国再以七十六公釐与一百二十二公釐砲加倍回击。印度亦回以砲击，杀伤至少三十六名解放军。

中国外交部发给印度驻北京大使馆的信件指出：「切勿误判形势，重蹈一九六二年覆辙......中国人民解放军将会对任何入侵的敌人予以痛击。」[422]然而印度并未跨越边境进入西藏，也未离开其边界据点。中国在乃堆拉山口驳火之后可能理解到，此时情况已经与一九六二年不同。

在一九六○年代末期至一九七○年代初期，锡金情势对印度来说逐渐严峻：中国从北方压境；在喜马拉雅分水岭以南的锡金统治者，做出更多寻求自主的动作，造成第二重威胁；在大吉岭丘陵下方具重要战略地位的西里古里走廊，则有拿撒尔人活动。锡金菁英阶级中的阴谋，让此敏感区域的情势更加不稳。虽然荷蒲绝不是某些印度小报所说的中情局干员，但她与锡金社会格格不入，并且开始有所感受。根据达塔——雷所述：「荷蒲成为喜马拉雅山区王后的梦想，将法王与王室传统支持者切割开来，使法王孤立于锡金社会之外。」[423]

荷蒲必须与另外两名深具影响力的女性竞争地位。一位是顿珠的长姊库库拉公主，另一位是伦珠．多吉（Lhendup Dorji）的苏格兰妻子伊丽莎——玛利亚．兰佛——瑞（Elisa-Maria Langford-Rae）；伦珠．多吉来自古老的绒巴家族，是当地地主兼政治家。纳里．罗斯通吉观察到，「库库拉公主认为荷蒲是她掌握法王的竞争对手；而荷蒲很快就明确展现出，身为王后的她才是第一夫人。」[424]荷蒲与有力美国参议员的联系，促使库库拉要向其弟证明，「她也是国家的忠诚守护者。但其向媒体界的发言，只是让法王与印度官方已然不佳的关系更加恶化。」[425]

当印度记者开始猜疑荷蒲或许与中情局有挂勾时，他们忘了库库拉在二战时就结交了加尔各答的美国干员。当时二十岁出头的她所认识的干员，此时可能早已退役。她在美国的主要成就，或许是安排两位锡金妇女代表国家，出席一九六七年于纽约举行的世界联合妇女会议（Associated Country Women of the World），不过这对多数美国人来说并不算什么大事。

但印度怀疑美国对锡金可能有所图谋，则不能仅视为小报八卦消息。一九六四年中国首次核弹试爆后，一次最奇特的印美联合情报行动在喜马拉雅山区展开。根据计画，要在北印度标高七千八百一十六公尺

的南达德维峰（Nanda Devi）上，设立一组由核能电子发动机驱动的陆地通讯设备，蒐集西藏或新疆任何不寻常的地震活动。这具发动机名为19—C型核能辅助动力系统（System for Nuclear Auxiliary Power）包含五个部分，一个热能源区块、辐射能源胶囊置于核心、热电发动机从上包围、隔热材料，以及外壳。426

这并不是炸弹，而且若不装上引信就不会爆炸。但这具设备是以辐射物质提供动力，可能会对接近的人类造成伤害，因此不该遗失在偏远山巅的某处；结果居然还是发生了。首次攀登南达德维峰时，由于天候恶劣，大多数的设备都被抛弃。在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发动机依然消失在山脉范围中。

印度与美国合作情报行动，以及对支持西藏反抗军的兴趣，在此事件后快速消失。美国可以对中国採取强硬立场，但印度却对挑衅北方近邻的后果感到忧虑。中国涉入那迦兰的战争与对拿撒尔人起义的兴趣，都是印度无法忽视的警讯。纵然达赖喇嘛与流亡政府获准留在麦克罗甘己，但印度在一九六○年代末期削减对西藏武装反抗的支持，因此尼泊尔的木斯塘才会取代北印度的恰克拉塔，成为美国支持的西藏游击队重镇。

随着印度对中国採取更务实的态度，同时跟苏联建立起亲近关系，锡金并非不可能成为美国在喜马拉雅山区新的任务基地（特别是锡金若能争取到更多自主权）。我们很难定论这些忧虑是否有所本，然而这确实影响了印度面对锡金争取自主的态度。当然荷蒲也是个问题，这名自诩为「王后殿下」的天真美国女性，显然是反对印度。

然而荷蒲的宝座并不稳固，甘托克王宫中持续不断的阴谋斗争，进一步弱化了她的权力与影响力。比起大姑库库拉公主，荷蒲更强大的敌手是兰佛——瑞。兰佛——瑞的先生握有贵族头衔卡齐（kazi），因此她享有查功卡齐尼（Kazini of Chakung）的头衔。查功位于锡金西部，是兰佛——瑞夫家的故乡。卡齐是一群对锡金「古老选举体系」不满的团体，因此在卡齐尼从旁支持下（更多是在背后使力），倡议更为民主的政治秩序。427

一九五三年，顿珠之父札西引进温和的君主立宪制，设立了国务院与行政院。然而此体系是透过政党比例分配，国务院的席次在菩提亚——绒巴人与尼泊尔人社群间平均分配。这表示在宪法上，大约占全国人数百分之七十五的尼泊尔人与百分之二十五的菩提亚——绒巴人权力相当。一九五八年，这个复杂的投票体系被更复杂的方式取代；一九六七年，国务院席次由十八席增加至二十四席，然而新增的六席均由法王提名。428

这套不民主的体系招致许多反对，反对运动更获得印度支持，箝制了法王、美裔王后及民族主义贵族支持者的力量。一九七三年一月的选举争议中，支持王室的国家党赢得十八席中的九席，印度更进一步涉入锡金事务。两个敌对政党之一，卡齐的国大党（Congress Party）宣称有选举舞弊，要求逮捕负责选举的官员。当要求未果时，甘托克发起了反对法王的示威抗议，部分过程相当暴力。之后临时解决方式的共识在五月达成，法王、印度外交部长克瓦尔．辛格（Kewal Singh）与政党代表同意新的民主制度。在协议中，统领行政事务的行政首长将是印度人。429

王室权力快速崩解，而顿珠与荷蒲的婚姻也是如此，双方都有不忠情事。八月十五日，荷蒲带着儿女飞往纽约，而当时甘托克正在欢庆印度独立纪念日，一切已成定局。一九七四年第一次真正民主的选举中，卡齐的国大党夺取新议会三十二席中的二十九席，大败国家党，议会在五月开议时通过的首批决议之一，即是削减法王权力。六月，部分锡金王室卫队成员试图阻止当选议员进入议场，但并未成功。九月四日，印度国会的下议院投票通过，将锡金变更为其「附邦」（associate state）。

北京视此为印度接管锡金之举，中国外交部长乔冠华在一九七四年十月二日于联合国大会的演讲中，大肆挞伐印度，同时也抓住这机会谴责苏联：「印度政府兼併锡金，已激起锡金及印度人民的反抗，并受到印度邻国与世界的舆论谴责。仅有苏联的宣传机器赞美印度，这正显示了苏修派社会帝国主义是印度扩张主义背后的指使者。」430

卡齐上任锡金首位民选行政首长后，卡齐尼从旁协助，一切事件快速推进。一九七五年四月十日，锡金议会决议废止法王，顿珠被实质软禁在宫殿中。四天后举行了一场公投，最终绝大多数人投票贊成锡金与印度合併。四月二十三日，印度下议院投票通过让锡金成为印度联邦的第二十二邦，于五月十六日生效。

可想而知，中国政府谴责这项行动，在四月二十九日发出声明：「再次严肃声明，中国绝不承认印度兼併锡金，并全力支持锡金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对抗印度扩张主义及捍卫国家主权的正义斗争。」431

然而所谓「锡金人民」的「斗争」并不多。锡金与印度相对平稳的合併过程，约莫与印度对外情治机构——研究分析室的崛起同一时间。随着反对法王的声浪高涨，研究分析室派出干员前往当时锡金四县首府：甘托克、曼甘（Mangan）、南其（Namchi）与加尔辛（Gyalshing），除了蒐集情资外，也开始从幕后支持反对势力。432根据研究员阿苏卡．拉伊那（Asoka Raina）所述，研究分析室的干员与

当地反王室、支持民主代议政府的人民建立了紧密关系。[433]研究分析室不需花太多力气，就能强化法王必须下台的想法，而且锡金的民族组成也对旧王室高度不利。根据一九七一年人口普查，尼泊尔人占了绝大多数的十三万四千人，绒巴族仅约两万五千人，而菩提亚人与相关的林布族（Tsongs）则约有两万三千人。[434]

尽管不费军事干预就达成目的，与锡金合併仅被视为印度国防提升的第二大重要成就。第一大成就则是一九七一年相对血腥的孟加拉独立建国。印度支持孟加拉解放军（Mukti　Bahini）发起的自由抗争，从东巴基斯坦脱离独立建国。研究分析室视此为巩固国家东方边界的宝贵机会，其中包含重要的战略地点：西里古里走廊及通往西藏边界的锡金走廊。

印度介入战争后，根据伦敦《泰晤士报》在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十二日报导：「印度军队仅花了十二天就长驱直入达卡。这项成就令人想起一九四○年德国闪电进攻法国。战略是一样的：速度、强度与弹性。」[435]十二月十六日，巴基斯坦军队投降，并在国际压力下，被迫于一九七二年一月八日释放自由抗争领袖谢赫．穆吉布．拉赫曼（Sheikh Mujibur　Rahman）。他在一九七一年三月遭捕，之后被送往西巴基斯坦单独监禁。此刻，拉赫曼由英国皇家空军送回达卡，面对百万人民的等候迎接。东巴基斯坦终于成为独立国家孟加拉。

德里的情治单位也透过孟加拉行动，锁定逮捕了以达卡为基地的印度东北地区反抗军领袖。其中包含曾与穆瓦哈共同领导第一支那迦小队前往中国的提诺色里，以及那迦民族议会高层领导之一的涅德里（Niedelie）。米佐反抗军领袖拉尔登加当时也以达卡为基地，却成功带着一些人穿越边界逃进缅甸；后来透过设在缅甸若开邦首府实兑（Sittwe）的巴基斯坦领事馆，前往喀拉蚩。

失去了前东巴基斯坦基地，使米佐反抗军接受一九六八及一九七○年拉尔登加造访北京时，中国所提的支持条件。一九七三年初抵达中国的第一批米佐反抗军，是在一九七二年中离开米佐山地，循先前那迦人的途径，徒步跋涉穿过缅甸克钦邦，最后抵达云南。等之后孟加拉与印度反目，米佐人与其他东北区域反抗军，才重新在孟加拉的吉大港山地群中建立训练营与藏身地。然而此时印度的研究分析室已在所有周边国家广布干员与线人（不论亲印或反印的执政党），其中当然包括孟加拉。

研究分析室在一九六八年成立时，第一批干员是来自印度情报局的外事科及警察系统特别单位。首任室长拉梅许瓦．纳特．卡欧曾任殖民地帝国警察（一九四七年独立后改称印度警政署）。随着研究分析室成

长，更多人员由警政、军队及公务部门招募而来，更有许多印度大学毕业生。基本上，研究分析室兼具传统建制与现代发展。

相比之下，中国的情治单位是在一九四九年中共胜利前风云动乱的数十年中，随着毛泽东的革命奋斗而形成。一九二一年七月最后一周，毛泽东与十一名同志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现为兴业路）一栋不起眼的灰砖建筑中，发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当年的上海分成三区，各自有其行政与执法机构。法租界警戒较为松散，因此是一群异议分子在城里集会的最安全地点。英、美主导的公共租界，是由印度引进的锡克教警察严密控制并巡逻街道。上海的中国人区则是在国民党手中，虽然当时并非共产党的敌人，仍是无法真正信任的敌对势力。

直到一九二七年前，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实际组成「革命统一阵线」，然而两者关系早在一九二五年孙逸仙去世后就开始变质。接续成为国民党最高领袖的蒋介石是坚定反共者，他与上海青帮暱称为「大耳杜」的杜月笙、人称「黄麻皮」的黄金荣及其他黑帮分子过从甚密。黄麻皮同时也是上海法租界巡捕房的督察长，因此得以不受法律约束从事犯罪行为。相反地，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都市无产阶级中吸引了许多追随者。上海当时是中国最工业化的都市，根据马克思理论，应当成为共产党的主要权力基础。

共产党的影响力愈来愈大，开始威胁到国民党对上海政权的微妙掌控。大耳杜为了帮助老伙伴蒋介石，动员自己与黄麻皮的数百名手下，其中包含打家劫舍、偷拐抢骗、保镳杀手、皮条客、乞丐小贩等三教九流，他们穿着蓝衫，臂上缠着中文「工」字布条，所持的枪枝则是由蒋的司令官提供。

攻击行动在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天亮前一小时发动，这群暴徒攻击当时共党工人民兵总部所在的建筑。建筑周围的藩篱遭到一阵机枪扫射破坏。其他共党办公室与建筑也遭到攻击。当天结束时，共有七百名工会人士遭杀害，出动了八辆卡车，花费数小时才清运所有死者与遗留物品。国共合作随之结束。436

一九二七年在上海的血腥镇压令共产党伤亡惨重，也迫使中共将主要行动区域从城市移往更多中国人民居住的农村地区，因此这将是一场农民革命，而非由都市无产阶级所领导的斗争。事实上后者的人数也并不足以夺取中国政权。

南昌起义中，有部分国民党军队叛变，加上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中国工农革命军（人民解放军前身）的成立，让中共获得重生。虽然其主要根据地在农村地区，仍必须仰赖城市地区蒐集的情报，但一九二七年的镇压及共产党的挣扎求生，都强化了中共的情报蒐集能力。

根据中国研究学者大卫．钱伯斯（David Chambers）所述，艰困的一九二○至一九三○年代初期，情报蒐集能力在维护中共免于灭绝上，确实扮演了重要角色。可靠的情报确保共产党人成功从江西突围，展开一九三四年的长征；同时还渗透国民党军政组织，以致最终成功夺取政权。437当然，党内异议声音也受监视，并在党中形成恐惧气氛。

在一九四九年共党取得政权前，中共拥有两个情报机构：中共中央社会部与情报部。一九三九至一九四六年间，这复杂的情治安全体系由恶名昭彰的康生统领；然而他在一九四○年代初期发动的「整风运动」，被毛泽东与其他党内高层发现对党内造成的伤害后，随即遭到解除职务。康生发动的整风运动在一九四三年特别恶毒，关押了上千位被指为「特务」、「间谍」者，其中不乏建党时的着名知识分子。结果约有四万至八万名党员遭驱逐出党，许多人神智不清，有些人上吊或投河、投井自杀。438

虽然不再担任情报头子，康生在共党取得政权后，仍是毛泽东信任的核心集团成员兼主席亲信。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中国新统治者成立了公安部，这个新的单位理应接掌社会部的国内侦防与安全职责，令后者即被废止。然而事实上，直到一九五三或一九五四年之前，社会部仍持续在中国内部运作。

由于整个体系变得过于庞大而难以施展，因此一九五五年又成立了中共中央调查部，做为主要的文职情报机构，而解放军总参谋部二部则负责军事情报任务。两者之上的统筹单位是鲜为人知的中共中央情报委员会。439

在这些全面性变革之前，又是另一波中共党内的清算斗争。曾因情报侦察长才，被毛泽东誉为「延安福尔摩斯」的陈泊，被指控为英国间谍与国民党特务，在一九五○年被撤销广东省公安厅长一职，并监禁超过二十年。杨帆曾负责蒐集情资，协助一九四九年五月相对和平接管上海，后续更负责上海市的反情报工作，却于一九五一年遭撤销职务，并被指为国民党特务，他在一九五五年入狱，直到一九七八年才被释放。前任中共情报副手的潘汉年，在一九三○年代初期曾领导对抗国民党的情报行动，并在二战期间对抗日本，一九五五年时遭逮捕，被指为国民党与日本间谍，在一九七七年死于狱中。根据钱伯斯所述：「（潘汉年）是这波情治系统清算的头号受害者，约有八百至一千名干员遭到强制转职、贬职或长期徒刑关押，有些人自杀以逃避审讯。」440

也许是害怕一九四三年整风清算下的党内高层干员反扑，康生在中共取得内战胜利后曾一度退出公众领域，因此逃过了一九五○年代初期的权力斗争。后来他在一九五六年重出江湖，掌控「外交事务」，会见

外国兄弟党的代表，并前往海外访问。他第一次出国访问是在三月，以中国代表团长身分前往东德，参加主政的社会统一党（Socialist Unity Party）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由于在国内经常安排与毛泽东同行，康生因此重新获得接近主席的机会，接着成为一九六○与一九七○年代文化大革命的策划者及最残暴的审讯者之一。他甚至在中央调查部内掀起一波彻底整肃。中调部在一九六七年三月改由军队接管，两年后再由中国军事情报机构吸收。

康生在混乱持续中愈发狂乱，整肃时指控许多过去与现在的「罪行」，例如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五年对日战争中的日本特务，或近年的苏修特务，抑或包庇隐藏美蒋特务。[441]当时中央调查部实际领袖邹大鹏与身为资深情报干员的妻子宁愿自杀，也不愿承受一九四三年整风运动中康生人马所施行的审讯方式。上海公安局超过一千名干员遭关押，其中有一百四十七人在所谓的「歴史犯行」调查中遭杀害[442]，而这数字相当于许多国家特别警力的总额。

看似如此昏庸、歴史错综复杂的国安机制，究竟是如何在一九六二年战争前后，针对印度边界（甚至边界以外地区）蒐集如此详尽的情资？这至今仍旧是个谜。战前印度的情报体系较为传统，比起中国同侪，正如高尔准将所描述的「相对不利」。[443]不过毛泽东确实成功了，很可能是因为对他而言，成为中国与第三世界领袖同等重要。此外，印度不只是地缘政治的对手，更是敌国，这个国家在一九五九年提供达赖喇嘛政治庇护，并允许达赖在麦克罗甘己成立基地，持续倡议西藏独立。面对印度，确实有必要做好情报蒐集工作。冷静思考占了上风，因此有别于中共党内指控敌人（不论真实或「假想」）的狂乱发展；当时后者正排山倒海地撕裂共产党组织。

除了较传统的情报组织外，负责情报蒐集任务并代表政府直接进行颠覆工作的重要角色，是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所扮演。中联部以地理区域划分成十个不同局处，其中第三局负责印度、斯里兰卡、巴基斯坦、尼泊尔、印尼与马来西亚。[444]根据解密的中情局报告，其最早任务包含「进行寻找、调查，最终支持倾中分裂团体与不满者，鼓励他们组成所谓的『马列主义』政党，对抗倾苏『修正主义』政党。」[445]中情局认为，中联部在此任务上「提供资金协助有望的团体持续活动，并针对可能获益的区域，在中国境内提供政治与组织训练」。[446]

文化大革命前，中联部活动由邓小平、彭真与刘少奇督导，这也表示其领导阶层在一九六○年中后期遭整肃一空。此后，中联部由康生及其妻曹轶欧聘任并控制的一群解放军接管；曹轶欧在意识型态上的疯狂程度，与康生可说是不相上下。根据中情局报告，直到一九七○年代末期，几位在文革时失踪的老将重返舞台后，新的中联部才逐渐成形。当

康生指派管理中联部业务的申健遭到撤换之后，中情局注意到：

不久后康生的消失留下权力真空，并由北平（北京）驻阿尔巴尼亚大使耿飚填补。他在一九七一年一月返回中国，三月获提名为中联部部长。这段期间，中联部的军管影响力也被削弱了。447

「新的」中联部崛起于文革气焰逐渐消散、中共内部更多派系斗争爆发之时。一九六九年三月，在中苏乌苏里江冲突后，毛泽东的左右手林彪正处于权力颠峰，他也是知名小红书《毛主席语录》的发起人，在文革中占有主导地位。然而出乎多数世界观察家意料，林彪在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突然于蒙古坠机死亡。事件实际经过依然成谜，然而在官方说法中，林彪偕妻子叶群、儿子林立果与六名部属发动反毛政变，在失败之后欲潜逃苏联。

传说的阴谋与坠机实际发生的状况，时至今日依旧不明，而中国官方说法是因飞机燃油耗尽。根据阴谋论者的观点，飞机是被俄国或中国军队发出的火箭击落；然而蒙古情报单位在坠机后，透过苏联专家协助做出的报告显示，主因是驾驶员操控失当。据了解，飞机的三架引擎在坠毁前并未受损，倘若是因射击坠落，则应当有损坏；飞机以时速五百至六百公里速度坠落地面，结果造成爆炸及「长时间」火灾燃烧。报告认为飞机上应载有大批燃油。448

就在此时，印度干预东巴基斯坦事务，最终导致孟加拉建国。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伊斯兰马巴德当局在这场撕裂巴基斯坦的战争中，仅获得北京的有限支持。根据另一份解密的孟加拉战后中情局报告所述：

事实上，一九七一年中国为巴基斯坦所做的，远少于一九六五年的印巴战争。这次中国并未在中印边界上进行转移焦点的行动。比起一九六五年，他们的边界巡逻相当低调，避免移动轰炸机进入西藏，对于所谓的印度侵略，只做了形式上的事后抗议。中国以此方式减低印度对中国侵略的顾虑，因为中国认为印度的顾虑，可能导致新德里允许苏联在南亚扮演更重要的角色。449

中国不采取行动的另一种解释，很可能是因为内部问题。北京领导圈对林彪突然的死讯感到震惊，毛泽东本人因得知视为接班人的林彪极可能背叛了自己，据说变得相当忧郁且闭门不出。接着毛泽东转向他的旧同志，他过去曾厌弃的极左派。三十八岁来自上海的王洪文抵达北京，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此时毛已经病重，无法视事，主要由其妻子江青掌控权力，又带进了宣传专家张春桥与姚文元，后来这四个人被称为「四人帮」。他们认为邓小平及其温和主张（从中共观点来看），是他们掌权的主要威胁。邓小平被要求进行一系列自我批评，承认许多思想错误，而毛泽东站在妻子与三位同伙这边，要求中共中央

委员会「彻底检讨邓的错误」。450

此时，随着革命老兵逐一离世，中共高层领导人正大批凋零。首先去世的是恶名昭彰的康生，在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六日死于膀胱癌。在葬礼上，官媒大肆褒扬他是「无产阶级革命者、马克思理论家与光荣的反修斗士」。451

周恩来与毛泽东因为过于虚弱而无法出席葬礼。之后周恩来先走一步，在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过世，死因也是膀胱癌。毛泽东缺席葬礼，而正在重掌权力的邓小平在一月十五日的国葬中发表演说。康生之死或许没有太多人哀悼，但四月时有大批群众齐集北京天安门广场，他们追悼周恩来，并公开地批评四人帮，因此也间接批评了毛本人。这场少见又未经许可的公众抗议，后来被警力与赶来的军队镇压。

接着轮到毛泽东了，他死于同年九月九日。毛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在五月二十七日接见巴基斯坦总理阿里．布托。老主席去世后，他的官方肖像悬挂在天安门主门上，标旗上写着：「继承毛主席遗志，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452

老主席死后，必然发生的剧烈权力争斗紧接而至，最终邓小平重返舞台。毛泽东任命其忠实的追随者华国锋为接班人，然而他实在过于软弱，无法统合分崩离析的共产党。首先遭到攻击的是四人帮，他们在年底前就遭到整肃、逮捕，后来接受审判。

文革以来不断上下权力舞台的邓小平，终于在一九八○年成为强人。赵紫阳在一九八○年取代华国锋成为总理，次年党主席一职则由胡耀邦取代，这两人皆是邓小平的支持者。胡耀邦释放了三百万在文革时期受迫害者；赵紫阳则是一九八○年代初期启动开放新经济政策的主要推手。至此，意识型态僵硬与政策狂乱的毛泽东时代看似结束。

邓小平上台也带来中国外交政策新局。三个世界理论仍旧活跃，但此时有不同的定调与重点。「中国虽是大国，但从未追寻在第三世界的特殊地位。中国并非第三世界领袖，现在与未来都不是，因为此举将和中国与外国交往的原则相牴触。」453此刻中国寻求与更多国家建立友谊关系，这与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大相迳庭。根据毛的理论，只要共同敌人是苏联，中国可与资本主义国家结交往来；若「世界人民彼此支持正义斗争454……所有国家人民都奋起。对抗美帝主义与苏修主义斗争的新歷史阶段已经开始」。455

怀疑论者也许会争论，邓小平治下的中国开始怀抱成为全球政经强国的渴望，而非世界「受压迫大众」的革命模范。中国对亚洲革命运动的支持，已让位给商业合作与贸易协定。邓小平确实体现出他在文革中的「走资派」形象，并开始将中国以农民为主的社会，逐渐转向工业化

社会。

印度与如此难以预测、变化无常的邻国交往时，必须保持冷静。这国家可以从建国初期的革命好战，转成文革年代的全然疯狂，接着却是割喉资本主义。一九六二年战争及其后续，仅是中国在世界政治地位概念上转变的徵兆，正如毛泽东本人所说，与边界争议毫无关系。

这段期间的锡金，中印之间的情报战方兴未艾。然而一九六○年代的冲突岁月已经结束，印中开始谈判边界贸易的可能性，最终于二○○六年六月签署了一项歷史性协定：允许边界贸易。七月六日，就在边境关闭四十四年后，乃堆拉山口重新开放边界贸易。协定内容允许居住在两国边界区域的居民，交易一九九一、一九九二及二○○三年中印边界贸易协定中允许的二十八种商品。[456]商品清单自签订后经过数次修正，但仍侷限在部分品项，而且贸易也非全年放行。虽然如此，大量的中国消费性商品仍涌入锡金、西孟加拉邦及印度东北各邦市场。即使在接近中国边界的达旺或阿鲁纳恰尔邦，中国商品也从锡金转运而来。

不单是中国的贸易，还有观光业、木屋产业与在地创业，结合新德里中央政府丰厚的补助金，为锡金带来了繁荣。锡金虽是印度最小的邦及属地之一，但每人平均国民生产毛额是全国第三高，仅次于果亚及德里。锡金人识字率是百分之八十二点二，也是全国最高的区域之一，并且远高于全国平均值的百分之六十八点九。[457]在甘托克，常能看到汽车后车窗悬挂旧锡金国旗，然而邦里并没有分离主义运动。就连顿珠与荷蒲的女儿，荷蒲．李珠（Hope Leezum）也由纽约返回锡金嫁给当地人。他们住在甘托克，协助管理负责经营王宫与旧王室家庙的大昭寺信托基金（Tsuklakhang Trust）。

392 Andrew Duff, Sikkim: Requiem for a Himalayan Kingdom (Gurgaon: Random House India, 2015), p. 105.

393 Hope Cooke, Time Change: An Autobiography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80), p. 107.

394 Duff, Sikkim, 2015, p. 117. ‘Monaco touched by Grace’ refers to Grace Kelly, the American actress who married Rainier III, the prince of Monaco and thus became the princess of Monaco.

395 ‘Speech from the Throne of Denjong Palden Thondupo Namgyal’, available at http://sikhim.blogspot.com/2009/04/april-4-1965-coronation-of-last-king.html (accessed on 5 October 2016).

396 See, for instance, Sunanda K. Datta-Ray, Smash and Grab: The Annexation of Sikkim (Chennai: Tranquebar, 2013), p. 93.

397 Saul Mullard, Opening the Hidden Land: State Form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ikkimese History (Leiden: Brill, 2011), p. 186.

398 ‘Ainslie T. Embree (ed.), Encyclopedia of Asian History: Prepared under the Auspices of the Asia Society, Vol. 3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and London: Collier Macmillan

Publishers, 1988), p. 466.

399 Nari Rustomji, Sikkim: A Himalayan Tragedy (New Delhi: Allied Publishers, 1987), p. 10.

400 Rustomji, Sikkim, p. 10.

401 Rustomji, Sikkim, pp. 10–11.

402 For the full text of the treaty, see G.S. Bajpai, China's Shadow over Sikkim: The Politics of Intimidation (New Delhi, London, and Hartford, Wi: Lancer Publishers), pp. 231–7.

403 Bajpai, China's Shadow over Sikkim, p. 232.

404 Datta-Ray, Smash and Grab, p. 92.

405 'Annexation of Sikkim: Demise of a Himalayan Kingdom', Spotlight on Regional Affairs, Vol. IV, Issue No. 6, June–July 1985 (Islamabad: Institute of Regional Studies), p. 26.

406 Quoted in Datta-Ray, Smash and Grab, p. 201.

407 Cooke, Time Change, p. 198.

408 Cooke, Time Change, p. 198.

409 Cooke, Time Change, p. 198.

410 Datta-Ray, Smash and Grab, p. 92.

411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Central Intelligence Bulletin: Daily Brief, 6 November 1962, declassified in 2002, p vii.

412 Nari Rustomji, Enchanted Frontiers (Calcutta, Delhi, Bombay, Madra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p. 146.

413 Rustomji, Enchanted Frontiers, p. 146.

414 Bajpai, China's Shadow over Sikkim, p. 129.

415 Quoted in Bajpai, China's Shadow over Sikkim, p. 130.

416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A Chronology of Events (1949–1988)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89), p. 247.

417 'Annexation of Sikkim: Demise of a Himalayan Kingdom', p. 27.

418 Bajpai, China's Shadow over Sikkim, p. 143.

419 Bajpai, China's Shadow over Sikkim, p. 142,

420 Bajpai, China's Shadow over Sikkim, p. 153.

421 'Note given by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to the Embassy of India in China',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Government of India, Notes, Memoranda and Letters Exchanged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and China, January 1965–February 1966, White Paper XII (Delhi: Manager of Publications, 1966), p. 187.

Bajpai, China's Shadow over Sikkim, p. 129.

422 Quoted in Bajpai, China's Shadow over Sikkim, p. 189.

423 Bajpai, China's Shadow over Sikkim, p. 92.

424 Rustomji, Sikkim, p. 71.

425 Rustomji, Sikkim, pp. 71–2.

426 For an account of the espionage mission, see Bertil Lintner, Great Game East: India, China and the Struggle for Asia's Most Volatile Frontier (New Delhi: HarperCollins India, 2016), pp. 31–2.

427 Duff, Sikkim, p. 85.

428 J.R. Subba, History, Culture and Customs of Sikkim (New Delhi: Gyan Publishing House, 2011), pp. 67–8.

429 For the details of the agreement, see Satyendra R. Shukla, Sikkim: The Story of Integration (New Delhi: S. Chand & Co, 1976), p. 86. 1976.

430 Ch'iao Kuan-hua's Speech at the 19th U.N. General Assembly Session, Warren Kuo (ed.), Foreign Policy Speeches by Chinese Communist Leaders, 1963–1975 (Taipei: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ess, 1976), p. 103. Although Ch'iao Kuan-hua (Qiao Guanhua in Pinyin) had been denounced as a 'counterrevolutionary'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the 1960s, he was protected by Zhou Enlai and survived the turmoil. In the early 1970s, he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alks with the American Secretary of State Henry Kissinger to normalize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Qiao was purged from his post as foreign minister after the death of Mao Zedong in 1976, but remained an adviser to the Chinese People's Association for Friendship with Foreign Countries.

431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p. 248.

432 Asoka Raina, Inside RAW: The Story of India's Secret Service (Delhi: Vikas Publishing House, 1981), p. 68 and Duff, Sikkim, p. 188.

433 Raina, Inside RAW, p. 69.

434 Yadav, Mission R&AW. New Delhi: Manas Publications, 2014, pp. 69–70.

435 Quoted in Raina, Inside RAW, pp. 48–9.

436 For a detailed account of events in Shanghai in the late 1920s, see Bertil Lintner, Bloodbrothers: Crime, Business and Politics in Asia (Cows Nest, NSW, Australia: Allen & Unwin, 2002), pp. 35–40.

437 David Ian Chambers, 'The Past and Present State of Chinese Intelligence Historiography', Studies in Intelligence, Vol. 56, Issue no. 3, September 2012, p. 2.

438 John Byron and Robert Pack, The Claws of the Dragon: Kang Sheng, the Evil Genius Behind Mao and his Legacy of Terror in People's China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2), p. 182.

439 Communication with David Ian Chambers, on 13 October 2016.

440 Chambers, 'The Past and Present State of Chinese Intelligence Historiography', p. 4.

441 Chambers, 'The Past and Present State of Chinese Intelligence Historiography', p. 5.

442 Chambers, 'The Past and Present State of Chinese Intelligence Historiography', pp. 4–5.

443 Kaul explains: 'Our intelligence system compared unfavourably with that of the Chinese. They had systematically introduced agents into India in general and NEFA in particular (whereas we had lagged in this respect). Their agents built up a net-work for reporting back information to the Chinese … the Chinese often knew about our military build-up in a particular area in advance whereas similar knowledge about them was denied us due to faulty intelligence.' See Brij Mohan Kaul, The Untold Story (Bombay, Calcutta, New Delhi, Madras, London, New York: Allied Publishers, 1967), p. 438.

444 译者注：依二○一八年六月底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官方网站公布之机构设置，由一局（亚洲一局）负责与南亚、东南亚各国政党及政治组织的联络交往，以及对该区各国政党和政治组织的研究工作。

445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Intelligence Report: The International Liaison Department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Reference title: POLO XLIV), December 1971, declassified in May 2007, p. i.

446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Intelligence Report, p. i.

447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Intelligence Report, pp. ii–iii.

448 Minnie Chan, 'Mongolian report blames Lin Biao plane crash on "pilot error"',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2 September 2016, available at http://www.scmp.com/news/china/article/2017978/mongolian-report-blames-lin-biaoplane-crash-pilot-error (accessed on 17 October 2016).

449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Research Study: Chinese-Indian Relations 1972– 1975, September 1975, Declassified on 29 June 2004.

450 Yuwu Song,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Jefferson, NC: McFarland, 2013), p. 62. For a more detailed account of the power struggle within the CCP at this time, see Roderick MacFarquhar, The Politics of China: Sixty Yea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 275–98.

451 Byron and Pack, The Claws of the Dragon, p. 409.

452 Christine Quigley, Modern Mummies: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Human Bod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Jefferson, NC: McFarland, 1998), p. 41. Mao's body was embalmed after his death and placed in a mausoleum in Tiananmen Square.

453 'The Third World Needs No Leader', Su Wenming (ed.), China After Mao: A Collection of 80 Topical Essays by the Editors of Beijing Review (Beijing: Beijing Review, 1984), p. 89. The article 'The Third World Needs No Leader' first appeared in Beijing Review, December 1982.

454 Chairman Mao's Theory of the Differentiation of the Three Worlds is a Major Contribution to Marxism-Leninis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77), p. 53.

455 Chairman Mao's Theory of the Differentiation of the Three Worlds is a Major Contribution to Marxism-Leninism, p. 73.

456 'Nathu La to open for Indo-China trade after 44 years', The Economic Times, 20 June 2006, available at http://articles.economictimes.indiatimes.com/200606-20/news/27445981_1_border-trade-trade-route-indo-china-trade (accessed on 15 October 2016).

457 Effective literacy rate in India in 2011 was 82.14 per cent for males and 65.46 for females (average 68.90 per cent), in Sikkim 87.29 per cent for males and 76.43 for females (average 82.20 per cent). See http://censusindia.gov.in/2011-prov-results/data_files/india/Final_PPT_2011_chapter6.pdf (accessed on 13 August 2017).

# 第六章　国民幸福指数？

不丹，喜马拉雅山区仅存的佛教王国，香格里拉神话的缩影，这个人口少于百万的小国家，挤在地球上两个人口最多、彼此为区域对手的国家中间，并成功维持其独特的文化认同。不丹地景之美令人屏息，古老佛教寺院坐落山巅，是致力于打造以佛教为精神价值，而非粗鄙物质主义为基础的国家。一九七○年代初期，不丹国王吉格梅．辛杰．旺楚克（Jigme Singye Wangchuk）提出了国民幸福指数（Gross National Happiness）。一九五三年制定的不丹国歌，内容总结了这社会的精神，「出自原住民族，并有丰厚藏、蒙、印——缅移民文化涵养」458：

雷龙王国中香檀环绕

捍卫者执守宗教世俗双重体系

坚守不变岗位之际

高贵荣光的陛下，德威远披

我主佛法辉煌之时

和平幸福煦日将光照万民！459

佛教长期以来即为不丹国教，所谓「宗教世俗双重体系」指的是二十世纪初之前，一直存在政教统治的结合与分立，歷史上这套体系定义了不丹独特的统治架构。然而在浪漫如诗的外表下，不丹却有着动盪的歷史与难测的未来。歷经数次与英属印度殖民政权的冲突后，一九一○年双方达成协议，不丹将「在外交事务上接受英国政府的指导」，而英国则承诺「不干预不丹的内部行政」。460一九四九年八月八日，不丹政府与独立后的印度也签订类似协议，确认不丹做为印度属国，实际却享有高度自主权的地位。461

然而与锡金不同的是，不丹逐渐成功强化独立地位。一九七一年，不丹在成为观察员国三年后正式加入联合国，接着在二○○七年修订不印条约：「不丹王国政府与印度共和国政府将在两国国家利益相关事务上紧密合作。彼此皆不允许在领土上，进行对彼此国家安全利益有害之活动。」462

两国间的特殊关系，使印度占不丹全年货物进口量的百分之七十五，而不丹百分之八十五都出口到印度，最主要的出口货物包含喜马拉雅山区河流的水力发电，印度是唯一的买家。不丹货币努尔特鲁姆（Ngultrum）的币值与印度卢比挂勾，匯率维持一比一。在战略位置上，不丹与中国沿着山稜分界，这里与整个喜马拉雅山脉沿线，是印度次大陆与西藏高原的分界。在一九四九与二○○七年的条约中，并未特别

提及印度协防不丹；然而尼赫鲁总理早在一九五八年就宣布：「对不丹的侵略行为，等同对印度本身的侵略行为」。[463]印度军队在哈县（Ha）常驻的一个训练营，印度军事训练团（Indian Military Training Team），就位在重要战略地西藏春丕山谷附近。不丹也会将其军官送到普纳的印度国防学院（National Defense Academy）与德拉敦的印度军事学校（Indian Military Academy）受训。

同时，不丹是中国所有邻近国家中，唯一尚未与其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但为了不得罪中国，尽管不丹信奉的佛教教派与藏传佛教类似，却是世上少数达赖喇嘛还未造访过的佛教国家。一九五九年拉萨起义后，当时六千名西藏难民涌入不丹，并在「不得从事任何政治活动」的前提下获准留在此地；但到了一九八一年，藏人被要求若不成为不丹公民就必须离开，许多人因此前往印度。

中国为了回应不丹微妙的平衡动作，也採行后毛泽东时代新的外交策略：软性外交。近年来中国的马戏团、特技表演与足球员纷纷造访不丹；一小群不丹学生获得奖学金，前往中国大学就读；观光业亦大幅发展。十多年前，仅有十九名中国游客造访不丹，二○一五年数字成长至九千三百九十九人，占不丹全年外国访客总数的百分之十九。[464]

印度忧虑地注意这些发展，这一点也不令人意外。二○一四年七月，上台两个月的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第一个出访的国家就是不丹。同年稍晚，印度总统普拉纳布．穆克吉（Pranab Mukherjee）也出访不丹，强调新德里重视这个面积虽小却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喜马拉雅王国。会面的重要议题是讨论中国与不丹建立长久关系的企图。外交上，中国与不丹的联系仅有一串解决两国边界争议的会谈。今日，中国宣称拥有不丹两个区域：一块邻近春丕山谷的领土，以及北方一大块土地。北京印制的一九六一年地图上，将不丹大部分区域、尼泊尔及锡金都划入中国版图。中国一度认为，不丹北部与西部将近四千五百平方公里的土地是有争议的。一九三○年代，毛泽东曾公开宣称：「中国的正确疆界应包含不丹、缅甸、尼泊尔、台湾、韩国与琉球群岛。」后来这段谈话从正式纪录中删除，以免激起邻国不满。[465]

位于喜马拉雅高山地区的不丹，可能被视为孤立王国，但事实上这区域与外界的互动早在七世纪就已开始。当时的吐蕃国王松贊干布改信佛教，并下令建造两座佛寺，一座位于布姆唐（Bumthang），另一座则在帕罗河谷（Paro Valley）。到了八世纪，被藏人称为古鲁仁波切[466]（有时亦敬称为第二佛陀）的佛教圣者莲花生大士（Padmasambhava），应不丹当时诸多分裂小国的国王之请，从印度前往不丹，之后更进入吐蕃。后来古鲁仁波切返回不丹时，在帕罗山谷[467]

与布姆唐兴建新佛寺，并且将祖寺设在布姆唐。

古鲁仁波切被公认为藏传密宗大乘佛教宁玛派（Nyingmapa）的创始人，此派又称「旧派」或「红帽派」[468]，在八世纪时传遍不丹各地。但今日的不丹及西藏区域，当时都缺乏有组织的中央政府，地方王侯各立山头，经常相互兴战，宗教派别间也争夺信徒领导权。蒙古人也曾进入此区，统治域内丰饶谷地，并协助达赖喇嘛取得政权。

十四世纪，蒙古领主势力开始衰微，经过一段无政府时期之后，最终由蒙古支持的「黄帽派」格鲁派（Gelupa）成为吐蕃主要势力，敌对教派的僧侣因此逃往东藏，或是往南前往不丹。其中部分僧侣闢建了最早的武装寺院，称之为「宗」（dzongs），今日仍旧分布于不丹各地。后来红帽派的分支「竹巴」[469]成为主要教派，特别在不丹西部，竹巴噶举逐渐形成最重要的一股势力，就如不丹史学家噶玛彭措（Karma Phuntsho）所写：「后世成为统治势力及国家宗教」。[470]

在竹巴噶举僧侣阿旺朗杰（Ngawang Namgyal）于十七世纪初抵达不丹前，此地并未形成中央集权的政府架构。当时为逃离达赖五世所领导势力强大的黄帽派，阿旺朗杰进入不丹，承「夏宗法王」（shabdrung）头衔（意为「行足礼的对象」），并屡次击败入侵的西藏格鲁派统治者。夏宗阿旺朗杰的强大性格，在一六二七年葡萄牙耶稣会士笔下鲜明呈现。两名葡萄牙天主教耶稣会士艾斯特法．卡塞拉（Estevao Cacella）及乔．卡布拉（Joao Cabral）是第一批进入不丹的西方人。卡塞拉形容夏宗法王「同时是王国之主与最高喇嘛」。[471]

十七世纪以来，不丹被称为「竹域」（Druk Yul）或「雷龙之国」，强调竹巴噶举派的传承。不丹（Bhutan）一词过去拼音为Bootan，字源可能来自尼泊尔语中的「菩提亚」（Bhutia）或「菩帖」（Bhotay），是印度语言中指涉「藏族」之词。然而印欧语系中的bhot字根，相对地可能来自藏语的bod[472]，这是藏语与不丹方言中称「西藏」之词。藏人自称bod-pa，意即藏地居民。[473]

为强化对雷龙王国的掌控，夏宗法王兴建更多大型的碉堡：「宗」，后续成为宗教及世俗权力的中心，亦即现代不丹国歌中提及的宗教世俗双重体系；理论上，此一体系也延续到今日。廷布（Thimphu）、帕罗与普纳卡（Punakha）的大型宗寺都可溯源至第一世夏宗法王时代。根据英国歷史学者暨藏学家迈克．阿里斯（Michael Aris）所述：

每间宗寺都分成神职与世俗两翼，前者由竹巴噶举僧人使用，后者则处理政务及储存人民缴纳的谷物与税收等[474]……他的统治有效性，从其死前获得全国各地及邻近印度国家、尼泊尔与数个藏地政权遣使进贡

可见一斑。[475]

虽然属于神权国家，世俗政府则由可能是僧侣或俗人的竹第悉（druk desi）领导。

夏宗法王理应与西藏达赖喇嘛一样採取转世传承。然而第一世夏宗法王在一六五一年去世后，由于对国家影响甚巨，因此死讯遭隐瞒，对外宣称他正闭关修行。后来第一世夏宗死讯终于公布，并展开寻找转世灵童的工作；而敌对派系分别支持至少五个不同转世灵童。最后，冲突在一七三○年代不丹受西藏入侵时获得解决。根据阿里斯所述，这是「唯一一次西藏成功入侵不丹……（然而）侵略行动的结束，事实上归功于当时西藏喇嘛领袖的和平啰吁，而非征服」。[476]

当时不丹分裂成两个国家，并各自向拉萨请求仲裁，同时也必须向当时握有西藏宗主权的中国皇帝上书请愿。一七三四年，两个阵营分别遣使前往北京朝廷。最终此事获得和平解决，国家也再次统一。然而正如阿里斯指出：「向中国请愿仲裁，意味着理论上的主权丧失。」不过与此同时，「这个举动亦与西藏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有助于确保不丹独立的事实。」[477]

接下来，在不丹歷史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并非中国而是英国。不丹从一七七○年代开始夺取喜马拉雅山脚平原的库齐比哈尔公国（Cooch Behar，今日为Koch Bihar）。[478]为驱逐入侵者，库齐比哈尔的统治者向英属东印度公司请求援助。在一七七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的首次冲突中，六百名不丹军士战死，英军将不丹势力逐出库齐比哈尔堡[479]，因而取代西藏，成为不丹首要的外在威胁。

边界争议持续影响英国与不丹的关系。英国在一八二四至一八二六年对缅甸王国战争[480]中，取得了对阿萨姆地区的控制，并进一步占领平原上其他不丹的控制区域。随着殖民扩张进入布拉马普特拉河谷地，英不之间产生数波的军事冲突。一八六二年，不丹军队劫掠库齐比哈尔与锡金，此时英国政府已从英属东印度公司收回印度控制权，决定发动反击。虽然不丹曾取得几次胜利，但冲突结果是一八六五年十一月十一日签订了《辛楚拉条约》（Treaty of Sinchula）：不丹人必须放弃所有阿萨姆丘陵地（Assam Duars），并以此换取每年五万印度卢比的补偿金。条约第一条同时言明：「此后英国政府与不丹政府间将永享友谊与和平。」[481]

失去平原为不丹的经济带来严重冲击，并在剩余国土中造成民生动盪。虽然转世的夏宗法王仍是不丹的精神领袖，各省实际上由称为「本乐」（penlop或pönlop）的世俗行政首长统治。通萨本乐[482]为倾英派，而帕罗本乐却是倾藏派；到了十九世纪末，通萨本乐乌颜．旺楚克

（Ugyen Wangchuk）在数波内战与叛乱中击败对手，崛起成为最有力的领袖。

英国自然欢迎这样的新发展，因为平定不丹边界并非他们唯一的考量。根据美国政府研究，当时英国希望阻碍俄国进入拉萨，并且与西藏通商。「乌颜．旺楚克看到协助英国的机会，因此在一九○三至一九○四年间，自愿伴随前往拉萨的英国使团，担任协调人。」483当然，这使团就是荣赫鹏带领的西藏远征团。为感谢乌颜．旺楚克对一九○四年签订《英藏条约》的贡献，英国授予他骑士勋衔。一九○五年，通萨本乐在普纳卡宗受勋成为英属印度帝国骑士指挥官，在场观礼者除了当地显贵外，还有英国驻锡金政务官约翰．克劳德．怀特。

乌颜．旺楚克一跃成为不丹最有权势之人，至于帕罗本乐则遭到解职，取而代之的是来自同样倾英的多吉家族（Dorji）。不丹成为现代国家的时机已经到来，当时的夏宗法王于一九○三年去世，但转世灵童直到一九○六年仍未寻获，乌颜．旺楚克因此取得整个国家的掌控权。虽然后来寻获了两位名义上的夏宗法王转世：一位是身转世，另一位则是意转世。484在僧侣领袖、政府官员、国内重要家族领袖所组成的会议中，选出乌颜．旺楚克担任不丹首任「竹甲布」（druk gyalpo），意思是「龙王」；第五十七任竹第悉（亦称「德布王」[deb raja]）被迫退位。世系传承的绝对王权取代了旧的神权国家，多吉家族则世系传承首席部长（gongzim）一职。485

这个新体系完美符合英国需求。乌颜．旺楚克曾于一九○六年造访加尔各答，并与威尔斯王子会面。两人于一九一一年在德里重逢，当时王子已继位成为英王乔治五世，乌颜．旺楚克成为不丹国王，也是新的《英不条约》（Anglo-Bhutanese Treaty）签署一年后，其中规定不丹对外事务由英属印度政府掌控，而不丹享有内部自主权。486

一九一○年条约是由乌颜．旺楚克与接替怀特为锡金政务官的查尔斯．贝尔，以及不丹当地行政官员签署上印。贝尔同时也是驻不丹与西藏政务官，但持续驻扎在甘托克。与锡金相比，不丹在管理内部事务上有更大的自主权。

另一方面，英国开始注意到中国侵藏武力愈趋接近印度边界。《经济政治周刊》在二○一六年十一月十二日刊出普拉迪普．潘竹邦的长篇文章，批评马克斯韦尔对于当时事件的叙述。此前马克斯韦尔曾于同一期刊上发表文章写道：「满清帝国在一九○九至一九一○年垂死一搏的扩张冲动，导致『权力接近印度的东北』。」487潘竹邦反驳，中国在此垂死一搏的冲动中不仅蹂躏西藏，更「开始试探邻近公国、尼泊尔、不丹、锡金，以及内部界线外未设治的英国领土」。488英国并不担心拥有

强力军队的尼泊尔、已成为其保护国的锡金，或是「中国不大可能贪图的无治无利蛮荒东北地区」。489中国入侵印度东北区域的唯一迹象，是瓦弄南方几枚边界标石。

然而根据潘竹邦的研究，英国却「对不丹的可能命运相当焦虑」，虽然一九一○年条约已正式定下不丹与英属印度的关系，确保不丹不会自行发动任何外交行动。但更重要的是，英国希望能预先避免中国将侵藏行动延伸到不丹。后来满清帝国在一九一一至一九一二年的革命中垮台，代表了此一忧虑将不会发生。随着中国撤出西藏高原，拉萨重掌政权，再次确认了西藏一面做为中印缓冲，另一面做为中不缓冲的角色。

在不丹与印度的亲近关系下，首任国王不只增加了与山下平原的贸易往来，也引进西式学校，改善内部沟通。此一发展在继承人吉格梅．旺楚克任内持续进行，他在一九二六年即位后，建立了更多学校、诊所与道路。佛教寺院与地方政府都纳入中央王室掌控；不过夏宗法王仍旧存在，也曾在吉格梅．旺楚克继位时发动挑战，但并未成功。

一九三一年春，当时的夏宗法王晋美多吉（Jigme Dorji）试图夺回权力，派遣兄弟却吉坚贊（Ckökyi Gyeltsen）带两位仆人，前往印度古贾拉特邦波尔萨德（Borsad）拜访圣雄甘地。他依指示告知甘地，不丹不再受到夏宗法王统治，向甘地请求协助。但就如迈克．阿里斯所述：「很难想像会有比甘地更不适合涉入这类阴谋的人。」490因此夏宗法王开始计画前往西藏，并将在必要时由藏入中。根据阿里斯的纪录：「当时有些人期待班禅喇嘛却吉宁玛（Ckökyi Nyima）在长期流亡后，能在中国军队的强力支持下返藏，所以夏宗法王此刻也想寻求协助，与国王争夺权力。」491

不丹国王发现阴谋，因此将夏宗法王软禁在驻驾之普纳卡的泰罗寺（Talo moastry）。之后夏宗法王在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二日去世，并无法确认是遭杀害或自杀，但他是最后一任正式认定的夏宗法王。此后有好几位号称夏宗法王转世者，但都居住在印度，对于不丹毫无影响力。

第一任国王在一九二六年去世前，已取得了英国的保证，旺楚克家族将持续在不丹的显赫地位，王家世系就此建立。第二任国王吉格梅．旺楚克的统治，直到一九五二年去世前都未受到任何挑战；在他任内，不丹与英国殖民政权的关系，顺利转移为不丹与独立印度的新条约。一九四九年八月八日，吉格梅．旺楚克亲自批准了《印度政府与不丹政府的永久和平友谊条约》。印度许下与之前英国同样的承诺，负责不丹的外交政策，但不干涉内政。但现在部分歷史学者认为，若当时印度就与中国发生冲突（例如十几年后的战争），可能不会这么轻易同意不丹持

续内政自主的要求。492

第三任国王吉格梅．多杰．旺楚克（Jigme Dorje Wangchuk）于一九五二年即位，持续统治到一九七二年去世为止，那也是不丹现代史上最动盪的年代。中国在一九五一年侵藏之后成了不丹的邻居，也因此使不丹与印度关系更加紧密。吉格梅．多杰．旺楚克鼓励印度投资小型产业与农业，此刻不丹为对抗中国侵犯藏边，加速现代化的需求是前所未有之强烈。

奴隶与农奴遭到废止，第三任不丹国王推动土地改革，以确保财富更加平均分配。一九五三年，不丹成立了一百三十席的国会；一九五八年，长期由多吉家族把持的首席部长一职提升为首相（lonchen），迈向君主立宪制的第一步已经跨出。此外，不丹更加强通讯科技，打破以往孤立于世界之外的状态，并在印度的资助下，于一九六二年兴建一条连结印度边界上彭措林493到首都廷布的公路。在此之前，从不丹前往印度的交通运输必须仰赖犛牛与驴子，而这正是一九五八年尼赫鲁与女儿英迪拉一同造访不丹的方式。

直到一九五九年中国镇压西藏起义前，不丹都与中国维持相当友善的关系。当时，不丹长期行使半主权统治的部分西藏飞地，全都遭到中国接管。494接着涌入六千名西藏难民，中印关系恶化，不丹也因此关闭通往西藏的边境。

在一九六二年中印战争期间，中国宣称只要不丹「维持中立」，解放军就不会进入不丹。495虽然部分由达旺地区撤出的印军确实借道不丹领土，但中国避免跨越不丹国界。若真的发生冲突，微小的不丹军队无法对抗中国攻击，印度势必得协助不丹强化军事力量，并改善由低地通往内陆的路况。

即使不丹已有诸多进步，仍旧是个接近中古时代的社会，除了印度之外，与外界几无联系。不过随着教育发展，许多不丹青年前往印度就学，主要在大吉岭与噶伦堡等山区避暑地。当然也有人就读显贵的德拉敦杜恩公学496，例如多吉家族的吉格梅．巴登．多吉（Jigme Palden Dorji），他的小妹亚希格桑497嫁给第三任国王吉格梅．多杰．旺楚克，因此他也被视为旺楚克王室成员之一。

一九五二年，吉格梅．巴登．多吉受聘为首席部长，六年后职称改为首相，因此成为不丹第一位首相；一九六二年中印战争，正是他担任不丹首相期间。根据亲近友人罗斯通吉所言，他当时最深的焦虑是中国可能绑架住在印度东北边境特区达旺附近寺院的一位六岁男孩，这位男孩是最近转世的夏宗法王，他害怕中国会以他为傀儡挑战不丹国王的权威。忠于国王的吉格梅．巴登．多吉告诉罗斯通吉：「法王体系（夏宗

法王）已经像度度鸟一样灭绝了……若有任何小男孩如此不幸，被认定为潜在的法王人选，那么不丹也能安排一场『意外』，让他早登涅槃。」498

当时担任东北边境特区行政长官顾问的罗斯通吉，收到吉格梅．巴登．多吉请他搜寻小夏宗法王的紧急请求。在中国占领达旺前，小男孩被寻获并送往西隆，接着转往麦克罗甘已的藏人社区学习，在达赖喇嘛的庇护下安全成长。吉格梅．巴登．多吉对中国可能绑架夏宗法王的担忧，究竟是确有其事或是猜测下的谨慎行动，则不得而知。

吉格梅．巴登．多吉决心推动不丹现代化，第三任国王也不反对。但削减国家支持宗教机构权力一事，却激怒神职人员中的某些人。之后国王年纪渐长，与活力充沛的首相摩擦也更明显。吉格梅．巴登．多吉更因军车使用与强迫五十名军官退休的政策，在军队中树敌。

所有反对现代化的人（特别是传统派）在国王与多吉家族攀升的冲突中，看到了见缝插针的机会。一九六四年四月五日国王前往瑞士接受治疗，吉格梅．巴登．多吉在彭措林遭一名军官暗杀。整个国家陷入一九○七年世袭王制建立以来最严重的政治危机。

国王由瑞士赶回不丹，密谋者在印度催促下遭逮捕，以叛国起诉，部分遭到处决，其中包含军队总司令暨王叔南嘉．巴哈杜（Namgyal Bahadur）。其他参与暗杀者则逃往尼泊尔。然而，这并非动乱的终结，旺楚克保王派与多吉派现代化支持者间的权力斗争尚未结束。主要问题也许并非王室权力的终结或削减，而是「完全脱离印度干预」。499 无论如何，吉格梅．巴登．多吉的弟弟伦珠．多吉（Lhendup Dorji）继任首相，而他连同家族成员在一九六五年遭到流放。国王本人成为首相，派任保守人士取代多吉派位置，并命同父异母的王弟担任陆军总司令，以此确保军队忠诚。危机仍未结束，一九六五年七月发生另一次针对国王的暗杀行动；不过多吉派并未涉入其中，国王也释放了刺杀未成的嫌犯。

即使部分不丹人可能对国家高度依赖印度感到失望，但依照不丹对印度的战略重要性来看（特别在一九六二年战争之后），印度很难让不丹走自己的路。事实上，此刻已解密的中情局报告指出：「吉格梅暗杀事件后，提供印度扩大影响力的良机。」500同一份报告说：「印度（现在）提供不丹军事与情报训练，特别针对反中国颠覆行动501……中国……则运用不丹教派差异的管道，特别是利用友善的藏人。」502

各种发展不丹经济及强化王室做为国家支柱的努力逐渐开展。在第三任不丹国王任内，藏语相关的方言宗喀语503成为官方语言，廷布也成为全年唯一首都。一九五五年之前，普纳卡曾是首都，一九五五年后改

为冬都，高山上的廷布则是夏都。随着行政组织集中在廷布，政府效能也跟着提升。

不丹领导人在处理印度关系上，比甘托克那对充满争议的王室夫妇精明许多。不丹如同锡金，也追求更直接的国际连结，但为避免激怒印度，做法较为谨慎。没多久，一九六二年，不丹加入亚洲太平洋经济与社会发展合作计画（Plan for Cooperativ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Asia and Pacific），即一般众所周知的可伦坡计画（Colombo Plan）。一九六六年廷布政府通知印度，希望能成为联合国会员国。一九七一年正式入联，是不丹外交政策的重大突破。

第三任国王吉格梅．多杰．旺楚克被视为现代不丹之父。他长久以来为疾病所苦，曾遭遇数次心脏病发作，一九七二年七月二十一日，他在肯亚奈洛比接受治疗，最后不治去世，享年四十三岁。第一任国王为王室定下独特徽记：头顶着王冠的乌鸦，代表不丹的乌鸦形守护神大黑天玛哈嘎拉（Mahakala）。504这顶乌鸦王冠传到吉格梅．多杰．旺楚克的独子，吉格梅．辛杰．旺楚克手上。他在同年七月二十四日即位，成为第四代国王，登基为当时仍是独裁王国的国王。虽然即位时还差几个月才满十七岁，但少年国王受过良好教育，也比前人更适应现代化的外在世界。他从大吉岭的圣约瑟夫学院（St. Joseph's College）毕业之后，便前往英国的海瑟顿预科学校（Heatherdown Preparatory School）。英国的安德鲁王子、爱德华王子与后来的首相卡麦隆（David Cameron）都是他的学弟。从海瑟顿毕业后，吉格梅．辛杰．旺楚克返回帕罗就读乌颜．旺楚克学院（Ugyen Wangchuk Academy）。

第四任国王统治到二○○六年一月，便让位给儿子吉格梅．葛萨尔．朗杰．旺楚克（Jigme Khesar Namgyel Wangchuk）。期间他见证了快速的经济社会发展，奠基于外销印度的水力发电、高端旅游市场及木屋产业，这也让不丹政府得以提供人民免费教育与医疗。新的中产阶级兴起，即使农民仍旧贫穷，但多数可以自给自足，乡间不至于赤贫。

第四任国王引入了某种民主形式，并与印度谈判签订二○○七年条约，让不丹成为真正的独立国家。这段期间，由于一九九○年代初期驱逐尼泊尔裔的政策，导致不丹与尼泊尔关系恶化；印度对于在不丹南部设营训练的东北反抗军也深感不满；中国更开始对这喜马拉雅山王国显露出新兴趣。

对外在世界来说，第四任国王最知名的作为，莫过于提出取代国民生产毛额的新概念：国民幸福指数。伴随国民幸福指数的提出，也展开强化国家认同的积极运动，制定《传统价值与礼节条例》（Driglam

Namzha），以及推广国语：宗喀语，同时无论男女都必须穿着不丹传统服饰，而非西式服装。

此事并不容易，因为不丹是个充满多元民族、人口散居各处的小国。广义来说，不丹包含了四大主要民族，是由七个次团体组成。额朗人（Ngalops）早在七世纪左右就移入不丹，名称意思为「最早兴起」或「首先改宗」；他们与藏人相近，并在歷史早期就改信佛教，宗喀语是他们的母语。额朗人主要居住在不丹的西部与北部，也是主导现代不丹的政治文化团体。505

沙尔乔普人（Sharchops）的名称意思是「东部人」，恰如其名住在不丹东部，是藏族与南亚族裔的混血。据信他们是在数世纪前，由阿萨姆或缅甸北部移入不丹。由于与阿萨姆的连结，除了母语仓洛语（Tshangla）之外，多数也使用阿萨姆语，甚至印地语。仓洛语与宗喀语一样属于藏缅语。沙尔乔普人与边界对面印度达旺地区的门巴人相近；他们虽是不丹国内最大的单一族群，却逐渐为藏人与额朗人文化所吸纳。

接着是不丹各地村落散居的原住部落民，大多是印度教徒，与阿萨姆区域的部落有关。有些族群被认为是不丹多元民族中最原初的住民，部分则是由印度类似部落区域带进不丹的奴隶后裔。

第四个族群则是尼泊尔裔。他们被称为洛昌人（Lhotshampas），名称意思为「南部人」，多数在二十世纪初由尼泊尔及大吉岭区域移入不丹。他们的移入，主要是为了耕作当时在山脉与印度边界间那些由东往西、几无人居的小片低地。尼泊尔移民将一度鲜有人迹、疟疾横行的不丹南部丛林区，转变成富庶的稻田、菜园、柑橘果园及豆蔻园。高地区因此获得食物供给，政府也能向勤劳移民徵纳国家急需的税收。洛昌人多数是印度教徒，说尼泊尔语（属印欧语系），由于是南亚裔外表，可以轻易从人群中被辨识出来。但洛昌人无法融入第四代国王打造的新国家。许多不丹人记得邻国锡金的命运：尼泊尔移民超过原生菩提亚人与绒巴人，国家最终永远失去曾拥有的独立地位。

这问题其实并非最近才发生。早在一九四二年，当时英国驻锡金、不丹与西藏政务官巴西尔．顾尔德爵士就曾警告过不丹，有关移民掌控国家的潜在危机。不丹则回应，由于新移民并未纳入国民，因此「有需要时」可驱逐出境。506一九五二年，离开不丹后定居在西孟加拉邦与阿萨姆邦的洛昌人组成政党，命名为「不丹国家议会党」（Bhutan State Congress Party），号召创建包含尼泊尔、锡金、西孟加拉邦北部与不丹的「大尼泊尔」。两年后，他们试图在不丹村落撒尔邦（Sarbhang）发起「不合作运动」（satyagraha），即印度式的非暴力对抗，并扩大

活动进入不丹。然而很少洛昌人响应，因为他们不希望因此举影响自己岌岌可危的公民身分。不丹政府则透过设立国会中洛昌人的代表席次，以解除不丹国家议会党可能带来的危机。

不丹同时于一九五八年制订《公民法》（Citizenship Act）解决这问题。凡是能证明自己在新法施行前就已在不丹居住超过十年者，就能免受此法规范。进一步移民遭到禁止，但到了一九六○年代初期，却在兴建彭措林至廷布的公路时遇到问题。不丹希望运用本地劳力，印度却认为不可行，不丹无法提供愿意参与此类工程的劳力。印度因此引进无技术劳工，其中大多数是尼泊尔人。等到工程结束后，许多人便决定留在亲族居住的南方村落。

直到一九八八年当局决定进行全国人口普查前，南方区域的非法移民情况并不明朗。人口普查理论上是为了执行一九八五年通过的新《公民法》。新法意在澄清一九五八年法案，规定仅有一九五八年前已定居不丹之家族的后续移民，才能获得公民身分。然而整体调查却以灾难收场。首先，完整调查仅在南部进行；其次，他们在南方各区发现大量超越预期的非法移民。

问题在不丹西南部的桑契宗（Samtse，旧拼音为Samchi）特别明显，此地距印度仅有短短的车程。不丹多数道路都是南北向，由南方印不边界通往北方不丹内地；此外只有一条穿越全国的东西向高速公路。桑契宗邻近噶伦堡，是一九八六至一九八八年动乱受害最深的地区之一。当时一点暴力火花，就能让北印度尼泊尔人自治区变成廓尔喀国（Gorkhaland）。毫不意外，人口普查发现桑契宗人口在一九八○年代中期成长两倍。根据当时不丹政府的文宣所述：「最近完成的桑契宗地籍调查（同时）显示非法土地所有权达四万七千两百三十五英亩，甚至超越全国面积最大的札西冈宗（Tashigang）。」507

一九八○年代末期，全不丹的合法及非法尼泊尔裔居民人数无法确知，但很可能高达总人口数（时为一百三十七万人）的三至四成，因此激起驱逐「非法移民」的运动。在过去，尼泊尔语连同宗喀语及英语，曾是不丹三种官方语言之一，并在学校中被教授。然而从一九八九年起，尼泊尔语不再是官方语言，也不被列入教学。

部分洛昌人在一九九○年成立不丹人民党（Bhutan People’s Party），反抗传统价值与礼节政策，并主张争取南方人民的权利。不丹人民党指控政府逮捕、刑虐并杀害许多涉嫌反王家运动的洛昌人。相对地，不丹政府则宣称不丹人民党的武装组织（该党确实有一些武装组织）烧毁学校、炸毁桥梁并暗杀村庄头人与警察。一九九○年九月至隔年九月，不丹政府从南方反抗者手中没收超过两千件的武器、手榴弹、

地雷及硝化甘油炸药。508

无论何为正确，这场暴力导致大量尼泊尔人出走，至少超过十万人逃离不丹。然而除了中国以外，不丹唯一的邻国印度并不想接收这群人，毕竟具有战略重要性的印不关系，远比洛昌人的悲剧来得重要。因此难民持续涌向尼泊尔，并被安置在尼国南部邻近印度边界的贾帕（Jhapa）与莫朗509县内的许多难民营中。部分洛昌人在此与尼泊尔共产党不同派系人物建立联系。一九七○年代初期，贾帕曾是尼共（毛派）主导起义之地，与边界对侧印度的拿撒尔人起义类似。在尼泊尔同志的启发下，部分洛昌人甚至成立自己的毛派政党。

不需多说，这类活动自然让不丹无法接受尼泊尔与许多西方政府提出的要求：让洛昌人回家。印度也无法忽视尼国南部难民营发出的警讯，中情局早在一九六五年就指出，洛昌人分离主义活动可能造成：

被中国利用的情况。即使中国无法直接触及印度近旁的杜亚尔（阿萨姆丘陵地）。接触管道之一是透过锡金，传闻中国已在此部署特务。西孟加拉邦的大吉岭区域约有一千名印度共产党员，多数倾中，可用以渗透丘陵区煽动颠覆。510

洛昌难民无法返家，即使不丹与尼泊尔已进行多次协商，在未来许多年中，他们仍将待在贾帕与莫朗的困苦难民营里。至于留在不丹的洛昌人，则十分小心不涉入任何反政府行动，因为知道后果将是遭王国驱逐。

不丹的难民危机消停不久，又出现另一个与邻国有关的问题。一九八○年代初期，一场由学生领头的运动席卷整个阿萨姆区域，反对主要来自孟加拉的非法移民。运动中较温和的派系最终形成政党，加入选举竞争；其他人则转入地下，走向争取阿萨姆独立的武装抗争。阿萨姆联合解放阵线（United Liberation Front of Asom [Assam]）的信念混合阿萨姆民族主义与左派理论，在一九八○年代中后期的高峰年代里，于阿萨姆各地设有基地。甚至更有小部分跨越边界进入缅甸，与在当地长久经营的那迦人及曼尼普尔人反抗军合作，逃避印度军队的追击。

一九九○年代初期，印度军方在阿萨姆发动一系列行动，包含「犀牛行动」（Operation Rhino）与「金刚行动」（Operation Bajrang），迫使阿萨姆联合解放阵线退出此地，在孟加拉与不丹南部建立新营地。阿萨姆联合解放阵线与印度东北另外三支武装力量共用营地，包含活跃于阿萨姆波多族（Bodo）平原部落中的波多民族民主解放阵线（National Democratic Front of Bodoland）与波多勐虎解放军（Bodo Liberation Tigers Force），以及坎塔普解放组织（Kamtapur Liberation Organization）。坎塔普解放组织的目标，是在西孟加拉邦

北部与阿萨姆邦西部（亦即尼泊尔、不丹与孟加拉所包围的敏感区域「西里古里走廊」），建立名为「坎塔普」（Kamtapur）的国家。[511]藉由将营地与庇护所建在不丹与孟加拉，这些反抗军在「走廊」两侧都占有据点，对印度的国家安全造成强大威胁。

部分观察者认为，不丹政府「邀请」这些印度东北武装分子，协助他们「驱走」洛昌人。[512]然而此一指控缺乏证据。事实上，这些反抗军是在多数洛昌人离去后才移入不丹，而且营地建在偏远森林山丘上，在洛昌人居住的南方平原之外。比较可信的解释是，不丹缺乏驱逐他们的能力。而营地附近的部分部落民，与这些来自边界对侧的反抗军族群文化相近，因此形成友善环境。

不丹自然承受了来自印度的压力，必须採取行动对付反抗军。不丹政府数次试图透过与反抗军领袖协商来解决问题，但毫无成果，仅剩军事选项。不丹王军在二○○三年十二月採取行动；这支军队接受印度训练，装备大多由印度提供。该次行动代号为「全面清除」，是不丹王军首次进行的主要军事行动，结果相当成功。十二月十五日，不丹攻下阿萨姆联合解放阵线设在萨姆德鲁琼卡尔宗（Samdrup Jongkhar）普卡通村（Phukatong）的总部。次日，十个营地遭到摧毁，许多反抗军阵亡。印度军队虽未直接参与行动，但沿着不丹边界派驻十二个军团，防止反抗军往南逃窜，也用直升机协助撤离不丹伤兵。十二月底，不丹境内再也不存任何印度东北反抗军。[513]

这个被不丹称为「排除作战」（Operation Flush Out）的全面清除作战结束时，不丹截获大批突击步枪、火箭发射器、迫击砲、通讯设备与数万发弹药。多数装备是中国制，并透过所谓的「中国黑市」交易取得，经由孟加拉港口走私到不丹。阿萨姆联合解放阵线与其他反抗军在不丹的营地虽然陷落，但仍旧在孟加拉出没。当时孟加拉是由反印度的孟加拉民族主义党（Bangladesh Nationalist Party）执政。

在痛失不丹藏身处后仅仅四个月，阿萨姆联合解放阵线又面临进一步打击，而这一次是发生在孟加拉。阿萨姆联合解放阵线向中国联络人下了一笔巨额武器订单，装运致命武器的船只却在四月二日抵达吉大港时遭到扣押。船运始于香港，当时船上仅有中国武器，驶往新加坡后，加入其他美国及以色列制武器。根据深受敬重的《简氏情报评论期刊》（Jane’s Intelligence Review）报导：「货运当时正往北通过麻六甲海峡，前往孟加拉湾中等待的两艘拖网渔船，『卡札丹号』（Kazaddan）与『阿玛纳特号』（Amanat）。两船将武器运往吉大港卡纳普利河（Karnaphuli River）的码头。」[514]这批武器包含自动与半自动步枪、AK—47步枪、火箭推进榴弹发射器、手榴弹及大批各种弹药。总价值估计约在四百五十万至七百万美元之间。[515]

武器运送的消息是如何被截获，至今仍不清楚，然而《简氏情报评论期刊》猜测「接到情报后（据了解可能是来自印度的情报），四月二日凌晨武器卸运时，遭吉大港警方与孟加拉步枪队查获。九辆卡车的军火遭到扣押，但据信其中一辆满载军火的卡车在港警抵达前已经逃逸」。516大家对军火流向并无疑问：印度东北地区的阿萨姆联合解放阵线、波多族与那迦族反抗军。

商业导向的新中国也许对向全世界输出革命不感兴趣，然而军火贸易是利润丰厚的生意，只要有买家，网络通达的中国「私人军火商」就愿意卖。武器确实来自中国武器制造商，例如国营的中国北方工业公司，交易可以透过中国门面上的公司，或更方便地透过香港的自由经济与完善金融机构。泰国首都曼谷的中间人也是数个国家武器流通的管道，其中包含中国。

阿萨姆联合解放阵线面对严峻情势，更多问题接踵而至。下一波挑战是在二○○九年十一月，由人民联盟（Awami League）所领导的新孟加拉政府与民族主义党不同，对于支持印度反抗军毫无兴趣，因此逮捕了阿萨姆联合解放阵线主席阿拉宾达．拉吉科瓦（Arabinda Rajkhowa）、反抗军副司令拉朱．巴鲁亚（Raju Baruah）及其他八名武装分子，后续转交给印度。二○一○年九月，曼尼普尔联合民族解放阵线的领袖，对外自称「撒那．亚马」（Sana Yaima）的拉吉库玛．梅根（Rajkumar Meghen），也在达卡被捕并送交印度。同时，以泰国为基地且常造访中国的那迦反抗军主要军火採购人安东尼．希姆瑞（Anthony Shimray），在尼泊尔加德满都机场被捕后转交印度收押。517

失去不丹与孟加拉藏身地后，印度东北反抗军只剩下最后的安全天堂：缅甸西北边陲。阿萨姆联合解放阵线与那迦、曼尼普尔同盟在缅甸实皆省（Sagaing）辛嗄伦坎迪（Singkaling Hkamti）的北方与西北山地区设有数个营地。主营设在钦敦江（Chindwin）西部支流的塔卡（Taka），部分来自中国的武器仍由云南走私进口，经过中缅甸的曼德勒与蒙育瓦，再转送印度边界上的反抗军营地。然而中国治安当局是否直接涉入其中、武器是否在中国黑市购得，则都无从得知。不论如何，这总是处于灰色地带。阿萨姆联合解放阵线总司令派瑞许．巴鲁亚偶尔访视塔卡营地，此外总是长居云南。

二○○四年吉大港武器走私虽是透过「私人军火商」安排，但数量之大，若缺乏有力人士默许也难以成事。巴鲁亚在云南现身及参与吉大港走私事件，显示中国治安当局并未切断与印度东北反抗军的联系，两者关系也明显远超过商业交易。只要达赖喇嘛与西藏流亡政府持续以印度为基地，中国就不太可能放弃这些联系。除了扰乱印度外，此举更在印

度内部留下一步棋，做为边界谈判与其他双边议题的筹码。

虽然不丹只是游戏中的小卒，但对中国并非不重要，毛泽东一度主张不丹应该是属于中国的一部分；但一九七一年不丹加入联合国后，中国在策略上改弦易辙。中情局在一九七五年中印关系报告中，分析了中国对不丹的新兴趣：「不仅要探索如何煽动不丹在印度保护下的不安，更要低调展现中国对维护不丹做为中印缓冲区的兴趣。」518

一九七一年，不丹随同印度投票贊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中华民国，成为联合国的中国席次代表。廷布与北京此刻同时在纽约联合国派驻代表，两国开始建立直接联系。中不开始互动的第一件大事，是吉格梅．辛杰．旺楚克的加冕典礼。虽然他在一九七二年开始担任国王，但加冕典礼必须等到星象家选出的吉时。一九七四年六月二日，乌鸦王冠戴在第四任国王头上，观礼贵宾包括中国驻德里大使馆的临时代办马牧鸣。马牧鸣造访不丹一事，被中国官方新闻通讯社新华社形容为「两国友善接触的新页」。519中国贺词中强调「不丹政府发展经济与维护国家独立的期望」。520

中情局的结论是：「无法疏离老大哥印度的不丹，对于新的中国关系轻描淡写。印度对不丹邀中国上门虽有不满，但明显相信自己对这山区小国包含防卫责任在内的掌控，足以让这次事件就此过去。」521

一九八三年，中国外交部长吴学谦与不丹外交部长龙波．达瓦．慈仁（Lyonpo Dawa Tsering）首度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会面。次年四月，中不第一轮边界会谈在北京举行。中国代表团由外交部副部长宫达非率领，不丹代表团则由不丹驻印大使大肖欧姆．普拉丹（Dasho Om Pradhan）率领。中不双方于四月二十日签订了联合公报，「表达对于首轮会谈的满意」。522

此后中国与不丹总共进行了二十四轮此类会谈，然而进展缓慢。中国仍宣称拥有部分不丹领土，并于一九九○年代在争议区域内进行道路建设与伐木。不丹发出抗议，而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两国签订《关于在中不边境地区保持和平与安宁的协定》，其中载明中国重申「完全尊重不丹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523

中国对于不丹边界的立场，可视为无意间承认麦克马洪线，因为不丹位于喜马拉雅山稜线分水岭南侧；但因中不边界迟迟未正式划定，因此中国随时都可宣称此议题尚未解决。更重要的是，一轮又一轮没有结论的会谈，有利于中国改善与不丹的关系，而这自然对印度不利。二○一六年八月第二十四轮会谈之后，中国外交部发声明表示：「尽管不中尚未建交，但这不会阻碍两国开展互利合作。不丹愿不断深化与中国在旅游、宗教、文化、农业等领域交流，进一步提升合作水准。」524

中国应该也对不丹未接受达赖喇嘛入境而感到满意，虽然后者的决定并不是为了安抚中国。不丹与西藏信仰的佛教虽然形式类似，仍旧分属不同并在许多方面相互竞争的大乘佛教支派。多数接受不丹公民身分的藏人，并未对现有政教体系带来挑战，然而在一九七四年六月，一个计画暗杀第四任国王并烧毁廷布札西却宗（Tashichhodzong）的阴谋被揭发，据闻许多西藏难民与一名大吉岭藏人涉入此案。525虽然并无证据指向达赖喇嘛涉入阴谋，但由于策画者属于格鲁派，比起不丹王室更忠于达赖。部分共谋者成功逃到印度，数十人遭到逮捕但于不久后被释放。无论阴谋背后的理由为何，都点出不丹与藏人并非对抗中国的自然同盟。

随着中国软外交持续推动，新德里也谨慎观望。然而在第四任国王任内，不丹确实重新稳固内政，同时也与其他中小型国家扩大外交领域，避免影响与印度的关系。除了印度外，仅有孟加拉与科威特在廷布设立全权外交代表团；瑞士、丹麦、瑞典都与不丹维持紧密关系；曼谷也设有不丹大使馆，许多不丹家庭将孩子送来此地就学或购物。

多吉家与旺楚克家似乎已然和解，就连夏宗法王的后代也被纳入新秩序中。一九八八年十月三十一日的大型典礼上，第四任国王正式迎娶四姊妹，年龄在二十三至二十八岁之间，这场婚礼办在与她们私下结为夫妻的九年后。四姊妹是亚布．乌颜．多吉（Yab Ugyen Dorji）的女儿，而他是第一世夏宗法王阿旺朗杰「语」及「意」的转世526，更是一九三一年神秘去世的夏宗法王晋美多吉之姪。

第四任国王婚姻故事的正式版本是，国王受预言将娶第一世夏宗法王的后代四姊妹为妻，因此国王顺应预言大婚；但更可信的解释可能是为了收编夏宗法王的追随者。透过一次迎娶四姊妹，就不会发生其他派系利用女儿相互对抗的阴谋诡计。

四王后之一的亚希多吉．汪莫．旺楚克（Ashi Dorji Wangmo Wangchuk）在坦率描述其父亲一生的作品中，意外地仔细描述她的伯祖父晋美多吉事实上是遭到谋杀。当时晋美多吉进入卧室，「他们将他压倒在地，掐住喉咙，踢他的下腹。夏宗法王持续挣扎，直到塞进喉咙的丝巾让他窒息。」527如此清楚的揭露，在一个世代之前还难以想像；然而今日不丹已非过往的中古时代国家。现代化的不丹享有高教育水准，以及穿越全国的优良路网。一九九九年六月引进电视与网路，正如第四世国王当时所言：「反映不丹在近年达到的进步水平。」528电视与网路启用，恰与国王加冕二十五周年同庆，彰显王室在过去数十年的经济社会变动中已巩固的地位。

二○○五年不丹通过新宪法，为选举及更民主的制度铺路，不丹即将

成为君主立宪国家。根据宪法第二条，不丹王室是「王国与人民团结的象徵」529，并将持续扮演深具影响力的角色。此时，第四任国王宣布即将让位给长子吉格梅．葛萨尔．朗杰．旺楚克，其母为三王后。二○○六年吉格梅．葛萨尔．朗杰．旺楚克继承王位，第五任国王加冕典礼在二○○八年十一月于廷布的札西却宗风光举行。这位新任国王生于一九八○年，在美国、英国与印度接受教育，是已经远离中古过往歷史的新一代不丹人。

然而某些老议题依旧盘桓不去。留在不丹国内的洛昌人似乎已适应新秩序，以免有碍公民身分；部分留在尼泊尔难民营者，等待外国接纳他们重新安置。美国接收了绝大多数的洛昌人，特别是在二○○一年九月十一日纽约及华府遭受恐怖攻击之后，此事并非偶然。美国法律规定每年必须接收六万至七万名难民，然而九一一事件后的数年皆未达到人数门槛。根据一名官员私下透露，美国必须寻求「适当的难民族群」，即是非穆斯林族群530，因此选项包括泰国难民营的缅甸克伦人（Karen），他们主要是基督徒；不丹的尼泊尔裔洛昌人，他们是印度教徒。这从未列入正式政策，但超过八万名不丹尼泊尔人赴美重新安置，支持了前述假设。美国的决定是基于尽可能缩减穆斯林移民人数。

然而其他非法移民仍旧带来问题。不丹当地英文报纸《澄清日报》（Kuensel）于二○一六年六月十日报导：「根据国民议会立法委员会向大会提出的非法移民的相关报告指出，持续成长的非法移民，已造成国家治安的严重忧虑及威胁。」531「非法移民」多指在边境城市中帮佣的印度女性移工及印度建筑工人，部分是由印度军事训练团与丹塔克计画（Dantak）雇用。丹塔克计画是印度边境道路组织（Border Roads Organization）下的机构，专门兴建不丹道路。

因此不印关系并非一帆风顺。当不丹忧虑非法移民时，印度则关切中国的迷人攻势，特别是二○○七年新的印不条约给予不丹更多自主时。除非中国影响超越可接受的范围，否则印度不太可能採取行动。然而二○一七年六月，中国军队带着挖土机进入都克兰高原（Doklam Plateau），这是靠近锡金——西藏——不丹交界的区域，被不丹与中国同时宣称拥有。中国计画兴建跨越都克兰高原的道路，将此地称为洞朗，并宣称为中国所有。进入敏感边界区域的举动，印度必然视之为明显挑衅。六月十八日，印度军队进入争议区域阻止道路铺设；两天后，不丹政府透过中国驻德里大使馆向北京发出正式外交照会，抗议中国入侵。

六月二十九日，不丹再次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后者则于当日发布地图，将都克兰高原纳入中国范围。中国引用中英一八九○年签订的条约做为支持证据，并宣称尼赫鲁已经承认；然而该条约仅定义不丹——

西藏边界的北段，而非锡金——不丹——西藏交界处。532同时印度也派遣军队进入锡金，强化一般边界防御。边界情势在双方对峙下升温，这是一九六二年战争以来未曾出现的状况。

两位印度作者摩奴．巴拉强德兰（Manu Balachandran）与哈利许．梅农（Harish C. Menon）在网路媒体《印度石英》（Quartz India）上发表文章，指出此议题不仅是小范围的边界争议。他们认为「中国正在测试印度与不丹的关系，若印度踌躇不决，中国将展开双臂迎接不丹，特别是不丹将外交外包给印度多年之后，如今这小国正开始追求独立的外交政策」。533

不丹身处两难之中。一方面，不印关系事关国家经济、外贸与国防；另一方面，廷布也不能得罪有力的北方邻居。八月一日，不丹驻印度大使维措．朗杰（Vetsop Namgyel）出席德里中国大使馆庆祝人民解放军建军九十周年活动时，震惊了德里外交圈。由于不丹与中国并未建交，他在活动中现身引起高度注目。然而正如当时一名区域媒体评论员所述，此举应视为「不丹对中国表示善意的微妙讯号」。534

危机最终于八月底解决，然而印、中以极度不同的方式，各自宣布从都克兰高原撤军。八月二十八日的声明中，印度外交部表示「经双方同意并持续加速从都克兰对峙地点撤回边界人员」。535另一方面，中国官方新闻社新华社则宣布，印度已将人员设备「撤回跨越的边界……现场中国人员已证实此事，（且）中国将持续行使主权，根据历史边界协定维护领土主权」。536

在印度传统友谊与中国企图争取更多影响力之间，不丹虽试图保持平衡，但未来仍面对重大挑战。此情势将如何影响不丹内部的稳定，则仍有待观察。到目前为止，不丹的社会经济持续稳健成长。描述不丹发展模式时，「国民幸福指数」听来便利又陈腐，但不丹确实成长为相对繁荣的福利国家。除了中国之外，这个喜马拉雅山王国是印度唯一稳定的邻居。巴基斯坦政治混乱且暴力频传；大众情绪起伏与菁英之间的权力斗争，令孟加拉的未来迷茫难测；泰米尔人反抗运动虽于二○○九年落幕，斯里兰卡仍是个未知数；缅甸在内战与民族冲突中撕裂；尼泊尔则由一个政治危机进入另一个政治危机。随着中国转型为极权统治的自由资本主义社会，多数人认为正统毛泽东主义已然消逝。然而到了一九九○年代，毛泽东主义以超乎想像的勐烈力道在尼泊尔重新展开。

458 Andrea Matles Savada, Nepal and Bhutan: Country Studies (Washington: Federal Research Division, Library of Congress, 1993), p. 253.

459 Savada, Nepal and Bhutan, p. 253. The website 'National Anthem of Bhutan', available at http://www.himalaya2000.com/bhutan/national-symbols/national-anthem.html (accessed on 5 November 2016) gives a slightly different English translation with 'consistency' instead

of ‘constancy’, but that may be a typographical error.

460 For a complete text of the 1910 treaty, see Lyonpo Om Pradhan, Bhutan: The Roar of the Thunder Dragon (Thimphu: K Media, 2012), pp. 244–5.

461 ‘Treaty of Perpetual Peace and Friendship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and the Government of Bhutan’. For a complete text of the treaty see, Pradhan, Bhutan, pp. 246–9.

462 ‘India-Bhutan Friendship Treaty (2007)’, Pradhan, Bhutan, pp. 260–2.

463 Quoted in Savada, Nepal and Bhutan, p. 335.

464 Bertil Lintner, ‘China Turns on Charm Offensive for the Himalayan Kingdom of Bhutan’, Yale Global Online, 22 September 2016, available at http://yaleglobal.yale.edu/content/china-turns-charm-offensive-himalayan-kingdombhutan (accessed on 25 September 2016). The article is based on information gathered in Bhutan in June 2016.

465 Thierry Mathou, 2004, ‘Bhutan-China Relations: Towards a New Step in Himalayan Politics’, The Spider and the Piglet: Proceedings of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Seminar on Bhutanese Studies (Thimphu: Centre for Bhutan Studies, 2004), p. 392, available at http://www.bhutanstudies.org.bt/publicationFiles/ConferenceProceedings/SpiderAndPiglet/19-Spdr&Pglt.pdf (accessed on 15 July 2016).

466 译者注：古鲁仁波切（Guru Rimpoche），其中Guru意为「上师」，Rimpoche意为「珍宝」，因此合起来意思是「如同珍宝一般的上师」。

467 译者注：不丹最神圣且举世闻名的佛寺：帕罗虎穴寺（Bacho Dagcang），悬于帕罗山谷九百公尺的悬壁上，据说莲花生大士曾骑虎飞过此地。

468 Savada, Neoal and Bhutan, p. 255: ‘Following the guru’s [Guru Rimpoche] sojourn, Indian influence played a temporary role until increasing Tibetan migrations brought new cultural and religious contributions.’

469 译者注：竹巴（Drukpa），竹为藏语druk音译，原意为「龙」或「雷」（因为藏人认为雷声为龙的吼叫）。十二世纪，噶举派高僧藏巴甲热在拉萨附近的南木建寺，据闻建寺时听到雷声三响，因此命名为「竹寺」（即龙寺之意）。竹巴噶举派便由竹寺得名。后续分裂成三支，南竹巴一支进入不丹，因此不丹也称为「竹域」，即「雷龙之国」之意。

470 Savada, Nepal and Bhutan, p. 255. For a more detailed account of the sects and religious rivalries at the time, see Karma Phuntsho, The History of Bhutan (New Delhi, Random House, 2013), pp. 136–52. Phuntsho’s massive, 663page book is the best and most authoritativ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Bhutan.

471 Quoted in Phuntsho, The History of Bhutan, p. 224.

472 译者注：藏语དབུས་གཙང，汉语称为「卫藏」。

473 Pradhan., Bhutan, p. 15.

474 Michael Aris, The Raven Crown: The Origins of Buddhist Monarchy in Bhutan (London: Serindia Publications, 1994), p. 32.

475 Aris, The Raven Crown, p. 28.

476 Aris, The Raven Crown, p. 40.

477 Aris, The Raven Crown, p. 40.

478 译者注：库齐比哈尔位于不丹、大吉岭、锡金以南，孟加拉以北。一九四九年前为英属印度统治，印度独立后，分别併入西孟加拉邦与东巴基斯坦。

479 Phuntsho, The History of Bhutan, p. 350.

480 译者注：英缅战争共有三次，此为第一次英缅战争。

481 For the text of the treaty, see ‘Treaty of Sinchula - 1865’, and https://

bangaloregorkha.wordpress.com/documents/treaty-sinchula/ (accessed on 10 December 2016).

482 译者注：通萨（Tongsa）位于不丹正中央，是不丹东西公路的关口，无论经商行军、交通往来都需要经过通萨宗。海拔两千两百公尺高的通萨宗，由第一世夏宗法王所建，是掌控整个区域的关键，传统上每位不丹统治者即位时，都必须在通萨宗居住一段时间。

483 Savada, Nepal and Bhutan, p. 261.

484 To minimize the power of the shabdrung, the druk desi decided not to recognize only one but several reincarnations of the same man. Even three reincarnations (body, mind, and speech) were sometimes referred to. See Ashi Dorji Wangmo Wangchuk, Of Rainbows and Clouds: The Life of Yab Ugyen Dorji as told to his Daughter (London: Serindia Publications, 1999), p. 13.

485 Savada, Nepal and Bhutan, p. 262.

486 For the text of the 1910 Anglo-Bhutanese Treaty, also called the Punakha Treaty, see Pradhan, Bhutan, pp. 244–5.

487 Neville Maxwell, 'Olaf Caroe's Fabrication of the McMahon Lin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Vol. 51, Issue 32, 6 August 2016, p. 101.

488 Pradip Phanjoubam, 'Neville Maxwell's "Facts" and Silences',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Vol. 51, Issue No .46, 12 November 2016, available at http://www.epw.in/journal/2016/46/discussion/neville-maxwells-factsandsilences.html (accessed on 18 November 2016).

489 Phanjoubam. 'Neville Maxwell's "Facts" and Silences'.

490 Aris, The Raven Crown, pp. 121–2.

491 Aris, The Raven Crown, p. 122.

492 Savada, Nepal and Bhutan, p. 263.

493 译者注：彭措林（Phuntsholing）是不丹第二大城，位于不丹西南部楚卡宗（Chukha dzong），与印度边界城市热岗（Jaigon）仅有一街之隔。楚卡宗是不丹的经济金融中心，境内更有全国最大的水力发电厂，印度是唯一买主。

494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Intelligence Study: Bhutan between India and China (OCI No. 1105/65), 2 April 1965, declassified on 19 December 2003, p. 19.

495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Intelligence Study: Bhutan between India and China, p. 20.

496 译者注：印度公立学校一般称为「政府学校」（Government School），是由国家兴办提供免费教育的学校。私立学校则称为「公学」（Public School）。一九三五年成立的德拉敦杜恩公学（Doon School）是第一所由印度人兴办的私立公学，名人校友繁多，例如印度前总理拉吉夫．甘地、现任青年事务部部长艾亚尔、商业部长纳特等社会菁英。

497 译者注：亚希（Ashi）是不丹女性皇族敬称，冠于姓名之前；男性敬称为大肖（Dasho）。不丹第三任王后全名为格桑．却登．多吉（Kesang Choden Dorji）。

498 Quoted in Nari Rustomji, Bhutan: The Dragon Kingdom in Crisis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p. 92.

499 Savada, Nepal and Bhutan, p. 264.

500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Intelligence Study: Bhutan between India and China,. p. 15.

501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Intelligence Study: Bhutan between India and China, p. 16.

502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Intelligence Study: Bhutan between India and China, p. 20.

503 译者注：宗喀语（Dzongkha）中的「宗」（Dzong）有两层含义：一指堡垒，二指政府行政部门，特指不丹新旧首都廷布和普纳卡的行政部门。「喀」（kha）字是「语言」的意思。因

此「宗喀」可理解为城堡中使用的语言，或不丹官方行政部门使用的语言。宗喀语是藏语的一种地区变体，在语音和语法上几乎完全遵循藏文传统语音学，它跟现代藏语都源自中古藏语，因此宗喀语和现代藏语在书面形式多有相同之处，口语方面也能相互理解。一九五○年代，在宗喀语成为国语前，不丹的公立学校一直都教授和使用丘喀语（chöke/chökey），这是以佛教《大藏经》为代表的古典藏语。此外，宗喀语与锡金语关系密切，两种语言一定程度上可以互通。不丹（特别是农村地区）交通不便，居住分散，人口流动性小，因此语言相互接触少。宗喀语是廷布区域使用的语言，虽衍生出数种方言或变体，但非宗喀语区的农村人口对宗喀文的识字率不高。

504 Aris, The Raven Crown, p. 56.

505 Savada Nepal and Bhutan, pp. 273–5.

506 Sunanda K. Datta-Ray, Smash and Grab: Annexation of Sikkim (New Delhi: Vikas Publishing House, 1985), p. 51.

507 Bertil Lintner, 'Bhutan, India and the Nepalese Diaspora', The New Asia-Pacific Review, Vol. 3, Issue No. 2, 1997, p. 18.

508 Lintner, 'Bhutan, India and the Nepalese Diaspora' and Bertil Lintner, 'Stateless in Shangri-la',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25 July 1996, p. 30.

509 译者注：莫朗（Morang）位于尼泊尔东部边陲，北接西藏，东接锡金与大吉岭，南接印度比哈尔邦。贾帕为农业区，莫朗则是农产品加工及轻工业区，产品主要流向印度。

510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Intelligence Study: Bhutan between India and China , p. 21.

511 For an account of the insurgency in Assam, see Bertil Linter, Great Game East: India, China and the Struggle for Asia's Most Volatile Frontier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 144–203.

512 See for instance Ramtanu Maitra, 'Pakistan's Bhutan gambit worries India', Asia Times Online, 25 November 2004, available at http://www.atimes.com/atimes/South_Asia/FK25Df03.html (accessed on 15 December 2016) and S. Chandrasekharen, 'The ULFA and Bodo militants were invited into Bhutan', 2006, available at http://freu.blogspot.com/2006/08/ulfa-and-bodo-militants-were-invited.html (accessed on 15 December 2016).

513 For a detailed account of Operation All Clear see '2003: Operation all Clear', 2013, available at http://bhutannews.blogspot.com/2013/09/2003-operation-all-clear.html (accessed on 15 December 2016).

514 Anthony Davis, 'New Details Emerge on Bangladesh Arms Haul', Jane's Intelligence Review, August 2004 (closed website, copy provided to the author by Davis).

515 Davis, 'New Details Emerge on Bangladesh Arms Haul'. For a complete list of the seized equipment, see Lintner, Great Game East, p. 268.

516 Davis, 'New Details Emerge on Bangladesh Arms Haul'.

517 Mithu Chaudhury, 'NIA Report Reveals NSCN(IM)-China Link', North East News Portal, 14 January 2013, http://northeastnewsportal.-blogspot.com/2013/01/nia-report-reveals-china-link.html (accessed on 18 December 2016).

518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Research Study: Chinese-Indian Relations: 1972–1975, September 1975, declassified on 29 June 2004, p. 7.

519 Quoted in Mathou, 'Bhutan–China Relations: Towards a New Step in Himalayan Politics', p. 399.

520 Quoted in Mathou, 'Bhutan–China Relations', p. 399.

521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Research Study: Chinese-Indian Relations: 1972–1975, . p.

7.

522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A Chronology of Events (1949-1988)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89), pp. 149.

523 For the text of the agreement, see Mathou, 'Bhutan–China Relations: Towards a New Step in Himalayan Politics', pp. 410–11.

524 'China and Bhutan Hold 24th Round of Talks on the Boundary Issu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5 August 2016, available at http://www.fmprc.gov.cn/mfa_eng/wjbxw/t1389633.shtml (accessed on 20 August 2016).

525 Rustomji, Bhutan, pp. 145–7.

526 译者注：夏宗法王圆寂后有身、语、意三个转世传承世系，其中身转世于十八世纪中叶终结，语及意转世则持续到二十世纪。意转世一般认为是主要的转世传承世系。

527 Ashi Dorji Wangmo Wangchuk, Of Rainbows and Clouds, p. 31. See also Norma Levine, Love and Death: My Years with the Lost Spiritual King of Bhutan (Kathmandu: Vajra Publications, 2011). The book is written by a Canadian woman who had an intimate relationship with the exiled (but not recognized) shabdrung who died in 2003. Some claim that he was poisoned, while the official version is that he died from cancer. He is considered by many as the last shabdrung, although some regard a young boy, born in 2003, as the newest incarnation. In early 2007, reports alleged that the boy, Pema Namgyen, along with his parents, has been held under house arrest in Bhutan since 2005 after being invited to there from his home in India, see 'Shabdrung', available at http://www.chinabuddhismencyclopedia.com/en/index.php/Shabdrung (accessed on 15 December 2016).

528 'Bhutan TV follows Cyber Launch', 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BBC), 2 June 1999, http://news.bbc.co.uk/2/hi/south_asia/358230.stm (accessed on 15 December 2016).

529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Kingdom of Bhutan (Printed at The Kuensel Corporation, 2008), p. 4. The constitution is also available at http://www.nationalcouncil.bt/assets/uploads/files/Constitution%20%20of%20Bhutan%20English.pdf (accessed on 15 December 2016).

530 A US government official, speaking on condition of anonymity, told me this in December 2014.

531 'Illegal Immigration Concerns NC', Kuensel, 10 June 2016, p. 1.

532 A.S. Nazir Ahamed, 'Did Nehru really accept the Sino-British Treaty as final word on the border issue?' The Hindu, 5 July 2017.

533 Manu Balachandaran and Harish C. Menon, 'Fifty years after round one, Bhutan and China are stuck in another border face-off,' Quartz India, 4 July 2017, at https://qz.com/1020177/50-years-after-round-one-bhutan-china-andindia-are-stuck-in-another-border-face-off/ (accessed on 13 August 2017).

534 M.K. Bhadrakumar, 'China raps India over Doklam standoff, but dogs are on leash,' Asia Times, 3 August 2017, at http://www.atimes.com/article/chinaraps-india-doklam-standoff-dogs-leash/ (accessed on 13 August 2017).

535 James Griffiths, 'India, China agree to "expeditious disengagement" of the Doklam border dispute', CNN, 29 August 2017, available at http://edition.cnn.com/2017/08/28/asia/india-china-brics-doklam/index.html (accessed on 1 September 2017).

536 James Griffiths, 'India, China agree to "expeditious disengagement" of the Doklam border dispute'.

# 第七章　毛主义再现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三日本是相当平静的星期二。没有人（特别是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统治圈中）会想到王国将发生任何反常之事。然而就在这天，手持斧头、旧猎枪与土制炸弹的群众，对尼国西部赤贫区域的罗尔帕（Rolpa）、鲁孔（Rukum）及东部辛杜利（Sindhuli）的警局发动攻击。攻击者占领警局，抢走枪枝、弹药与其他器材设备。

在卡巴雷（Kavre），攻击者掳走一名高利贷，所有写着借款人姓名的借据都付之一炬。类似事件也发生在廓尔喀县（Gorkha），农业发展银行当地分行遭到占领，并宣告所有借款人的债务全免。在加德满都谷地，百事可乐工厂遭投掷汽油弹，部分建筑物毁坏。全国各地出现海报传单，鼓励人民支持起义。尼泊尔毛派发起对抗王室的「人民战争」，将建立共产党的「人民共和国」。

但起义不全然令人意外。前一年，匿名「普拉昌达」（Prachanda，意为「凶勐者」）的帕苏巴．卡麦尔．达哈尔（Pushpa Kamal Dahal），以及巴布拉姆．巴特莱（Baburam Bhattarai）共同领导的极端基进派，与尼泊尔共产党主流派系分裂，并指责后者是参与议会程序的「叛徒」及「修正派」。随着极左派的分裂，尼共影响力似乎也随着一九九四年选举结果公布而减弱，因此政府当局发动攻势，试图镇压他们认定的左派运动余孽。一九九五年十一月，政府向基进派重镇罗尔帕发动「罗密欧行动」（Operation Romeo）。在十二月转入地下前的最后访谈，巴特莱告诉尼泊尔周报《独立报》（The Independent）：

这次的警察武装行动，加德满都派出约一千五百名警力，其中包含特勤部队，在崎岖的尼泊尔西部山区（罗尔帕），对贫穷农民进行恐怖统治。目前约有一千人遭到逮捕，其中三百人因虚构的罪名遭警方关押或被送入监狱，其他人则在严刑之后交保释放。537

巴特莱在这场访问后不久即离开加德满都，与友人普拉昌达会合。尼泊尔共产党（毛泽东派）就此诞生，不过其实际成立日期目前依旧不明，推测可能是早在一九九四年末，尼国西部警察镇压行动前就已形成。且不论组织名称，在一九九六年二月的尼共（毛派）攻击事件前，已经存在一个组织完善的地下毛派运动。根据普拉昌达的观点，诉诸武装斗争是「对尼泊尔共产运动中高涨的修正派一次决定性打击。换句话说，这个伟大过程开始燃烧修正派垃圾。事实上，二月十三日起我们证明了，国际无产阶级主义的真义，在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的形式中再次获得肯定」。538

当天採取的行动明显有经过事先详细规划，目的是造成最大冲击与象徵意义。地方警察是政府压迫人的爪牙，银行与高利贷业者剥削贫民；以普拉昌达的角度来看，攻击百事可乐工厂象徵承诺「将人民从直接代表帝国主义的中产买办阶级中解放出来」。539这场斗争如普拉昌达所说：「从二月十四日开始，蔓延全国……（同时）对抗全国各处封建势力与受雇暴徒的行动，特别是来自农村区域，持续发动。尼泊尔的天空响彻口号，『毛主义万岁！』『人民战争万岁！』『新民主万岁！』」540

这是一场极度恶劣的战争。数万名男女在厮杀中失去生命，竟是为了追求世上多数人认为不合时宜的主张。第三世界因毛主义鼓舞而产生的起义行动，在一九六○与一九七○年代并不少见，然而到一九九○年代末期与二十一世纪初还有影响力吗？尼泊尔毛派那些华而不实的文字，读起来也像另一个年代的事物；然而极左派与毛主义在尼泊尔政治中扎根极深。尼泊尔共产党是尼国第一个共产政党，在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二日，由四名尼泊尔知识青年于加尔各答成立。其中之一，普什帕．拉尔．什雷斯塔（Pushpa Lal Shrestha），或称PL同志，成为该党首任总书记，一般被认为是尼泊尔共产主义之父。

一九一一年，尼泊尔国王狄里布凡（Tribhuvan）即位时年仅十一岁。他在位的前几年，尼泊尔曾经歷一段短暂的相对民主时期，当时国王仅是没有实权的傀儡。自一八四六年起，国家就由英国的老盟友拉纳（Rana）家族世袭的首相所掌控。之后，国王透过独立印度的支持，开始挑战拉纳家族。一场反对寡头政权的大众运动在一九五○年爆发。一九五一年初，流亡印度一年并支持运动的狄里布凡国王、拉纳家族与主要反对党：尼泊尔国大党（Nepali Congress）代表，在德里会议中达成妥协。新政府将在国王领导下成立，由尼泊尔国大党及拉纳家族分庭抗礼。国王于二月十八日返回加德满都，二十一日宣布拉纳专制统治结束，尼泊尔展开第一次民主实验。

由于尼泊尔共产党在推翻拉纳家族上扮演重要角色，因此成为合法政党。然而当尼泊尔国大党的武装民兵「护卫团」（Raksha Dal）在一九五二年掀起暴动并遭到镇压后，尼泊尔共产党因同情起事也遭禁止，直到四年后禁令取消，才能再次在加德满都举行全国大会，通过革命性党章，鼓吹终结王室，建立共和国。这段政治开放时期十分短暂。一九六○年十二月十五日，新任国王马亨德拉（Mahendra）发动政变中止民选国会，解散政府，改採「评议会」（Panchayat）这个全新体系。「评议会」是以上下阶级体系建立，由村庄、县市到国家评议会，顶端则是国王。尼泊尔共产党再次遭禁止，不过这次是所有政党都被禁。

一九六○年的王室政变、党禁，以及一九六○年代的中苏冲突，导致

尼泊尔多次共产运动分裂的开端。实际上支持王室的尼共总书记凯沙尔．荣．拉亚马吉（Keshar Jung Rayamajhi）当时正在莫斯科参加共党会议；而一九六一年三月，尼共在印度的达尔邦加（Darbhanga）举行全国大会，撤除拉亚马吉的总书记职位，次年更将他驱逐出党。拉亚马吉拒绝接受党的决定，因此成立了自己的共产党。同时，尼泊尔共产党「主流」虽然忠于莫斯科，但普什帕．拉尔与较基进的同志们却在中苏冲突中支持中国。因此尼泊尔共产党（普什帕．拉尔派）诞生，由普什帕．拉尔担任领导，直到他一九七八年去世为止。

一九七○年代初期受到印度拿撒尔运动启发，贾帕县爆发反抗事件，催生出另一个政党：尼泊尔共产党（马列派）。尼共（马列派）成立于一九七八年，在东南部平原区的比拉特那加（Biratnagar）活动。同年，倾中运动的类似支派在东南部成立了尼泊尔工农组织（Nepal Workers’ and Peasants Organization）。一九七○年代的动乱中又浮现另一支共党派系，是效法印度的「独立」共产党：印度共产党（马克思派），是由当时追随普什帕．拉尔的尼共前总书记曼摩罕．阿迪卡利（Manmohan Adhikari）领军，这支派系自称尼泊尔共产党（马克思派）。

一九九○年春，这动乱王国又陷入新一波危机。一场名为「人民运动」（Jan Andolan）的大众起事，迫使马亨德拉国王的长子继承人毕兰德拉国王同意，废止接近绝对王权的统治。在国王最终对大众让步并终结旧体系前，加德满都有超过五百名抗议者在与警方的激烈冲突中丧生。一九九一年五月，新的多党体系成立，并举行国会大选，而共党各派系也由地下浮上台面。一开始，即使是最基进的派系也参与了民主选举程序，其代表组织，联合人民阵线（Samyukta Jana Morcha/United People’s Front）在一九九一年下议院两百零五席选举中赢得九席，成为国会第三大党。当时由青年知识分子巴特莱领军的联合人民阵线，以「贪腐下台」及「还富于民」等不算基进的口号，吸引了许多不满的尼泊尔青年。

然而一九九四年七月，尼泊尔国大党组成的第一个民选政府解散国会，让已然错综难解的情势雪上加霜。同年十一月大选后，尼泊尔共产党（联合马列派）领军形成少数政府。尼共（联合马列派）是一九九一年由马列派跟马克思派的尼共联合形成。尼共（联合马列派）的领袖曼摩罕．阿迪卡利成为尼泊尔新首相。尼泊尔成为除了欧洲的圣马利诺（San Marino）外，第一个共产党透过选举执政的国家。

然而新的左翼政府也无法改善贫苦大众命运、清除贪腐，执政九个月即告失败。接着是一连串脆弱无用的联盟，政党间的合作是利益交换而非共同理念。重返民主之路一片混乱，一九九○年人民运动的参与者

更是挫败无望。

虽顶着尼共（联合马列派）的名号，但这政党对许多人来说确实不够基进，比较像欧洲的社会民主党，并非准备带来基进政经改革的斗争组织。整个尼泊尔从一九九○年人民运动以来，革命情绪依旧沸腾。尼泊尔基进派动向的明确指标出现在一九九二年九月，当时秘鲁「光辉道路」（Shining Path）游击队领袖阿维马埃尔．古斯曼（Abimael Guzmán），又被称为贡札罗主席（Chairman Gonzalo），在首都利马被捕，这组织自一九八○年以来，持续不断与秘鲁政府进行激烈的武装斗争。捍卫古斯曼国际紧急委员会（International Emergency Committee to Defend the Life of Guzmán）的伦敦工作人员，对收到大量来自尼泊尔的支持信件感到相当惊讶。541

当时尼泊尔毛派已透过神秘组织国际革命者运动（Revolutionary Internationalist Movement），与秘鲁的同志接上线。国际革命者运动包含来自美国、印度、伊朗、土耳其、拉丁美洲与西欧的毛派团体，该组织期刊《赢得世界》（A World to Win）是一份内容丰富的杂志，每年出版二至三期，刊登世界各地武装革命斗争的资讯，其中包含尼泊尔。

学者史蒂芬．米克赛尔（Stephen I. Mikesell）在加德满都的《雪山》（Himal）新闻杂志撰文表示：

秘鲁与尼泊尔之间明显可见地缘文化类比。两国都跨在所处大陆的山脉上，孤立村庄与高山造就广大相异的文化传统。两国近期歷史上皆无外国势力征服与占领，例如一九三○年代的中国；却都有大批农村原住民族受少数统治菁英宰制。因此两国都因种族、种姓与区域因素而分裂。542

光辉道路游击队的高峰期与尼泊尔毛派武装运动崛起期间，秘鲁与尼泊尔都经歷了激烈扩大的城乡差距。尼泊尔虽然在一九九○年代建立民主制度，同时经济较为开放，但薪资成长实际上停滞不前，国民生产毛额年平均成长率仅百分之二点三，这表示快速的人口成长率（百分之二点四）吃光新政府所有成就。根据加德满都智库，尼泊尔南亚中心（Nepal South Asia Centre）的报告，即使在首都地区，百分之七十一的财富掌握在百分之十二的家户手中；仅有百分之三点七的国家收入流向总人口最贫困的百分之二十区间。543

区域差异也很严重。一九九○年代，加德满都地区每人年均收入约为两万一千尼泊尔卢比（约合三百一十二美元），然而西北赤贫地区仅有五千卢比，当地既缺乏道路，也没有发展活动。外资支持的研究机构国际山岳整合发展中心（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Integrated Mountain

Development）在一份一九九七年的报告中，列出西部区域在识字率、童工、无地家户与人均食物生产上，都是最糟糕的区域。544夏姆．什雷斯塔（Shyam Shrestha）在左翼《评估月刊》（Mulyankan）上形容尼泊尔的西北地区是「赤贫区域……主要住民马嘉人（Magars）是非常『落后』的民族，透过前往印度担任移工维持生活。这块区域歷史上由小封建领主统治，直到今日，贫富之间仍保持一种中古时代关系，而这正是毛派活动的经典环境」。545

一九九○年起义前夕，人民的广泛不满除了针对普遍贪腐、政治社会动盪、嘴砲政客、滥用权力而非带来经济成长与社会平等现象外，什雷斯塔还暗示了尼泊尔「人民运动」一个非常重要的面向：尼泊尔错综复杂的种姓制度，以及高度多样性的族群组成。毛派战士主要是来自于低种姓与所谓的「落后」族群，例如山地居民蒙古族裔马嘉人（Mongol Magars）、靠近低地狭长谷地中的塔鲁人（Tharus）。毛派与其「无产阶级理想」的到来，让这些低阶种姓与部落族群取得权力，统治高阶种姓如巴洪（Bahuns）与切特利（chhetris），即当地的「婆罗门」与「剎帝利」种姓。尼泊尔社会中的印欧族裔上层阶级，传统上将这些人视为次等公民或者更糟。从许多毛派低阶士兵的案例中不难理解，为何如此不合时宜的运动能在尼泊尔造成广大迴响。这国家需要一场社会革命，而对许多人来说，尼泊尔共产党（毛派）是取代古老压迫秩序的唯一选项。

就连普拉昌达在评估头两年战争的文章中也写道：

随着人民战争发展，一种为自己权利而战的新意识正在诸多受迫族群中蔓延，例如马嘉族、古隆族（Gurungs）、塔曼族（Tamangs）、尼瓦尔族（Newars）、塔鲁族、拉伊族（Rais）、林布族（Limbus）与马德西族（Madhesis）……类似的……组织斗争浪潮也在达利（Dalits）种姓（低阶种姓族群）间快速发展并扩散。今日达利人开始反抗高阶种姓印度教徒封建国家施加给他们的不人道残暴统治。546

然而尼共（毛派）许多领袖（包含普拉昌达与巴特莱），其实都是巴洪种姓知识分子，这也与「光辉道路」高度相似，组织领袖古斯曼也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哲学系教授，而追随者多数属于非欧洲裔的原住民族部落贫苦大众。同样的脉络令人望而生惧，同属毛派的柬埔寨红高棉军（Khmer Rouge），也是受过法国教育的知识分子领导来自乡间的贫农士兵。对都市富人恨意所驱动的力量，远胜过意识型态。

一九五四年，普拉昌达生于喀斯奇县（Kaski）的村庄，虽是农夫之子，仍属巴洪种姓。这位未来的革命领袖就读尼泊尔南部兰姆普尔农牧科技学院，并获得农业科学文凭。讽刺的是，他曾受雇于美国援外总署

（United State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的贾甲廓（Jajarkot）计画区，此地后来成为毛派重镇。547

巴特莱同样生于一九五四年，在廓尔喀县的山地区域成长，其父母与普拉昌达的双亲一样是巴洪农民。一九七○年，巴特莱在尼泊尔全国高中毕业考拿下全国第一名，接着前往印度求学，在昌迪加尔大学（Chandigarh University）以优异成绩取得建筑学士，并且在知名的德里尼赫鲁大学（Jawaharlal Nehru University）获得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题目是《尼泊尔区域架构与开发落后探析：马克思主义分析》（The Nature of Underdevelopment and Regional Structure of Nepal: A Marxist Analysis）。548他在印度求学时就成立了全印尼泊尔学生会，并担任主席。549

他们要踏上的武装反抗之路，始于一九九四年选前。当时联合人民阵线重大分裂，巴特莱领导的主要团体决定杯葛选举，而尼拉强．哥文达．维迪亚（Niranjan Govinda Vaidya）领导的较小派系则决定继续参选，不过最终并未赢得席次。这次分裂使政府当局认定左派已趋于弱势，后来证明这是个重大误判。

一九九六年二月第一波攻击之后，武装反抗迅速被传播到邻近县城，其中包含撒利扬（Salyan）、贾甲廓、卡利廓（Kalikot），以及尼国其他区域。新的口号与联合人民阵线相对温和的言词或一九七○年代的贾帕运动比较，带有更多的火药味：「战！战！战！从头到尾！」550

但以秘鲁光辉道路为模范，并未让尼泊尔受中国喜爱。一九八○年十二月，早起的利马人发现秘鲁首都路灯与号志灯上吊着死狗，并写着标语：「邓小平，狗娘养的！」551一九八九年十月二十五日，利马的苏联与中国大使馆外遭汽车炸弹攻击，主导活动的光辉道路认为莫斯科与北京的共党领袖背叛了马列思想。一九九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光辉道路游击队又点燃两个汽车炸弹，这次则是在利马的日本与中国使馆外。中国是秘鲁毛派的明显目标，而当时秘鲁总统藤森（Alberto Fujimori）是日本后裔，因此被视为日本国际企业的傀儡。

普拉昌达总结尼共（毛派）「人民战争」一九九七年的经验，认为武装斗争的第一年已经在「包含印度的南亚革命者间」建立稳固关系，「……毛派人民战争获得印度千万人的支持，他们也正在不同邦掀起民族解放斗争……孟加拉与斯里兰卡的共产革命者，也同样支持尼泊尔的人民战争。」552

在这些据称支持尼共（毛派）「人民战争」的国家中，最令人注目的是，中国并不在其列。尼共（毛派）仅指控邓小平将新中国领导为修正主义，而普拉昌达在自己的文章里写道：

在第三世界半封建、半殖民国家普遍面对剥削、压迫与赤贫的客观背景下，对大众来说，除了反抗与革命别无选择。在尼泊尔，我们首要任务是正确掌握马列主义科学。为此，我们致力连结世界真正共产革命者发起的激烈意识斗争，并肩对抗毛泽东同志死后的中国反革命。以伟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大成，阶级意识斗争的最高表现做为起点，我们将深入严肃钻研。553

尼共（毛派）的美国支持者李．奥内斯托（Li Onesto），同时也是芝加哥《革命工人》（Revolutionary Worker）周报专栏作者，在她关于尼泊尔战争的书籍中也响应相同观点，「尼泊尔毛派谴责现行中国政府，在毛泽东死后推翻并瓦解社会主义。中国政府虽明确支持镇压反抗行动，但也极度忧虑印度为避免毛派掌权，可能入侵尼泊尔。」554

说印度可能「入侵」尼泊尔也许有些过度。印度有其他影响尼泊尔政治的管道，例如透过与尼泊尔国大党和其他台面上政治人物的亲近关系。中国这一方则指控尼共（毛派）扭曲毛泽东思想：「将无差别杀害平民的行为称作人民战争，正是抹黑毛泽东名声……二○○五年二月三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孔泉对于外媒称尼泊尔反政府叛军为『毛派』一事表达了愤怒。」555

中国与尼泊尔的关系，一向都以地缘政治而非意识型态为考量，中国希望打造喜马拉雅山区策略廊道，以对抗印度在边境区域的影响力。中尼于一九五五年正式建交，隔年八月及九月，双方政府代表在加德满都首次直接对谈。会后，唐卡．普拉萨德．阿恰利亚（Tanka Prasad Acharya）成为后拉纳家族时代中首位造访中国的尼泊尔首相，并与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举行会谈。中国同意提供六千万印度卢比（比起无法兑换的中国人民币，印度卢比在尼泊尔更受欢迎），协助推动尼国第一次五年计画。556同年，尼泊尔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一九五七年一月，周恩来访尼。由于当时中印关系尚未变质，因此中尼关系亲善也未困扰印度。

一九五九年边界争议导致中国军队移往尼泊尔边界后，中国对尼政策有了改变。中国地图视尼泊尔领土属于中国的一部分，并宣称圣母峰为中国所有，称之为珠穆朗玛峰。557当年发生西藏起义事件之后，总数超过两万的大批难民涌入了尼泊尔。今日多数人虽仍旧在此，还是有大量难民持续前往印度，因为环境较友善且能自由从事政治活动。

一九六○年三月，尼泊尔首相毕许威许瓦．普拉萨德．克伊拉拉（Bishweshwar Prasad Koirala）访北京时解决了边界争议，并与中国签订《和平友好条约》，条款之一是勘察并划定共同边界。次年九至十月，王室政变建立评议会体系后，马亨德拉国王与王后正式访问中国，

会见国家主席刘少奇与总理周恩来。十月五日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尼泊尔王国边界条约》，「缔约双方以传统习惯边界线为基础，并且根据平等互利、友好互让的原则，划定全部边界走向。」558

在十月十五日（国王访问行程的最后一天）双方签订协议，铺设一条由西藏通往加德满都的高速公路。两国政府将各自负责兴建自己境内的路段，但中国承诺将慷慨提供资金协助兴建尼泊尔段。此后数年，兴建团队穿山越岭，公路以十三世纪尼泊尔人阿尼哥（Araniko）为名559，传说他曾将尼式建筑引入西藏与中国。

这条公路于一九六七年正式开通，虽然数世纪以来旧的牦牛商旅多半沿着相同路线，这仍是第一条穿越喜马拉雅山的高速公路。中国在西藏新建的公路系统现在不只向下延伸到印度边界，更穿越喜马拉雅山巅。中尼友谊桥横跨边境的桑科西河（Sun Koshi River），连接尼泊尔辛杜帕尔乔克县（Sindhupalchok）柯达里（Kodari）与西藏樟木镇。

在公路兴建之前，尼泊尔一九六二年撤回驻西藏大使，改以总领事取代，藉此取悦中国。隔年一月二十二日，两国边界终于正式划定。在一九六二年中印战争中，尼泊尔曾宣布中立，并表明不会接受任何国家入侵。尼国此讯息虽是针对中国，但仍支持中国争取联合国代表权，并维持与北京的关系。560一九六二年战前，印度与尼泊尔签订武器协助协定，印度承诺将「为尼泊尔全军提供武器、弹药与设备，（并）尽速以现代化武器取代现有尼军军备，且就印度提供之武器设备，提供维护及替换」。561

但此时尼国已经开始打中国牌，减少传统上对印度的依赖，因为后者令许多尼泊尔人相当不安。中国明显视尼泊尔为印度北方边防的弱点，可用来延伸中国对喜马拉雅山区的影响力。因此，当尼泊尔通往西藏的公路开启新贸易路线时，印度对此心有不满，并在一九七○年对尼泊尔实施边境封锁。虽然封锁期不长，然而尼国经济一九七○至一九七一会计年度的成长率仅有百分之一点七，远比前一年成长率百分之九点八低。562令印度更加苦恼的是，经过封锁后中尼关系更形亲密。

尼泊尔不像锡金，后者在外交政策上不可能脱离印度而独立；也不像不丹有更加圆滑的折冲技巧，能在不得罪南方强邻的情况下建立自己的认同。尼泊尔逐渐成为中印区域竞争中的马前卒。

即使中情局支持的西藏游击队进驻木斯塘，似乎也未对北京共党统治者与加德满都王室的新友谊造成负面影响。毕兰德拉国王于一九七三年十二月访问中国，正是中尼在一九六○年代与一九七○年代初期建立的亲近关系，因此尼军一九七四年时将西藏反抗军赶出木斯塘藏身地。同年，尼泊尔强力抨击印度国会将锡金变更为附邦的决定，并称印度为

「扩张主义国家」。[563]中国则回报以更多道路建设计画；一九七六年四月，尼泊尔与「中国西藏自治区」签订贸易协定。[564]

即使歷经一九九○年动盪与废除绝对王权后的混乱年代，无论由谁当政，中国都持续与加德满都的当权者保持亲密关系。二○○一年六月一日，王储狄潘德拉（Dipendra）冲入加德满都的纳拉扬希蒂王宫（Narayanhiti Palace），在王室每月例行聚餐中对众开枪，导致尼泊尔情势更加恶劣。九名王室成员死于枪杀，包含狄潘德拉的父母毕兰德拉国王与艾许瓦莉亚王后、弟弟尼拉詹、妹妹施鲁蒂与其他五名亲戚。狄潘德拉自杀未遂，在六月四日伤重不治前曾短暂继位；他死后，由马亨德拉的另一个儿子，毕兰德拉之弟贾南德拉（Gyanendra）宣布即位为王。

王室屠杀案后，各种阴谋论在加德满都流传，甚至包含了印度与中情局介入的精采版本。然而并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狄潘德拉除了对父母不满外，是否有受到任何外力驱使。[565]当他持枪杀害这些家人时早已酩酊大醉，并且因吸食大麻而兴奋激昂。狄潘德拉想娶拉纳家族之女狄维雅妮．拉纳（Devyani Rana）为妻，而她与印度瓜里尔（Gwalior）王室也有亲戚关系；然而艾许瓦莉亚王后并不贊同这段关系。屠杀事件之后，狄维雅妮．拉纳为躲避媒体关注而逃往印度，现今在联合国发展组织（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工作。

这段期间，透过一连串银行抢劫及在控制区域的所有大城镇（甚至国外）全面强加人民「革命税」，尼共（毛派）成为亚洲最富裕的反抗运动者之一。根据加德满都出版的尼泊尔文报纸《首都日报》（Rajdhani Daily）报导，即使最贫困的农民也不能免除这些赋税，「家户被迫依据房屋价值缴税，而瓦顶或铁皮屋顶的人家，比茅草屋顶缴纳更多税。反叛军下令，非营利组织与社区组织在未取得书面许可前，不得展开任何计画。」[566]

大量金钱也从国外尼泊尔人「收集」得来，特别是在印度的数百万尼泊尔移工。移工中的主要组织「全印尼泊尔团结协会」（Akhil Bharatiya Nepali Ekta Samaj）在二○○二年七月因为与尼共（毛派）的关系而遭禁止。印度当局于九月七日逮捕秘书长巴姆德夫．切特利（Bamdev Chhetri），并将之遣返尼泊尔；切特利当时被认为是尼泊尔毛派在印度最重要的联络人。

贫困加上家乡的政治社会动盪，迫使数万尼泊尔人成为移工。根据报导，香港大约两万多人的尼泊尔社群中，存在一个小而活跃的毛派小组，并强迫收取「革命税」。尼共（毛派）的另一种新颖做法，是向外国游客发行贩售登山许可，连同一份声明解释毛派成立共产共和国的努

力。据估计，二○○二年的尼共（毛派）总收入约在五十亿至一百亿尼泊尔卢比之间（约合六千四百万至一亿两千八百万美元）。567

然而尼共（毛派）并未获得外国政权的资金或武器协助，其军火几乎都由军队仓库及驻站劫掠而来，部分则来自印度比哈尔邦的地下枪枝工厂。二十一世纪初，毛派相关暴力已经散布到尼泊尔全部七十五个县。鲁孔、罗尔帕、撒利扬及贾甲廓等西部县市是山区毛派的核心区域，政府势力仅能掌控县市中心，以及一串通往南方低地道路上的检查哨。即使在毛派重镇外围的卡利廓、代列克（Dailekh）、苏尔凯特（Surkhet）、丹（Dang）与皮优檀（Pyuthan）等县市，除了主要城镇外，政府势力几乎不存在。

毛派接掌尼泊尔并非不切实际。然而和平协议在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签订，尼共（毛派）的人民战争突然告终，这让多数人（特别是中国）都松了一口气。568总计十年的反抗行动导致了一万五千人死亡，超过十万人流离失所，国家基础建设尽成废墟。经过内部调解人士三年的折冲谈判之后，终于促成协议。尼共（毛派）的「人民战争」战士将限制在联合国监管的七个营区内；这些战士将接受「复员」，领导人则获得适当保护。

相对地，协议中指出：

国王将不再拥有国家权力。前国王毕兰德拉、前王后艾许瓦莉亚及其家族成员拥有的财产，将由尼泊尔政府接管，在国家利益下透过信托加以运用。贾南德拉国王在位期间取得之所有财产（例如不同地点的宫殿、森林与国家公园、歷史与重要建筑遗产等）将予以国有化。569

该协议同时订定，应制定并执行土地改革政策：

为终结以阶级、族群、语言、性别、文化、宗教及区域为基础的歧视，并面对妇女、达利人、原住民族、少数族群（贾那贾提人［Janajatis］）、特莱（Terai）族群（马德西人）、受压迫、忽视及少数族群与落后区域的问题，透过解构现行中央集权统一架构，政府应该以更包容、民主及进步的方式重新架构。570

协议并未建立尼共（毛派）极力争取的共党「人民共和国」，但尼共（毛派）现在可以公开活动并参与大选。尼泊尔终于获得和平。大选在二○○八年四月十日举行，尼共（毛派）在制宪议会五百七十五席竞争席次中，赢得了两百二十席，成为最大党。贾南德拉国王被迫于五月二十八日逊位，终结自一七六八年开始统治尼泊尔的沙阿王朝。议会决定尼泊尔将成为联邦共和国，并于七月二十三日选出国家第一任总统拉姆．巴兰．亚达夫（Ram Baran Yadav），一名出自尼泊尔国大党的医生政治家。随着王室终结，木斯塘的最后一任统治者晋美．多杰．帕尔

巴（Jigme Dorje Palbar）也失去使用了半个世纪的王室头衔。晋美．多杰．帕尔巴在年少时代曾支持中情局资助的游击队，欲将中国赶出西藏。

革命前锋普拉昌达于二○○八年八月四日宣誓成为尼泊尔总理，他的内阁成员包含自己政党、尼共（联合马列派）及代表南方平原本地人的马德西人民权利论坛（Madhesi Janadhikar Forum）。巴特莱成为副总理与财政部长，另一席副总理则由尼共（联合马列派）的巴姆德夫．高谭（Bamdev Gautam）出任。让尼泊尔军方有些忧虑的是，国防部长为毛派的拉姆．巴哈杜尔．塔帕．马嘉尔（Ram Bahadur Thapa Magar）。身为前革命派的总理向国际社会（特别是中、印两国）保证，其政党与政府希望与大家保持友好关系，也宣示支持选举及多党民主制度。这些看似与早期岁月大相迳庭的表现并非无中生有；许多前同志开始怀疑，他是否也加入以前所蔑称为「修正派垃圾」的行列。

毛派组成新政府后，中国开始重新评估尼共（毛派）。二○○八年八月二十三日，普拉昌达在中国政府邀请下，抵达北京参加次日的北京奥运闭幕式。随行者有担任资讯通讯部长的尼共（毛派）成员克里希那．巴哈杜尔（Krishna Bahadur）及其他政府官员，一行人在北京停留将近一周。

尼泊尔毛派领袖应该对中国经济发展印象深刻。他会见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时说：

中尼友谊经过时间考验。尼泊尔在地情势正发生歷史性的变化，尼泊尔政府与人民（正）致力于国家稳定与发展，并（希望）获得中国的支持与合作。尼泊尔将一如以往，支持中国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努力。571

二○○八年九月访问纽约时，普拉昌达说明他对尼泊尔未来的愿景，与一九九○年代末期的革命语汇截然不同：「我们正进行大型实验，不仅是为了尼泊尔或南亚，更是为了世界人民。我们共产党人深具弹性且动能十足，试着根据新条件发展思想。我们了解改变的动力。」572

邓小平思想取代了毛泽东主义，这成为普拉昌达进入主流政治后新的核心理念。他开始强调透过资本主义推动经济成长的重要性，而非大肆赞美毛泽东的革命远景，或高举一九六○年代文化大革命的光荣。二○○六年普拉昌达在加德满都与政府谈判和平协定时曾受访表示：「我们并非为了社会主义而战，我们对抗的是封建主义。我们为了资本主义生产模式而战。我们试着给予资本家与实业家更多利润。」573

中国对此自然非常欢喜。资深中国领导贾庆林向普拉昌达保证，二○○八年访问中国将「对两国及两党关系有正面深远的影响」。574过去

曾谴责尼泊尔毛派为「假货」的中国，现在希望与尼共（毛派）建立党对党关系。中国愿意接受过去以秘鲁光辉道路反邓路线为典范的尼泊尔毛派，这并不令人惊讶。中国在后毛泽东时代的外交政策，地缘政治考量更胜过意识型态，而亲近的中尼关系无疑符合中国利益。因此，若说内战期间中国未曾与尼泊尔毛派建立联系，才会更令人惊讶。採取务实主义而非教条主义，这是邓小平的指导原则。从这角度来看，他的继承人确实践履了相同的路线。

然而由于尼泊尔政治党派林立的特色，普拉昌达政府的执政也不长久。二○○九年五月，上任不到一年的他试图开除尼泊尔军队总司令鲁克曼古德．卡塔威（Rookmangud Katawai），却遭总统亚达夫反对，之后辞去总理一职。接任者是尼共（联合马列派）的马达夫．库玛尔．尼泊尔（Madhav Kumar Nepal），他曾是一九九四至一九九五年尼泊尔首届共党政府的副首相。

此时，尼共（毛派）已与另一个毛主义派系，尼共（团结中心［Unity Centre］）合併，组成尼泊尔联合共产党（毛派）。北京政府急于和尼泊尔同志维持良好关系，邀请普拉昌达与其他毛派领袖于二○○九年十月访问中国。一行人出发去北京前，普拉昌达本人说：「这将是中尼两个共产党之间有史以来最高层级的会议。这次访问不只强化两党联系，也将强化中尼长久关系。」575

一九九八至二○○二年尼泊尔驻华大使拉杰什瓦尔．阿查里雅（Rajeshwar Acharya）在此次访中后受访表示：

确实已经展现出明显重要性。王室废止后，中国正在尼泊尔寻找可靠盟友，而毛派似乎愿意担任这角色。中国政策的分析脉络，也必须考虑北京对于扩张南亚地区联系网络的明显兴趣。576

二○一一年八月，另一位毛派，巴布拉姆．巴特莱成为尼泊尔总理。有些人对尼泊尔毛派是否扬弃革命理想存疑，而他的新经济政策说明一切。巴特莱在一九九八年出版的小册中玩弄尼泊尔的反印情绪，指出尼泊尔遭到「印度封锁」，进一步指出「世界帝国主义压迫剥削在尼泊尔的直接展现，正是印度扩张主义者的剥削与压迫」，577并认为未来的道路是「接收反动阶级手中的生产工具……并转交给进步的力量」。578

然而这些在巴特莱总理任内并未发生。现在他希望强化经济、改善民生，并且和普拉昌达一样强调要与两邻（中国及印度）保持良好关系。普拉昌达上任总理后首次出访，是二○○八年九月前往印度。巴特莱在二○一一年以总理身分访问德里时表示：

我们诚挚感谢印度政府与人民，做为尼泊尔主要发展伙伴，在我们

发展道路上的不断支持……在尼泊尔，我们敏锐观察到，当全球经济停滞时，印度经济仍持续惊人地成长。贵国已经以身作则，展现出有利政策环境支持下的领袖与决心，可以刺激出他人也能效法的经济发展与繁荣景象。579

同一场演讲中，巴特莱也提到与中国维持良好关系的重要性：

边界另一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样也在经济发展上突飞勐进。我们感受到两方近邻（印度及中国）间增加的经贸互动。我们相信跨越我国边境的繁荣红利，也将造福我国人民与商机。从这观点来看，我们认为将尼泊尔发展为两邻之间充满活力的中介桥梁，共同分享荣景，将具有高度经济价值与发展机会。580

然而毛派领袖的新方向并未受到所有人欢迎。二○一二年十一月，普拉昌达在加德满都一场酒会上遭前游击队士兵打了一巴掌，连眼镜也摔碎了。二十五岁的攻击者巴达姆．坤瓦尔（Padam Kunwar）遭警方架走，后来被发现遭普拉昌达人马痛殴，倒在血泊之中。事件过后，坤瓦尔表示他之所以掌掴普拉昌达，是为了向这些背叛普通游击队士兵的领袖展现恨意。他们过去在山里作战所支持的理想，并非今日毛派拥抱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他说领袖们应该「小心大众怒火」。581

根据部分报导，普拉昌达离开群山丛林后换得一幢红砖豪宅，并有游泳池与羽球场。「普拉昌达同志拥有超过十亿卢比的竞选资金，并达成他个人的无产阶级梦想。这对他的支持者来说实在是太不幸了。」前内阁部长，同时也是拉纳家族主事者的帕什帕帝．舒姆什．拉纳（Pashupati Shumsher Rana）在访问中如此说。582

二○○六年和平协议中的一项重点，是尼共（毛派）「人民军队」约一万九千名男女士兵的复员工作，但这件事一直遭到忽略。也许是因为多数人不同于领袖，都是山岳地区来的低阶种姓。最初的想法是将他们编入正规军，但遭到尼泊尔军队司令与尼泊尔国大党反对，导致许多人必须自寻出路，因此这些人感觉遭到领袖抛弃背叛，也不令人讶异。二○一六年八月，普拉昌达再次成为总理，这是一九九○年人民起义终结绝对王权以来的第二十一届政府。

尼泊尔长年政治不稳，导致两个强大近邻（印度及中国）势必得面对直接冲突。两国都不希望看到不稳的尼泊尔，然而各自的战略利益却也天差地远。印度与尼泊尔的关系较为长久，也比中国来得深刻，就跟锡金与不丹一样，这段关系始于英属东印度公司。

一七六八年，廓尔喀统治者普利特维．纳拉扬．沙阿（Prithvi Narayan Shah）一统尼泊尔之前，此地是小王国分立的局面。他不仅征服这些小国，也成功击退英属东印度公司，当时后者派遣两千四百人的

远征队进入山地，援助加德满都谷地传统的统治者。许多英军在抵达谷地前就败给疟疾，因而不得不撤兵。普利特维．纳拉扬．沙阿利用宗教节庆，不受阻碍地进军加德满都，加冕为尼泊尔全国之王，建立沙阿王朝。该王朝至少在书面上持续统治尼泊尔直到二○○八年。

尼泊尔王国持续扩张领土，一七八八年占领锡金，一七九○年代远征西藏，因此也被迫与更强大的邻居正面冲突。藏人向中国皇帝求援，一七九二年干隆派兵入藏；尼泊尔转向英属东印度公司求助，但英国并不想挑战拥有庞大商机的中国。中国将尼泊尔逐出西藏，甚至逼近加德满都，尼泊尔被迫签下羞辱的条约，失去所有西藏贸易优惠。

当加德满都开始征服喜马拉雅山脉以南的领土时，尼泊尔与英国再次发生冲突。一八一四年四月，尼泊尔军队攻击布塔瓦尔（Butawal）警察站，并杀害十八名人员，英尼战争就此爆发。两年后战争结束，双方签订《萨加乌里条约》（Treaty of Sagauli）583，尼泊尔失去锡金和几块南方征服区域；加德满都国王被迫接受让英国政务官入驻首都，此举导致尼泊尔深恐失去独立地位。然而，英国发现部分南方区域难以统治，因而转交尼泊尔治理，最终将之限制在大约与今日相同的边界之内。

即使如此，国家也还谈不上稳定。一八四○年代的王室冲突，导致廓特（Kot）屠杀事件。军队指挥官荣．巴哈杜尔．拉纳（Jung Bahadur Rana）杀害四十名朝臣，建立拉纳家族的世袭首相制度，国王成了挂名元首。

接下来十年中，许多内部冲突导致中国势力逐渐衰弱，其中最严重的是一八五一至一八六四年的太平天国之乱。加德满都与拉萨已然紧张的关系，造成尼藏武力冲突，中国也间接受到影响。一八五六年，尼泊尔与拉萨的中国驻藏大臣签订条约，尼泊尔商人获得西藏通商免关税优惠，而藏人必须向加德满都支付每年一万尼泊尔卢比的贡金，尼泊尔也获准在拉萨派驻政务官。尼泊尔放弃对北方领土的权利，并同意尼泊尔及西藏持续做为北京皇帝的藩属国。藏人对此条约不满，但只能无奈接受。随着中国持续崩解，尼泊尔与西藏开始摆脱臣服地位。此后在尼泊尔发挥主要影响力的外国由中国转为英国；西藏也是同样情况，虽然影响较小。584

随着英尼关系改善，一八五七至一八五八年印度军队起义期间（殖民政权称之为「印度军叛变」），尼泊尔军队支持英国军队，英国开始接受拉纳政权，并返还数块南方平原领土做为回报。尼泊尔以沙阿王朝初期国王的廓尔喀军队为中心，建立了一支强大军力，军事技巧、技术及军工业皆效法英国模式。英国也发现尼泊尔军队的战斗能力，因此等

到镇压完叛变，英国政府从英属东印度公司手上接管印度后，尼泊尔成为英国军队重要的招募来源。

虽然英国影响力强大，尼泊尔人却能以自己的方式维护国家独立，这是锡金或不丹无法企及之处。尼泊尔国土较大，人口更多，拉纳家族得以运用对国内事务的全面掌控，让尼泊尔独立于英属印度及世界事务之外。一九三○年代确实也曾出现过政党，然而部分流亡至印度建立根据地，争取较自由运作的空间。在比哈尔邦，流亡者出版一份名为《人民》（Janata）的期刊，鼓吹推翻拉纳家族，支持多元种姓的民主政府。加德满都则逮捕了五百人，指称他们与流亡者合谋。四名领袖遭处决，其他人则判处长期监禁。

许多流亡者与印度国大党紧密合作。一九四七年一月在加尔各答会议中，致力于推翻拉纳独裁者的尼泊尔国大党成立。尼泊尔国大党领袖中最重要的人物是毕许威许瓦．普拉萨德．克伊拉拉，他做为代表会见尼赫鲁与圣雄甘地。一九四七年印度独立对尼泊尔反对党来说是重大助力，因为印度并不希望维持旧秩序。拉纳政权日子已近尾声，并在之后随国王重返高位，在一九五○至一九五一年大众运动中因建立民主统治而结束。

一九五○年七月三十一日，印度与尼泊尔签订了《和平友谊条约》。当时拉纳家族虽仍握有政权，但对国家的掌控力已大幅衰退。条约中两国政府同意：

相互承认并尊重彼此之完整主权、领土完整与独立……（同时）为展现印度与尼泊尔的友谊，双方政府将于本国领土中，就产业与经济发展之参与发展相关合约与优惠待遇，给予对方国民相同之国民待遇。585

条约也规定，印度与尼泊尔必须给予住在本国的对方国民相同权利。条约继续规定：「尼泊尔政府得自由从印度领土或透过印度领土，进口尼泊尔国家安全所需之武器、弹药及战争物资与设备。此项安排生效相关程序，应由两国政府协商定之。」586

印度的影响力在一九五○年代持续攀升。一九五二年，印度在尼泊尔成立军事团，两年后签订双方外交政策联合协定的备忘录，更在靠近西藏边界的哨所进驻印度安全人员。一九五二年签订的另一纸条约，扩大一九五○年条约中的优惠待遇，给予印度公民移民尼泊尔、成为尼国公民的权利；尼泊尔公民也获得相同权利。然而这纸条约却引起尼泊尔人民不满，他们并不想见到大规模印度移民；许多印度人也反对尼泊尔人到印度工作。对印度影响力的不满导致尼国开始北望，寻求与中国更亲近的关系。新德里提供尼泊尔高度经济援助，同时也庇护几乎完全流亡印度的尼泊尔国大党。

然而在西藏高速公路兴建及一九七○年边界封锁事件后，印度与尼泊尔的关系再也无法回到从前。一九七八年两国签订新的通商与通运权利条约，然而一九八八年尼泊尔政府与中国签订包含高射炮在内的军购协定，尼、印两国关系愈趋紧张。此时尼、中计画将于阿尼哥高速公路以西，兴建第二条通往西藏的高速公路。

根据美国学者安德瑞．沙瓦达（Andrea M. Savada）所述：

为了报复这些发展，印度将尼泊尔置于实质的贸易围城中。一九八九年三月，正当一九七八年贸易通运权利条约即将到期之际，除了未授权贸易协议之外，印度坚持谈判签订单一全面性条约，尼泊尔视此为扼杀经济的明目张胆之举。一九八九年三月二十三日，印度宣布条约到期失效，关闭所有边境关口，仅留入境点。587

同样在一九八九年，尼泊尔决定让尼泊尔卢比与印度卢比脱钩，在此之前，印度卢比原本可在尼泊尔自由流通。而印度的报复是禁止尼泊尔使用加尔各答港的尼属港口设备，以致来自新加坡及其他国家的石油无法运往尼国。

一九九○年人民运动后，因尼泊尔国大党重掌政权，两国关系有所改善。一九九○年六月两国发布联合公报，宣告恢复既有状态，重启所有边界关口。尼泊尔领袖甚至说向中国购买武器的理由是「成本较低」，并建议中国暂缓最后一批送往尼国的武器。588

接踵而来的毛派起义，让中、印两国都难以处理。对中国来说，问题在于尼泊尔革命者以毛主席思想为领导原则所带来的尴尬。印度则苦于自身的毛派反抗军；后者虽根植于中印度的部落区域，但印度并不想看到两国革命者连结。尼共（毛派）已与印度共产党（马列派，人民战争团体）建立紧密关系，后者于二○○四年九月与印度毛主义共产中央（Maoist Communist Centre of India）合併，组建印度共产党（毛派）。除了从比哈尔邦的工厂取得武器外，尼共（毛派）也在印度毛派营地进行部分人员训练。到了二○○一年七月，南亚的毛主义政党组织协调委员会（Coordinating Committee of Maoist Parties and Organizations of South Asia）成立，其中成员包含了印度、尼泊尔、斯里兰卡与孟加拉的毛派政党，不丹共产党（马列毛派）则是「观察员」。589

二○○八年之后的发展与尼共（毛派）的软化消除了这些疑虑，同时却也加剧中印之间争夺对尼影响力的拉锯战。二○一五年尼泊尔遭第三次边界封锁，印度受到谴责，此举重挫了两国关系。经歷数年政治角力与口水战后，尼泊尔的制宪议会终于在二○一五年九月二十日通过新宪法，将尼泊尔转为由七个未命名的省所组成的联邦国家。此举导致马德

西人与塔鲁人激烈抗争，因为这两个传统上遭到边缘化的族群，都是居住在靠近印度的南方平原。

国际危机组织（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简述问题如下：

关于新省界划分、代表产生……以及公民身分相关议题皆有异议。新宪支持者……认为过度聚焦在以认同为基础的不满上，将威胁尼泊尔的团结、完整甚至主权。反对者的意见则根植于社会长期对尼泊尔认同的不同看法，以及尼泊尔意识的单一概念是否会对非来自山区、非使用尼泊尔语、非高阶印度教社群的价值行为，造成结构性歧视。590

马德西民间与政治团体发起的一百三十五日封锁行动，虽赢得印度社会多数人的同情，却是在尼泊尔大地震灾后五个月发起。这场大地震造成将近九千人死亡，两万两千人受伤，数万人无家可归，整个村落遭到夷平，加德满都许多古老神庙也受损严重。中、印两国连同许多国家提供灾民协助，然而封锁行动却令灾情雪上加霜，导致二○一五年成为尼泊尔现代史上情势最恶劣的一年。在这已经满目疮痍的国家里，封锁行动造成包含燃料在内的日常用品短缺。

许多尼泊尔人将边界封锁怪到印度头上，因为后者确实曾批评尼泊尔新宪缺乏包容性。现在加德满都部分政客开始指控印度煽动马德西人。根据国际危机组织的看法：

印度内政也是因素之一。当封锁开始的时候，一般人相信执政的印度人民党（Bharatiya Janata Party）透过表明比哈尔人的尼国亲友利益，以此来赢得比哈尔邦选举。这更进一步强化了马德西人与印度人的需求，马德西人与印度比哈尔人，根本就是一体两面的想法。591

印度否认指控，但毫无效果。当封锁行动在二○一六年二月八日结束时，尼泊尔全国的反印情绪高涨。

同一时间，中国则採取较隐微的幕后政策。中国的主要顾虑是尼泊尔内部的两万名西藏难民，其中部分是在一九五九年逃出的。根据专精情报与组织犯罪的德国政治学者史蒂芬．布兰克（Stephan Blancke）刊于《简氏情报评论期刊》的文章所述：「内部来说，西藏仍是个重要战场。在尼泊尔，（中国）国安部成立数个非政府组织及语言学校，中国情报特务代表团经常聚会，统合对付西藏社群的行动。」592《简氏情报评论期刊》继续引述西藏流亡政府安全部在二○一三年五月二十三日发出的新闻稿：「宣称西藏自治区那曲地区公安处处长李玉泉，招募一名藏人，针对西藏非政府组织进行情报蒐集工作，后续更试图谋杀两名异议分子。」593

在官方层级上，中国协助尼泊尔成立了国立武警学院（National Armed Police Force Academy），并在辛杜帕尔乔克县的塔托帕尼

（Tatopani）成立设备精良的中国资讯中心（China Information Centre），追踪阿尼哥高速公路沿线的反中活动。中国同时提供尼泊尔警方先进的中继式数位无线电系统，以提升通讯能力。二○○二年起，中国派遣军官参与尼泊尔的「冒险训练」；从二○○八年开始，尼泊尔军方也派军官与士兵到中国的教育机构受训。594早在一九九九年，加德满都靠中国大使馆的协助，成立了中国研究中心，推广中文与中国文化，尼泊尔人都可在此免费学习中文。尼中媒体论坛（Nepal-China Media Forum）是另一个长期发展尼、中关系的组织。

《简氏情报评论期刊》里提及由中国支持成立的非政府组织，包括由尼共（联合马列派）领袖马达夫．库玛尔．尼泊尔成立的国际释迦佛信徒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hakya Buddha Faithful）。另一个据闻也接受中国援助的非政府组织名为原子（ATOM），是由尼共（毛派）中央领袖克里希那．巴哈杜尔．马哈拉之子诺玛尔．马哈拉（Normal Mahara）领导。此外，还有尼中互助合作协会（Nepal-China Mutual Cooperation Society）、尼中友谊协会（Nepal-China Friendship Society），以及由尼共（马列派）主席昌德拉．普拉克什．麦拉利（Chandra Prakash Mainali）之妻主持的非政府组织。尼中互助合作协会更进一步协助希玛尼信托（Himani Trust）进行各种社会福利活动。595中国甚至侵门踏户到印度的传统势力范围，为毕许威许瓦．普拉萨德．克伊拉拉基金会的地震赈灾方案提供协助。

在政治上，中国则积极促成尼泊尔诸多共党派系的团结，而尼共（毛派）——现在称为尼共（联合马列派）——可能是他们的首选。二○一五年十月，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高层官员曾在尼共（联合马列派）领导人卡德加．普拉萨德．奥利（Khadka Prasad Oli）成为总理前与他会面，承诺提供丰厚经济配套，协助他巩固地位。九月奥利接任总理前，另一名尼共（联合马列派）的领袖伊许瓦．波克瑞尔（Ishwor Pokhrel）访问中国，为该党即将组织的政府寻求支持。二○一六年五月，中国驻尼大使吴春太主持一场在加德满都举行的会议，奥利、普拉昌达与尼共（团结中心）的纳拉扬．卡齐．什雷斯塔（Narayan Kazi Shrestha）都出席参加。当时可能会有一场内阁危机，据传吴春太告知普拉昌达，由于奥利才刚访问过中国，因此不适合立即下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将于当年十月访问尼泊尔，届时尼泊尔应由左派当政。

奥利的总理任期在二○一五年八月四日结束。习近平的访问行程并未如当时部分印度媒体所预测一般取消，但因为尼泊尔的政治危机而延后。十月，习近平出席了在印度果亚举行的「金砖五国——环孟加拉湾多领域技术暨经济合作倡议」（Brazil, Russia, India, China, South Africa and the Bay of Bengal Initiative on Multi-Sectoral Technical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当时他与奥利的继任者普拉昌达握手致意，并承诺「将于最近的方便日期」访问尼泊尔。596

即使一般被认为亲近印度的马德西人，也转向中国寻求协助。二○一六年三月十八日，马德西联合民主阵线（Samyukta Loktantrik Madhesi Morcha）代表团前往加德满都的中国大使馆递交备忘录，表达对于新宪的抗议，希望获得中国支持并施压奥利政府来回应他们的不满。马德西人主导的政党，尼泊尔联邦社会主义论坛（Federal Socialist Forum, Nepal）及马德西人民权利论坛的派系之一，都接受中国大使馆资助活动，这显示出中国总是两方下注，避免把鸡蛋放在同个篮子里。

尼泊尔的政治始终处于混乱之中。二○一六年七月，巴特莱与普拉昌达分裂，自行成立新党：新力量（Naya Shakti），局势更加混乱。两位毛派领袖之间的差异存在已久，知识分子取向的巴特莱并不认同普拉昌达独揽大权的做法。然而，除了意图建立总统直接普选制度来解决政治动盪与经常陷入危机的困境外，巴特莱新政党的实际政策并不明晰。巴特莱同时也反对新宪，表达对马德西人的支持，而这是受印度欢迎的立场。

即使印度仍是尼泊尔的主要外贸伙伴，并持续提供大量外援，但中国无疑已与歷任尼国政府及公民社会各界（包含政治与经济）发展出非常特别的关系。在其他方面，中尼关系也更加靠近。二○○五年，中国完成青藏铁路，连接青海省会西宁与拉萨。西宁早在一九五九年就纳入中国的主要铁路网。二○一四年八月，路线延伸至西藏南部的日喀则，离尼泊尔边境不远。不断有揣测认为路线将持续延伸到边界的樟木镇，甚至往加德满都；考量到印度的敏感神经，此举将具高度争议性。中国也持续参与尼泊尔国内公共建设计画，例如在印度边境上的佛陀出生地蓝毗尼（Lumbini），以及加德满都以西从波卡拉（Pokhara）到巴格隆（Baglung）的公路建设。

尼泊尔有时被形容为「卡在两块巨岩之间」。尼泊尔无疑将持续强化与中国的经济和其他关系，以实现「降低对印度依赖」的长期国家政策。然而，如同法新社在二○一六年八月的报导指出，这仍是一条漫漫长路。「二○一四年七月至二○一五年六月，（尼泊尔）与印度的双边贸易额将近四十五亿美元，这令尼中贸易额八亿八千两百万美元相形见绌。」597但尼中贸易额正在成长，并如法新社引述智库尼泊尔经济论坛（Nepal Economic Forum）主席苏吉夫．沙奇亚（Sujeev Shakya）所言：「一般感觉中国说到做到，而印度只是空谈。数年来，中国因为执行公共建设的速度，在尼泊尔获得更多信任。」598然而尼泊尔的问题是，这些计画中多数劳工都是中国人，因此并没有为尼泊尔创造任何工作机会。599

面对一个又一个政治危机，加上高度仰赖外援的经济，尼泊尔很可能持续「喜马拉雅病夫」的角色。比起任何其他邻国，尼泊尔也可能是印度与渐趋自信的中国，在地缘政治利益上冲突最大之处。印度寻求维持在尼泊尔的传统影响力，并护卫喜马拉雅山棱；中国则试图在自己周遭建立「友善国家」，类似古代中国皇帝在帝国周围有一群忠诚藩属。然而印度与中国在更往东区域的迴异利益，一旦沸腾过度很可能变成公开冲突。冲突将不仅是边界争议，更是双边议题，例如布拉马普特拉河水治理、印度洋上更宽广的地缘政治竞争，以及面对武装冲突时，仍旧藏身缅甸境内的中国盟友：印度东北反抗军。

537 Quoted in Bertil Lintner, ‘Nepal struggles to cope with diehard Maoist violence’, Jane’s Intelligence Review, June 1999, pp. 43–4.

538 Prachanda, The First Glorious Year of People’s War (Kathmandu: Utprerak Publications, 1998), p. 25. ., p. 25.

539 Prachanda, The First Glorious Year of People’s War, p. 24.

540 Prachanda, The First Glorious Year of People’s War, pp. 25–6.

541 Lintner, ‘Nepal struggles to cope with diehard Maoist violence’, p. 43.

542 Stephen I. Mikesell, ‘The Paradoxical Support of Nepal’s Left for Comrade Gonzalo’, Himal, March–April 1993, p. 31.

543 Quoted in Lintner, ‘Nepal struggles to cope with diehard Maoist violence’, p. 43. Nepal South Asia Centre can be reached at http://nepalsouthasia.org/remaining_of_intro.html (accessed on 14 August 2017). See also Udaya R. Wagle, ‘Economic Inequality in the “democratic” Nepal’, School of Public Affairs and Administration, Western Michigan University, Kalamazoo, available at http://homepages.wmich.edu/~uwagle/IneqNepal.pdf (accessed on 14 August 2017).

544 Quoted in Lintner, ‘Nepal struggles to cope with diehard Maoist violence’, p. 43.

545 Shyam Shrestha, ‘Nepali Cart Before Horse’, Himal, September 1997, available at http://old.himalmag.com/component/content/article/2721-NepaliCart-Before-Horse.html (accessed on 18 December 2016).

546 Prachanda, Two Momentous Years of Revolutionary Transformation (Kathmandu: Utprerak Publications, n.d.), p. 22. This book is undated, but was most probably published in 1998 (at the second anniversary of the 1996 uprising).

547 For a detailed biography of Prachanda, see, Anirban Roy, Prachanda: The Unknown Revolutionary (Kathmandu: Mandala Book Point, 2008).

548 The dissertation is available at http://nepalitimes.com/news.php?id=11198#.WZFnXXcjFuU (accessed on 14 August 2017) and for purchase here https://www.amazon.com/Nature-Underdevelopment-Regional-Structure-Nepal/dp/8187392398 (accessed on 14 August 2017).

549 For a brief biography of Baburam Bhattarai, see ‘Dr. Baburam Bhattarai’s Biography’, available at http://baburam-bhattarai.blogspot.com/2010/01/dr-baburam-bhattarais-biography.html (accessed on 23 December 2016).

550 Lintner, ‘Nepal struggles to cope with diehard Maoist violence’, p. 44.

551 Carlos Iván Degregori, ‘The Origins and Logic of Shining Path: Two Views’ Palmer, David Scott (ed.), Shining Path of Peru (London: Hurst and Company, 1992), pp. 33–4.

552 Prachanda, The First Glorious Year of People's War, p. 67.

553 Quoted in B. Raman, 'India & China: as seen by Maoists - part II', New Delhi: Observer Research Foundation, 15 February 2005, available at http://www.orfonline.org/research/india-china-as-seen-by-maoists-part-ii/ (accessed on 20 December 2016).

554 Li Onesto, Dispatches from the People's War in Nepal (London: Pluto Press, and London and Chicago: Insight Press Inc., 2005), p. 228.

555 Raman, 'India & China: as seen by Maoists - part II'.

556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A Chronology of Events (1949–1988)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89), p. 215.

557 Sanjay Kumar, Nepal as a Factor in India's Security during Post Cold War Era (Delhi: Mohit Publications, 2013), p. 62.

558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p. 216.

559 译者注：中国称之为中尼公路。

560 Andrea Matles Savada, Nepal and Bhutan: Country Studies (Washington: Federal Research Division, Library of Congress, 1993), p. 186.

561 Rajeev Ranjan Chaturvedy and David M. Malone, 'A Yam, between Two Boulders: Nepal's Foreign Policy Caught between India and China', Sebastian von Einsiedel, David M. Malone, and Suman Pradhan (eds), Nepal in Transition: From People's War to Fragile Pea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 294–5.

562 'Over reliance on India has hit economy hard', Kathmandu Post, 22 November 2015, available at http://kathmandupost.ekantipur.com/printedition/news/2015-11-22/over-reliance-on-india-has-hit-economy-hard.html (accessed on 20 December 2016).

563 Kumar, Nepal as a Factor in India's Security during Post Cold War Era, p. 22.

564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p. 218.

565 For a succinct account of the massacre, see Jonathan Gregson, Blood Against the Snows: The Tragic Story of Nepal's Royal Dynasty (London: Fourth Estate, 2002). See pp. 194–5: 'For a country whose history is littered with real conspiracies, it is second nature to accept anything at face value with extreme reluctance. The result is an admixture of credulity and distrust which permits no truth to be set in stone. Rather, it encourages the multiplication of different versions of an event to the point where it seems there are as many "true" variants as there are gods and goddesses in the Hindu pantheon.'

566 Quoted in Roy, Prachanda, p. 178.

567 Bertil Lintner, 'Nepal's Maoists Prepare for the Final Offensive, Jane's Intelligence Review, October 2002, p. 37.

568 For the full text of the peace agreement, see 'Unofficial Translation of the Comprehensive Peace Agreement concluded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 Nepal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of Nepal (Maoist)', available at http://www.usip.org/sites/default/files/file/resources/collections/peace_agreements/nepal_cpa_20061121_en.pdf (accessed on 18 December 2016).

569 'Unofficial Translation of the Comprehensive Peace Agreement concluded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 Nepal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of Nepal (Maoist)'.

570 'Unofficial Translation of the Comprehensive Peace Agreement concluded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 Nepal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of Nepal (Maoist)'.

571 'Chinese Premier meets Nepali PM', Xinhua, 24 August 2008, available at https://marxistleninist.wordpress.com/2008/08/24/prachanda-visitschina/ (accessed on 14 August

2017).

572 'Prachanda in New York: A Maoist Vision for Nepal', Link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ist Renewal, 22 October 2008, available at http://links.org.au/node/652/7040 (accessed on 20 December 2016).

573 Thomas Bell, 'Nepal's "fierce one" spurns Chairman Mao and claims centre ground in peace talks', The Telegraph, 31 October 2006, available at http://www.telegraph.co.uk/news/worldnews/1532891/Nepals-fierce-one-spurnsChairman-Mao-and-claims-centre-ground-in-peace-talks.html (accessed on 20 December 2016).

574 'Chinese top political advisor pledges closer ties with Nepal', CCTV.com, 12 October 2009, available at http://english.cctv.com/20091012/104634.shtml (accessed on 14 August 2017).

575 Quoted in 'Prachanda makes historic visit to China', Lalkar, November/ December 2009, available at http://www.lalkar.org/article/837/prachandamakes-historic-visit-to-china (accessed on 20 December 2016).

576 Quoted in Dhruba Adhikary, 'Maoists go on pilgrimage in China', Asia Times Online, 16 October 2009, available at http://www.atimes.com/atimes/South_Asia/KJ16Df03.html (accessed on 20 December 2016).

577 Baburam Bhattarai, Politico-Economic Rationale of People's War in Nepal (Kathmandu: Utprerak Publications, 1998), p. 7.

578 Bhattarai, Politico-Economic Rationale of People's War in Nepal, p. 35.

579 'Nepal and India: Bhattarai and Singh address each other', Nepal Monitor, 21 December 2011, available at http://www.nepalmonitor.com/2011/10/nepal-india_bhattara.html (accessed on 20 December 2016).

580 'Nepal and India: Bhattarai and Singh address each other'.

581 'Padam Kunwar suggests leaders to 'beware of public anger' as he admits "unlawful act"', available at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xITPtkKSo, (accessed on 20 December 2016).

582 Quoted in Lin Meilian, 'Maoism, borrowed and abandoned' Global Times, 25 March 2013, available at http://www.globaltimes.cn/content/770482.shtml (accessed on 20 December 2016).

583 For details of the treaty, see Buddhi Narayan Shrestha, 'What is Sugauli Treaty?', mimeograph available at https://indiamadhesi.files.wordpress.com/2008/11/what-is-sugauli-treaty.pdf (accessed on 14 August 2017). Sagauli can also be spelled Sugauli, See also 'Sugauli Treaty (1815) -East India Company and Nepal' at http://www.veergorkha.com/2012/01/sugaulitreaty-1815-east-india-company.html (accessed on 14 August 2017).

584 For a brief account of this period in Nepalese history, see Savada, Nepal and Bhutan, pp. 26–31.

585 For the full text of the agreement, see 'Treaty of Peace and Friendship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and the Government of Nepal', available at http://www.nepaldemocracy.org/documents/treaties_agreements/indonepal_treaty_peace.htm (accessed on 29 December 2016).

586 'Treaty of Peace and Friendship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and the Government of Nepal'.

587 Savada Nepal and Bhutan, p. 182.

588 Savada Nepal and Bhutan, p. 183.

589 See 'Joint Statement of the Maoist parties and Organisations of South Asia', available at http://www.bannedthought.net/International/RIM/AWTW/2001-27/AWTW-27-CCOMPOSA-Formation.pdf (accessed on 20 December 2016) and 'Coordination Committee of Maoist Parties and Organisations of South Asia', available at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oordination_Committee_of_Maoist_Parties_and_Organisations_of_South_Asia (accessed on 20 December 2016).

590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ICG), Nepal's Divisive New Constitution: An Existential Crisis, Crisis Group Asia Report No.276, (Brussels: ICG, 4 April 2016), p. i, available at https://d2071andvip0wj.cloudfront.net/276-nepal-s-divisivenew-constitution-an-existential-crisis.pdf (accessed on 20 December 2016).

591 ICG, Nepal's Divisive New Constitution, p. 23.

592 Stephan Blancke, 'Chinese whispers—Chinese intelligence Capabilities', Jane's Intelligence Review, 3 July 2013, available at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255701947_Chinese_whispers_-_Chinese_intelligence_capabilities (accessed on 20 December 2016).

593 Quoted in Stephan Blancke, 'Chinese whispers—Chinese intelligence capabilities'.

594 M.K. Singh, Nepal Foreign Policy (New Delhi: Sumit Enterprises, 2011), p. 244.

595 This and the information in the paragraph below comes from interviews with local security officials who requested anonymity, Kathmandu, 21–3 May 2016.

596 'Xi Jinping "ready to visit Nepal at earliest convenient date"', The Himalayan, 15 October 2016, available at http://thehimalayantimes.com/nepal/xi-jinpingready-visit-nepal-earliest-convenient-date/ (accessed on 20 December 2016).

597 Ammu Kannampilly, 'In Nepal's Himalayas, hopes of closer ties with China', Agence France-Presse, 25 August 2016.

598 Ammu Kannampilly, Agence France-Presse, 25 August 2016.

599 Chok Tsering, 'Kodari Road: Implications for Nepal, China and India: Analysis', Eurasia Review, 1 December 2011, available at http://www.eurasiareview.com/01122011-kodari-road-implications-for-nepal-china-andindia-analysis/ (accessed on 20 December 2016).

# 第八章　边疆与大洋

布拉马普特拉河总长度将近三千公里，是世界上极长的河流之一，源于喜马拉雅山北麓安西冰河（Angsi Glacier），穿越西藏一千六百二十公里后进入印度，往下开散为阿萨姆平原。布拉马普特拉河接着流入孟加拉，与恒河及其他河流汇合后形成三角洲，最后注入孟加拉湾。此河在西藏称为雅鲁藏布江，在孟加拉则称为贾木纳河（Jamuna），是数亿人民的生命线。因此当中国二○○九年在西藏兴建一百一十六公尺高、三百八十九公尺长的水坝，能支持发电量五十四万千瓦的藏木电站时，印度响起警报；此前中国一直否认任何在印度与不丹以北兴建大坝的计画。中国政府在二○一三年一月通过计画，于布拉马普特拉河再建三座大坝，分别位于藏木电站上游的大古和介绪，以及下游的加查。目前中国总共提出兴建二十八座水坝的计画。

更引人注意的是，中国学者李伶在二○○五年十一月出版的《西藏之水救中国》[600]书中提到，中国水利专家已针对引西藏之水进入中国中部解决旱象一事进行调查。[601]多数中国大河都源于西藏高原，因此将支流转向，甚至将布拉马普特拉河水导引到长江与黄河的概念并非新创。至少从一九八○年代起，人民解放军就开始评估这想法的可能性。[602]虽然布拉马普特拉河在印度段的河水，约有七成是集自边界以南的雨水、属阿鲁纳恰尔邦、锡金与不丹的支流，但中国控制三成河水的情况已足以造成印度忧虑。中国对此事的想法，从退休将领郭开接受官方报纸《环球时报》专访的发言表露无遗，「这么多雅鲁藏布江水流出中国，实在浪费。」[603]他更宣称印度与孟加拉因雨水过多造成洪灾，因此中国若将布拉马普特拉河转向，三国都将受惠。

快速扩张的中国经济需要大量电力虽可理解，但未徵询下游国家意见之前就兴建水坝，甚至可能将布拉马普特拉河转向，则令人不解。起初印度对中国计画的反应相当温和，二○一四年三月，印度前东北区域发展部长普拉邦．辛格．葛托瓦（Praban Singh Ghatowar）告诉英国国家广播公司：「我们外交部已询问中国并获得回覆，河水流量将不会受影响，我们也会确保人民生活不受水坝影响。」[604]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也回应英国国家广播公司：「所有计画都经过科学计画与可行性评估，对于上下游的影响都会纳入全盘考虑。」[605]

然而许多人仍旧心存疑虑，甚至对计画高度批判，因为中印之间并未订定水资源分享规划，只同意分享季风资料。中国提供的资讯不完整且经常相互矛盾，就如英国国家广播公司所指出：「难以确认何者为真。水坝建在偏远山谷或高山峡谷间，难见踪影。政治、发展与环境间

持续不断的冲突，正在这些偏远区域持续展开。」[606]还要纳入考量的是，中国控制的河川源头并不仅有布拉马普特拉河，更有其他亚洲主要河流，如湄公河与萨尔温江（Salween）。中国在湄公河上游澜沧江兴建数个水坝拦阻河水，已经对下游国家造成重大问题。另一项在萨尔温江上游的怒江兴建至少五个水坝的计画，则因泰国、缅甸及中国非政府组织「云南省大众流域管理研究和推广中心（绿色流域）」（Green Watershed）的大声抗议而暂缓。[607]萨尔温江流进缅甸后的部分河段成为泰缅边界。

中国政府发言人称「中国与东南亚五国（缅甸、寮国、泰国、柬埔寨、越南）之间设有合作机制，协助协调澜沧江与湄公河水资源永续利用与资讯分享」。[608]问题是，中国与下游国家所谓的「合作机制」事实上十分稀少。中国并非湄公河委员会（Mekong River Commission）成员国，这个水资源协调的跨政府组织包含了泰国、寮国、柬埔寨与越南代表，缅甸并未大量仰赖或汲取湄公河水，因此以观察员身分出席；中国也是，然而只提供洪水期间的水位资料。中国在湄公河上游建坝时，没有任何下游国家受到徵询。目前中国已在湄公河上游建造了七座水坝，并计画再建二十一座。[609]

中国计画于缅甸的密松（Myitsone）兴建一座大坝，位在迈立开江（Mali Hka）与恩梅开江（Nmai Hka）匯合形成伊洛瓦底江之处，而这两条河并非源自中国。这项计画激起了大众抗议，二○一一年九月三十日，登盛（Thein Sein）总统组成的半平民新政府宣布，暂缓中缅合作的超大型水力发电计画。造价达三十六亿美元的密松大坝将是世上第十五大水坝，预估淹没七百六十六平方公里的林地，比新加坡面积还大。[610]密松大坝的兴建计画暂缓，象徵中缅关系开始快速恶化。在此之前，缅甸一直是中国在东南亚最忠心的盟友。

英文《环球时报》（Global Times）记者胡玮家（Hu Weijia，音译）于二○一六年十月撰文主张：「印度做为布拉马普特拉河下游国家，对于中国利用河水一事的敏感反应可以理解，然而中国不可能利用河水做为潜在武器……中印关系不应受想像出来的『水战争』所影响。」[611]问题是「水战争」已经开打；虽然并未导致武装冲突（未来应该也不会），但这项争议势必将让原本已相当紧张的中印关系雪上加霜。

印度也兴建水坝来应付持续成长的电力需求，一开始是在不丹跟尼泊尔，后来则进入阿鲁纳恰尔邦。印度所建不丹水坝的售电营收，成为喜马拉雅山王国的重要收入，用以支持国家发展。印度也是尼泊尔水力发电的最主要推动者，并在二○一四年十一月签订协议，要于尼国东部兴建九十万千瓦的大坝及电厂。在那之前三个月，印度总理莫迪才与尼

泊尔签订第一座九十万千瓦水坝的合约，位于尼泊尔西部。不过这些计画并非毫无争议，有部分政治人物与非政府组织要求终止这些计画。[612]

阿鲁纳恰尔邦的水力发电也充满争议；由于所有河流都向下流入山脚的阿萨姆低地，此地具重大发电潜力。二○○九年四月，印度开始在阿鲁纳恰尔邦上桑朗县（Upper Siang）布拉马普特拉河的一条支流桑朗河（Siang River）兴建水坝，预计完工后将成为印度次大陆上最大型的水力发电大坝。到了二○一○年，当地学生组织向印度政府请愿，阻止桑朗计画与其他阿鲁纳恰尔邦计画兴建的水坝。政府回应这些计画并不会取消，但是将会採取必要预防措施，以降低环境冲击。[613]

这些建在喜马拉雅山南向河流上的巨大建筑，必然将为环境带来负面影响。然而中印的水力发电计画间有着根本上的差异。印度是个民主国家，这类议题可以自由讨论，同时反对政府决策也是合法之举。然而中国却非如此，萨尔温江水坝暂缓是少见例外，但这也是因为「绿色流域」的发起人与某些高层有联系，因此获得一些活动庇护。

然而印度的优点——民主制度，也让其容易被不必要的内部压力影响。反对阿鲁纳恰尔邦建坝的行动受印度毛派利用，持续武装反抗印度政府的印共（毛派）虽是非法团体，却透过许多公民社会团体与其他台面上组织进行活动。自二○一一年起，反水坝人士阻止苏班西里河（Subansiri River）水坝建筑工程。二○一五年四月，《印度时代杂志》引述阿鲁纳恰尔邦内政局长哈利拜．帕尔第拜．乔达利（Haribhai Parthibhai Chaudhary）的话，指出印共（毛派）的上阿萨姆领导委员会「目前正在阿萨姆与阿鲁纳恰尔邦运作，涉嫌劫夺武器，在各地村落勒索金钱」。[614]局长继续谈到印共（毛派）持续在阿萨姆招募训练干部，「这些印共干部大肆宣传反对阿萨姆的大型水坝。在此背景下，阿萨姆与阿鲁纳恰尔邦边界已合一，成为毛派活动的新舞台。」[615]

印度的毛派运动也许正在走下坡，也不如二十一世纪前十年那样风风火火，但主要在中印度部落族群带里活动的印共（毛派），开始在阿鲁纳恰尔邦的部落社群中为革命语言找到新沃土。因为阿鲁纳恰尔邦发展快速，水力发电是经济发展的一部分，正如古瓦哈提大学（Guwahati University）政治系教授阿耆．蓝詹．杜塔（Akhil Ranjan Dutta）所解释，这些计画已遭污染：

积极追求对企业有利的发展，最明显的模式就是在区域中兴建大型河坝。相对平等的社会已经……目睹阶级分立的转向，尤其是在政治菁英与印度统治阶级合作之后……同时兴起的新中产阶级，如承包商、店员等，逐渐与社区脱节。[616]

二○一一年八月，遭到逮捕的毛派干部向审问者透露，他们持续在

洛希特与下迪邦（Dibang）谷地区域的藏身处举行「革命会议」，这时毛派在阿鲁纳恰尔邦渗透的程度才为人所知。被捕毛派人士表示，这类会议通常有一百五十至两百名村民与干部参与。617过去数年中，印共（毛派）也与阿萨姆联合解放阵线及曼尼普尔的左派叛军建立联系。根据阿萨姆联合解放阵线指挥官派瑞许．巴鲁亚所说：「若毛派能对印度政府成功发动战争，对阿萨姆联合解放阵线是有利的。就共同敌人来说，我们与毛派有战略共识。」618从一九四○年代反抗军英雄伊贾姆．伊拉波特（Hijam Irabot）在曼尼普尔发起第一波革命运动开始，多数曼尼普尔叛军都是左派。

即使如此，在阿鲁纳恰尔邦掀起大规模印共（毛派）起事行动的机会仍旧渺茫。就跟尼泊尔的毛派起义一样，由于「毛主义」在中国已是过时概念，因此中国对印度毛派运动毫无兴趣，更不可能支持。不过，与中国情报机构有长久关系的印度东北民族反抗军则是另一回事。一九七六年毛泽东死后，邓小平面向市场的改革启动，中国不再向世界输出革命，取而代之的是消费性商品与其他快速发展工业的产品。然而从二○○四年的吉大港军火破获事件明显可知，中国情报机构并未放弃与印度民族反抗军的联系。此一联系必须透过缅甸西北区域维持；一九七○年代的那迦反抗军，一九八○年代的阿萨姆联合解放阵线，都曾在印度军队行动胜利时撤退到这个区域。透过设在缅甸实皆省北部塔卡总部，向边界对侧的印度发动攻击。

缅甸军队忙于应付国内其他区域的民族反抗军，不太理会屋檐下的印度叛军。在附近缅军哨站放任下，二○一四年四月，阿萨姆、那迦与曼尼普尔反抗军在钦敦江附近的塔卡营地举行会议。他们组成统合行动的新组织名称十分奇特：「东南亚西部民族解放联合阵线」（United 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 of Western Southeast Asia）。此名称着重与东南亚人民（而非印度民族）的联系，新联盟主席是一名来自缅甸的那迦人卡普兰（Shangwang Shangyung Khaplang），他已在缅甸争取那迦部落自主长达数十年。一九六○年代末期，卡普兰陪伴印度那迦人前往中国受训。当印度那迦人无法维持边界另一侧的营地时，缅甸侧随即建起了联合那迦营地。

一九七○年代末期，印度那迦运动分裂，卡普兰与穆瓦哈、伊萨克站在同一边，两人都曾在中国受训。一九八○年那迦兰民族社会主义议会成立，由伊萨克担任主席，穆瓦哈任秘书长，卡普兰则为副主席，然而这个联盟注定失败。缅甸那迦人受够了被印度那迦人当成奴仆，因此在一九八八年将他们逐出区域，那迦兰民族社会主义议会随即分裂为那迦兰民族社会主义议会（伊穆派）及那迦兰民族社会主义议会（卡普兰派）。

失去缅甸藏身地的那迦兰民族社会主义议会（伊穆派）没有选择，只能与印度政府进行和谈，并于一九九七年同意停火。然而其主要军火采购人安东尼．希姆瑞不顾和平协议，仍持续向中国及其他来源购买枪枝；直到二○○四年吉大港破获军火走私，才终止大批武器运入印度侧那迦区域，希姆瑞本人则于二○一○年被捕。一九九五年希姆瑞首次造访中国，并初步接洽中国军火制造商北方工业公司，以及位于沿海广东省的新利源（Xin Li Yuan，音译）国际投资公司，后者是军火买卖中间人。希姆瑞也常在云南瑞丽会见中国情报官员，其中一位匿名「张艾伦」（Allen Chang，音译）[619]希姆瑞在泰国的军火走私贩是乌提功．「威利」．纳乌伦雅特旺尼（Wuthikorn ‘Willy’ Naurenartwanich），他试图透过此人购买大批中国制枪枝。换句话说，乌提功是中国武器「灰」市的另一名中间人，从曼谷的中国门面公司（仅知名为「TCL」）购进武器。[620]

然而买卖最后未果。希姆瑞被捕两年后，印度政府成功说服泰国当局，将乌提功引渡到印度。[621]从那时起，那迦兰民族社会主义议会（伊穆派）的活动就限于偶尔谋杀曼尼普尔邦的反对者，并向那迦兰邦的商家、政府官员、一般人民及部分地方政客「收税」。在停火协议之下，那迦兰民族社会主义议会（伊穆派）不得在区域内进行任何暴力行动；他们的军队限在数个营地内，多数仅能以木枪进行操练。

那迦兰民族社会主义议会（卡普兰派）也分别在二○○一年与二○一二年四月，和印度及缅甸政府达成停火协议，成为缅甸境内唯一与两个主权国家政府订定停火协议的武装反抗团体。从一九八○年代末期、一九九○年代初期起，缅甸政府陆续与境内许多民族反抗军达成停火协议，虽然仍和其他团体持续交战，例如国家最北方强大的克钦独立军（Kachin Independence Army）。

那迦兰民族社会主义议会（卡普兰派）维持与缅甸政府的停火协议，却于二○一五年三月取消与印度的协议并展开突袭。东南亚西部民族解放联合阵线游击队在六月四日对曼尼普尔邦昌德尔市（Chandel）的印度军车队展开勐烈攻击，杀害十八名军人，并导致十五人受伤。突袭过后，这些来自缅甸的游击队又退回边界对侧的藏身地。

印度政府多年来试图向缅甸军队施压，使其对从印度过去的叛军採取行动，却没有任何成果；提出两国对反抗军採取联合或协调作战的建议也遭忽略。而昌德尔突袭促使印度决定自己出手解决。六月九日，印度军队跨过缅甸边境，攻击东南亚西部民族解放联合阵线营地。

很明显，只要印度反抗军不干扰缅甸军队，后者就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根据印度媒体刊登参与二○一五年六月跨境作战的印度士兵证

言，这次作战是瞒着该区的缅甸军官，以免对方事先通知反抗军，并宣称好几名缅甸军官向印度反抗军收取保护费。缅甸政府显然在事后才知道印度进行的跨境行动。[622]

然而，那迦兰民族社会主义议会（卡普兰派）究竟为何撕毁与印度政府的停火协议，则不得而知。东南亚西部民族解放联合阵线背后的真正主脑并非卡普兰，七十多岁的卡普兰之所以担任联盟正式领袖，只是因其年长及在缅甸那迦山区的地位；真正主脑其实是阿萨姆联合解放阵线年轻又有活力的领袖派瑞许．巴鲁亚。巴鲁亚来自迪布鲁加尔[623]，是一名深具领袖魅力的前足球员，从一九八○年代初期就加入阿萨姆地下反抗运动。现今巴鲁亚多数时间都在中国云南瑞丽或其他城市。他曾在二○○九年十一月被目击出现在广州的国际贸易展上。云南瑞丽位于缅甸木姐镇（Muse）北方，也是不少曼尼普尔反抗军的基地。二○一七年六月九日卡普兰去世，虽由一名亲近的部属柯雷．孔雅克[624]接任卡普兰派领袖，但东南亚西部民族解放联合阵线的新主席尚未产生。

非中国制武器是在边界对侧缅甸克钦邦的板瓦[625]枪枝工厂中取得。板瓦所在区域是由前缅共指挥官札昆丁英[626]控制，他在一九八八年与缅甸政府和谈，转而领导当地政府认可的民兵武力。二○一五年缅甸大选前，札昆丁英也是缅甸联邦议会上院民族院（Amyotha Hluttaw）的议员。身为前缅共指挥官，他拥有中国人脉，但所在的部落区域中，并没有人知道如何制作精密武器，而这正是由中国技工操控工厂内中国机械的原因。

丁英的工厂以制造自动步枪、手枪、左轮手枪与猎枪闻名，印度东北反抗军正是客户之一。运送枪枝的车队沿着密支那（Myitkyina）经过孟拱[627]及玉矿产地帕敢[628]一路西行。由此开始，为避开克钦独立军对货物收取现金或实物过路「税」，枪枝运送改行小路送往辛嘎伦坎迪以西营地。中国取得的枪枝从瑞丽走私穿过中缅边界，以卡车通过腊戍（Lashio）、曼德勒、蒙育瓦（Monywa），再送往缅印边界。[629]

阿萨姆联合解放阵线也以佤邦联合军的人脉闻名，后者接受中国武装，并成为中国的施压手段，用以对付逐渐倾向西方的缅甸政府。据说拥有两至三万武力、配备精良的佤邦联合军将新的中国军火留给自己，并将旧军火转手卖给其他反抗团体，其中包含印度东北反抗军。由于佤邦联合军领袖周围有中国安全人员常伴左右，因此若没有中国许可，绝不可能转卖任何东西。虽然中国支持佤邦联合军主要是为巩固在缅甸内部的立足之地，但也不能排除是以这武装团体为中间人，提供军火给阿萨姆联合解放阵线等组织，一如已提供军火给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军及其他缅甸团体一般。

所以，中国究竟与印度反抗军牵涉多深？多数是间接透过军火贩子居中接洽，但至少中国情治机构对军火流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类交易符合中国在此区域的地缘政治利益。除了庇护巴鲁亚，据悉中国情治人员也曾不只一次造访靠近塔卡的营地。

中国也许不打算让印度东北烽火遍地，然而在缅印关系上造成摩擦与冲突，却符合北京利益。自从二○一一年密松大坝暂缓后，缅甸开始疏远旧盟友中国，并与西方及印度建立更紧密的连结；缅印关系紧密对中国并不利，因此反抗军突袭印度与印度跨边反击所造成的边界不稳，反而符合中国利益。缅甸官方对西部边界事件兴趣缺缺，对中国更加有利。这让缅甸更趋近中国，后者并未放弃改善两国关系的希望。

由于这原因及其他更重要的因素（如缅甸自身面对的民族反抗军等），导致缅甸极不可能同意与印度军队进行任何共同对抗印度东北反抗军的行动。在官方层次上，缅甸政府与那迦兰民族社会主义议会（卡普兰派）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反抗军突袭印度及印度军队跨境缅甸作战之时，卡普兰本人正躺在缅甸旧都仰光的医院中休养。参与缅甸政府与许多武装反抗团体和平谈判的内阁成员昂敏还前往医院探视。[630]

印缅边界比喜马拉雅山区更可能成为下一波军事行动的场域。一九六二年战后，阿鲁纳恰尔邦与西藏之间唯一的潜在严重冲突，发生在一九八六年七月。当时一名印度巡逻兵发现四十名中国士兵在松多朗朱河谷（Sumdorong Chu）盖起类似永久建物。印度认为这处河谷属于印度领土或位在边界上，并派出更多军力监视当地发展。到了八月，中国在当地盖了一座直升机停机坪。

为了消解情势，印度建议若中国在即将到来的冬天撤出当地，来年夏天印度军队将不会进入该区，但北京拒绝了此项提议。[631]当时印度军队参谋长克里希纳斯瓦米．桑达吉将军（Krishnaswamy Sundarji）决定该是展现印度力量的时刻，因此派出一个旅进入边界南缘的吉米塘（Zeimithang），「猎鹰行动」（Operation Falcon）就此展开。印度军队在俯视松多朗朱河谷的山顶上建直升机停机坪，重机枪就定位，并向附近区域派出长程巡逻。根据当时在边界值勤的一名印度军官回忆：「桑达吉想向中国展现，此时并非一九六二年。他想伸展肌肉，让中国知道今日面对的是截然不同的印度军队。」[632]

当时的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Rajiv Gandhi）对于东北边界发展有所警觉，因此于十月前往当地。然而他却无法进入吉米塘，因为军官表示「天候不佳」，直升机无法降落吉米塘，只能在达旺接受简报。据闻总理说：「不错的简报，但我不相信。」[633]桑达吉却未退缩，甚至加派更多军力与重兵器进入当地。

到了一九八七年初，中国也调遣两万名军力进入俯视松多朗朱河谷的山区，中印士兵在棒山口与其他山口几乎可说是直接对峙，情况一直未获缓解。直到印度外长纳拉扬．杜特．塔瓦利在同年五月前往北韩首都平壤的路上中停北京。后来两国决定八月五日于棒山口会面，以会谈而非武力冲突的方式，解决边界事件。

像桑达吉这样由印度军人挑战民选政府领袖之事，实在极端少见；但一九八六至一九八七年事件正是其中之一。一九九九年桑达吉将军去世时，《今日印度》（India Today）杂志刊出一篇讣闻如此形容他：

在歷史上地位也许是由较不为人知的「猎鹰行动」所奠定……西方外交官预测将有战争，拉吉夫．甘地总理的顾问指控桑达吉的鲁莽必须为此负责。然而将军屹立不摇，甚至告诉一名拉吉夫资深幕僚：「若你认为未能获得专业妥适的建议，可以另作安排。」官员们就退让了，中国也是。[634]

松多朗朱河谷冲突后，中国在应对印度时更为谨慎。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十九日至十二月二十三日，拉吉夫．甘地应国务院总理李鹏之邀，前往中国正式访问。这是从拉吉夫的外祖父尼赫鲁一九五四年十月访问北京之后，印度总理再次访中。拉吉夫与中国高层领袖会晤，攀爬长城，并在两日后的国宴上出现精緻蔬果雕刻，分别以龙（象徵中国）与孔雀（象徵印度）代表两国和平。[635]也许是因为不久前的边界冲突，印度总理获得最高规格接待。一九六二年后，中国确实经歷许多改变，而印度也是。

拉吉夫．甘地的访中行程，是标志着中印关系解冻的里程碑。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鹏回访德里；高层互访在整个一九九○年代中成为常态。一九九三年九月，当时的印度总理纳拉辛哈．拉奥（Pamulaparti Venkata Narasimha Rao）访中，就维持喜马拉雅山区和平安宁一事签订协议。一九九六年十一月，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印，两国同意在共同边界上执行一系列增进互信的行动。[636]

经过数十年冲突，中印关系终于有所改善。纵然有重大进展，但也再次清楚展现出两国是截然不同的文明，政治体系也难相容。拉吉夫．甘地访中时，许多人期待边界问题有所突破，结果却未发生。一九六○年，中国曾提出东西领土直接互换，其中印度必须放弃西方的阿克赛钦，以此让中国接受喜马拉雅山稜线或麦克马洪线做为东方边界。换句话说，实质控制线将成为新的划定边界。[637]

对中国来说，要接受这笔买卖并不困难，因为当时中国并无人敢反对政府的关键战略决策；印度却不同，做为民主国家，领袖政客必须在选举中面对一般大众。任何印度政治家胆敢提议放弃阿克赛钦的既有领

土，交换中国承认印度实质控制下的东北边境特区主权，无疑是政治自杀之举。让问题更加复杂的是，一九八五年起，中国更在宣示中加入要求取得达旺地区。印度视此为更广的包围策略，其中包含入侵不丹的可能，将使印度的处境更加脆弱。638

二○一四年十月，莫迪的新政府宣布一项计画，将在阿鲁纳恰尔邦兴建超过两千公里的新道路，改善公共建设，协助发展偏远忽视的区域。政府同时也承诺将规划更多经费，建设学校、诊所与桥梁，并改善电讯。出身该邦的内政局长奇兰．里吉竹（Kiren Rijiju）稍后告诉《彭博商业周刊》（Bloomberg）：「边界附近的人民持续向下移居到社会建设较好的地方。当地人不应被迫外移。」639然而这些路都不会通向中国。里吉竹告诉《彭博商业周刊》：「我不想连向中国，我们并没有做任何破坏关系的事。这并非要向中国挑战或竞争，而是保卫我们自己的领土。」640

中国政府立刻回应印度的计画。十月十四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说：「我们仍须确认细节。中印边界议题是殖民歷史所留下，我们必须谨慎应对……在有最终解决方案前，我们希望印度勿採取任何进一步让情势复杂化的举动。」641

二○一五年二月，在莫迪访问阿鲁纳恰尔邦首府伊塔那葛后，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刘振民说：「中国政府从未承认印度单方设立所谓的『阿鲁纳恰尔邦』。」642中国国家新闻社新华社也以相同脉络报导：「所谓的『阿鲁纳恰尔邦』，主要建立在中国西藏的三个区域：门隅、珞隅及下察隅，目前由印度非法占领。此三隅位于非法的『麦克马洪线』及中印传统疆界之间，一贯为中国领土。」643

即使中国近年来言辞不再如一九五○与一九六○年代那般粗鲁狂勐，但其立场依旧不变，并且根本上从一九一三至一九一四年西姆拉会议之后就未曾改变。然而面对印度在阿鲁纳恰尔邦任何醒目动作，今日的中国除了发出这类官方声明，以及偶尔派出跨境巡逻显示自己仍不承认麦克马洪线外，并不可能多做些什么。印度的边界防御愈趋强悍，这类侵入不过是骚动之举。因此边界谈判的僵局很可能持续无解。

双边关系中比较棘手的议题是印度的西藏流亡者。一九八八年拉吉夫．甘地访中时，中国将大半时间都花在西藏议题上。访问结束后双方签署联合新闻公报，上面写着：「中国对一些西藏人在印度进行反中的活动表示关切。印度方面重申其政府长期和一贯的政策，即西藏是中国的一个自治区，不会允许这些藏人在印度进行反中政治活动。」644

接着中印联合宣言的语气更加强烈，根据美国的中国研究专家高龙江所说：

等到一九九一年十二月李鹏访问印度时，在最后公报里，中国对于「关切」的表达由一九八八年公报的十四个字，延伸成四十九个字：「中国关切在印藏人持续的反祖国活动，重申西藏为中国不可分割领土，严禁任何分裂中国、追求西藏『独立』之企图与行动。」645

透过将印度的西藏活动连结到「分裂中国」，北京确实正强化对德里的压力，而不是缓解情势。

即使签订这些友谊合作宣言，双方在处理西藏流亡者议题上差异十分明显。对中国来说，镇压示威与其他形式的公众抗议是标准程序；然而正如高龙江指出，印度只能在很有限的范围内对言论自由施加限制，「无论如何，印度的核心政治价值是自由主义，视言论与行动自由为应然人权。」646

印度最多只能限制，却无法禁止西藏流亡者进行政治活动，这让全世界知道发生在西藏人故乡的事。从一九八七年九月到一九八九年三月之间（亦即拉吉夫．甘地访中行的前后期间），西藏受一系列支持独立抗议事件所震动。这些抗议证明，即使在区域经济发展之下，藏人并未比一九五九年时更支持中国统治。抗议者在暴动中遭到杀害或受伤，所有外国人（包含记者）都被逐出西藏。

其中最血腥的事件发生在一九八九年三月。根据中国官方说法，仅有十多名抗议者死于治安警力的镇压之下；然而一位在动乱时以中国记者协会代表身分前往西藏的中国记者，在定居法国之后告诉媒体，他握有一份公安局与西藏军区指挥部的报告。日期是一九八九年三月十一日，内容写着：「三百八十七名拉萨居民死亡……多数遭到枪杀……七百二十一名伤者，两千一百人遭逮捕或拘押……三百五十四人失踪……八十二名宗教人士死亡，三十七人受伤，六百五十人遭逮捕或拘押。」647

除了缅甸边界的地缘政治利益外，对于藏人、达赖喇嘛及流亡追随者活动的关切，是中国持续与印度东北反抗军维持关系的另一个原因。这是向印度施压的途径，也是中国在双边议题（包含水资源分享）上施力的槓桿。中国也许不会承认，但他们同意让派瑞许．巴鲁亚及其同志进入中国，接触不怎么黑的军火黑市，确实足以让印度坐立不安。更进一步让印度恼火的是，当阿鲁纳恰尔邦居民进入中国时，当局持续发出以订书针固定的签证。

另一方面，两国快速的经济发展也为双方关系创造全新局面，中印之间的贸易蓬勃发展。中国成为印度最大的贸易伙伴，两国也在金砖五国（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的架构下合作。中印双边贸易总额，在二○一五至二○一六年到达七百零七点三亿美元。印度主要从中

国进口电子器材、电脑硬体周边、肥料、电子设备、消耗品、化学品与药物原料；出口到中国的有矿产、铁、钢、锡、生皮、皮革、塑胶与棉花。然而在此贸易关系中，中国是主要受益者；印度对中国的贸易赤字从前一年的四百八十四点八亿美元，上升至五百二十六点八亿美元。648中国在亚太区域逐渐强势的经济及政治角色，难免将招致区域其他国家的关切。南中国海争议中，一边是中国，一边是其他东南亚国家与美国，引发了许多国际关注。同时中美争夺太平洋诸岛国，以及周边广大经济海域的拉锯战也方兴未艾。然而一场可形容为新冷战的情势正在印度洋酝酿；中国与印度的战略利益将迎头对上，而印度、日本、美国与澳洲的非正式结盟逐渐浮现。

中国对于打开一条通往印度洋廊道的兴趣，早在一九八五年九月就已提出，当时中国正由僵硬的社会主义移向以市场为主的经济制度。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潘奇在为官方喉舌的《北京周报》上，探讨为中国西南内陆共有一亿六千万人的云南、四川、贵州，寻求通过缅甸直达印度洋，以此打通对外贸易出路的可能性。649潘奇在文章中提及以缅北密支那及东北的腊戌为铁路接点，伊洛瓦底江也是运送中国货品的可能渠道。

仰光与北京的第一份边贸条约在一九八八年八月初签订，数天后缅甸全国爆发民主运动。民主运动遭到镇压后，西方对缅甸施以制裁，中国却为这可能在内外压力下垮台的政权带来贸易、借款与信贷。除了成为缅甸最主要的外贸伙伴外，北京也向缅甸输出超过价值十四亿美元的军事设备，更承诺将升级缅甸在印度洋上的海军设施。相对地，缅甸军政府则让海军使用中国提供的设备，在关键的原油运输海道蒐集讯号情资，并将之提供给北京。区域内的战略平衡开始偏向中国。除了印度外，美国也越发关注这些发展。从缅甸海岸通往中国的油气管道建设工程，更加深西方与印度的焦虑。

西方制裁也许不像许多观察家所主张的，将缅甸的经济与战略关系推进中国手中；然而这政策确实让中国更轻易施展对缅甸的图谋，相对也让西方重新思考对缅政策。美国的战略考量，早在一九九七年六月就由安全专家暨前中情局分析师马文．欧特（Marvin Ott）于《洛杉矶时报》撰文总结：「华府可以也必须公开谴责缅甸暴行；然而仍必须考量其他安全与国家利益议题……此刻正是严肃思考其他可能性的时刻。」650

并非人权与民主等议题，而是出于地缘政治考量，这才是华府对缅政策转向的原因。同时，许多缅甸军方强硬派也对于高度仰赖中国心生不满。为了理解缅甸政策转向，必须跳过二○一○年大选后成立的民主表象。早在二○○四年八月，一份认定是知名的缅甸国防综合大学

（Defense Services Academy）研究员昂觉拉（Aung Kyaw Hla）中校所写的机密军事文件，已在缅甸内部流传。主题是「缅美关系研究」，三百四十六页的内容核心主旨，在于缅甸近年仰赖中国做为外交盟友与经济庇护，已造成威胁国家独立地位的「国家危机」。根据这份文件，缅甸只有进行政治改革，以民选政府取代军政府，才可能与西方关系正常化。昂觉拉建议，如此缅甸政府才有更好的条件应对外在世界。[651]

此建议确实成功了，虽然转向着实费了些功夫。直到二○一○年十一月缅甸举行大选，缅美关系才开始改善。二○一一年十二月初，美国国务卿希拉蕊高调访缅，距上次美国高层领导人访问缅甸已超过五十年；欧巴马总统紧接着在二○一二年十一月访缅。二○一三年五月，登盛成为一九六六年以来，第一位访美的缅甸总统。

缅甸与西方的外交互动，特别加上停止了密松大坝计画，促使中国开始寻求抢救中缅关系的新途径。二○一二年，中国学术期刊上刊载了数篇文章，分析北京对缅政策的错误及修正建议。提议之一是在缅甸发起公关活动，改变目前中国在缅甸的负面形象，并保证协助政府的和平进程。许多国家在财务上支持和平进程，大批西方非政府组织出任缅甸政府和平委员会的顾问，但只有中国能同时拿出红萝蔔跟棍子：援助、借款、贸易，以及给佤邦联合军的枪。

中国无法放弃新赢得的印度洋通道，因此缅甸对北京的战略重要性无庸置疑。全世界超过百分之六十的原油运输都要通过印度洋，从中东油田运往中国、日本与区域内其他强势经济体。同样地，亚洲工业国家与世界各地间百分之七十的货柜运输，也要通过印度洋。当大西洋货运量逐渐下滑、太平洋货运量相对稳定时，印度洋的货运量正在上升。这片海洋的部分区域，特别是西方的非洲之角[652]区域与东方的麻六甲海峡（Strait of Malacca），海盗活动十分盛行，恐怖分子运送武器前往区内不同冲突地点，导致更紧密的区域合作。然而对印度洋稳定来说，存在着更根本的地缘政治威胁。除了美国外，日本与印度也不信任中国。对印度来说，一切始于诸多边界冲突，最终导致一九六二年战争；日本则是数十年来持续与中国争夺东海一串岛群的所有权，日本称为尖阁诸岛，中国则称钓鱼台列屿。

日本在二○一二年十二月由首相安倍晋三开始主政，印度总理莫迪于二○一四年五月上台；随着两位民族主义者当权，战线与结盟关系更加明显。海军区域合作实际上始于二○○七年的年度联合军演，一开始参与的印度、日本、澳洲、新加坡与美国，在日本外海以相对非正式的方式进行「马拉巴军演」（Exercise Malabar）。二○一五年「马拉巴军演」升级，在莫迪与欧巴马的同意之下加入更多参与者，美、印、日的联合军演则是在孟加拉湾举行。

印度拥有区域中最强的舰队，包含航空母舰、潜艇与超过九十种不同船舰。印度海军此刻正进行潜艇船舰的现代化升级作业，特别是能侦测外国潜艇的船舰。中国则在区域内投资许多港口兴建计画：缅甸的皎漂港[653]、孟加拉的吉大港、斯里兰卡的汉班托塔港[654]，以及最重要的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655]。瓜达尔的深水港结合一九七九年开通的喀喇崑崙公路[656]，连接起巴基斯坦北部与新疆地区，将给予中国西部直接进入印度洋的通道。中国基本上是个大型陆上帝国，对比国家幅员来说，海岸线相对短少；它的内陆省必须依靠周边国家的通道，才能与外在世界进行贸易。缅甸的皎漂港对云南及其他西南省也是同样功能，这些省分通往中国自家港口的距离太过遥远。中国也计画开闢一条从西藏穿过锡金通往加尔各答港的贸易路线，然而并未获得印度欢迎，可能永远无法实现。

由于缅甸政府新的外交政策，加上不愿再被视为中国属国，皎漂港设施与中国兴建从皎漂港通往云南的中缅油气管道[657]的未来因此浑沌不明。中国目前多数原油供应都必须通过麻六甲海峡，兴建中缅油气管道就是为了避免受麻六甲海峡箝制。因此虽然中国持续让武器流向佤邦联合军及印度东北地区，其实也不想看到另一场战争爆发。这是后毛泽东时代，中国向周边邻国施压展现影响力的方式。

中国的兴趣虽然看似以贸易与经济发展为主，但以中东原油供应运输对中国的重要性来看，也难怪北京会寻求建立防护伞，保障交通生命线。二○○五年，美国博斯艾伦谘询公司（Booz Allen Hamilton）提出「珍珠链」概念来描述中国在印度洋的港口计画，此刻更加入非洲之角国家吉布地（Djibouti）的奥博克港（Obock）。[658]中国称这项新计画为「海上丝路」与「一带一路」，并重申其目的是在区域内和平推动贸易。[659]

中国自己承认，奥博克港计画将成为反海盗行动基地，由中国船舰在区域内执行，并不会对其他国家造成威胁；然而奥博克将会成为中国第一个海外军事基地，中国飞机将在此部属，瓜达尔港也设有机场。两者结合表示中国空军将于海外拥有更大的行动自由。美国已在区域内部署，包含吉布地与印度洋上的英国属地：迪亚哥贾西亚岛[660]。一九七○年代，美国在此建立大型海空军基地，并在阿富汗与伊拉克战争中频繁运用此岛。

同一时间，印度洋上已经观察到中国潜艇出没，主要是在麻六甲海峡以北的安达曼与尼可巴群岛（Andaman and Nicobar Islands），印度海军表示每个月至少遭遇中国潜艇一次。考虑到印度洋上的中国贸易与油运量，这并不令人惊讶；然而相较于二十年前中国未曾在此出现，对这片水域来说这是全新发展。现在印、美携手合作侦查中国潜艇踪迹。

法国则是另一个几乎不为人知、亲近印度及美国的印度洋强权。印度洋上有两块法国海外属地：马约特岛661与留尼旺岛662，因此两岛也是欧盟的一部分。此外，法国还控制较大的凯尔盖朗岛、较小的圣保罗与阿姆斯特丹群岛、克罗泽群岛663及一群马达加斯加附近的小岛。只有马约特与留尼旺岛上有永久住民，但其他岛屿都驻有法国军队与研究人员，凯尔盖朗岛上更设有卫星观测站。总体而言，法国在南印度洋上的专属经济海域超过两百五十万平方公里。

这个非正式联盟中另一名伙伴：澳洲，拥有爪哇岛南方的圣诞节岛（Christmas Island）及印度洋中的科科斯（基林）群岛（Cocos [Keeling] Islands）。这些领土的人口加总不过三千余人，但科科斯岛上却有一座大型机场跑道，并广设电子监测设备。664根据报导，美国有意以科科斯岛做为无人机基地，监测区域的海上交通；中国必然视此为针对性举动。澳洲也提议允许印度海军使用科科斯岛上设备。

中国在印度洋的长期计画尚未明朗，特别是将来会否兴建更多港口，以及哪些港口将由中国军队实际使用。然而中国已进入印度洋的事实，在各个层面上促使印度必须提升其印度洋舰队，并与区域内其他国家合作。虽然印度洋的情势并不如南海或东海令人忧虑，但无疑将成为新冷战的焦点——这个人尽皆知却鲜少议及的情势。

部分西方学者反驳区域内正上演新的「大博弈」。665然而正如坎培拉澳洲国防学院（Australian Defense College）的史都华．肯尼上校（Suart Kenny）指出，「新大博弈」已在「歴史猜疑与当前竞争中成形」。666这与喜马拉雅山区的边界争议有关；与竞逐尼泊尔、不丹及缅甸的影响力有关；与跨越边界的反抗军有关；与水资源分享有关；更与印度洋上的战略对峙有关。这一次，竞争非在沙俄帝国与大英帝国之间，而是歴经漫长又复杂的暴力歴史后，由独立印度与共产中国上演，后者已从饥荒、混乱与无政府状态中兴起，一跃成为今日世界的新经济强权。

600 Li Ling, Xizang zhi shui jiu Zhongguo: Da xixian ‘zai zao Zhongguo’ zhanlüe neimu xianglu [Save China through water from Tibet: a detailed record of the inside story of the Great Western Route ‘Rebuild China’ strategy] (Beijing: Zhongguo Chang’an chubanshe, 2005).

601 Binoda Kumar Mishra, ‘China Eyes Brahmaputra Waters’, Lookeast, September 2010, p. 23. See also Marcus Nüsser (ed.), Large Dams in Asia: Contested Environments between Technological Hydroscapes and Social Resistance, available at https://storage.googleapis.com/vjaystnboufufn.appspot.com/large-dams-inasia-contested-environments-between-technological-hydroscapes-and-socialresistance-advances-in-asian-human-environmental-research-PDF-a9a66.pdf (accessed on 26 December 2016).

602 Brahma Chellaney, Water: Asia’s New Battleground (Washington: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135. See also Michael Buckley, Meltdown in Tibet: China’s Reckless

Destruction of Ecosystems From the Highlands of Tibet to the Deltas of Asia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4), p. 193.

603 Quoted in Buckley, Meltdown in Tibet, pp. 194–5.

604 Quoted in Navin Singh Khadka, 'Megadams: Battle on the Brahmaputra', BBC, 20 March 2014, available at http://www.bbc.com/news/world-asiaindia-26663820 (accessed on 26 December 2016).

605 BBC, 'Megadams: Battle on the Brahmaputra', 20 March 2014.

606 BBC, 'Megadams: Battle on the Brahmaputra', 20 March 2014.

607 Tom Fawthrop, 'Southeast Asia's Last Undammed River in Crisis', thethirdpole.net, 26 October 2016, available at https://www.thethirdpole.net/2016/10/26/southeast-asias-last-major-undammed-river-in-crisis/ (accessed on 20 December 2016).

608 Hu Weija, 'No Need for Concern in India over China's Blockage of Brahmaputra River Tributary', Global Times, 10 October 2016, available at http://www.globaltimes.cn/content/1010346.shtml (accessed on 10 December 2016).

609 World Rivers Review, 'Understanding the Impacts of China's Upper Mekong Dams', December 2014, available at https://www.internationalrivers.org/resources/8477 (accessed on 20 December 2016).

610 Bertil Lintner, Burma Delivers its First Rebuff to China, YaleGlobal Online, 3 October 2011, available at http://yaleglobal.yale.edu/content/burma-delivers-its-first-rebuff-china (accessed on 23 December 2016).

611 Hu, 'No Need for Concern in India over China's Blockage of Brahmaputra River Tributary'.

612 Ramesh Bhushal, 'India and Nepal Sign deal to Build another Mega-dam', thethirdpole.net, 27 November 2014, available at https://www.thethirdpole.net/2014/11/27/india-and-nepal-sign-deal-to-build-another-mega-dam/ (accessed on 21 December 2016).

613 Sify News, 'Assam Dam Project May Continue: Jairam Ramesh', 12 August 2010, available at http://www.sify.com/news/assam-dam-project-may-continue-jairam-ramesh-news-national-kimpEcidiaa.html (accessed on 23 December 2016).

614 Prabin Kalital, 'Subansiri dam is the new theatre of Maoist activity', Times of India, 30 April 2015, available at http://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city/guwahati/Subansiri-dam-site-is-new-theatre-of-Maoist-activity/articleshow/47101239.cms (accessed on 26 December 2016).

615 Prabin Kalital, Times of India, 30 April 2015.

616 Akhil Ranjan Dutta, 'Equitable Justice Development and Rise of the Maoists in Northeast India', Wasbir Hussain (ed.), Northeast India: The Maoist Spread (Guwahati: Worldweaves India, 2014), p. 41.

617 Wasbir Hussain and Arunav Goswami, 'Maoists in Assam: Filling the Void Created by Rebels in Peace Talks And Truce', in Wasbir Hussain (ed.), Northeast India: The Maoist Spread (Guwahati: Worldweaves India, 2014), p. 108.

618 Quoted in Dutta, Equitable Justice Development and Rise of the Maoists in Northeast India', p. 44.

619 Interview with a Southeast Asian security officer who wished to remain anonymous, 15 October 2016.

620 For a detailed account of the arms deal, see Bertil Lintner, Great Game East: India, China

and the Struggle for Asia’s Most Volatile Frontie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 220–1.

621 Rahul Tripathi and Dipanjan Roy Chaudhury, ‘Extradited Thai National Wuthikorn Naruenartwanich sent to NIA’s custody till December 21’, The Economic Times, 11 December 2015, available at http://articles.economictimes.indiatimes.com/2015-12-09/news/68899905_1_naruenartwanichbangkok-extradition(accessed on 20 December 2016).

622 Bertil Lintner, ‘Mysterious Motives: India’s Raids on the Burma Border’, The Irrawaddy, 30 June 2015, available at http://www.irrawaddy.com/news/ethnic-issues/mysterious-motives-indias-raids-on-the-burma-border.html (accessed on 10 December 2016).

623 译者注：迪布鲁加尔（Dibrugarh）位于上阿萨姆邦，布拉马普特拉河南岸，是阿萨姆邦的第二大城，有印度茶都之称。位于阿萨姆东缘，上控阿鲁纳恰尔邦，下连那迦兰邦与曼尼普尔邦，东边紧邻中国云南与缅甸北部的克钦邦。自十九世纪英国人取得阿萨姆地区以来，此地就是上阿萨姆与印度东北地区的行政与交通枢纽。二次大战期间，此地成为英缅军的重要军事基地及缅甸军民撤退的转运基地。近年来更是印度东北地区工业、通讯与医疗产业发展的重镇之一，也是阿萨姆邦唯二获得亚洲开发银行投资挹注的城市。

624 译者注：卡普兰派的成员主要是孔雅克（Konyak）部落那迦人，伊萨克—穆瓦哈派的成员主要是坦昆（Tangkhul）部落那迦人。

625 译者注：板瓦（Pangwa）位于密支那东北方的中缅边界上，靠近中国云南腾冲的猴桥口岸，是克钦新民主军的驻扎地。

626 译者注：札昆丁英（Zakhung Ting Ying）原为克钦独立军指挥官。一九六九年，札昆丁英和拉姚泽龙（Layawk Zalum）率部脱离克钦独立军并加入缅共。克钦独立军当时领导人是反对缅共的佐森（Zau Seng）。在缅共领导下，札昆丁英成立一○一战区（War Zone 101）展开战斗。一九八九年缅共瓦解后，一○一战区改编为克钦新民主军，并与缅甸军政府签署停火协议。停火协议令克钦新民主军的领导人收穫颇丰，透过与中国的木材、玉石及其他货物贸易获得大量利益。二○○九年克钦新民主军改编为缅甸政府控制下的边防部队。二○一二年克钦独立军攻占克钦新民主军旧辖区，丁英旧部接受收编。丁英虽是缅甸国会议员，但在二○一二年战事爆发后遭缅甸政府软禁。

627 译者注：孟拱（Mogaung）位于密支那西南五十公里，在密支那—曼德勒铁路线上，并有公路西北通往印度，二战时缅甸战役的主战场之一。附近有红玉和琥珀等矿，为全缅甸最大的玉市。

628 译者注：帕敢（Hpakant）位于缅甸克钦邦中北部，曼德勒以北三百五十公里，世界最知名的玉矿产地之一，自明代即有开採玉石的纪录，翡翠产量曾一度高达世界产量的百分之九十五。克钦独立组织（Kachin Independence Organization）前主席慕然布朗森（Maran Bang Seng）生于此地。一九九○年代初期，克钦独立军与缅甸军政府达成停火协议后，虽然一度开放私人公司开矿，但因玉石利润惊人，克钦独立军与缅甸政府军仍持续争夺此地控制权。

629 Lintner, ‘Mysterious Motives: India’s Raids on the Burma Border’.

630 For a picture of the meeting, see Lintner, ‘Mysterious Motives: India’s Raids on the Burma Border’.

631 Claude Arpi, ‘The Sumdorong Chu incident: a Strong Indian Stand’, Indian Defence Review, 4 May 2013, available at http://www.indiandefencereview.com/the-sumdorong-chu-incident-a-strong-indian-stand/ (accessed on 22 December 2016).

632 Interview with retired Colonel Ashish Das, Kolkata, 26 February 2013.

633 Interview with retired Colonel Ashish Das, Kolkata, 26 February 2013.

634 Manoj Joshi, ‘Warrior as Scholar’, India Today, 22 February 1999, available at available at http://indiatoday.intoday.in/story/general-krishnaswami-sundarjipasses-away/1/253281.html (accessed on 27 December 2016).

635 Dilip Bobb, 'Breaching the Wall', India Today, 15 January 1989, available at http://indiatoday.intoday.in/story/prime-minister-rajiv-gandhi-visit-tochina-marks-a-new-beginning-in-bilateral-relations/1/322962.html (accessed on 27 December 2016).

636 John W. Garver, Protracted Contest: Sino-Indian Rivalr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Seattle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1), p. 7.

637 Katherine Richards, China-India: An Analysis of the Himalayan Territorial Dispute (Canberra: Australian Defence College, Centre for Defence and Strategic Studies, 2015), p. 11, available at http://www.defence.gov.au/ADC/Publications/IndoPac/Richards%20final%20IPSD%20paper.pdf (accessed on 20 December 2016).

638 Richards, China-India, p. 11.

639 Quoted in Natalie Obiko Pearson, 'India is Spending Billions to Populate a Remote Area Claimed by China', 26 October 2015, available at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5-10-25/india-spending-billions-topopulate-remote-area-claimed-by-china (accessed on 20 December 2016).

640 Pearson, 'India is Spending Billions to Populate a Remote Area Claimed by China'.

641 Quoted in 'China reacts to India's road construction plan, says don't complicate border issue', The Indian Express, 16 October 2014, available at http://indianexpress.com/article/india/india-others/china-reacts-to-indias-roadconstruction-plan-says-dont-complicate-border-situation/ (accessed on 23 December 2016).

642 Xinhua in China Daily, 'China "unhappy" on Modi's visit to disputed territory', 21 February 2015, available at http://usa.chinadaily.com.cn/china/201502/21/content_19630989.htm (accessed on 23 December 2016).

643 'China "unhappy" on Modi's visit to disputed territory'.

644 Garver, Protracted Contest, p. 72.

645 Garver, Protracted Contest, pp. 72–3.

646 Garver, Protracted Contest, p. 73.

647 'Chinese Said to Kill 450 Tibetans in 1989', New York Times, 14 August 1990, available at http://www.nytimes.com/1990/08/14/world/chinese-said-tokill-450-tibetans-in-1989.html (accessed on 23 December 2016).

648 'India's trade deficit with China jumps to $53 billion in 2015-16', The Economic Times, 1 August 2016, available at http://economictimes.indiatimes.com/news/economy/foreign-trade/indias-trade-deficit-with-china-jumps-to-53-billionin-2015-16/articleshow/53492853.cms (accessed on 27 December 2016).

649 Pan Qi, 'Opening to the Southwest: An Expert Opinion', Beijing Review, 2 September 1985.

650 Marvin Ott, 'Don't Push Myanmar into China's Orbit', Los Angeles Times, 17 June 1997.

651 A copy of the document is in the author's possession.

652 译者注：非洲之角（Horn of Africa）位于非洲东北部，为东非的半岛区，向东深入阿拉伯海，上接红海，包含衣索比亚、厄利垂亚、索马利亚与吉布地等国。

653 译者注：皎漂港（Kyaukphyu）位于缅甸若开邦实兑港附近，面对孟加拉湾。

654 译者注：汉班托塔港（Hambantota）位于斯里兰卡南部，西通印度西海岸、巴基斯坦、中东与非洲，东接孟加拉湾与麻六甲海峡。

655 译者注：瓜达尔（Gwadar）位于巴基斯坦南部，邻近伊朗，面对阿拉伯半岛，控制阿拉伯海进入波斯湾的入口。

656 译者注：喀喇崑崙公路（Karakoram Highway），又名中巴友谊公路或帕米尔公路。北起

中国新疆喀什，翻越喀喇崑崙山红其拉甫关口，进入巴基斯坦控制区，最后抵达巴基斯坦北部的塔科特（Thakot）。这是中国通往巴基斯坦及巴南港口、南亚次大陆、中东地区的唯一陆路通道，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喀喇崑崙公路对于二○○四年中国、巴基斯坦、吉尔吉斯与哈萨克签订之《四方过境运输协议》的启动也创造了有利条件。喀喇崑崙公路全长超过一千公里，最高点红其拉甫关口为四千三百三十三公尺，三度跨越印度河，穿越喀喇崑崙山脉、兴都库什山脉、帕米尔高原、喜马拉雅山脉西端，五条长度超过五十公里的冰川也发育于此区。地质情况极为复杂，雪崩、山体滑坡、落石、塌方、积雪、积冰、地震等地质灾害经常发生。中巴兴建公路过程中约有七百名工程人员罹难。

657 译者注：中缅油气管道起于缅甸西海岸皎漂港，经过缅甸若开邦、马圭省（Magway）、曼德勒与掸邦，循滇缅公路路线，从云南省瑞丽市进入中国，在贵州省安顺市进行油气管道分离。原油管道通往一度为油荒所苦的四川重庆，天然气管道则南下前往广西。

658 译者注：位于非洲之角上方，与叶门的亚丁港相对，控制红海与亚丁湾交接处。

659 Zhou Bo, 'The String of Pearls and the Maritime Silk Road', China.org.cn, 12 February 2014 , available at http://www.china.org.cn/opinion/2014-02/12/content_31445571.htm (accessed on 23 December 2016).

660 译者注：迪亚哥贾西亚岛（Diego Garcia）位于印度洋中央，距非洲三千五百公里，离印度最南端约一千八百公里，距澳洲四千七百公里。最早由法国占领，拿破崙战败后转交英国，长期做为英国模里西斯殖民地的附属岛屿，直到一九六五年英国将其脱离模里西斯，改纳入英属印度洋领地，然而模里西斯与英国仍持续争议此岛归属。一九六八至一九七三年间，英美强迫将岛上人口迁出，并在此建立大型军事基地。此地为美国在亚太区域最重要的两处基地之一。

661 译者注：马约特岛（Mayotte）位于莫三比克海峡北端，介于莫三比克与马达加斯加之间。

662 译者注：留尼旺岛（Réunion）位于马达加斯加外海，靠近模里西斯。

663 译者注：凯尔盖朗岛（Kerguelen）、圣保罗与阿姆斯特丹群岛（St. Paul and Amsterdam Islands）、克罗泽群岛（Crozet）皆位于印度洋南方，南极大陆以北，无永久居民，设有法国科研站。

664 Bertil Lintner, 'Australia's strategic little dots', Asia Times Online, 25 June 2010, available at http://www.atimes.com/atimes/China/LF25Ad01.html (accessed on 23 December 2016).

665 For an unusually naïve account of the rivalry, see, for instance, Sunniva Engh, 'India's Myanmar Policy and the "Sino-Indian Great Game"', Asian Affairs, 9 March 2016, available at http://www.tandfonline.com/doi/abs/10.1080/03068374.2015.1130307?journalCode=raaf20 (accessed on 25 December 2016).

666 Stuart Kenny, China and India: A 'New Great Game' founded on historic mistrust and current competition (Canberra: Australian Defence College, 2015), available at http://www.defence.gov.au/ADC/Publications/IndoPac/Kenny_IPS_Paper.pdf (accessed on 26 December 2016).

# 年表

## 一九○三至一九○四年

荣赫鹏中校带领英国远征军进入拉萨。

## 一九○六年

四月二十七日，《中英续订藏印条约》在北京签订。中英同意不干涉西藏内政。

## 一九○七年

八月三十一日，俄国与英国于圣彼得堡签订关于波斯、阿富汗与西藏的条约。

十二月十七日，不丹在乌颜．旺楚克之下成为统一王国。

## 一九一○至一九一二年

中国入侵西藏。

## 一九一○年

一月八日，不丹与英属印度签订条约，不丹对外事务由英属印度政府掌控，不丹享有内政掌控权。

## 一九一一年

十月十日，中国爆发共和国起义。

十月二十九日，蒙古宣布独立。

## 一九一二年

一月一日，中国宣布成为共和国，清朝于二月十二日失去政权。

## 一九一三年

二月十三日，西藏宣布独立。

十月十三日，英属印度、中国与西藏于西姆拉召开会议解决双边议题。

## 一九一四年

七月三日，签订《西姆拉条约》。中、英同意不占领西藏。英属印度东北区域与西藏之间划定麦克马洪线。英、藏签订协议，中国代表陈贻范仅署名。中国不承认西藏独立，英国与拉萨建立亲近关系。

一九二八年

中国成立蒙藏事务委员会，重申对两个事实独立国家的主权。

一九三二年

中藏爆发战争。中国击败西藏，然而后者维持事实独立。

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二年

中国国民政府军队抵达印度，加入英美联军，对抗占据英属缅甸殖民地的日本军队。中国希望铺设一条穿越西藏的补给路线，西藏不同意。英、美领军的同盟国改建一条由印度东北雷多通往缅甸北部的公路。

一九四七年

八月十五日，印度脱离英国独立。

一九四九年

八月八日，印度与不丹政府签订协议，重申不丹做为印度属国的地位，但享有高度自主。

十月一日，毛泽东在北京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结束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内战。国民党与其追随者逃往台湾，中华民国于台湾持续存在。部分国民党部队撤往缅甸东北部山区。

一九五○年

十月七日，中共军队进入西藏。

十一月，第一批中国部队抵达拉萨。

十二月五日，印度总统与锡金大公签订协议，根据协议「锡金将持续做为印度的被保护国」。

一九五○至一九五三年

中国在韩战中派出「志愿军」支持北韩；印度参与联合国支持的援助南韩行动。

一九五一年

二月，拉连瑙．「鲍伯」．卡亭少尉带领阿萨姆步枪队支队进入达旺，在中国据藏后稳定印藏边防。

五月二十三日，中国与西藏达赖喇嘛代表签订十七点《和平解放西藏》协议。

九月，中国军队控制拉萨。

一九五四年

一月，东北边境地域群转为东北边境特区。

四月二十九日，中印签订关于西藏的协议。印度承认西藏为中国的一部分。周恩来访问新德里，尼赫鲁访问北京。两国关系逐渐亲善。

九月，达赖喇嘛访问北京，与毛泽东、周恩来及邓小平会面。

一九五五年

四月，一群新近独立国家在印尼万隆聚会，发起不结盟运动。

一九五六年

二月，西藏康巴人开始反抗中国据藏。美国中情局秘密提供支持。

三月，印度东北区域那迦人爆发反叛行动。

十一至十二月，达赖喇嘛前往印度朝圣。

一九五七年

印度发现中国兴建穿越阿克赛钦的新藏公路。中国也在西藏内部兴建道路，包含通往印度边界的道路。

一九五八年

毛泽东发起「大跃进」，推动中国经济现代化，却造成灾难。

一九五九年

三月十日，爆发反对中国据藏的拉萨起义。达赖喇嘛出逃印度。同月，中、苏开始产生分歧。

三月二十五日，邓小平表示中国将跟印度「算总帐」，开始准备与印度一战，派遣藏语间谍进入东北边境特区的藏语区，调查地势地形并蒐集情报。

八月二十五日，中国军队攻击印度东北边境特区的朗久据点，杀害两名印度士兵。

十月二十一日，中国军队攻击印度拉达克地区的空喀山口据点，杀害十七名印度士兵。

一九六○年

六月，中苏关系全面破裂。苏联从中国撤回一千四百名专家技士，取消两百件计画。

十月一日，中缅签订边界条约，边界随着山脉稜线划定，亦即麦克

马洪线。

中国开始调动数万名军力进入印度边界附近区域。

一九六一年

二月，数千名中国军队跨越缅甸东北边界，攻击缅甸境内的国民党部队。

十月十五日，中尼签订协议，兴建西藏通往加德满都的高速公路，此路于一九六七年正式开通。

十一月二日，印度总理尼赫鲁在德里召开会议，宣布巩固边界区域的「前进政策」。

十二月，印度接收果亚与西海岸上其他的前葡萄牙殖民地。

大跃进结束，高达四千五百万人可能死于饥荒与其他问题；毛泽东受到责难。

一九六二年

六月，那迦反叛军在喀拉蚩会见中国官员，后者承诺提供协助。

十月，麦克马洪线附近发现中国军队动作。毛泽东似乎重掌大权。

十月十九日，中国开始轰炸边界上的印度据点。

十月二十日，中国对东北边境特区与拉达克的印度据点发动全面攻击。达旺于二十四日陷落。东边的基比图遭到攻击。

十月二十六日，尼赫鲁诉求国际「同情与支持」。

十一月十六日，中国夺取瓦弄。

十一月十九日，中国军队抵达邦迪拉。

十一月二十一日，中国宣布片面停火，开始从占领区撤军。

一九六三年

十二月一日，那迦山地转为那迦兰邦，但反叛行动依然持续。

一九六四年

五月二十七日，尼赫鲁在被中国背叛的忧愤中去世。

八月，中国军队入侵锡金的乃堆拉山口，十二月进行更多入侵行动。

十月十六日，中国进行第一次核弹试爆。

一九六五年

四月，印巴冲突导致两国于八月开战。巴基斯坦战败之后更倾向中国。

## 一九六六年

一月二十四日，甘地夫人成为印度总理，强化印苏关系。

二月二十六日，印缅边界爆发米佐人反抗行动。

五月十六日，毛泽东发起「伟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肃清任何残存的反对者。

九月二十日，中国向锡金边界的印度军队开火。

十月二十四日，第一批那迦反抗军由印度出发，徒步穿越缅甸北部，进入中国。

## 一九六七年

一月二十七日，第一批那迦反抗军抵达中国；更多那迦、米佐与曼尼普尔反抗军陆续前往中国。

五月，受到毛泽东主义启发，西孟加拉邦北部的拿撒尔巴利爆发农民起义。

## 一九六八年

一月，中国开始对缅甸共产党提供大量军事协助。数千名中国志愿者加入当时流亡中国的缅共。缅甸共产党占领缅甸东北大片区域。

## 一九六九年

三月二日，中国军队偷袭中苏边界乌苏里江小岛上的苏联边防。中苏军队为争夺小岛控制权发动了短暂战争。

## 一九七○年

二月，中国支持的缅甸共产党占领缅甸东北更多区域。

由于中国兴建西藏往加德满都的公路，印度对尼泊尔实施边境封锁。印度要求重审与尼泊尔的通商通运条约。

## 一九七一年

三月二十六日，东巴基斯坦宣布脱离巴基斯坦独立，血腥战争爆发。新国家定名为孟加拉。

四月二十二日，尼泊尔东南的贾帕与其他区域爆发拿撒尔式反抗行动，导致尼泊尔共产党（马列派）形成。

九月二十一日，不丹成为联合国会员国。

十二月二日，印度介入孟加拉内战。

十二月十六日，巴基斯坦军队在达卡投降，孟加拉成为独立国家。

一九七二年

一月二十日，东北边境特区转为联邦直属阿鲁纳恰尔区。

一月二十一日，联邦直属领土的前大公国曼尼普尔与特里普拉，成为独立邦。一九七○年四月二日后成为阿萨姆邦内自治区的卡西、詹塔与加罗山地，成为独立的梅加拉亚邦。

一九七三年

一月，锡金举行大选。反王室派宣布选举舞弊，反对当地统治者法王派系取得上风。

一九七四年

五月十八日，印度测试核子装置。

九月四日，锡金成为印度「附邦」。

一九七五年

五月十六日，锡金废除法王，举行公投，成为印度第二十二邦。

一九七六年

九月九日，毛泽东去世。权力斗争展开，邓小平重返高位。

一九七九年

四月，阿萨姆爆发称为「阿萨姆骚动」的反非法移民运动。武装运动者形成阿萨姆联合解放阵线。

一九八三年

二月十八日，暴徒攻击穆斯林村落，阿萨姆邦涅利超过两千人丧生，这被视为对印度的反动，因后者在「阿萨姆骚动」中仍持续举行一九八三年邦选举，且甘地夫人给四百万孟加拉移民投票权。

一九八六年

六月三十日，印度政府与米佐民族阵线签订协议，预备让米佐拉姆成为印度联邦中的完全独立邦。

十月，印度军队发动「猎鹰行动」，巩固印度吉米塘与西藏——中国的兼则马尼之间的边界。

一九八七年

一月，中国侧以建筑工事回应。紧张情势升高，但未导致战争。

二月二十日，阿鲁纳恰尔与米佐拉姆成为独立邦。

十二月二十七日，拉萨爆发反中抗议。抗议者在警局纵火，警察朝群众开枪。

一九八八年

五月十一至五月十三日，印度进行一系列地下核爆测试。

八月，缅甸爆发全国性反独裁起义行动。印度支持民主派。中国亲近仰光政权。

十二月十日，拉萨爆发更多反中暴动，数人死亡。

十二月十九至十二月二十三日：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访中。

一九八九年

三至四月，缅甸共产党低阶士兵叛变，党内老毛派领袖流亡中国。中国支持兵变，并提供高端武器给新的佤邦联合军，但同时维持与缅甸军政府的关系。

三月五至三月六日，中国警察攻击西藏独立派抗议者。根据独立中国记者的纪录，至少四百六十九人（包含八十二名佛教僧侣）丧生，七百二十一人受伤。

一九九○年

九月，不丹南部发生尼泊尔裔与不丹王军的冲突。暴力攀升，导致将近十万名尼泊尔裔逃离不丹，多数前往尼泊尔东南部的难民营。

一九九一年

十二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鹏访印，印中关系开始解冻。

一九九三年

九月，印度新总理纳拉辛哈．拉奥访中。

一九九六年

二月十三日，尼泊尔爆发毛派反抗行动。

一九九八年

十二月八日，不中签订《关于在中不边境地区保持和平与安宁的协定》，中国重申尊重不丹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

二○○三年

十二月，不丹军队将印度的阿萨姆与波多反抗军逐出不丹南部藏身地。

二○○四年

四月二日，孟加拉吉大港扣押大批武器，主要为中制；武器目的地为印度东北民族反抗军。

二○○七年

二月八日，印不签订新的双边协定，承诺将在「两国国家利益相关事务」上紧密合作，但不丹获得更多自主权。

二○○八年

三月，反中抗议震撼拉萨。中国政府表示二十二人死于暴动，但流亡藏人表示许多人死于抗议与镇压行动。

二○一○年

九月二十七日，那迦反抗军主要军火採购人安东尼．希姆瑞在尼泊尔加德满都机场被捕，转交印度收押。他负责跨孟加拉、泰国、菲律宾与中国的枪枝走私网络。

二○一一年

九月三十日，登盛组成的半平民新政府宣布，暂缓中缅在缅北合作的超大型水力发电计画。中缅关系开始恶化。

二○一五年

三至四月，阿萨姆、那迦与曼尼普尔反抗军在缅北总部举行会议，组成东南亚西部民族解放联合阵线。武器由缅中边界的枪枝工厂取得。

六月九日，印度军队跨越缅甸边界，攻击印度东北反抗军营地。

二○一六年

八月十一日，不丹外交大臣丹曲．多吉抵达北京，参加中不第二十四轮边界会谈。中国外交部发声明表示：「尽管不中尚未建交，但这不会阻碍两国开展互利合作。不丹方面愿不断深化与中国在旅游、宗教、文化、农业等领域交流，进一步提升合作水准。」然而双方仍未就边界划定达成协议。

二○一七年

六月九日，那迦反抗军领袖卡普兰于缅甸西北营地去世。印度那迦人柯雷．孔雅克接任那迦兰民族社会主义议会（卡普兰派）领袖。反抗

军团体仍旧以缅甸为基地。

六月十八日，中国试图在都克兰高地兴建道路，印度军队进入中不争议的都克兰高地。

六月二十日，不丹政府向北京发出正式外交照会，抗议中国入侵不丹领土。

六月二十九日，不丹再次抗议中国兴建道路。

八月一日，中国外交部发出十五页文件，指责印度以不丹为「藉口」，干涉中不边界会谈，冲突导致中印军队在都克兰高地对峙。

八月二十八日，中印同意各自从都克兰高地撤军。

# 我读《中国的印度战争》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吴启讷

在《中国的印度战争》这部书中，作者以一九六二年印度—中国边境战争为中心，对纵贯超过半个世纪的印中角力过程做了详细的爬梳，之后还花费了很大的篇幅，呈现了战争结束后的南亚和东南亚政治。作者柏提尔．林纳是一位记者，但这部深度专题报导型态的着作却颇有学术气味。欧美优秀政治记者的专业能力往往不在学者之下，这部书整体的观点并不算新颖，但旁徵博引，比较系统地整理了一九六○年代印中战争以来的研究成果，从特定的歷史视角呈现出印中冲突过程与演变，扮演了学术研究的侧翼角色。其中，作者对于毛泽东在中印边界战争中抱有问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权和争夺第三世界、不结盟运动主导地位的观察，颇有见地；对于印度华人在战争当中鲜为人知的窘迫处境的呈现，也颇有独到之处。

对于中文读者而言，这部着作还有更进一步的价值。通常，西方学界基于自觉或其他动机，都会试图在研究中掩饰其西方中心的视角，记者倒率直得多。本书作者并不掩饰其写作目标，也未曾使用晦涩的后现代理论，他只是想论证在印中冲突中，中国是非正义的一方。就歷史写作应还原史实的角度看，这个目的本身，不见得就没有正当性，只要证据充分，论证过程得当，也会有其价值。遗憾的是，作者在为其预设结论寻找证据时，出现了很多逻辑上和证据上的缺失。读完之后，我们也许会发现，作者的理念、取材、论证过程，大致符合西方政界的主流思维，作者这样不加掩饰的呈现，对于中文读者理解西方在中印关系议题上的思维，有意外的助益。

对于四分之一世纪以来更加急于脱离中国政治—文化圈的台湾主体论者，这部从冷战时期的研究中演义出来的着作，其所抱持的殖民地现代化论、殖民主权继承论，传统国家无主权、无边界论，更能引发高度的兴趣，它的中文译本在台湾出版，也许与此不无关连。当然，台湾自然存在一些不同的声音，但藉由此书，对于从侧面了解台湾知识界内部的认知差异，也会有意外的助益。

这部书的内容事涉一九五○至一九六○年代冷战与中国边疆议题，与我的研究领域有所重叠。就我的研究所见，近代中国边界的法律确认，主要集中在三个时段：第一阶段，十七世纪末到十九世纪末，列强透过不平等条约直接割取清朝领土；第二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做为名义上而非实质战胜国的中国，进一步经由条约丧失从清朝继承的领土；第三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有约十年间处在韩战获胜、中苏同

盟、经济成长的状态，除印度外，二战前分属英、法等国殖民地的新兴亚洲民族国家基本上有意接受其与中国自清朝以来的传统边界；但伴随一九五○年代末期中、苏两个共产主义大国的反目以及毛泽东所发动的大跃进的失败，加上西方的封锁和台北蒋介石当局的威胁，与中国接壤的新兴亚洲国家把握中国国势减弱，亟需摆脱内外困境的机会，纷纷开启与中国的边界谈判，迫使中国在边界议题上基本满足了各国的领土要求。包括本书提及的尼泊尔、缅甸在内，朝鲜、蒙古、阿富汗、巴基斯坦、寮国、越南等国大致都是以古代王国时期或前殖民者的领土主张为依据，得到中国的正面回应。本书的主角之一印度，也是在这一背景下，试图让中国接受其领土主张的。印度对自己的要求有相当的自信：不仅因为中国与印度在一九五○年代前、中段有一段蜜月期，而且一九五○年代末期的中国还面临内部经济动盪、西藏危机，外部受到西方和苏联集团的双重夹击。对中国而言，向印度让步，将会获得一个不结盟领袖大国的友情。然而，印度在领土和西藏议题上都越过了北京的最后底线，双方最终结束蜜月，走向冲突。

本书作者在处理这一主题时，抱持了一些基本立场，但这些立场所显示的，是作者在西方中心史观下，对于非西方歷史的基本误解。这些误解，使得这部着作出现一些重大缺失。

## 一、认定「西藏是独立国家」——挪用的国家观

作者以理所当然的口气宣称西藏是独立的国家，并据以责备（在一九一四年的西姆拉会议中）「中国并不承认西藏是独立国家」。然而，书中这种宣示其实是特定政治立场下的政治主张，与歷史现实有相当距离。作者努力避免提及西藏与清朝之间近三百年的特殊或隶属关系，虽然书中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军队于一九一○至一九一二年在西藏的主控角色，但仍不忘强调这一活动的「短暂而失败」；书中也避免提及当今世界上没有任何一国，包括作者所在的瑞典，以及曾和西藏相互承认对方独立的「蒙古帝国」的继承者：「蒙古人民共和国」和「蒙古国」在内，承认西藏是独立国家的事实。这一写作策略的目标，并不在于确立西藏独立的合法性，而在于佐证中国领土主张的不合理。

作者认定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但又迴避以下事实：一、西藏在清朝国家体系内长期承认自己对清朝的隶属关系，其政教领袖统治西藏的权威来自清朝皇帝的授予，故在双方关系中，西藏政教上层其实是受益的一方。二、西藏对自身「国家」地位的重新想像，发生在英国数度入侵之后，在西姆拉会议当中，西藏官员认定自己是独立国家，是在西方的刺激下，反应、学习的过程；事实上，亚洲各国、各区域的民族主义思潮，都经歷了经受西方刺激，从十九世纪中后期萌发，于二十世纪

勃兴的过程；西姆拉会议当中西藏官员的表述，是一种民族主义主张，而非事实陈述。其实在书中，作者几度间接承认，西藏在法律上，甚至于在事实上，都不是独立的，原因不仅在于中国否认，英、俄也都同样反对。

作者承袭了从一九二○年代的日本开始，并被整个西方迅速接受的看待近代中国主权议题的公式，即「满蒙回藏非中国」，但在领土完整议题上，採用了双重的双重标准，即凡涉及满蒙回藏与「本部」行省的界线争议，一律支持满蒙回藏；凡涉及满蒙回藏与邻国的边界争议，一律否认满蒙回藏的权利。在本书涉及的藏印边界议题上，作者立足于（因寻求英印协助而有意奉送领土权益的）西藏独立派的立场，而非整个西藏的立场。为此，书中完全隐去西藏内部的独立派为了获得英国支持，不惜在领土纷争上做出大幅让步，全盘接受英印立场的歷史。

针对一九六二年战争，作者强调中方是挑衅者。但谁先攻击，重点仍在于如何认定边界，一九六○年代初的印度，不断将军队刚刚抵达的区域视为本国境内，当然会将已经在那里的中国人视为入侵者。其实，作者提到中国「进攻」的几个地点的地名都是藏语地名，等于为作者的主张做了反证。

## 二、认定争议区域不是中国领土——对非西方歷史的误解

该书认定，一九六二年中国以印度入侵为藉口出兵，是侵略行为；从歷史上看，中国从未统治过东西段任何一块争议区域，而争议区域其实是不存在争议的印度领土。然而，作者在强调中国从未统治「布拉马普特拉河以北直至喜马拉雅山脚」时，却从未清楚交代，「布拉马普特拉河以北直至喜马拉雅山脚」区域在「麦克马洪线」被创造出来之前一直处在西藏的文化政治圈之中的歷史。

书中声称，「远在明确的边界地图成为现实前，分水岭、山川河流就已成为国与国之间的分界；而喜马拉雅山巅（而非南方的山脚）长久以来，就是西藏高原与印度次大陆的分界线」，这一说法是殖民时期西方帝国地理想像的产物，并不符合欧洲以外的歷史，尤其不符合喜马拉雅区域的歷史、文化、社会、经济状态。西藏文化、经济圈明显涵盖整个喜马拉雅山南坡，这一点可以从分水岭南侧的尼泊尔、不丹、锡金在文化上与西藏高度一致，在政治上是西藏的藩属同时又是清朝藩属这一点上得到侧面佐证（其中，锡金和尼泊尔的冲突，是由清朝调停的；十八世纪末清朝攻打尼泊尔的战争，也是清藏、藏尼、清尼三组藩属关系下的产物）；而不丹以东的喜马拉雅山南坡因地形和文化原因，又不存在一个相对独立的小型政体，使得从达旺到瓦弄间的这块地域与拉萨之间有着明确的歷史、文化、政治和现实连结，否则我们就不能解释达赖

六世来自这一区域的歷史。书中其实提及，在西藏当局和达旺地方官员看来，英国探险家到达达旺，是「非法越境」。

对于台湾读者而言，理解从达旺到瓦弄间的这块山地与布拉马普特拉河平原的关系，远比西方人容易：这种关系与台湾西海岸平原、台地和中央山脉的关系很相似，清朝将区分汉人耕作区和土着居民经济、文化区的「土牛沟」划在山脚下而非中央山脉的山嵴。清朝这样做的原因很简单，在亚洲，地理因素与政治界线的关系，率皆受到前现代经济型态的影响。这种令西方人感到困惑，但对亚洲人而言无比自然的歷史所呈现的是，布拉马普特拉河以北到喜马拉雅山嵴这块区域，无疑既不是印度的传统属地或英国殖民印度期间开拓的土地，也非蛮荒的无主地，而是由西藏当局管辖几个世纪的土地。书中直接断定这个区域就是「英属印度的一部分，而非外国土地」，就像直接认定「锡金就是英属印度的一部分」一样武断。

在本书极力强调的边界议题上，可以看出作者对于近代之前的亚洲史相对陌生，不知道亚洲的主权边界是西方人闯入亚洲后，由殖民者违背当地歷史传统任意划定的结果。

其实，书中曾数度无意识地提及西藏对达旺到瓦弄区域的「传统控制权」；也曾承认，「直到一九五○年代初期，达旺才进入印度中央政府的控制之下」；而直到一九五四年，武器装备逐渐现代化的印军才初次到达「麦克马洪线」，书中这些内容，无异于标明印度在一九五○年代初期（利用共产主义中国陷入韩战的机会）的行动，不是行使行政权力，而是扩张。与达旺到瓦弄区域类似，书中提到印中边界西段的阿克赛钦地区与拉达克的关系，即令做为西藏藩属的拉达克被英属喀什米尔控制，英国人也依照其控制范围划了界，但只有吃了亏的西藏遵守新界线，印度则仍不满足，又虚拟了深入西藏的新线。

而西藏与中国的关系，一如本书列举（但以嘲笑的口气认定并非中国领土）的蒙古、吐瓦、缅甸北部部分区域一样，都是清朝的臣属，它们与清朝之间的隶属关系或臣服关系，有一系列法律文件和统治事实的佐证，这种关系的歷史远较美利坚合众国建国的歷史为久。至于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清朝领土、人民遗产的继承，则是另一个问题。但对作者而言不幸的是，这种继承不仅来自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单方面宣示，而且得到二十世纪初期几乎全部外国的承认，以至于日本在一九二○年代后期宣称「满蒙非中国」时，遭遇到国际的谴责。直到一九四五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外蒙古才在法律上成为独立国家。

## 三、判断印、中冲突中谁是谁非——价值中心取向

作者看待西方以外的歷史，是将殖民者到来以前的歷史视为神话或史前史，殖民开始后的歷史，方被视为真实的歷史，故于不知不觉间据此建立了根植于内心的是非观。印度长期经受西方殖民统治的歷史，使得作者在意识型态上对其有强烈的亲切感。比如书中认为，「印度军队是远离政治的专业军队」，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理想典型，则展现在虚拟士兵雷锋的个人形象上」；在现实中，印度学界也不否认，印度军队更像是一支陷于内部种姓、种族和宗教等结构性冲突的雇佣军；而雷锋不是「虚拟」士兵，只是常识层面的资讯。以为雷锋是「虚拟」的偶像，显示作者对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现代史的理解还停留在肤浅的层次上。作者认为「毛泽东是政治而非军事领袖」，「形塑了游击战操作原则的并非毛泽东，而是朱德」；书中还宣称，「彭德怀、张闻天与其他相关人士皆被打为『右派』与『反革命分子』」，事实上，彭、张从未被打成「右派」或「反革命分子」，它们的罪名是「反党集团」，这些也是性质相同的例子。作者认为在一九六○年代初，「毛的地位动摇」，而这是毛发动对印度战争的动机，但其实，这段期间毛的地位没有丝毫动摇。作者做出这类结论的依据，基本上还是西方对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史料缺乏掌握之际的研究成果。

作者又认定，一九六二年发生在喜马拉雅山区的印中冲突，「是两个文明间的冲突」，这一认定，从近代史的角度看，有部分合理成分，尤其是，如能连结到作者对尼赫鲁、毛泽东二人对各自歷史定位的追求的猜测上，大致可以成立。然而，作者为这个结论提供的证据，却是「印度自始至终遵守国际法」、「印度在法理上站得住脚」，而「不论出于何原因，只要不为中国所喜的条约都被视为不平等，因此也不会遵守」。在此，作者先是忘记中国和印度在过往的两千多年中并未发生冲突，古代中国甚至经由佛教，大范围地接受印度文化；后来又有意遗忘印度打破国际条约，收回葡萄牙属地（我们当然肯定印度驱逐殖民统治的正当性），吞併锡金的歷史；进而有意忽略清朝和中华民国遵守一切国际条约（包括蒋介石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过程），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样遵守一切国际条约（包括它认定为「不平等」的和「非法」的条约）的歷史：一九六二年中国在战胜后撤军的结果，以及中国对名为「实际控制线」实为「麦克马洪线」的尊重，恰好表明该国实质上遵守条约；最后，做为熟知当代国际政治的记者，作者根本忘记欧洲人制定「国际法」的重要一面，即是为他们非洲、亚洲、美洲和大洋洲扩张寻求法理依据的史实，因而不仅无法理解做为「国际法」受害者的中国，在面对印度破坏国际法的行径时，也只能迴避。

作者也在西藏议题上谴责北京违背其与拉萨签订的「十七条协议」，理由是该协议规定「西藏现行政治制度不变」，而北京背弃承

诺。在现实中，十四世达赖方面之所以认定北京违约，是因为他们所认定的「西藏」，还包含青海省全境和甘肃、四川、云南三省的相当一部分地区；他们将中共在这些地区进行的「民主改革」和集体化运动，视为「改变西藏制度」；而「十七条协议」遭到废弃的契机，又恰在于十四世达赖当局的「起义」行动。作者又进一步迴避拉萨「起义」过程的歷史，先是转换「起义」和「平叛」的先后次序，进而称达赖喇嘛逃亡后，「后方的人民解放军紧追不捨」。其实，当代学界（无论如何解读）都承认解放军奉毛之命，刻意不加追击，放任达赖喇嘛出境这一史实。一九五九年尼赫鲁当局对拉萨事变的反应，都显示印度政府对印、藏、中之间关系的理解方式，并不像本书作者那样简化。

## 四、为了维护预设结论——双重标准的普遍化

为证实自己的预设结论，作者的逻辑不得不常常转移。作者在书中将印中边界或印藏边界一律称为「印度东北边界」，将争议区域定义为「印度东北」，清楚地表明了这是一部立足于印度立场的着作，以此为既定立场，很自然地脱离了学术规范。

作者为强调「中国从未控制或统治印度东北任何区域」，陷入一系列的双重标准陈述中。在这句表述中，作者首先需要掩盖以下事实，即古代印度和英印政府也从未统治过布拉马普特拉和以北到喜马拉雅山嵴的区域；与此类似事实还有，古代印度和英印政府同样从未控制或统治拉达克以东的阿克赛钦地区。

作者承认清朝军队确曾到达喜马拉雅山分水岭以南区域，但并不提及英国人接触这个区域的时间晚于清朝军队的到达时间；作者两度承认，跨越清末和中华民国时段的「中国官员曾穿过喜马拉雅山脉，抵达后来成为东北边境特区的极东区域」，并「在瓦弄的东南方竖立边界柱」、「几个边界标志」，但又从不提及英印政府对该「东北边境特区」的接触，远迟于中国政府「在瓦弄的东南方竖立边界柱」。

作者承认二十世纪初英国对布拉马普特拉河以北的山区展开军事征服，但却迴避展示其范围，因为在现实中，这些征服行动并未到达由西藏当局控制或影响下的喜马拉雅山南坡，作者只能将英印方面较中国竖立界碑晚得多的接触行动赋予行使主权的色彩。以上做法，无一不在挑战西方自己定义的主权原则。双重标准至此，令人惊叹。

作者数度强调「中国从未控制或统治印度东北任何区域」，可是又无法掩饰西藏政府管辖这一片区域的史实，于是採取以下策略：凡涉及西藏管辖纪录，即切割西藏与中国；凡涉及中国政府在四川、云南、青海、甘肃藏语区的政治活动，即谴责中国对西藏的干涉与入侵。凡欲证实中国有非法的领土要求时，就强调中国从不遵守条约和协议；凡欲证

明中国谋求第三世界领袖地位时，又强调中国的目标不在领土。

该书在描述中印冲突的关键因素之一——麦克马洪线议题上，避重就轻，略去对西藏和中国立场有利的内容，仅採用英印立场有利的证据。

## 五、保有传统色彩的中国政治思维VS进化的印度政治思维

这部着作致力于打破中国观点，呈现印度观点，如果不是有知识体系的偏颇和选择性的论证，则其价值未必受到太大损害。不巧的是，本书还有一个重要的缺陷，在于作者花费了不少篇幅描述中国在共产主义建国实践中的灾难，但对印度的古代歷史、殖民史与独立后印度的社会变迁、内外政策、战略目标的了解与铺陈，反而十分有限。

作者认为，印中冲突「是两个文明间的冲突」，但作者却未能呈现印中之间歷史的重大差异，即后者在歷史上显着的连续性和前者的殖民经验，这是本书在论述结构上最主要的缺失。揆其原因，在于作者对于中国古代基于「天下」观念建立的「天下」政治秩序，和做为这个秩序一部分的「喜马拉雅山区政治秩序」体系十分陌生，进而难以理解毛对世界革命的想像与苏联的不同，一部分来自他对中国古代天下秩序理念的继承；同时，作者也未体认到印度藉着英国殖民体系完成国家整合并累积扩张能量的歷史过程。

也许，这个缘由才是这部书不断转移评判标准，策略性地採用採取了虚／实、褒／贬两组写作策略，因此降低自身说服力的思想动因。例如作者承认，「尼赫鲁接纳英国的地缘策略思考，因为对他来说，过去与现在是连续的」。依此逻辑，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清朝和中华民国的领土和人民遗产，其正当性当然超过印度对扩张性殖民遗产的继承，但作者为印度无条件辩护的努力，又摧毁了这一逻辑。在阿萨姆、曼尼普尔议题上，作者同样採取与西藏议题、边界议题一样的双重标准，为印度继承英国扩张遗产，推动内部殖民辩护，破坏了自己在西藏议题上同情弱势的形象。

在后面几章中，作者有意进一步地证实一九六二年战后中国在南亚次大陆和中南半岛持续扩张的态势，但作者虚／实、褒／贬的写作策略却往往为自己的目标做了反证。文中所提供的事实，反而显示战前战后，中国在它与南亚的接合部採取战略守势，以致于对印度的要求不断让步的过程。如认定，「一九六○年（中缅）签订协议划界，结果对缅甸不利」，其所引用的资料来源反倒彰显了中国为笼络缅甸做出大幅让步的史实。近年来，中国更承认了印度对锡金的兼併，并在边界争端中持续保持克制，乃至多次退让。相反地，战后印度的扩张仍在持续，包括全面恢复并扩大对中国所不承认，但加以尊重的「麦克马洪线」的控

制，并向该线以北进一步推进、吞併锡金、支解巴基斯坦、控制不丹外交、干涉尼泊尔事务等等。面对后毛时代的中国政治，作者依然强调其独断、专制，全然未能察觉到一九七○年代末期之后的中国政府决策，已不能像一九六○年代那样不需顾虑民意了。

林纳着作的中译，部分满足了中文读者了解中印冲突议题上不同观点的需求。正因为这部书瑕瑜并存，它能够为读者创造的思考空间反而更大。这部书的真正价值可能正在于此。

# 延伸阅读

Adams, Barbara. 2006. Nepal: Crisis Unlimited—Reflections from the Crucial Years. New Delhi: Adroit Publishers.

Adhikari, Aditya. 2014. The Bullet and the Ballot Box.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Adhikari, D.P. 1998. The History of Nepalese Nationalism. Kathmandu: Romila Adhikari Acharya.

Adhikari, Pushpa. 2012. China: Threat in South Asia. New Delhi, Frankfort, IL: Lancer Publishers.

Agrawal, Ajay B. 2003. India and Tibet: The Role Nehru Played. Mumbai: N.A. Books International.

Allen. B.C., E.A. Gait, C.G.H. Allen, and H.F. Howard. 2012 [1905]. Gazetteer of Bengal and North-East India. New Delhi: Mittal Publications.

Appadorai, A. 1955. The Bandung Conference. New Delhi: The Indian Council of World Affairs.

Aris, Michael. 1994. The Raven Crown: The Origins of Buddhist Monarchy in Bhutan. London: Serindia Publications.

Arpi, Claude. 2008. Tibet: The Lost Frontier. New Delhi, Olympia Fields IL: Lancer Publishers.

Arpi, Claude. 2009. Dharamsala and Beijing: The Negotiations that Never Were. New Delhi, Olympia Fields, IL: Lancer Publishers.

Arpi, Claude. 2013. 1962 and the McMahon Saga. New Delhi, Frankfort, IL: Lancer Publishers.

Avedon, John F. 1985. In Exile from the Land of Snows. London: Wisdom Publications.

Bagchi, Romit. 2012. Gorkhaland: Crisis of Statehood. New Delhi: Sage Publications.

Bailey, F.M. 1945. China-Tibet-Assam: A Journey, 1911. London: Jonathan Cape.

Bains, J.S. 1962. India’s International Disputes. New York: Asia Publishing House.

Bajpai, G.S. 1999. China's Shadow over Sikkim: The Politics of Intimidation. New Delhi, London, Hartford, Wi: Lancer Publishers, Spantech & Lancers.

Bakshi, K.N. 2012. I was a Prisoner of War in China. New Delhi: Lancer Publishers.

Barber, Noel. 1969. From the Land of Lost Content: The Dalai Lama's Fight for Tibet. London: Collins.

Bareh, H.M. 2001. Encyclopaedia of North-East India: Sikkim. New Delhi: Mittal Publications.

Barkataki, Meena Sharma. 2011. British Administration in North-East India 1826– 1874: A Study of Their Social Policy. Guwahati, Delhi: Spectrum Publications.

Barpujari, N.K. 2008. Seven Sisters: North East India Profile. Delhi: Sumit Enterprises.

Barua, Lalit Kumar. 2010. India's North-East Frontier: The Colonial Legacy. Guwahati, Delhi: Spectrum Publications.

Basnet, Lal Bahadur. 1974. Sikkim: A Short Political History. New Delhi: S. Chand & Co.

Basu, Gautam Kumar. 1996. Bhuta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Development. New Delhi: South Asian Publishers.

Becker, Jasper. 1996. Hungry Ghosts: Mao's Secret Famine.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Bell, Charles. 1991 [1928]. The People of Tibet. New Delhi, Madras: Asian Educational Services.

Bhanot, Madan. 2015. Escape from Namka Chu: A Love Story Based on India-China War 1962. New Delhi: KW Publishers.

Bhattacharyya, Rajeev. 2014. Rendezvous with Rebels: Journey to Meet India's Most Wanted Man. Noida: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India.

Bhushan, Ranjit. 2016. Maoism in India and Nepal. New Delhi,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Bhutani, Sudarshan. 2004. A Clash of Political Cultures: Sino Indian Relations [1957–1962]. New Delhi: Roli Books.

Bhuyan, S.K. (compiled, trans., and ed.). 1933. Tungkhungia Buranji or A History of Assam 1681–1826 A.D. London, Bombay,

Calcutta, Madra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ista, Dor Bahadur. 2001. Fatalism and Development: Nepal's Struggle for Modernization. Hyderabad: Orient Longman.

Borah, Swapnali, Deke Tourangbam, and A.C. Meitei. 2010. Encyclopaedic Studies of North-Eastern States of India: Arunachal Pradesh. New Delhi: New Academic Publishers.

Bower, Ursula Graham. 1953. The Hidden Land. London: John Murray.

Bray, John (ed.). 2011. Ladakhi Histories: Local and Regional Perspectives. New Delhi and Dharamsala: Library of Tibetan World and Archives & Indraprastha Press.

Cederlöf, Gunnel. 2014. Founding an Empire on India's North-Eastern Frontiers 1790–1840. New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1965. Intelligence Study: Bhutan between India and China. OCI No. 1105/65, April 2. Directorate of Intelligence, Office of Current Intelligence.

Chakravarti, P.C. 1961. India–China Relations. Calcutta: Firma K.L. Mukhopadhyay.

Chakravarti, P.C. 1971. The Evolution of India's Northern Borders. London: Asia Publishing House.

Chakravarti, Sudeep. 2008. Red Sun: Travels in Naxalite Country. New Delhi: Penguin Books.

Chakravarty, L.N. 1989. Glimpses of the Early History of Arunachal. Itanagar: Director of Research, Government of Arunachal Pradesh.

Chapman, F. Spencer. 1940. Lhasa: The Holy City. London: Readers Union and Chatto & Windus.

Chaudhury, Mithu. 2013. 'NIA Report Reveals NSCN (IM)-China Link', North East News Portal, 14 January.

Choudhary, Shubhranshu. 2012. Let's Call Him Vasu: With the Maoists in Chhattisgarh. New Delhi: Penguin Books.

Chowdhury, J.N. 1990. The Tribal Culture and History of Arunachal Pradesh. Delhi: Daya Publishing House.

Coelho, V.H. 1970. Sikkim and Bhutan. New Delhi: Vikas

Publications.

Craig, Mary. 1992. Tears of Blood: A Cry for Tibet. New Delhi: Harper Collins Indus.

Crossette, Barbara. 1995. So Close to Heaven: The Vanishing Buddhist Kingdoms of the Himalayas. New York: Albert A. Knopf.

Dalai Lama. 1964. My Land and My People: The Memoirs of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of Tibet. London: Panther Books.

Dalai Lama. 1982.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Collected Statements, Interviews and Articles. Dharamsala: The Information Office of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Dalai Lama. 1990. Freedom in Exile: The Autobiography of the Dalai Lama. New York: HarperCollins.

Damodaran, A.K., and U.S. Bajpai (eds). 1990. Indian Foreign Policy: The Indira Gandhi Years. New Delhi: Radiant Publishers, the Nehru Memorial Museum and Library.

Das, B.S. 1995. Mission to Bhutan: A Nation in Transition. New Delhi: Vikas Publishing House.

Das, Gautam. 2009. China-Tibet-India: The 1962 War and the Strategic Military Failure. New Delhi: Har-Anand Publications.

Das, Gautam. 2013. Understanding the Sino-Indian War 1962. New Delhi: HarAnand Publications.

Das, Gurudas, C. Joshua Thomas, and Nani Bath (eds.). Voices from the Border: Response to Chinese Claims over Arunachal Pradesh. New Delhi: Pentagon Press.

Das, Smriti. 2005. Assam–Bhutan Trade Relations 1865–1949: A Socio-Economic Study. Delhi: Anshah Publishing House.

Dash, Arther Jules. 2011 [1947]. Bengal District Gazetteer: Darjeeling. Siliguri: N.L. Publishers.

Datta, Saikat. 2011. 'The Great Claw of China', Outlook, 7 February. Available at http://www.outlookindia.com/article.aspx?270223 (accessed on 29 March 2016).

Dave, Shri A.K. 2006. The Real Story of China's War on India, 1962. Occasional Paper No 1. New Delhi: Centre for Armed Forces Historical Research.

De Vore, Howard O. 1999. China's Intelligence and Internal Security Forces. Surrey: Jane's Information Group.

Deane, Hugh. 1987. 'The Cold War in Tibet', Covert Action Information Bulletin, No. 29 (Winter): pp. 48–50.

Dhar, Maloy Krishna. 2005. Open Secrets: India's Intelligence Unveiled. New Delhi: Manas Publications.

Dikötter, Frank. 2013. The Tragedy of Liberation: 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45–1957. New York, London, New Delhi, Sydney: Bloomsbury Press.

Dixit, Kanak Mani, and Shastri Ramachandaran (eds). 2002. State of Nepal. Kathmandu: Himal Books.

Dixit, Kanak Mani. 2011. Peace Politics in Nepal: An Opinion from Within. Kathmandu: Himal Books.

Dorji, C.T., 1995. History of Bhutan. Thimphu: Sangay Xam.

Dozey, E.C. 2012. A Concise History of the Darjeeling District since 1835 with a Complete Itinerary of Tours in Sikkim and the District. Kolkata: Bibliophil.

Dunham, Mikel. 2004. Buddha's Warriors: The Story of the CIA-backed Tibetan Freedom Fighters, the Chinese Invasion, and the Ultimate Fall of Tibet. New York: Jeremy P. Tarcher and Penguin.

Dutta, S., B. Tripathy (ed.). 2008. Sources of the History of Arunachal Pradesh. New Delhi: Gyan Publishing House.

Eftimiades, Nicholas. 1994. Chinese Intelligence Operations. Essex: Frank Cass.

Elleman, Bruce A., Stephen Kotkin, and Clive Schofield (eds). 2013. Beijing's Power and China's Borders: Twenty Neighbours in Asia. New Delhi: Pentagon Press.

Elwin, Verrier (ed.). 1962. India's North-East Frontier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London, Bomba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Elwin, Verrier. 1964. The Tribal World of Verrier Elwin: An Autobiography. New York, Bomba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Elwin, Verrier. 2009. The Oxford India Elwin: Selected Writings. New Delhi,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Elwin, Verrier. 2014. Democracy in NEFA. Itanagar: Directorate

of Research, Department of Cultural Affairs, Government of Arunachal Pradesh.

Epstein, Israel. 1983. Tibet Transformed. Beijing: New World Press.

Faligot, Roger, and Rémi Kauffer. 1990. The Chinese Secret Service. London: Headline Book Publishing.

Fang, Percy Jucheng, and Lucy Guinong J. Fang. 1986. Zhou Enlai: A Profile.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Fisher, Margaret W., Leo E. Rose, and Robert A. Huttenback. 1963. Himalayan Battleground: Sino-Indian Rivalry in Ladakh. New York, London: Frederick A. Praeger.

Fleming, Peter. 1987. Bayonets to Lhasa. Hong Kong,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ord, Robert. 1957. Captured in Tibet: An Epic of Endurance. London: Pan Books.

French, Patrick. 2011. Younghusband: The Last Great Imperial Adventurer. London: Penguin Books.

Fürer-Haimendorf, Christoph von. 1955. Himalayan Barbary. London: John Murray.

Fürer-Haimendorf, Christoph von. 1962. The Apa Tanis and Their Neighbours.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Gaige, Fredrick H. 1975. Regionalism and National Unity in Nepal.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Gait, Edward Albert. 2011. A History of Assam. Guwahati, Delhi: Spectrum Publications.

Garver, John W., and Fei-Ling Wang. 2010. 'China's Anti-encirclement Struggle', Asian Survey, 6(3) 238–61.

Gautam, Kul Chandra. 2016. Lost in Transition: Rebuilding Nepal from the Maoist Mayhem and Mega Earthquake. Kathmandu: Nepal-Laya.

Gautam, Rajesh, and Asoke K. Thapa-Magar. 1994. Tribal Ethnography of Nepal, Volume I. Delhi: Book Faith India.

Gautam, Rajesh, and Asoke K. Thapa-Magar. 1994. Tribal Ethnography of Nepal, Volume II. Delhi: Book Faith India.

Gearing, Julian. 2000. 'Lama Wars: Can the Dalai Lama hold his divided people together—and keep China at bay?', Asiaweek, October 20.

Gearing, Julian. 2003. 'The tale of two Karmapas', Asia Times Online, December 24. Available at http://www.atimes.com/atimes/China/EL24Ad02.html (accessed on 29 March 2016).

Gelder, Stuart, and Roma Golder. 1964. The Timely Rain: Travels in New Tibet. New York and London: Monthly Review Press.

Ghosh, Suniti Kumar. 2009. Naxalbari: Before and After. Kolkata: New Age Publishers.

Goldstein, Melvin C., Dawei Sherap, and William R. Siebenschuh. 2004. A Tibetan Revolutionary: The Political Life and Times of Bapa Phüntso Wangye. Berkeley, Los Angeles,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Goldstein, Melvyn C. 2007.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Volume 2: The Calm before the Storm, 1951–1955. Berkeley, Los Angeles,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Goldstein, Melvyn C. 2014.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Volume 3: The Storm Clouds Descend, 1955–1957. Berkeley, Los Angeles,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Graff, David A., and Robin Higham (eds). 2012 A Military History of China. Dehra Dun: Greenfields Publishers.

Gupta, Karunakar. 1982. Spotlight on Sino-Indian Frontiers. Calcutta: New Book Centre.

Gupta, Ranjit Kumar. 2004. The Crimson Agenda: Maoist Protest and Terror. Delhi: Wordsmith.

Gupta, Shishir. 2014. The Himalayan Face-Off: Chinese Assertion and the Indian Riposte. Gurgaon: Hachette Book Publishing.

Guruswamy, Mohan, and Zorawar Daulet Singh. 2009. India China Relations: The Border Issue and Beyond. New Delhi: Viva Books and the Observer Research Foundation.

Halper, Lezlee Brown, and Stefan Halper. 2014. Tibet: An Unfinished Story. London: Hurst & Company.

Hamilton, Angus. 1912. In Abor Jungles: Being an Account of the

Abor Expedition, the Mishmi Mission and the Miri Mission. London: G. Bell & Sons. Harrer, Heinrich. 1956. Seven Years in Tibet. London: Pan Books.

Harrer, Heinrich. 1998. Return to Tibet: Tibet After the Chinese Invasion. New York: Penguin Putman.

Hazarika, Joysankar. 1996. Geopolitics of North East India. New Delhi: Gyan Publishing House.

Hoftun, Martin, William Raeper, and John Whelpton. 1999. People, Politics & Ideology: Democracy and Social Change in Nepal. Kathmandu: Mandala Book Point.

Hopkirk, Peter. 1982. Trespassers on the Roof of the World: The Race for Lhas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uberman, Leo, and Paul Sweezy. 1963. 'A Fool's Game: The China-India Border Dispute', Monthly Review, 14 (9) (January): 465–86.

Hussain, T. Karki. 1977. Sino-Indian Conflict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the Indian Sub-Continent, 1962–66. Faridabad: Thomson Press (India) Ltd.

Hutt, Michael (ed.). 2004. Himalayan People's War. London: Hurst & Company.

Jeffrey, Robin, Ronojoy Sen, and Pratima Singh. 2012. More than Maoism: Politics, Policies and Insurgencies in South Asia. New Delhi: Manohar and the Institute of South Asian Studies.

Jha, Prashant. 2014. Battles of the New Republic: A Contemporary History of Nepal. New Delhi: Aleph Book Company.

Johri, Sita Ram. 1968. The Chinese Invasion of NEFA. Lucknow: Himalaya Publications.

Johri, Sita Ram. 1969. The Chinese Invasion of Ladakh. Lucknow: Himalaya Publications.

Jose, Vinod K. 2010. 'Spies in the Snow: How the CIA and Indian Intelligence Lost a Nuclear Device in the Himalayas', The Caravan, December.

Joshi, H.G. 2004. Sikkim: Past and Present. New Delhi: Mittal Publications.

Joshi, P.C. 2012. Naxalism at a Glance. Delhi: Kalpaz Publications.

Kalha, Ranjit Singh. 2014. India–China Boundary Issues: Quest for Settlement. New Delhi: Indian Council of World Affairs and Pentagon Press.

Kampen, Thomas. 2000. Mao Zedong, Zhou Enlai and the Evolution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Leadership. Copenhagen: Nordic Institute of Asian Studies.

Kandell, Alice. 1971. Sikkim: The Hidden Kingdom. New York: Doubleday & Company Inc.

Kao, Ting Tsz. 1980. The Chinese Frontiers. Aurora, Ill: Chinese Scholarly Publishing Company.

Karki, Arjun, and David Seddon (eds.). 2003. The People's War in Nepal: Left Perspectives. Delhi: Adroit Publishers.

Karnik, V.B. (ed.). China Invades India. Bombay, New Delhi, Calcutta, Madras, London, New York: Allied Publishers.

Kazi, Jigme N. 2013. The Lone Warrior: Exiled in My Homeland. Gangtok: Hill Media Publications.

Khan, Sulmaan Wasif. 2015. Muslim, Trader, Nomad, Spy: China's Cold War and the People of the Tibetan Borderlands.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Khetsun, Tubten (trans. from Tibetan by Matthew Akester). 2008. Memories of Life in Lhasa under Chinese Rul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Kimura, Hisao, and Scott Berry. 1990. Japanese Agent in Tibet: My Ten Years of Travel in Disguise. London: Serindia Publications.

Kissinger, Henry. 2012. On China. London: Penguin Books.

Kohli, M.S., and Kenneth Conboy. 2002. Spies in the Himalayas: Secret Missions and Perilous Climbs. 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Kohli, Manorama. 1993. From Dependency to Interdependence: A Study of IndoBhutan Relations. New Delhi: Vikas Publishing House.

Kumar, Niraj, George van Driem, and Phunchok Stobdan (eds.). 2016. Himalayan Bridge. New Delhi: KW Publishers.

Kunnath, George J. 2012. Rebels from Mud Houses: Dalits and the Making of the Maoist Revolution in Bihar. New Delhi: Social Science Press.

Laird, Thomas. 2002. Into Tibet: The CIA's First Atomic Spy and His Secret Expedition to Lhasa. New York: Grove Press.

Lal, Dinesh. 2008. Indo-Tibet-China Conflict. Delhi: Kalpaz Publications.

Lamb, Alastair. 1966. The McMahon Line: A Study in the Relations Between India, China and Tibet, 1904 to 1914. Volume I: Morley, Minto and Non-Interference in Tibet.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Lamb, Alastair. 1966. The McMahon Line: A Study in the Relations between India, China and Tibet, 1904 to 1914. Volume II: Hardinge, McMahon and the Simla Conference.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Lamb, Alastair. 1968. Asian Frontiers: Studies in a Continuing Problem. London: Pall Mall Press.

Lamb, Alastair. 1973. The Sino-Indian Border in Ladakh. Canberra: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Lamb, Alastair. 1991. Kashmir: A Disputed Legacy 1846–1990. Hertingfordbury, Hertfordshire: Roxford Books.

Lecomte-Tilouine, Marie (ed.). 2013. Revolution in Nepal: An Anthropological and Historical Approach to the People's War. New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evenson, Claude B. 1988. Dalai Lama: A Biography. London, Sydney, Wellington: Unwin Hyman.

Lintner, Bertil. 1990.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Burma.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Southeast Asia Program.

Lintner, Bertil. 2011. Land of Jade: a Journey from India through Northern Burma to China. Bangkok: Orchid Press.

Liu, Melinda. 1999. 'Tibet: China's Kosovo? The Inside Story of How the CIA Helped the Dalai Lama', Newsweek (cover story, Asian edition), 19 April.

Lohia, Rammanohar. 2002. India, China and Northern Frontiers.

Delhi: B.R. Publishing Corporation.

Luthra, P.N. 1971. Constitutional and Administrative Growth of the North-East Frontier Agency. Shillong: North-East Frontier Agency.

Macaulay, Colman. 1977 [1885]. Report on a Mission to Sikkim and the Tibetan Frontier 1884. Kathmandu: Ratna Pustak Bhandar.

MacFarquhar, Roderick, and Michael Schoenhals. 2006. Mao's Last Revolution.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and London, England: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MacFarquhar, Roderick. 1974.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Volume 1: Contradictions among the People, 1956–1957.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MacFarquhar, Roderick. 1983.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Volume 2: The Great Leap Forward, 1958–1960.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Maitra, Ramtanu. 2004. 'Pakistan's Bhutan gambit worries India', Asia Times Online, November 25. Available at http://www.atimes.com/atimes/South_Asia/FK25Df03.html (accessed on 18 August 2017).

Malik, Mohan. 2011. China and India: Great Power Rivals. Boulder and London: First Forum Press, Lynne Reiner Publishers.

Mansingh, Surjit. (ed.). 1998. Indian and Chinese Foreign Policie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New Delhi: Radiant Publishers.

Marks, Thomas A. 2007. Maoist People's War in Post-Vietnam Asia. Bangkok: White Lotus Press.

Mathema, Kalyan Bhakta. 2011. Madheshi Uprising: The Resurgence of Ethnicity. Kathmandu: Mandala Book Point.

Maxwell, Neville. 1981. 'The Deadlocked Deadlock, Sino-Indian Boundary Disput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16(38) (19 September):1545–8.

Maxwell, Neville. 2014. China's Borders: Settlements and Conflicts. Newcastle: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McGranahan, Carole. 2010. Arrested Histories: Tibet, the CIA, and Memories of a Forgotten War.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McGregor, Richard. 2010. The Party: The Secret World of China's

Communist Rulers. London: Allen Lane.

McKay, Alex. 1997. Tibet and the British Raj: The Frontier Cadre, 1904–1947. Surrey: Curzon Press.

McKay, Alex. 2003. Tibet and Her Neighbours: A History. London: Edition Hansjörg Mayer.

Mehrotra, L.L. 1998. India's Tibet Policy. New Delhi: Tibetan Parliamentary and Policy Research Centre.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1960. Atlas of the Northern Frontier of India. New Delhi: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Ministry of Information and Broadcasting. 1963. The Chinese Threat. Delhi: Publications Division, Ministry of Information and Broadcasting.

Mishra, Trinath. 2007. Barrel of the Gun: The Maoist Challenge and Indian Democracy. New Delhi: Sheriden Book Company.

Misra, Tilottama (ed.). 2011. Writings from North-East India: Fiction. New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isra, Tilottama (ed.). 2011. Writings from North-East India: Poetry and Essays. New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oraes, Frank. 1960. The Revolt in Tibet.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Mukherji, Nirmalangshu. 2013. The Maoists in India: Tribals under Siege. New Delhi: Amaryllis.

Myrdal, Jan. 2012. Red Star over India: As 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 are Rising. Impressions, Reflexions and Preliminary Interferences. Kolkata: Setu Prakashani.

Nair, P. Thankappan. 1985. Tribes of Arunachal Pradesh. Guwahati: Spectrum Publications.

Nanda, B.R. (ed.). 1990. Indian Foreign Policy: The Nehru Years. New Delhi: Radiant Publishers and the Nehru Memorial Museum and Library.

Navlakha, Gautam. 2012. Days and Nights in the Heartland of Rebellion. New Delhi: Penguin Books.

Nayak, Nihar R. 2014. Strategic Himalayas: Republican Nepal and External Powers. New Delhi: Pentagon Press and the Institute for

Defence Studies and Analyses.

Noorani, A.G. 2011. India–China Boundary Problem 1846–1947: History and Diplomacy. New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orbu, Jamyang. 1986. Warriors of Tibet: The Story of Aten and the Khampas' Fight for the Freedom of their Country. London: Wisdom Publications.

Onesto, Li. 2005. Dispatches from the People's War in Nepal. London and Ann Arbor: Pluto Press; Chicago: Insight Press Inc.

Orton, Anna. 2010. India's Borderland Disputes: China, Pakistan, Bangladesh and Nepal. New Delhi: Epitome Books.

Osik, N.N. 1999. Modern History of Arunachal Pradesh (1825–1997). Itanagar, New Delhi: Himalayan Publishers.

Palit, D.K. 1991. War in High Himalaya: The Indian Army in Crisis, 1962. New Delhi: Lancer International.

Pandita, Rahul. 2011. Hello Bastar: The Untold Story of India's Maoist Movement. Chennai: Tranquebar Press.

Parmanand. 1992. The Politics of Bhutan: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Delhi: Pragati Publications.

Peissel, Michel. 1972. The Secret War in Tibet. Boston, Toronto: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Peissel, Michel. 1992. Mustang: A Lost Tibetan Kingdom. Delhi: Book Faith India.

Pommaret, Françoise. 1991. Introduction to Bhutan. Hong Kong: Odyssey.

Prasad, Ambika. 2011. Nehru in Parliament: On Social, Economic and Foreign Policy. New Delhi: Cyber Tech Publications.

Raeper, William, and Martin Hoftun. 1992. Spring Awakening: An Account of the 1990 Revolution in Nepal. New Delhi: Viking.

Raghavan, V.R. 2013. Nepal as a Federal State: Lessons from the Indian Experience. New Delhi: Vij Books India.

Raizada, Shefali. 2012. Merger of Sikkim: A New Perspective. Delhi: Swati Publications.

Raj, Prakash A. 2001. "Kay Gardeko?": The Royal Massacre in

Nepal. New Delhi: Rupa & Co.

Rajagopalan, Rajeswari Pillai. 2012. Clashing Titans: Military Strategy and Insecurity among Asian Great Powers. New Delhi: KW Publishers and the Observer Research Foundation.

Ram, Mohan. 1971. Maoism in India. Delhi, Bombay, Bangalore, Kanpur, London: Vikas Publications; New York: Barnes & Noble Inc.

Raman, B. 2007. The Kaoboys of R&AW: Down Memory Lane. New Delhi, Olympia Fields IL: Lancer Publishers.

Ramana, P.V. 2014. Understanding India's Maoists: Select Documents. New Delhi: Institute of Defence Studies and Analyses and Pentagon Press.

Rao, Gondker Narayana. 1968. The India–China Border: A Reappraisal. Bombay, Calcutta, New Delhi, Madras, Lucknow, Bangalore, London, New York: Asia Publishing House.

Rasgotra, M. (ed.). 2012. China and South Asia: Developments and Trends. New Delhi: Academic Foundation.

Rehman, Iskander. 2007. 'A Himalayan Challenge: India's Conventional Deterrent and the Role of Special Operations Forces along the Sino-Indian border',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70 (1) (Winter): 104–42.

Riencourt, Amaury de. 1950. Lost World: Tibet, Key to Asia. London: Victor Gollancz.

Rittenberg, Sidney, Amanda Bennett. 2001. The Man Who Stayed Behind.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Ronaldshay, Earl of. 2005 [1923]. Lands of the Thunderbolt: Sikhim, Chumbi & Bhutan. Varanasi: Pilgrims Publishing.

Roy, Anirban. '2009. Return of the Dalai Lama', The Northeast Today (cover story), November.

Roy, Asish Kumar. 2008. Unfinished Revolution: The Spring Thunder and Beyond. Kolkata: Minerva Associates.

Rustomji, Nari. 1983. Imperilled Frontiers: India's North-Eastern Borderlands. Delhi,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Ryan, Mark A., David M. Finkelstein, and Michael A. McDevitt (eds.). 2003. Chinese Warfighting: The PLA Experience since 1949.

Armonk, NY: Sharpe.

Ryavec, Karl E. 2015. A Historical Atlas of Tibet.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Saikia, Yasmin. 2004. Fragmented Histories: Struggling to be Tai-Ahom in India.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Sali, M.L. 1998. India–China Border Dispute: A Case Study of the Eastern Sector. New Delhi: A.P.H. Publishing Corporation.

Sarma, Amulya Chandra. 1986. Tai Ahom System of Government. Delhi: B.R. Publishing Corporation.

Satnam (trans. from Punjabi by Vishav Bharti). 2010. Jangalnama: Travels into a Maoist Guerilla Zone. New Delhi: Penguin Books India.

Schendel, Willem van. 2005. The Bengal Borderland: Beyond State and Nation in South Asia. London: Anthem Press.

Sebastian, Sarish. 2015. Bhutan: A Journey from Tradition to Modernity. New Delhi: Adroit Publishers.

Senanayake, Ratne Deshapriya. 1967. Inside Story of Tibet. Colombo: The Afro-Asian Writers' Bureau.

Shah, Alpa, and Judith Pettigrew (eds.). 2012. Windows into a Revolution: Ethnographies of Maoism in India and Nepal. New Delhi: Social Science Press and Orient Black Swan.

Shakaba, Tsepon W.D. 1967. Tibet: A Political History.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Shakespear. L.W. 2004. History of Upper Assam, Upper Burmah and North-Eastern Frontier. Guwahati, Delhi: Spectrum Publications.

Shakya, Tsering. 1999. The Dragon in the Land of Snows: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since 1947. London: Pimlico.

Sharma, Jan. 1998. Democracy without Roots. Delhi: Book Faith India.

Sharma, Khemraj. 2013. Gorkhas in the Wilderness: A Study in North East India. New Delhi: Concept Publishing Company.

Sharma, Shri Ram. 2003. India–China Relations 1972–1991. New Delhi: Discovery Publishing House.

Sheikh, A.G. 2010. Reflections on Ladakh, Tibet and Central Asia. New Delhi: Skyline Publications.

Short, Philip. 1999. Mao: A Life. London: Hodder and Stoughton.

Shrivastava, Manoj. 2013. Re-Energising Indian Intelligence. New Delhi: Vij Books India.

Siddika, Shamima. 1993. Muslims of Nepal. Kathmandu: Gazala Siddika.

Sidhu, Waheguru Pal Singh, and Jing-dong Yuan. 2003. China and India: Cooperation or Conflict? New Delhi: India Research Press.

Singh, Jasjit (ed.). China's India War 1962: Looking Back to See the Future. New Delhi: KW Publishers.

Singh, K. Natwar. 2009. My China Diary 1956M1988. New Delhi: Rupa & Company.

Singh, K.S. 1995. People of India Volume XIV: Arunachal Pradesh. Calcutta: Seagull Books and Anthropological Survey of India.

Singh, M.K. (ed.) 2012. Indian Intelligence: Missing in Action. Delhi: Prashant Publishing House.

Singh, Mithilesh Kumar. 2014. Increasing Diplomatic Relation Between Bhutan and China: A Great Concern for India. Delhi: Prashant Publishing House.

Singh, Mukesh Kumar. 2011. Nepal Foreign Policy. New Delhi: Sumit Enterprises.

Singh, Mukesh Kumar. 2014. Nepal in China's Foreign Policy. Delhi: Prashant Publishing House.

Singh, Prakash. 2011. The Naxalite Movement in India. New Delhi: Rupa Publications.

Singh, Sunjoy K. 2015. Major Operations of R&AW. New Delhi: Lenin Media.

Singh, V.K. 2007. India's External Intelligence: Secrets of Research and Analysis Wing (RAW). New Delhi: Manas Publications.

Sinha, A.C. 2008. Sikkim: Feudal and Democratic. New Delhi: Indus Publishing Company.

Sinha, Chandan. 2013. Kindling of an Insurrection: Notes from

Junglemahals. London, New York, New Delhi: Routledge.

Sinha, V.B. 1968. The Red Rebel in India: A Study of Communist Strategy and Tactics. New Delhi: Associated Publishing House.

Smith, Warren W. 1996. Tibetan Nation: A History of Tibetan Nationalism and Sino-Tibetan Relations.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Smith, Warren W. 2008. China's Tibet? Autonomy or Assimilation. Lanham, Boulder, New York, Toronto, Plymouth, UK: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Stewart, Jules. 2006. Spying For the Raj: The Pundits and the Mapping of the Himalaya. Phoenix Mill: Sutton Publishing.

Strong, Anna Louise. 2003. When Serfs Stood Up in Tibet.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Syed, Anwar H. 1974. China and Pakistan: Diplomacy of an Entente Cordiale. London, Karachi,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yiemlieh, David R. (ed.). 2014. On the Edge of Empire: Four British Plans for North East India, 1941–1947. New Delhi: Sage Publications.

Talukdar, Mrinal (trans. from Assamese by Deepika Phukan). 2014. 1962: Sino-Indian Conflict. Guwahati: Kaziranga Books.

Teiwes, Frederick C. 1993. Politics and Purges in China. Armonk, New York, London, England: M.E. Sharpe.

Teiwes, Frederick C. 2007. The End of the Maoist Era. Armonk, New York, London, England: M.E. Sharpe.

Teltscher, Kate. 2006. The High Road to China: George Bogle, the Panchen Lama and the First British Expedition to Tibet. London: Bloomsbury.

Tendhon Culture Preservation Society. 2014. A Short Account of His Holiness' visit to Mon Tawang on his way to India in 1959. Tawang: Tendhon Culture Preservation Society

Thant Myint-U, 2011. Where China Meets India: Burma and the New Crossroads of Asia.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Thapa, Deepak, and Bandita Sijapati. 2004. A Kingdom under Siege: Nepal's Maoist Insurgency, 1996 to 2004. London and New

York: Zed Books.

Thapa, Manjushree. 2005. Forget Kathmandu: An Elegy for Democracy. New Delhi: Penguin Books.

Thapa, Manjushree. 2013. Forget Kathmandu: An Elegy for Democracy. New Delhi: Aleph Books.

Thapar, Romila, Nandita Haksar, and Anand Teltumbde (eds.). 2013. Are We Sure About India? Kathmandu: Himal Books.

Thondup, Gyalo, and Anne F. Thurston. 2015. The Noodle Maker of Kalimpong: The Untold Story of My Struggle for Tibet. London, Sydney, Auckland, Johannesburg: Rider. By Dalai Lama's brother who served as a go-between for the CIA and Tibetan freedom fighters in the 1950s and 1960s.

Tsai Wei-ping (ed.). 1978. Classified Chinese Communist Documents: A Selection. Taipei: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Republic of China. Tripathi, D.P. and Deepak B.R. (eds.) India and Taiwan: From Benign Neglect to Pragmatism. 2016. New Delhi: Vij Books India.

Umpherston, Charles Aitchison. 2016 [1929]. A Collection of Treaties, Engagements and Sanads Relating to India and Neighbouring Countries. Delhi: Facsimile Publisher.

Upreti, Bishnu Raj. 2004. The Price of Neglect: From Resource Conflict to Maoist Insurgency in the Himalayan Kingdom. Kathmandu: Bhrikuti Academic Publications.

Van Walt van Praag, Michael C. 1987. The Status of Tibet: History, Rights, and Prospects in International Law.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A history of Tibet with the emphasis on its legal status.

Verma, Anand Swaroop (trans. from Hindi by Akhilanand, Dalip Upadhyay, and Ish Mishra). 2001. Maoist Movement in Nepal. New Delhi: Samkalin Teesari Duniya.

Wang Lixiong, and Shakya, Tsering. 2009. The Struggle for Tibet.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Wangchuck, Ashi Dorji Wangmo. 2012. Treasures of the Thunder Dragon: A Portrait of Bhutan. New Delhi: Penguin/Viking.

White, J. Claude. 2005 [1909]. Sikhim and Bhutan: Twenty-One Years of the NorthEast Frontier. New Delhi, Chennai: Asian Educational Services.

Wignall, Sydney. 1996. Spy on the Roof of the World: A True Story of Espionage and Survival in the Himalayas. New York: Lyons & Burford Publishers.

Wijer, Birgit Van De. 2010. Tibet's Forgotten Heroes: The Story of Tibet's Armed Resistance Against China. Stroud, Gloustershire: Amberley.

Woodcock, George. 1971. Into Tibet: The Early British Explorers. London: Faber and Faber.

Woodman, Dorothy. 1969. Himalayan Frontiers: A Political Review of British, Chinese, Indian and Russian Rivalries. New York, Washington: Frederick A. Praeger Publishers.

Xun, Zhou (ed.). 2012. The Great Famine in China, 1958–1962: A Documentary History.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Younghusband, Francis. 1998 [1910]. India and Tibet: A History of the Relations which have Subsisted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from the Time of Warren Hastings to 1910; With Particular Account of the Mission to Lhasa of 1904. Delhi: Book Faith India.

1920. Military Report on the Bhareli River Area and Tawang. General Staff, India Calcutta: Superintendent Government Printing, India.

1960. Documents on the Sino-Indian Boundary Question. Pek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62. The Sino-Indian Boundary Question (Enlarged Edition). Pek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84. Report on the Administration of Assam For the Year 1921–22 Reprint 1984. Delhi: Mittal Publications.